

在  
茲  
集



# 目錄

1. 封面
2. 目錄
3. 版權頁
4. 編者的話
5. 偉大的平凡，平凡的偉大
6. 與三爺交遊
7. 祥和，愛才，瀟灑，廉潔
8. 常寧以有三爺為榮
9. 冷靜沉着，深謀遠慮
10. 壽愈高而美愈甚
11. 照片一張以留永念
12. 歲暮憶藍天
13. 永念長者
14. 穩定軍心的一番話
15. 談風格
16. 精神積極，風度瀟灑
17. 模範上司
18. 我景仰的一代喆人

19. 新聞界的主帥
20. 一位高風亮節的知己
21. 東北易幟與同茲先生
22. 「活得好，死得快！」
23. 能人賢者
24. 平生難忘兩件事
25. 做人做事做記者
26. 前輩風範
27. 永恒的懷念
28. 最初與最後
29. 兩件紀念品的故事
30. 千載永懷，萬人低首
31. 永難彌補的歉疚
32. 忘年之交
33. 同老典範長留人間
34. 常寧先後兩人豪
35. 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
36. 一生一死乃見交情
37. 記「最後的晚餐」
38. 欽慕中央社難忘蕭先生
39. 待人接物處處周到
40. 逃兵的追悔

41. 前塵對景難排
42. 二十四個春天
43. 蕭三爺與楊綿老
44. 蕭先生創辦了英文通訊事業
45. 永遠抹不去的影子
46. 一位至情至性的讀書人
47. 我怎樣投入中央社
48. 我們視三爺爲家長
49. 以兩件小事爲例
50. 念茲在茲
51. 同茲先生致力振興國劇
52. 蕭先生是新聞通訊總工程師
53. 遙祭三爺
54. 記藍天之會
55. 中國的新聞事業家
56. 蕭先生寬厚仁慈
57. 有「至人之心」的蕭三爺
58. 提攜關懷與鼓勵
59. 不是逢人苦譽君
60. 憶香港的一段時期
61. 最合作的病人
62. 不伎不求不慍不怒

63. 以德服人的蕭三爺
64. 蕭先生的風範
65. 天泉西湧。空留回憶
66. 拜墓書懷以誌永念
67. 廣州之行
68. 爲三爺寫傳，我能嗎？
69. 蕭伯伯，謝謝！
70. 照人顏色我難忘
71. 事理洞明。人情鍊達
72. 灶披間的成就
73. 相見恨晚
74. 哭三爺
75. 藍天有幸
76. 憶鄉賢同茲先生
77. 三爺對我的影響
78. 卅年交遊記憶
79. 「我乾杯，你隨意！」
80. 襟懷若薰風朗月
81. 風雨憶故人
82. 要找比自己高明的人
83. 我是三爺一天的部下
84. 發揚蕭同茲精神

85. 首次晉見同茲先生
86. 少年時代同茲與我
87. 敬業樂群的楷模
88. 蕭同茲精神與我同在
89. 懷念蕭兄同茲
90. 從兩個分社看蕭先生
91. 生而無憾，死更無憾
92. 留給我最後一包烟
93. 蕭三哥軼事
94. 及早為同茲先生立傳
95. 附錄
96. 完成現代化通訊社我們需要更大努力
97. 中央社廿週年紀念會講詞
98. 運用自由，善盡責任
99. 遠大的目標，平凡的實踐
100. 中央社卅周年紀念會講詞
101. 新聞事業、新聞記者與新聞教育
102. 開弔那天
103. 六秩壽序
104. 七秩壽序
105. 生平事略
106. 墓表

## 107. 編後記

# 在茲集

蕭同茲文化基金會 編印

為保護原著作者權益，如有任何著作權相關問題，請主動與本會  
聯繫。

## 數位版編製／潑墨書房

網址：[puomo.tw](http://puomo.tw)

地址：106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號3樓之1

電話：02-2365-7755

服務信箱：[info@puomo.com](mailto:info@puomo.com)

Facebook：[潑墨書房 | Puomo Digital Publishing](#)

二〇一五年四月 數位初版



# 編者的話

沈宗琳

民國五十八年秋，我們六個人：馮志翔、張任飛、姚克紹、胡傳厚、周培敬、沈宗琳，受推編了一本「念茲集」。這次，我們六個人再度奉命編這本「在茲集」。說起來，工作雖然一樣，心情却迥然不同。

四年多前編那本「念茲集」，我們始終懷著一份悄悄的高興。因為那時蕭同茲先生還健在，大家發起每人寫幾段故事，集印成冊，用來慶祝大家長七秩晉五壽誕辰，是瞞着他老人家進行的。因此，我們在「高度保密」下進行徵稿、編輯的時候，每個人心裏都潛在著一份要在那年農曆九月十八日祝壽那天使他驚詫的喜悅。

但是，這次編這本「在茲集」，我們都是在默默的哀痛下從事的。因為去年蕭先生七秩晉九華誕，大家雖然公開說明要編一本「在茲集」，慶祝他今年的八十大慶；不料他老人家在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和我們大家永別了。當我們每次在水晶大廈十一樓蕭先生生前寓所集商編務時，更增睹物思人之痛。

唯一可以告慰大家的是：「在茲集」從籌議到成書，短短四個

月，海內外朋友賜稿，多凡九十篇。在這樣可感的盛情下，論字數，比「念茲集」的五十篇爲多；同時，徵稿範圍擴大集於中央通訊社同仁與社友之外，論內容，比「念茲集」所呈現者爲廣。如果說，「念茲集」是紀錄下了「蕭先生與中央社」的一段，則「在茲集」可以說是描繪下了「蕭先生與國家社會」的一生。

一如前例，這本小冊子的文章是依作者姓名爲序排列的；但我們另外增編了一個「附錄」，選印了蕭先生生前的講稿和文章以及身後哀榮的文件。全集配合了很多照片。此外，著名傳記作家張佛千先生曾廣徵博引「念茲集」和「在茲集」的文章以及中央社資料，寫成了七萬字的有系統的大作，發表於「傳記文學」。我們徵得他的同意，以「大家都說蕭三爺」爲題，另印單行本，隨同「在茲集」附送。此外，當初「念茲集」是中央社社友和同人湊錢出版的，這次「在茲集」則是由蕭先生家屬出資印贈的。

在這次工作過程中，我個人特別要感謝，周培敬兄卜晝卜夜爲編校努力，張任飛兄兩個禮拜的排印趕工，使得這本小冊子能在中央社五十週年的今年四月一日，和蕭先生銅像揭幕同時呈現於大家。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三月二十日)

# 偉大的平凡，平凡的偉大

丁中江

三爺——蕭同茲先生是我的前輩朋友中最被人敬愛的一位長者，他慈祥、和藹、平易、近人。當他去世的噩耗傳出後，無比的悲傷氣氛籠蓋了他的每一位朋友，大家都熱淚盈眶，如鯁在喉，有說不盡的沉痛。

追念和哀悼三爺的文章和輓聯很多，都是情文並茂，可以傳世。我却最欣賞三爺兩位好友的話，一位是周至柔先生，至公說三爺一生都從容，他那平易近人的從容是大家所學不到的，平易近人四個字每個人都知道，可誰也無法學得像三爺。黃少谷先生在治喪會中說：三爺的偉大，在其平凡中，正因他平凡，所以更顯得其偉大。

三爺走了，可是他却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他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提筆寫悼念他的文章，豈是一支筆幾張稿紙能盡其哀思！

近廿年來，三爺無論在黨和文化方面，都沒有擔當實際工作，以布衣之身，自放江湖，笑傲風月。他沒有權勢，沒有錢財，但是他以誠待人，以真待友，所以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最富有的人，因為無論是文化界、政界和工商界，認識他的朋友對他都是出於真誠，沒有任

何希冀，這種交往的基礎，在今天這個社會上，實在太難得了！

三爺最讓人懷念的，是他最容易讓人親近，當你和他相對時，他既親切，又真誠。更難得的是你會發現他是一位能和你「共秘密」的忘年長者，因為你對自己親人，甚至妻兒都不能說的話，却可以在他面前盡情傾訴，於是你覺得和他之間非常接近，他能了解你，安慰你，體貼你。

更難得的是他和你相交，不問你的年齡、地位、財富，只看你有沒有才華？有沒有作為？有沒有抱負？

我和三爺朝夕過從是這近十年的事，在此以前，我和三爺見面的機會不多，更沒有機會朝夕過從，但是在抗戰期間和大陸撤退前夕，却有兩件事深印在我的心中，給我留下永不磨滅的印象——

我於民國卅年離開昆明雲南大學轉赴重慶，加入國民公報工作。當時不僅人地生疏，而且環境困難，國民公報是大公報的班底，工作同人都來自復旦大學新聞系。我既和大公報沒有淵源，又不是復旦校友，更不是四川人（因為國民公報是四川財閥康心之所辦，代表四川財經界），當然非常孤立，幸而總編輯杜協民先生很照顧我，把我從跑新聞開始訓練。當時重慶新聞界工作同仁除了復旦校友之外，就是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的，政治學校新聞系同學都無法插足，像我完全不是學新聞的陌生人，插足其間當然不被重視，且飽受冷落。可是我咬緊牙關，忍受一切折磨，力爭上游，力求表現，既不計較名義，也

不計較待遇，有工作就做，有空閑依然工作，這樣奮鬥了兩年，加上國民公報內部有人事糾紛，互相鬥爭的結果，一個一個離開了報社，只剩下我一個年輕的傻瓜，一一接收他們留下的工作。大約有十個月，我一個人辦這張報紙，白天跑新聞，晚上編輯、寫社論、寫專欄、看拚版、看大樣。

當時重慶的日報，那一家在時間上最早出版，就可以多銷上千份，每天天還不亮總是國民公報和匪報新華日報競爭出版的第一名。我受到許多長者（如于右老、吳鐵老、蕭同茲先生和陶百川先生）的重視，就是這個時候開始。那時候我不過是廿餘歲的年輕人，受到了這麼多的讚揚，不免心浮氣傲，目中無人，特別是對那些腦滿腸肥的有錢人。不幸國民公報的老闆康心之就是一個腦滿腸肥的人，在我的心目中完全不值得一顧，但是這位康老闆却是于右老的好友，而右老則是我最敬愛的父執，又是他老人家推薦我進國民公報的。由于我太年輕，所以對康極不禮貌，爲了他要刊登一篇稿子，我拒絕刊出，寫了一封信拂袖離職，信中有「唯貧賤可以驕人，富貴豈可驕人，豈可驕我。」之句。我離開國民公報，連住的地方都成問題。



本文作者（左）和三爺在一起的時候。右為蕭公子孟能

有一天劉竹舟兄來找我，說三爺要見我，約我到中央社去見他，然後一同吃晚飯。當時我的心情很激動，也很落寞，見到蕭先生，他和藹可親，誠摯親切地聽我訴說經過，然後娓娓勸我不要煩惱。這樣

傾談了一個多鐘頭，一起去吃飯，問我的生活情況，也談到工作，還要竹舟邀我到中央社宿舍暫住。然後三爺勸我第二天去見右老，坦誠的把我離開國民公報的經過向右老報告。分手時告訴我說，他還有事拜託竹舟和我談。三爺走後，竹舟告訴我說，三爺交給他一千塊錢轉送給我，要我一定收下。同時問我可不可以考慮進到中央社工作？

這時候我已經接受中央設計局的工作，所以對三爺要我進中央社謝辭了。一千元我本不想收，竹舟却要我不可推辭，因為這是三爺的心意。我和三爺並不熟，平素見面也不多，可是三爺如此厚待我，我的感謝是無法用文字來形容的。我原本不想去見右老，因為右老和康心之是好友，可是三爺要我一定要去一趟，我只好硬了頭皮去見右老。怎知右老一點不責怪我，一迭連聲稱讚我有骨氣，是個好青年，殷殷問我生活有沒有困難，工作找到沒有？如果不是三爺的教導，我可能從此和右老不能見面。三爺這種春風化雨，實在令人永誌難忘！

大陸剿共戰事逆轉時，我和陸鏗（大聲）在廣州創辦天地新聞日報，這是一張純新聞從業員自己用勞力作爲資本所辦的報紙。開幕的第一天下午二時在報社舉行酒會，最早到的是三爺，我們大感意外，原來他就是這一天早上由上海飛到廣州，一下飛機看到報上有關我們舉行酒會的消息，就第一個趕來道賀，同時第一個親筆訂了一份我們的報紙，並且一直替我們招待朋友，到酒會散後才離去。以三爺當時在新聞界的地位和聲望，他如此週到和關切，給我們的鼓勵，實在比任何金錢和物質力量爲大，我們也以此爲榮，廣州天地新聞日報的第

一位訂報讀者是蕭同茲先生。當時在這份報紙中挑大樑的，就是現任監察委員沈宗琳兄，還有台視副總經理李蔚榮兄，名教授漆敬堯兄等。

以上這兩則故事，在三爺一生行誼中可能微不足道，但是他給我印象之深，感我之切，真是讓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近十年來由於我長住台北，因此和三爺時相過從，不知不覺中讓我覺得三爺是最可依賴的長者，無論你有甚麼煩惱和困難，只要向他傾訴，他會安慰你，為你化解。三爺去世後我感覺到最大的悲慟，就是他在世的最後幾個月，我沒有能天天晚上陪伴他，因為我血壓高，醫生勸我早睡早起，我也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所以晚上應酬一完就回家，這樣近一年都沒有陪三爺飯後宵夜，及今思之，萬悔無及！也因此更顯得葉明勳兄的難能可貴，廿多年來，明勳兄朝夕和三爺相對，廿年如一日，從不間斷，所以他也是朋友中最後一位和三爺晤面並且長談的。當我以萬分悲愴的心情悼念三爺時，我希望三爺的忘年好友葉明勳能接下三爺的棒子，繼承三爺的風範，為我們朋友輩的一個中心。

三爺與世長辭，他的言行，他的風範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 與三爺交遊

卜少夫

往年三爺的生日，漫不經心地讓它過去了，未做任何表示，我想，他爲人那樣的瀟灑自然，是不拘此種浮套小節的。假使其時我在台北，陪他喝一次酒，或喫一頓宵夜，談談說說，歡聚一次；假使未能適逢其會，存諸於心，想到了他的誕辰，也就算表示了一份友情。可是去年他的七十九歲生日（國曆十月廿五日，農曆九月十八日），對我却大大不同，之前，很想安排去一次台北，爲他祝壽，如果當時不能成行，在過了生日不遠的期間內，再爲他補壽。

結果，事前未能前往台北。

但我却寄了一張祝賀生日卡，請明勳兄轉交，因爲我不記得他的住所水晶大廈第幾樓，怕有遺失。這是我認識他近四十年來的第一次。

也許是一種預感：他畢竟是接近八十高齡了，他最近半年（去年一月到七月），給我有一種難以支持、掙扎的印象。不幸，這一擔心竟很快很快的來臨。

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晚間他去世了，十二日晨讀報才得知這個噩耗，當時爲之一陣茫然，好像兩腳已騰空，飄飄浮浮地，無聲影，無氣味，無感覺，無有，無無有。說不出失去了甚麼，或被奪去了甚麼。

我不能趕往台北，因爲第二天——十三日起，早已應美國洛歇飛機公司邀請，赴洛杉磯參觀訪問一星期。他的大殮之日，我想，一定有機會去看他最後一面的。十一月廿日從洛杉磯返回香港，廿四日下午去台北，因爲廿五日公祭大殮，我參加了祭悼，並一直看到他的遺體火化，廿六日晨才返香港。

廿四日晚，他的生前好友陪靈，黃達雲將軍特地帶來兩瓶好酒，他提議生前與三爺喝酒的朋友，今晚陪他飲最後一杯，大家接受了這建議，肅立靈前，舉杯飲時，每個人眼眶裏都含著一包淚水，這一幕，朋友們將永難忘記的。

## 奇特遇合奇特交往

我和蕭先生的關係非常奇特。

非同學，非同鄉，非同事，年齡相差一大截，又沒有在中央社工作過，他主持中央社時，在南京我還是一名小記者，雖然與那時在洪武路採訪部的馮有真、馮志翔、律鴻起等有交往，祇是工作上的關

係，他住的沈舉人巷，祇去過一次罷。

重慶時代，我供職中央日報，結識中央社的朋友更多，和他晤面，寥寥可數。抗戰勝利後，我由南京中央日報轉到上海申報，更少機會接觸。

大陸撤退初期，在香港，在天后廟道的潘公弼先生家裏，有一次歡聚，那一次相信彼此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真正與他過從密切是他在卅九年交卸了中央社社長職務以後的事。這廿三年中，幾乎我每次到台北，必和他見面，必和他歡聚。我不能不說明的，這一遇合因緣的形成，主要由於明勳兄的關係。

在他聲勢煥赫時，固然高不可攀，無從結識；在他無拳無勇，閒雲野鶴的退休時，從功利觀點出發，應該是更無交往的必要了。

然而，不僅是我，這廿三年來他確實也結交了不少新朋友，而這些新朋友和他的往還，可說是純友情的，基於一種人性中的彼此契合，一種精神上的彼此彌補。似乎和他在一起，有難以描述的和諧、舒徐，這大概就是所謂「如沐春風」的意思。

## 做人比處事更偉大

有一位年輕的外交官常常聽到有人讚頌三爺，樂於和他交往的故

事。三爺逝世後，他再看到各方哀悼的盛況（這位年輕人從未接觸過他），很奇怪，也很不解，問我：爲什麼他贏得如此的廣大人緣與深厚友誼，在當前這個極度現實的環境中？

老實說，我也很難具體的答覆這個問題。以我個人所親身感受的，祇覺得屬於一種氣氛，一種精神上的，而且是在自然流露中的一種聚合，從未想到爲什麼，有什麼作用，可以獲致怎樣的結果。

人不能離羣而獨居，性格上與心情上的此盈彼虛，彼消此長，往往需要調撫、挹注、互濟有無，中年以上的人，每多出現或徘徊於此種境界，說來也確算玄妙。

最近幾年，朋友們知道我常稱三爺爲「師父」，三爺也從不願意接受，有時反過來說，拜我爲師。其實我決非戲言，完全出諸於內心真誠，希望能學習他的以下若干風範：

他的恢恢有容的氣度。

他的從容不迫的態度。

他的平易近人的風度。

他道人之長，而不論人之短；他助興而不掃興；是非執着而不鄉愿；名利淡薄而不矯情；助人求心之所安，受敵則報之以恕。

這許多德操，是爲我敬仰，是我所缺乏，而願學習遵奉，身體力

行的。

以一個非新聞從業員出身的人，對於中國新聞界在那個翻騰的大時代卅二年中所做的貢獻，那是驚人的，也是歷史性的；但我認為值得大筆一寫的，是他站在一個國民，一個黨員，一個新聞從業員的立場，如何調和而樹立的一種典範，做爲一個新聞事業領導者，在做人方面的成就，一般公認，更遠遠駕乎他處事之上。

## 飲酒與唱戲

三爺懷具赤子之心，不是藝術家，却深深領會藝術，再加上他的厚實的感情，這些氣質的交揉，使他放射多方面的興趣，生活也多采多姿。我常常回憶也在揣測民國十七年他與吳鐵老啣命出關，與張學良先生折衝周旋的那些場面，是充滿了何等的詩的、畫的、戲劇的風情呀！他們不辱使命，東北易幟了，可也更證明了當局當時睿智的選擇。

他歡喜喝兩杯，爲飲者之上品，從不勉強人，自己也不豪飲、暴飲，興到爲止，因此，我們從來沒有看見他飲過量，至多有點怡然微醺而已。

他歡喜哼幾句皮黃，對捉放曹、烏盆記、搜孤救孤之類的鬚生戲，相當有研究，唱來中規中矩，而且能充分表達劇中人的感情。卽

使內行也致以敬佩的。每次酒酣耳熱之餘，聽他高唱一曲，領會到他那蒼涼的心境，神經每每爲之顫動不已，家仇國恨，悲憤萬千，聊寄歌聲而抒發，當時歌者聽者，心曲相通，都獲得了片暫的陶醉與慰藉。



本文作者（右）在六十歲時，三爺邀宴

## 給你鎮定給你勇氣

像很多很多朋友和他交往一樣，大家並不是指望他給與發財的機

會，給與做官，或兼個董事、顧問拿乾薪的機會。大家和他做朋友，因為他能給與任何煩難憂惶的心情以祥和寧定的力量。

他是最好的投訴、傾訴的對象；委屈、拂逆、甚至對妻子家人都不便說的，可以無保留地向他侃侃而道。也並非一定希望他指示，如何去應付、進行、解決，好像對他說了，就得到滿足，就了結了一件事。

可是他不是一個消極、悲觀、犬儒主義者，他始終樂觀，生趣盎然，活潑潑地，眼睛望着明天。當你需要他表示意見時，他的意見不脫離勇氣、前進、韌性。一個花甲以上的老人，在他的言談動作中，你絕找不到半點拖泥帶水、垂頭喪氣的跡象。他就是活得那麼爽朗、挺括！

他悄悄地走了，走得那麼灑脫自在，許多朋友將有很長很長一段時間惘然若失的。我知道寂寞留給明勳和明二兄的將遠比任何人為深重。讓我們大家啃嚙他生前給與我們的，來度過這段悠長傷感的日子罷！

(癸丑年除夕前三日於香港)



# 祥和。愛才。瀟灑。廉潔

## 于衡

十一月十一日晚上十點一刻，新聞界元老蕭同茲先生，在他住的水晶大廈十一樓寢室中悄然逝世。當他的家人發覺老人家喉中有一口痰吐不出來，急着招醫救治時，他的心臟已經停止跳動。

## 凋謝

第一個獲悉蕭同茲先生病危的人，是前中央社台北分社主任葉明勳先生，但當他匆匆忙忙地趕到蕭家時，老人家已經停止呼吸。於是他拉著蕭先生的手，伏在身上痛哭。那一晚同茲先生的臥室，擠滿了人，每一個人都默默地站立在他床邊，擦著眼淚。

他實在走得太快，因為那天下午四點多鐘，他還告訴葉明勳說：『感冒了幾天，因為忘記了吃防止高血壓藥，近來血壓高一些，相信短期內可以復原。』誰會想到，在六小時後，這個新聞界的「老兵」，忽然會「凋謝」。

十一日深夜，殯儀館派了一輛車子，並帶了一個担架，但水晶大

廈的電梯容納不了一個「睡著」的人，於是親朋計議，把遺體從十一樓抬到一樓，沿着樓梯，一層一層的走下去。同茲先生平日上下樓都搭乘電梯，但他走的那天，却通過了十一層樓，恍似在和每一位隣居道別。

同茲先生遠在二十年前罹過心臟病，住了一個時期醫院，因為他為人豁達，氣度恢宏，所以不久之後就恢復了健康。他和常人一樣，喝酒，吸煙，看報，讀書，並參加應酬。他平日常說，「活要活得好，死要死得快」。

## 祥和

近二十年來，他確確實實生活在快樂之中，雖然他也有着許多不如意的事。但每一件不如意的事，降臨到他的身邊，都被他常說的口頭語，「事情不大」的哲學化解了！

同茲先生在新聞界中被稱為三爺，凡是蕭三爺所到之處，就充滿了祥和的氣氛，因為在「三爺」身邊，每個人都有着「如沐春風」的感覺。

蕭三爺在他手創的中央社工作了三十多年，為中央社網羅了第一流的新聞人才，並為中央社建立了良好的制度，留下了自由與和諧的氣氛。中央社的人們常津津樂道的一件事是：在中央社創辦之初，蕭

三爺爲了網羅人才，他到北平英文時事日報去借將，禮聘了任玲遜先生到中央社工作，因爲任玲遜是燕京大學畢業的高材生，他給任玲遜的薪水，比他自己的薪水還多一百銀元，當時同茲先生的薪水是四百銀元，而任玲遜的薪水則是五百銀元。

另一件事，是民國卅八年夏天，麥克阿瑟元帥訪華，第二天匆匆返回日本，當時中央社的採訪副主任張任飛先生找不到採訪車，向蕭先生借車時，他說：我也陪你走一趟。他們上車之後，從西寧南路，經過中正路，到台北酒廠附近時，張任飛看見總統府侍衛長黃仁霖將軍的車子已經折返，乃向三爺說：『看樣子麥帥的座機已經起飛，現在還要不要趕往機場？』三爺的回答則是：『現在你在工作，一切由你指揮，我祇是跟你走一趟。』

## 愛才

還有一件事是：現在擔任監察委員的前任中央社總編輯沈宗琳先生，民國三十六年南京中央社做編輯部副主任時，上海申報的陳訓愈和卜少夫，曾以重金禮聘沈宗琳做南京辦事處主任，薪水大約高出中央社一倍。沈宗琳因爲當時家中的人口衆多，中央社的待遇不够開支，而且他又借住朋友的房子，於是他考慮向蕭先生請辭，但當他口袋裏帶著「辭呈」，走進蕭三爺的辦公室中，蕭先生却和他討論到中央社的「今天」和「明天」，他在如坐春風中，竟然不好意思說出他

要辭職的計劃。於是帶着原來的辭呈，回到編輯部繼續工作。沈宗琳且一直把那件事情埋到心底，一轉眼間二十六年過去了。

三年前，過去在中央社工作的張冰子先生從馬來西亞返國，下飛機後的第一件事，便是打聽同茲先生的住址，然後攜了兩瓶洋酒去看「三爺」。

張冰子告訴我說，他離開中央社已經二十多年，平常也沒給蕭先生寫信，但三爺的影子却常出現在他的腦裏。

## 瀟灑

一個人在他「當權」的時候，受到人們的恭維與尊敬，不算什麼稀奇，而在他隱退之後，人們比過去更為尊敬他，那才是真正的尊敬。而蕭三爺，便是在他離開中央社後，更受到尊敬的一個人。

同茲先生能夠認識人才，發掘人才，選拔人才，培植人才，更能夠善用人才。而且從來不對下屬疾言厲色。成年累月，臉上總是堆着笑容，那是他在做人方面的成功。他的朋友和部屬很多，但人們却從來沒聽過三爺背地裏批評別人的短處，相反的則常聽到他欣賞別人的長處。

他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特別喜愛新聞界年輕的一代，當他讀到一篇年輕記者寫的好文章時，他會撥個電話，表示他對那篇文章的欣

賞。中央社的「第三代」記者黃肇珩小姐，便是受到這種鼓勵的記者之一。

近年來他愛打保齡球，晚間則在藍天餐廳品茗，和二三好友聊天，他愛喝幾杯，但從不過量。今年夏天，薛毓麒大使自西班牙返國，中央社的國內新聞部主任彭清先生和葉明勳先生等約薛大使和三爺在中央酒店晚餐。那一晚三爺的興緻很好，多喝了幾杯，葉明勳和彭清都有醉意。大家下樓時，不見了蕭先生，由於天氣太熱，薛毓麒先生擔心三爺會在路上暈倒，於是薛和我分頭在附近尋找。當我找到藍天餐廳時，遠遠的就看見他很瀟灑的坐在餐廳的一角和賈毓泉先生一道品茗，真是仙風道骨。他看見我慌慌張張的滿頭大汗，一下子就明白了是在找他。乃不慌不忙的說：『不要擔心，我喝酒是有尺寸的……』

## 廉潔

同茲先生於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一日出任中央通訊社社長，到三十九年，他把職務交卸給曾虛白先生，他則擔任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直到五十二年十二月底退休，他在中央社整整工作了三十二年零八個月。其中最使人「肅然起敬」的事，是在大陸撤守之前，蕭先生從中央領到一筆經費，原預定購置通訊器材，但後來局勢緊張，物價天天上漲，三爺乃把那筆錢換成六百兩黃金和十萬多元美鈔，在兵荒

馬亂中，蕭先生把那筆錢帶到台灣，並保存在台灣銀行的保險箱中。中央社的賬面上沒有記載那筆款子，也沒有人知道蕭先生把那筆錢帶到台灣。但在卅九年他辦理交接時，却把那筆黃金美鈔交給了他的後任。

同茲先生近十年來，以閒雲野鶴之身，度過晚年，但他並不寂寞。今年的陽曆十月廿五日，剛剛度過八十歲生日，那是他和中央社的同仁一道度過的，在酒席桌上，他表示過，明年他生日，還要和大家再一起。

五年以前，在他七十五歲生日，過去和當時仍在中央社工作的同仁五十三人，出了一本「念茲集」。那裏面寫了三爺很多真摯而動人的故事。在那些故事中，歸納成一句話，便是：『每一個追隨他做事的人，都感受到自己的人格受到尊重。』那也便是中國讀書人最需要的「精神報酬」。

現在同茲先生去了，他沒有留下什麼遺言，因為他從沒想到死亡。他熱愛社會，熱愛國家，愛他自己，也愛別人。在他的眼中，一切都是美好而和諧的。他真是「活也活得好，死也死得快」。在沒有痛苦中，走向人生的終站。

他留給新聞界的遺產，實在太多，但那是無形的，人們所難能領悟到的。現在我們所能夠覺察得到的，則是他那高潔的風格，和一切與人為善的心地，更重要的是他那恢宏的氣度。



# 常寧以有三爺爲榮

尹滌寰

國父創建民國，締造共和。這是「中國人」的光榮！

黃克強先生協助 國父，締造民國。蔡松坡先生護法討袁，再造共和。這是「湖南人」的光榮！

蕭同茲先生——「三爺」，在開國六十年代中，享有「中國新聞事業拓荒者」的美譽，是位成功的新聞事業家！這算是「常寧人」的光榮！

我很幸運的享到了「中國人」、「湖南人」而又「常寧人」的這三種光榮！

以上的感想，是我在「三爺」去世後，第二天早晨讀報知道消息時，自然而然地在腦海裏構成的一種悼念意識與驕傲感！

三爺是湖南常寧人，系出常寧西鄉藍江蕭家村，距縣城十二華里。我是生長在縣城的，在家鄉時，未見過面，因爲三爺讀書後做事就少回到家鄉，而且年齡整整長我二十歲。但我知道三爺家中不大富有，僅薄田數畝；後來職膺中樞，身世顯赫，家鄉是確確實實沒有置



過一點產業的。其廉操洵可風世，足見心在事業，不爲身謀。

鄉賢陳貽孫先生，有政治理想，性剛方，對時人不輕許可，惟對三爺，則以「有政治眼光與頭腦，有事業心」美之。

三爺沒有學過新聞，也沒有出國留學。雖然獻身革命，歷任中委、中常委、中央評議委員、國策顧問，但從來不肯做一日官。其一生事業在新聞，主持中央通訊社，任職達三十二年，由敝屋三楹，員工二三十人，發展到分支機構遍全國及國外，鼎盛時期，分支機構在國內者五十有二，在國外者二十有五，全社員工達二千六百餘人之衆。談現代新聞界中的傑出人才，受過三爺薰陶培成者，恆河沙數，不可勝計。三爺壽高八秩，新聞界尊爲元老，奉爲北辰。其才度弘毅，與其成功之道，當非常人所能及！故今日談中國新聞事業家者，必推三爺爲第一人，豈偶然哉！

三爺喆嗣孟能兄，民卅八年春回到家鄉，由郭南強兄陪同來看我，好像是籌辦中學的事，要我贊助，這是我認識孟能兄之始。來台後，雖與孟能兄常有過從，但從來沒有因此關係去「干求」、「請託」過三爺什麼？我說明這點關係，只是證明我對三爺的崇敬，不是私誼，而是發乎內心裏對一位偉大新聞事業家的成功和偉大，我髣髴也沾上了一點驕傲和餘榮！

在台，我與三爺，數挹清芬，總覺得他有一股雍容文雅，汪洋浩瀚，和善親切，清新雋逸，接之也溫，休休有容，芬馨如蘭的氣質！

又有一種藹然仁厚，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秋月照人，冬月溫人，如羊叔子的汪洋大度！所以主持中央社，得有偌大的成就！集新聞界之大成，數千高級知識份子的新聞從業人員，能得到歷久不衰、尊敬如一的崇拜，豈可倖致！

三爺既歿，很多人或痛哭失聲，或嚶嚶啜泣，開弔前夕，景行廳裏，擁滿了黨政軍及新聞界元老，許多希齡耆宿，還自動的在那裏輪值守靈過夜。越月，陽明公墓既成，啓靈告祭之時，還有一位在新聞界已有成就，而學貫中西的老人，着長袍，躡踊痛哭，跽靈不起。與祭人士，莫不黯然而淚下！始信今日「陽明尚有隳淚碑」的真實事實，足與「硯山隳淚碑」古今媲美。

三爺少小離家，老大未回，宣勤黨國，「王事靡盬」，人或以爲他對家鄉會是陌生的，但我知道他愛國愛鄉，并無二致，下面兩事，可以作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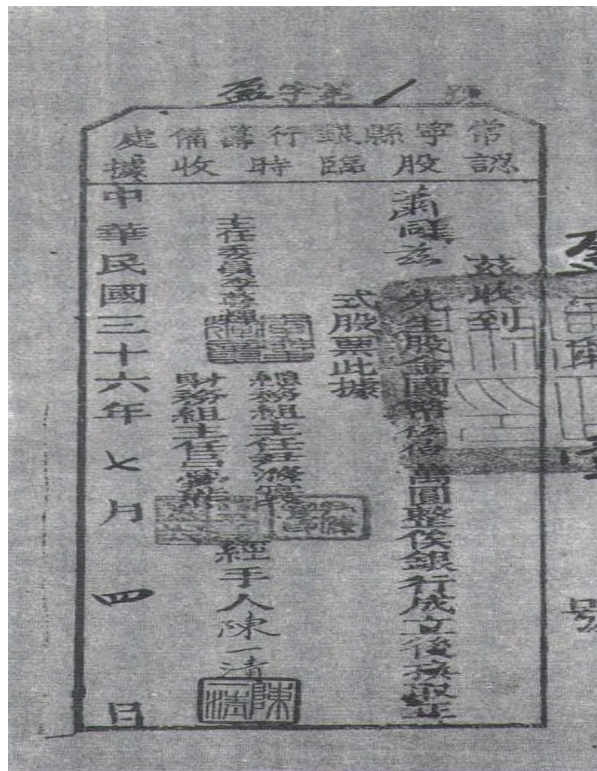
（一）卅五年抗戰勝利，國土重光，美援物資，撫輯災黎，常寧應領發救濟物資，被當時縣長李某違法盜賣，計西貢米及蛋粉奶粉類，達二百十九噸之多，得價僅市值十分之一，其價款挪作別用，變相瓜分，人民滴惠未沾。我當時年方三十，血氣正盛，在參議會嚴詞詢究詰責後，由我提案檢舉，嗣經檢察官起訴，衡陽地院通緝，省府始明令撤職，并限照數追賠物資。該縣長漏夜潛逃，鴻飛冥冥，我於是再提前案，由參議會將檢案函送全省各縣各報，並函南京中央通訊

社發佈新聞，務期緝案賠繳。不數日，全省各報登錄全案原文；而「中央通訊社」也徧及全國新聞報紙！同時也接到三爺親筆來函表示「欽敬」！并對我的述志詩：「有志掃除當道棘！一心培養自由花」句，表示「激賞」！

這足見三爺愛家愛鄉與正義感的濃厚！

（二）民卅六年陳丈貽孫發起籌辦縣銀行，京滬由陳募股，縣方由我募股。在京滬認股的同鄉，三爺就是首先自動響應參加的；後來三爺也當然當選為董事之一。現在在台的當時董事，尚有朱有為、蕭新民、朱自強、劉已侗與我數人，均知其事。三爺在家鄉，沒置過一文錢產業，而與地方社會經濟有關事業，却如此義不後人！

這足見三爺愛鄉愛國與富於社會事業心的濃厚！



蕭先生投資常寧縣銀行的股票收據

三爺雖壽高八十，然神采奕奕，儒雅瀟灑，精力健旺，識慮深遠，望之猶如六十許，不啻是神仙中人，如再假以十年廿年，對國策之獻替，全民之福祉，必多裨益。誠如在台北市黨部治喪會上，方治

先生講演詞結句說：『蕭先生識慮彌遠，惜未能假以年，盡其才，竟其志，這確是國家最大的損失。』我當時覺得：更是我們常寧人的損失！因為失去了這樣一位長者！

三爺葬禮既竣，新聞界懷念其勳業，與偉大的成就！復鑄造銅像，樹立於中央社總社。以瞻以仰！念茲在茲！並創立文化基金會，拍製電影片。後之人將聞風興起。三爺之勳在黨國，在人間，在新聞界，亦將長在後代人士之心目中！永不磨沒！

培敬兄電話：屬我寫幾句紀念三爺的文字，以實「在茲集」。時賢衰衰，胥盡當代名家；三爺勳業，已昭史冊；其逸事遺聞，更有各大名家鴻文記述，我祇能拉雜寫這些「雜碎」交卷，實不成爲文章。

最後，我以在治喪會散會後，歸途中所吟成的一幅「紀實」的聯語，也是我表達哀悼三爺的心聲，以作本文的殿尾！

縮全國新聞樞紐，三十二年，通訊機構徧全球，無冕稱王，人世長留念「茲」集！

迺吾鄉革命耆英，八旬高壽，洪範箕疇全五福，奇才名世，德業早著大「同」篇！

六十三年二月十八日於雲山新村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創業樹宏規，懋績克昭，橫掃千軍張筆陣；  
濟時垂令範，遺徽不泯，總持卅載緬幃籌。

# 冷靜沉着，深謀遠慮

## 方治

同茲兄，湖南人。性倜儻，溫良純篤，平易近人。朝野人士多樂與交遊，往往稱之爲蕭三爺而不名。其人緣之佳，人望之重，於此可見。猶憶民國十六年，余由福建省黨部奉調中央宣傳部服務，與同茲兄、張廷休兄、朱雲光兄同任秘書，按組分工，襄助葉公楚儉策畫部務。同茲兄冷靜沉着，深謀遠慮，每值國內外情勢錯綜複雜之時，特能高瞻遠矚，發揮其獨到主張，做宣傳之指導，貢獻良多。尤其是對中央通訊社之改建、革新與發展三大進程，同茲兄獨當重任，夙興夜寐，艱苦備嘗。

當年新聞傳播，國內通訊零亂複雜，不易徵信；國外通訊取捨由人，無法運用。而且外人在華所辦之通訊社，往往憑其主觀之好惡，作爲發佈消息之依據，以致訛傳臆測，莫衷一是，影響視聽，至爲重大。中宣部主管對內對外之宣傳，新聞通訊此一關係大眾傳播之重要任務，乃宣傳之基本資源，斷斷不容忽視。楚儉先生因以建議中央，指定同茲兄專任中央社社長，授以全權，並付與足資擴充之經費，使成爲獨立機構，力圖發展。終賴同茲兄之展佈長材，得以衝破難關，奠定基礎，並於短短七八年中，業務蒸蒸日上，贏得中外好評，外人

所辦之通訊社相率與我中央社成立合作協定。

於是進而在世界各國重要城市設立分社，或派通訊專員，藉收通訊交流之功効；國內各報亦在此重大革新之後，一律採用中央社稿為唯一之正確報導。所以中央社前在大陸，對剿匪、戡亂、抗日，以及來台灣對反共復國之宣導工作，均能克盡最大之努力，卓著優越之表現。凡此一切，端由同茲兄三十餘年所流之血汗，澆灌培植，有以致之，其殊勳懋績，自當在黨史與國史有其光輝記載之一頁。

奈何人生如夢，朱雲光兄身陷大陸，據聞早已不在人間；張廷休兄來台灣曾任考試委員，亦於數年前謝世；今同茲兄又以心臟病遽歸道山，當年中宣部四秘書，存者僅余一人，撫今思昔，不勝傷感。南京丁家橋中宣部秘書室之形象，當年彼此和衷共濟黽勉從公之精神，尤其同茲兄之音容笑貌，始終縈迴腦海而無法釋諸於懷。近來公餘之暇偶爾散步於台北市水晶大廈同茲兄寓所門前，輒徘徊瞻顧，不忍離去，而仰觀悠悠白雲，深感人琴之痛，不能自己。



睥睨塵寰意自高  
歌場酒陣共偏高  
卅年心血寫閑業  
留與宗邦作寶刀

送恩

回台元

景年徐秋白



# 壽愈高而美愈甚

王兆荃

同茲三爺足下：欣逢我

公六十華誕，僕不文，不能以詩古文詞爲壽，然又不能已於言，爰以書進，幸恕其草草。僕偶與朋輩聚談，輒稱道我

公之美，淺見者或以爲諧謔，而不知此實僕廿餘年來感受有得之語。

廿餘年來與

公相接，不爲少矣，而每見輒覺光彩四射，清氣襲人，俗塵鄙念爲之滌去三斗，推尋其原，竊以爲

公實詩人，方克臻此。僕知

公必不自承此號，以爲己未嘗詩。然詩人有作詩與行詩之別，作者詩發於腦，而形於筆；行者詩萃於身。而顯於行。夫著之於身外之楮墨，何若著之於己身之行爲。

公雖未嘗爲詩，而言笑警效，乃至舉手投足之間皆詩也，尚何取於楮墨乎？雖然

公又不僅爲詩人也，彼詩人者大抵靜而乏動，柔而缺剛，失之於偏，至而未可語於周全。周全之道，固須有阿波羅之寧靜澹雅，尤須有巴喀士之發揚蹈厲，所謂剛柔相濟、動靜雙修方爲得之。試溯

公之勳業，其始也，以輕裘緩帶之姿，而冒險犯難，助成偉大之革命；其繼也，以低吟淺唱之態，而筆路藍縷，開創恢宏之事業。外溫文而內剛毅，蓋冶詩人英雄於一爐而始成。

公之美，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非我

公其孰足以當之。抑又有進者，世所稱英雄所憑為血氣，美人所賴為容顏，及乎血氣既衰，容顏既改，而美亦隨之。

公則蘊藏之富，體會之深，隨年以俱進，故壽愈高而美亦愈甚，此內發者所以不同於外鑠也。謹以此

意為

公上壽可乎？專肅敬祝

千秋，並賀

夫人萬福

此余壽三爺六十壽函也，函中盛讚其美，而文雖拙劣，意則誠懇，蓋追本溯源，身正則其他隨之，初不必述其功勳也。今忽忽二十年矣，而先生已歸道山，人天永訣。痛也何如！

憶昔三爺曾謂「生要生得好，死要死得快」，余嘗師佛教莊學及西儒之意，而以今語出之，以文所言僅係意願而非決策，然內心實佩其洒脫。今兩者皆已如其所願，此在三爺自可無憾於人間，然來日大難，生者何堪？不識九泉有知，亦曾念及否？

此二十年間，余以教讀餬口，甚少暇時，故晉謁無多，即賀年之禮亦廢，而先生不以爲悔，反謂賀年便俗。嗚呼！由此可見其風度矣！

附贅數語以當誄辭，不自覺其涕泗之滂沱也。

兆荃謹誌 六十三年一月

### 治喪委員會

立身以忠直誠信爲先，心力瘁宗邦，懋績永當昭簡策；  
撒手於播越艱屯之際，橫流正滄海，餘生不及共澄清。

# 照片一張以留永念

王永濤

蕭三爺去了，所有認識他的人，現在一提起他，總有一股說不出的感情，激動著每一個人。

我和三爺最後一次相會，是在他離世三個月以前。他在中央酒店緊握住了我的手，要我坐在他的身傍。平時相會，總要乾上三盃白蘭地，這次我說：『三爺，我患了胃病很重，不能陪您喝酒了！』他很自然而關注的看了我一眼。散筵後我扶持他老人家下樓走到大門，想不到就成永別。

三爺向以助人為樂，當復興劇校十分困窘的時候，我去請求他擔任董事長。他說：『我現在是退休之身，無力担任難鉅。』經我再三懇商，他毅然決然負起責任，從民國五十年一月到五十七年三月改為國立，始終如一。

今日復興劇校能揚名國際，為復興中華傳統文化而努力，蕭三爺功不可沒。



蕭先生擔任復興戲劇學校董事長時，歡送調景嶺學生回香港。他的右邊是校長王振祖，左邊是民族晚報董事長王永濤

# 歲暮憶藍天

王家松

我追隨蕭先生多年，親承教誨，受惠極深，至今獎掖之恩未報，他竟撒手而去，人天永隔，悲慟之忱，鬱鬱於懷。屢欲追述一二往事，奈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以致提筆而擱筆者再，延至今日才拉雜寫了片段的回憶，聊表哀思與敬意。

我出國已有廿六年了，每次回國多由老友葉明勳兄安排首先拜見蕭先生。三年前我因公返臺，抵達之日，行裝甫卸，就接到明勳兄電話相約當晚十一時到藍天餐廳晤面，我如約到會，一進門遠遠地就看見蕭先生和明勳兄等數位老友圍坐閒談。他老人家雖兩鬢斑白，而精神矍鑠，風度瀟灑不減當年。相見之下，握手暢談，至深夜方散。這次充滿愉快溫暖的重聚，至今猶縈迴腦際。

藍天餐廳設於臺北嘉新大廈的最高一層樓，佈置幽雅，環境舒適，憑窗遠眺，全市風光盡入眼簾，這兒就是蕭先生近年幾乎每晚必到之處，與二三好友品茗聊天，在輕鬆安逸氣氛中度他的晚年歲月。那一次我在臺勾留了一個多月，白天為公忙，晚間酬酢頻繁，可是百忙之中我總要抽空去看蕭先生。記起在公畢離臺的前夕，我趕到藍天

餐廳向蕭先生拜辭之時，依依的心情，彼此心照不宣，詎知藍天一別，竟成永訣，言念及此，不勝悲愴。

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中央社的創立和今日的規模，蕭先生有不可磨滅的貢獻。而蕭先生的事業成功，則得助於他的做人成功。他老人家一生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不矯情，不做作，不擺官架，對部屬寬厚為懷，推誠信任，關愛體諒，無微不至。工作上偶有差錯，輒良言規勸，絕不嚴詞責備，這份溫和坦誠的人情味，惟有身受其惠者才能深刻領會。

蕭先生胸懷磊落，與世無爭，遇有不如意事，常能泰然處之。明勳兄「哭三爺」文中，提及陽明山之行，拜讀後我感覺蕭先生的豁達氣度，實可與陽明山上的藍天比擬了。

憶五年前蕭先生七五誕辰，中央社同仁編了「念茲集」一冊，我也寫了一篇拙文祝壽。年終時，便收到蕭先生寄來的一張賀年卡，附一短箋，字裏行間不僅洋溢著親切的友情，而且表現出高超的風格。茲僅錄原函於左：

『家松：今年賤辰意外的收到一份很珍貴的禮物——念茲集，朋友們這樣意味深長的用心，那麼多熱情洋溢的文章，使我深受感動。

『大家把我描寫的太好了，實在愧不敢當。中央社的一切成就，都是大家集體的心血和努力的結晶，我個人的貢獻實在微不足道，倒



是當年盛會難再，未免令人無限惆悵。如今風雨晨昏，每展閱此一文集，字裏行間就會浮現着一張熟悉的面孔，彷彿知己重逢，握手談心，這份親切之感，又非言語所能形容了。

『生平貴求適意，老來懶散，尤不耐咬文嚼字，蕪箋遙寄相思，功拙在所不計。』

我與蕭先生有一同好，記起十幾年前我回臺北，兩度觀賞小大鵬的星期日演出，而兩度與蕭先生不期而遇。迨九年前回國的一次，應辜振甫兄之邀，欣賞金素琴女士主演的「潘金蓮」，蕭先生竟亦在座。散場時他笑著問我：『家松，你胡琴學得怎麼樣？幾時替我吊吊嗓子吧。』九年來我學琴未嘗間斷，而始終沒有機會爲他老人家吊過一次嗓子，實引爲憾事！

(六十二年十二月廿日於倫敦)

# 永念長者

王惕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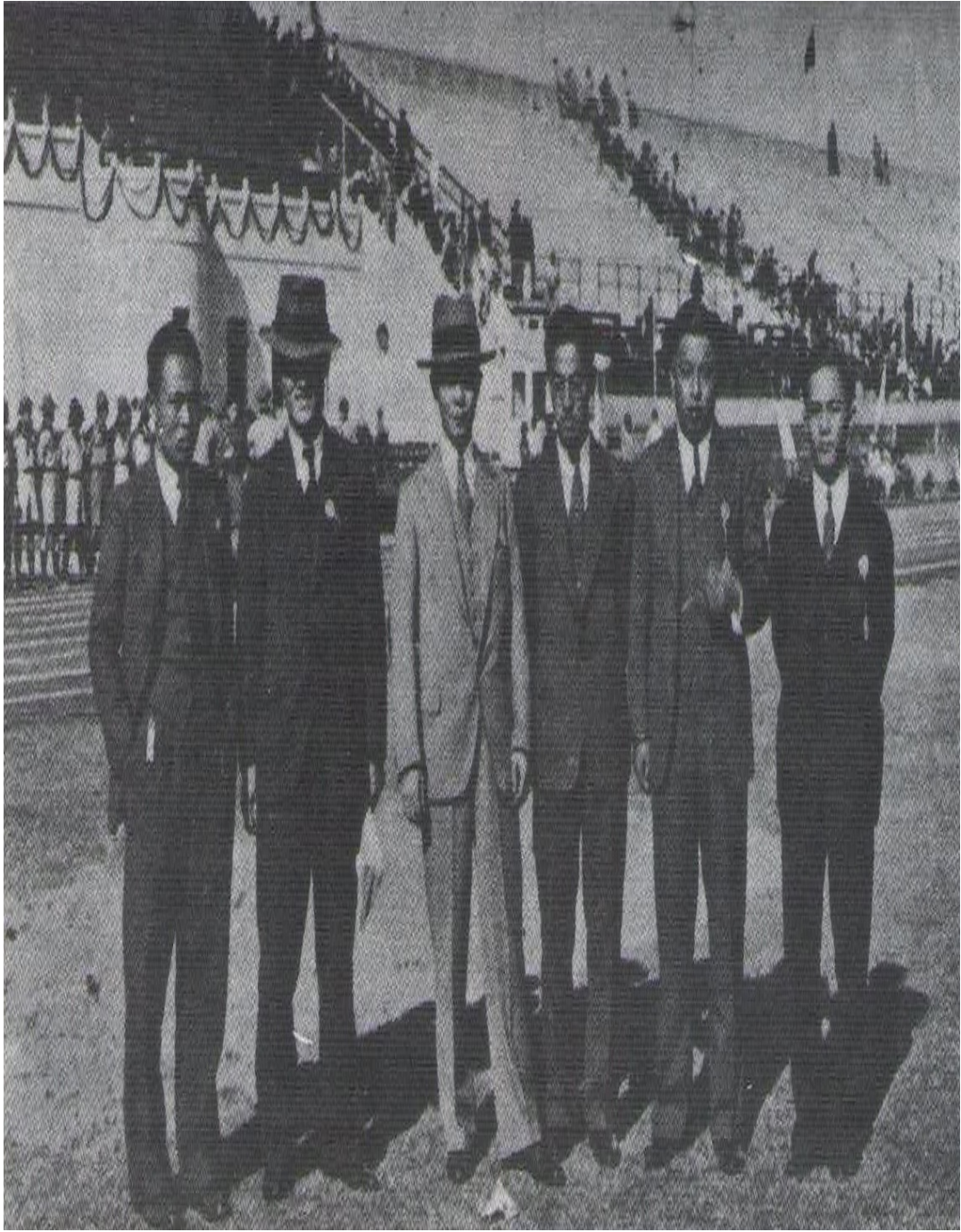
我進接蕭同茲先生，只是在台北這廿多年的事。但我仰慕蕭同茲先生，則早在他老人家成功的主持中央通訊社的時期就開始。從仰慕其人到進接其人，從我發現蕭先生這個人，不僅是一位新聞事業家，同時是一位平凡中的不平凡人物。

例如蕭先生胸懷的謙沖，可謂深得前一輩黨國元老的餘緒。以他在中國新聞界的崇高地位，像我這樣一介後進真不敢高攀。可是這廿多年來，偶以有關問題向他請益，他不但絕不作老氣橫秋狀，而且總是先表明所知有限。結果，一席話談下來，雖然沒有直接答覆我的問題，從他講故事式的舉證取譬中，使我間接領會到了他對這個問題的意見。

我最佩服蕭先生恂恂儒者的風範。我知道他畢業於湖南長沙的高工，初期從事的是工人運動，中期從事的是宣傳工作，然而，我所看到的晚年的蕭先生，却是恂恂儒者。他不大發表文章，更沒有著書立說，但他那風光霽月的胸襟，娓娓說理的態度，特別是關於接受現代化觀念的日新又新精神，是個典型的學者，更是恂恂的儒者。

從這廿多年來上述幾點進接印象，我自然而然的連想到：初期蕭先生之投身工人運動，而能秉持三民主義的工人運動政策，其後蕭先生之獻身宣傳大任，而能成中央通訊社這樣的新聞事業之大，無疑是由他的有見識、有擔當的秉賦得來。見識因謙沖的胸懷而與時俱廣，擔當因儒家的風範而志節益堅，四者互為因果。同茲先生乃能修得最近這廿多年的有所為而有所不為，出世而又入世的晚年寧靜淡泊境界。

同茲先生大殮之日我適在歐洲，回國後只趕上安葬大典。敢書短文，藉以對長者表示永念。



民國二十五年在上海全國運動會場（從左至右）：李丕祖、馮有真、蕭先生、丁繼昶、律鴻起、郭則虬

# 穩定軍心的一番話

王繼樸

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是星期天，適逢報社休假，翌日清晨我翻開報紙，驚悉新聞界前輩，我的老上司蕭同茲先生溘然仙逝。當天下午在我住處附近的安東街與信義路口遇見老友齊振一兄，他正去水晶大廈蕭公館弔喪，我們是南京中央社總社的老同事，談起一週前（十一月三日）頤和園飯莊的聚會，祝賀同茲先生七秩晉九華誕的情景，我們兩人嘯唏良久。

參加那天餐會的都是中央社老同事，葉明勳兄還特別拉我向同茲先生敬酒，並作簡短介紹。同茲先生似未忘記我這位老部屬，他講了幾句客氣的話。他那謙虛和藹的長者風度，與我過去在南京時見到的一樣，永遠令人心儀神往。

如果我的記憶不錯，那是在民國三十七年年底，徐蚌會戰失利之後，匪焰猖獗，中央政府開始西遷，中央社正積極準備搬往廣州。同茲先生召集總社同仁在大禮堂中講話。蕭先生並不善言詞，但他那天說的話却是十分誠摯而意義深長。他說：『我和毛澤東曾經是拜把的兄弟，在長沙分手後，抗戰時期一度在重慶見面，毛澤東稱當時的重

逢是「古城會」。那段舊事說明我和毛澤東的關係。但我現在許身黨國，義無反顧，即使將來被共匪抓住，上刀山，下油鍋，我也心甘情願，決不後悔。』

當時大陸情勢紊亂，人心惶恐，一般意志動搖、趨炎附勢之徒，都奔走鑽營，希望搭上一條通匪的路線，搖身一變，轉為紅朝新貴。同茲先生的那番話，具有激勵士氣、穩定軍心的作用。後來中央社總社及各地分社的主要負責人，都來到了台灣，與中央社共存亡，這應該是同茲先生的精神感召所致。二十多年的往事，回想起來，宛如往昔。如今同茲先生已撒手人寰，我實希望他的這種精神永遠領導著我們新聞界的同業，擊敗共匪，返回南京。



有個時期的中央日報社長是由中央社總編輯陳博生（左第三人兼任）。右為中央社長蕭同茲，左第二人為中央宣傳部長張道藩，左為中央社秘書曹蔭穉。

我在中央社服務的幾年中，老實說是不大愉快的，其原因是咎由自取。我自民國三十年畢業於燕大新聞系之後，由北平輾轉到達重慶，經吳文藻老師介紹給那時的中央日報社社長陳博生先生，入中央

日報服務，名義是助理編輯，實際是翻譯外電的工作。博生先生對我極為關照，時常問我起居飲食，但我極不習慣當時郊區化龍橋編輯部的生活，尤其是剛從北平到達後方。化龍橋編輯部的辦公室和宿舍都在山坡上，茅屋數間，聊避風雨，膳食是粗劣的「八寶飯」，吃後即腹瀉，後來又「打擺子」（患瘧疾）。

於是我寫了一封信給陳博生先生，大意謂我決定辭職，好在貴社「人才濟濟」，當不介意也。這種留下簽呈，不辭而別的魯莽行爲，使我日後懊悔萬分。這也是爲什麼我擔任過中央社台北分社編輯組長，後來回到南京總社，遲遲未能獲准的主要原因。我還經過考試，當時編輯部副主任，我的老上司沈宗琳兄親口對我說，在那批朋友中我考得最好。但是後來一直沒有下文，我常去追問，大概過了一個多月，我終於獲准回社，我想當時的總編輯博生先生一定是很勉強同意的。如今博生先生亦已作古多年，我對他實感歉咎。這件事給我的教訓是；一個年輕人如果要好好的收穫，必須好好的耕耘。

我也在沈宗琳兄的領導之下，從事中央社編發C F P（對美廣播）的工作，每日凌晨一時開始工作，直至三時，當時的同事，現在仍與我共事的老友黃慶祥兄也是編輯之一。後來因爲與美國分社事先未聯絡好，工作停頓，我們戲稱那一段時間內的廣播爲「無的放矢」，作爲解嘲。我也清清楚楚的記得，我們曾在南京光華門外的馬祥興回教餐館中爲李緘三兄赴美餞行。



總之，同茲先生的創業精神，博生先生的道德文章，中央社同仁處理與報導新聞態度的嚴謹，使我獲益良多。老同事之間的友誼，都是值得懷念與珍惜的。茲值「在茲集」編截稿前夕，特匆匆趕撰數語，作為我對這位老社長最後的敬禮。

黃少谷一

肝胆照人，風儀如在；

忠勤報國，金石同堅。

# 談風格

毛樹清

擺脫二十餘年的美國新聞工作，回國七年，在幾家大學教書。黃昏閒暇，陪蕭三爺在藍天樓上品茗聊天，幾乎是每天最大的樂事。那種情趣，那種感受，是無法用言語筆墨來描寫的。記得有一天我在授課時，一位大眾傳播系的學生突然發問：什麼叫男人的風格？什麼叫女人的氣質？這一問竟然把我考倒，我瞠目不知該如何用通俗的字彙描摹出來。突然間，我想起了藍天樓上的三爺，我告訴那位學生說：關於氣質，你最好詢問高貴的女性；關於風格，我邀請你明天晚間到藍天來，你無須講一句話，祇是坐在一旁細細觀察就夠了。身教遠勝言教，就祇那麼一個黃昏，夠那位青年朋友受用一輩子了。

三爺作過我的長官，作過我的老師，但他留給我最深刻的，是他的風格。白雲蒼穹，如今我也快花甲之年了，我不知道還要修身養性苦煉多少年，纔能學到三爺風格的萬分之一？！

（三爺逝世後四月，於台北）

# 精神積極。風度瀟灑

## 包明叔

同茲兄小我四歲，去冬竟以心臟病猝發，先我而逝。回憶四十多年來我和他的公私交往，尤其對日抗戰時期，我們辦敵後報紙的，對中央社新聞供應的感激，對這位新聞事業先驅者的去世，實不勝其痛悼！

我於民國十七年在江蘇省會鎮江創辦「新江蘇報」，當時的中央社還沒有新聞電訊廣播，最後稿件都是由夜班火車傳遞給京滬線各報。上海申報爲了提前獲得消息，祇有利用長途電話報新聞。可是京滬之間直接通話的時間有限，不得不利用京鎮——鎮滬間的通話時間，接駁轉遞。我因爲兼作申報駐鎮江特派員，自然承乏其事，每晚先和南京通話，取得電訊，再轉告上海；不過，我也藉此機會，把得自南京方面的新聞供「新江蘇報」採用，一舉兩得。這個局面一直維持到民國二十一年。

同茲兄接長中央社不久，便有了新聞電訊廣播，上海、鎮江、甚至更遠地方的報紙，都能在當天抄收中央社所播發的新聞，上海申報自無需再經由鎮江以電話傳遞消息。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當時全國各

地方辦報的人，在抄收到中央社最新而最正確的消息時，內心是如何的感激，我們新江蘇報自設收報機自不例外。每當同茲兄來到鎮江，我總要請他遊金焦名勝，吃新鮮鮭魚，表示一點心意；不過，我到南京看他，也都會接受他飯局的招待。

對日抗戰八年，「新江蘇報」播遷大江南北，繼續發行，先遷揚州，再遷泰州，最後到宜興的張渚鎮，均捲土重新鉛印。逮張渚不守，仍得地下縣長蔣如鏡先生的協助，在田干里蔣家祠堂祕密用油印印行，我們躲在祠堂閣樓上抄收中央社的C A P廣播，天昏地黑，悶得難受。當時電訊器材補充固為困難，就連乾電池也得之不易。加上日寇的嚴密搜索，共匪「新四軍」和土匪的困擾，環境實在十分險惡。我們仍然排除萬難，竭盡所能，維持著六七百份發行額的一張油印報。因為是祕密發行，大家不敢公開直呼報名，而以「新娘子」取代。抗戰後期幾年中，「新娘子」乃成為江蘇淪陷區擁護中央的同胞想望中央及參加「和平」的偽組織的有心人唯一的精神慰藉。

八年之間，「新江蘇報」之得在陷區出版，消息來源完全依賴中央社的新聞廣播，否則，戰時的敵後報紙勢將無法維持。我們如此，其他淪陷地區亦然。

身處敵後，如果不能得到大後方的正確消息，以及世界各地戰場的動態，真不知將何以自處。所以我們在收C A P電訊，編發之餘，說不出對中央社有多麼感激；我知道這都是同茲兄經營中央社的成

就，對他的敬佩之心，也就與日俱增。卅四年九月，「新江蘇報」首先回到鎮江受降，而得中央消息者亦唯有鎮江居先。次年春同茲兄由渝還都，我特地到南京去拜望他，感謝他無形中對淪陷區報紙的幫助。他却謙虛地說，那是中央社應盡的責任。

避秦來台，我已成繳械的老兵，退出新聞界的行列，同茲兄也卸却中央社的重担，每次見面，常閒話當年。由於我和他以及趙班斧兄同嗜平劇，有時在一起也哼上幾句，同茲兄的洪羊洞和打漁殺家唱得極有韻味。我曾和他預約，回大陸之後，邀他重遊鎮江的金、焦、北固諸名勝，可惜這話已無法實現。

同茲兄具有積極的精神，瀟灑的風度，有此，才能在事業上有卓越的表現。同茲兄離去，其對現代中國新聞事業的貢獻，將令人常記心頭，永垂不朽。

# 模範上司

任玲遜

世界上最著名的傳記作家布魯塔克曾經一度說明他寫作名人生活的成功祕訣。他說：『一個短而有趣的故事，一個脫口而出的辭句，甚至一句打趣的話語，往往較最大的戰役或者最精彩的演說，更能顯露出一個人的性格。』

當我於去年十一月中旬，突然像晴天霹靂一樣接到蕭同茲先生逝世的不幸消息時，因我遠離台北，我的第一個反應是私下作一次祈禱，以代替親臨向他致最後的意。我向上帝禱告，祈求其賜予蕭先生永恆的安息，進入天國。我當時並不知道蕭先生不是基督徒，但是在我看來，更重要的一個事實是，憑他的行爲、言論和他一生的典範，他的精神實在是基督精神——至少在我所知道他當中央通訊社社長時期的情形是如此。

隨著他的突然逝世所引起的震驚逐漸歸於平淡，記憶中的一些小事情——蕭先生所作所爲，或者所說的片段金玉良言——紛紛湧入腦際，證明布魯塔克有關人生偉大之條件的說法的確是不易之論。

我們大家都知道蕭先生是新聞界一位傑出的人物，這已由中央通

訊社在他擔任社長的那許多年所獲得的眾多成就表現出來。蕭先生也是一位具有獻身熱誠的愛國者，對於國事和黨務都有深刻的瞭解。這已由他於三十四年，在他五十一年歲的時候，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而獲得證明。但最重要的是：蕭先生——在和他發生密切接觸的人看來——乃一巍然屹立的偉人，一個具有古道熱腸而富於同情心的好人。

我們這些曾在蕭先生手下工作過的人，都瞭解駐在中國的外國記者描繪蕭先生對於中央社在短短幾年間驚人成長所作貢獻而使用的辭句。他們說，中央社就是蕭同茲，蕭同茲就是中央社。

蕭先生的工作時間很長，不知疲倦——他是一個喜歡行動的，也是一個有眼光的人。我們知道他工作是多麼辛勞。當我於二十三年擔任英文部主任時，中央社設在南京壽康里頗為簡陋的建築物裏，我的辦公室在底層（設在二樓）的下面。社長室裏的任何談話，每當說話的聲音比正常的說話聲音高一點，在下面一層的辦公室就聽得很清楚。聽到他在工作，聽到他打電話，聽到他對來訪的客人作簡報，聽到他作說明，聽到他作計畫，有時甚至跳過一次午餐或晚餐不吃。人們便覺得，對蕭先生來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似乎從來就不夠用。蕭先生學的是機械工程，二十一年受命出任中央通訊社社長時，却變成了新聞記者。從那時起，蕭先生便熱切地決心獻身新聞事業。

不僅他自己成為新聞事業的一位熱心的實踐者，而且他的熱心還感染了別人。換句話說，他以成為一位新聞事業傳道者自任。每當有

機會和他商量某些問題時，他總是說：『中央社是我一生的事業，我希望你也這樣想。』隨後，當他察覺到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同樣鋼鐵般的決心時，蕭先生會接著這麼補充一句說：『把新聞事業當着一種終身職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你從其中所得到的滿足，是值得你做這種嘗試的。』蕭先生在適當的時機所提出的這一類型的忠告，替中央社贏得了許多職員一生的效忠。

在我替中央社工作的將近三十年中，我發現為蕭先生做事是一種無可言宣的快樂，既可獲得鼓舞，又可獲得教益。這不祇是我一己的判斷，中央社同人在茶餘飯後的談話中，大家一致公認的意見是認為，在任何別的地方，都無法可以找到一位比蕭先生更富於同情心，更體恤和更肯幫忙的主管。在處理中央社的計劃和各項職業性的問題方面。他表現出鋼鐵般的堅毅，但對待他的下屬却是一片慈祥之心。

在這方面，中央社對他來說像是一個大家庭。他在處理人事關係方面所表現的體恤、容忍、大度和肯幫忙，例子實在太多，不勝枚舉。我毫無疑問地相信，以前曾替中央社工作，而現在為這本「在茲集」寫文章紀念他的每一位同人，都會有許多事情可資記述，來說明他們身受蕭先生恩惠的情形。我不知道有任何中央社的職員，在錢財或其他方面陷於困難時，而不克獲得蕭先生樂意伸出援手的。

不過，我將僅敘述一兩件和我直接或間接有關的事。民國三十年初，我奉命擔任中央社香港分社主任，做夢也不想到在十二個月時間



內我幾乎因珍珠港事變而被埋葬在香港。香港在聖誕節那天向日本投降後，我們一個小團體，共六人，包括中宣部駐港代表鄧友德在內，從香港經廣州灣逃到自由中國。由於缺乏適當的公共交通工具，我們步行到廣西的鬱林。這是一個多山地區，我們在五天中走了一百里路。從鬱林出發，我們很幸運，有一輛大型汽車把我們載到桂林。不用說，於抵達桂林後，我們差不多都很疲倦。

在抵達桂林後不久，我接到重慶蕭社長的一封急電。他以非常客氣的言辭要我儘可能趕快前往重慶，「有要事相商」。在這封電報的結尾，他補充了這幾個字，「請先在桂林休息幾日」。

爲了另外一個原因，這封電報使我陷於一種顯得有點進退維谷的困境。我和我的那個團體經事先的安排從香港逃出來，把我的妻子和兩個女兒留下。他們原定稍後和另外一個團體，主要是婦女和兒童跟著逃出來，而我們的計劃是要在桂林和他們會合。最後，我毫不猶疑地先往重慶，因爲我明瞭蕭社長是一位如果事情不太急絕不會打電報給我的那種主管。在那些日子，祇有大人物才有資格可以優先獲得民航飛機的保留座位。因此，我祇得乘卡車經貴陽前往重慶。

抵達重慶以後，我纔獲悉蕭社長急電召我前來的理由。蕭先生解釋說，不久前 蔣總統曾訪問印度，參加一次高階層會議，結果很遺憾地發現，在印度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東西方的重要交會點全境却沒有一個中國記者。蕭社長說，他決定要來填補這個真空，於是要

我前往印度，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設立中央社的分社。對我來說，在職業上我將打開了一個新境界，但在同時，我不能忘記我對家庭的責任。

當聽到我的妻子兒女仍在香港時，蕭社長的反應就是蕭先生作人的典型例子。他瞭解他每一個職員的私生活（家庭）正和他的職業生活一樣重要。『如果這是使你感到遲疑的唯一理由，』蕭先生說：『你不用擔憂，我會親自照顧它的。』

過不了幾天，我便飛越駝峯到印度去了。他信守諾言，親自替我的家庭從香港長途跋涉前往印度事策劃一切，即使在承平時期的，帶著兩個兒女，一個五歲，一個一歲，長途跋涉，就算最順利，也是一種累贅，而在珍珠港事變以後的那些日子，則更是困難倍增。首先社裏的一位職員奉派前往香港，給予我妻子所可能需要的一切協助，並護送他們一路從香港到桂林。然後，中央社桂林分社能幹的主任陳純粹，運用他的一切影響力量，替我的妻子和女兒弄到了民航飛機票，因而使他們能在一兩個小時內飛到重慶，而這却是我所未能享受到的一項特權。我的家屬從中央社總社所在地的重慶出發，一切都很順遂。在我自己抵達新德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她們便和我在印度會合了。

另外一件事，我雖不是直接當事人，但却知道其詳細經過，足可認清蕭社長人格的另一方面。在一九三五年或一九三六年——我不大

記得清楚究竟是那一年——中央社上海分社一位資深的記者（編者按：係曾任蘭州分社主任的陳萬里），有一天晚上寫了一則有關財政部某項重大決策的重要消息。那則消息是以當晚的一項官方聲明為中心。但是，爲了太過急於趕時間，他抄寫那項聲明後，未能核對一遍。第二天，當這則消息在所有報紙的頭版上刊出時，曾在上海金融界引起不小的驚恐，而導致政府進行調查。經將這則消息仔細核對的結果，最後顯示該記者由於過份急於趕時間，在抄錄那項聲明時，竟漏掉整整一行，而那一行開頭的一個字和末尾的一個字剛好和前一行相同。

我們這些熟悉那項「嚴重錯誤」內幕的人，都預料那位當事的記者定會立即被開革，但那事並沒有發生。蕭社長絕非通常的報館老板，他既把中央社當作他的終身事業，於是他就不厭其煩地把同一觀念灌輸給他所有的職員，因而使我們大家腦中都存着一個觀念：與中央社相結合不祇是一項職業而已。

因此，蕭社長絲毫沒有打擊該記者前程的意思，他對他的懲罰祇是給予一頓教訓，說明新聞的正確性最爲重要。蕭先生後來向他的若干親信解釋他爲何不大加懲罰。他說：『每一個人有時都會犯錯誤，而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須給他一個機會，使他可以從錯誤中得到教訓。祇有在一個人犯同一錯誤兩次時，才可以認爲不可原諒，後來的事實證明，那位記者得到這次教訓便學乖了，他沒有再犯一次錯誤。事實上他的工作表現一直很好，以致在幾年之內他便升任爲駐西

北一個省會的分社主任。

蕭先生是一位第一流的新聞事業家，具有完美無缺的人格，他在中國新聞界名人錄中的地位，也許可以和創辦英國路透社的瓊斯爵士（Sir Roderick Jones）相比。當然，蕭先生在發展中央社方面的成就當會全部記錄在中國新聞史上。但是，我和許多以前曾經在中央社擔任過職員的人一樣，最懷念蕭先生的，是他乃一個模範上司和具有一種光明磊落的人格，在說話聲音或者儀態方面，從不傲慢，從不狡詐，從不自私，慷慨而大度，永遠和善與永遠溫厚。

周至柔一

革命著勳猷，筆掃千軍寒敵胆；

老成悲寥落，壽登八秩賦仙遊。

# 我景仰的一代喆人

任素予

三爺雖已作古，他的聲音笑貌，恍惚仍在眼前，使我時興懷仰的哀思。

我知道三爺，敬仰三爺，早在民國廿三年，那時他任中央社社長，已是名噪一時。徐鎮埏先生是我的舊居停，他與三爺是總角交，他時常稱道三爺雄才大略，氣度恢宏，並談論三爺諸多頗具歷史意義的事蹟，使我油然而生敬仰之心，但迄無晉見機會。直到三十三年在重慶，記不清是三月的那一天，徐先生因事介紹我去七星崗嘉廬晉謁三爺，接談之下果然是一位雍容雅度、和藹可親的長者，至此才知道受人尊敬的三爺，確有其受人尊敬的道理。事情談完，我即匆匆辭出。

三十八年二月徐先生由昆明脫險來台，才在基隆港邊重見三爺。他與徐先生在船邊相遇，緊握著手，相對噓唏，大有仿如隔世之感。此一至情的表現，至今仍飄浮腦際。在台二十餘年當中，徐先生與三爺往來過從，我也時常參與其間，因此三爺對我的認識日深，得蒙青睞。

三爺於詩酒之外，酷愛京戲，徐先生於脫險抵台後，曾大宴親友，三爺在酒酣耳熱之際，曾高唱一曲，腔圓字正，音韻鏗鏘，頗有名派風味，後十餘年間，屢隨三爺在國大聯誼會及趙班斧先生處調嗓遣興，我也同愛此道，因天賦太低，一無是處，却謬蒙三爺嘉許，深感慚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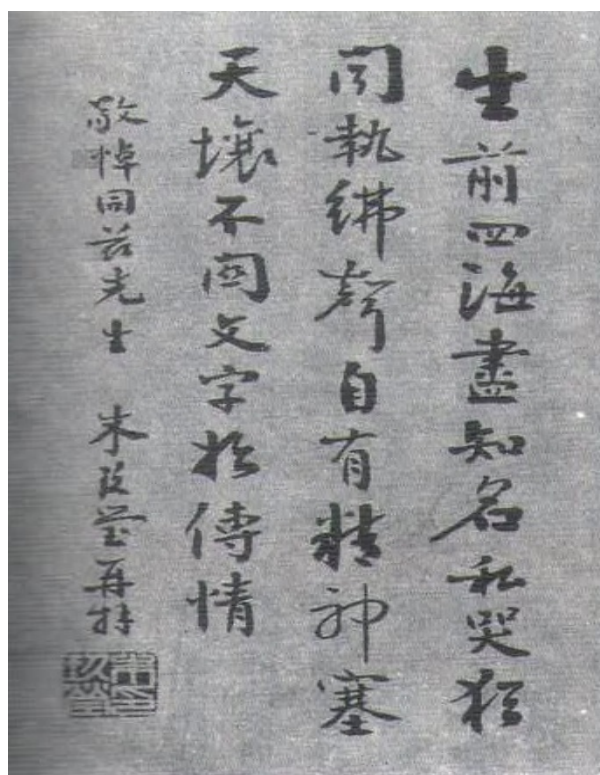
徐先生去世後，我與李葉超先生同赴南京西路榮星保齡球館向三爺請示徐先生治喪事宜時，當即着我代撰輓聯，並約我於徐先生喪葬後，赴良士大廈閒談。

我於七月下旬應約前往，正值三爺午睡起床，興致勃勃，長談一小時以上。除著我在水晶大廈工程處暫司文書有關事項外，並囑我於工程告竣後，爲他整理與黨國有關的資料，在三爺遷回水晶大廈後，遲遲沒有囑我着手。不料一代哲人竟與世長辭，我爲要實踐對三爺的諾言，曾於他火葬前夕在市立殯儀館和明勳先生商酌如何共同負責完成。

三爺生平有兩樁眾所週知的大事：一爲在長沙學生會與毛匪澤東明爭暗鬥。二爲與吳鐵老同赴東北說服張學良易幟。我在輓三爺的輓聯中，亦經提及，茲附錄如左：

董狐史筆，管仲經綸；樞府賴陳謨，爲期遠靖邊綏，撫循滿閩輸誠幟。

張漢雲山，樊川詩酒，林泉有至樂，曾記與酣耳熱，暢述星垣鬥  
赤眉。



# 新聞界的主帥

朱仲育

我個人只是新聞界的一名「充員戰士」，（因原非學新聞的，所以是充員，末學後進，也只能勉列戰士之一員而已。）對於心儀十多年的主帥，簡直沒有一親恩澤的機會，雖然在好多場合中，我偷偷的瞻仰過主帥的風範，竊聽過主帥的談笑，主帥手下的許多五星上將，我也認識一些，可是，主帥與充員戰士之間的距離，畢竟是相當遠的。

## 將秀才兵難上加難

古往今來，將兵的人才摭拾皆是，將將的帥才幾乎百世難求。新聞部隊這支兵，其難以駕馭的程度，唯有身為新聞從業員的人才最清楚。記者羣中，多的才高八斗，眼高於頂，而文章「永遠是自己的好」的秀才老爺，非屬將將之帥才者，那能指揮調度得動。中央通訊社在全盛時期，秀才兵達二千七百餘人之眾，能讓這些人精誠團結，凝聚得混然一體，真是談何容易；連那美國紐約時報，百年之基，仍一直互傾互軋，家務還永遠鬧不清呢！



## 自上至下併肩作戰

誰都知道，新聞事業已是一種專業，新聞部隊無疑的是一支專業部隊，近數十年來，新聞部隊中崛起了不少上將之才，有出諸正規軍者，也有草莽英雄。中央社當然是屬於黨國一力培植的正規軍，通常，配備精良的正規軍，兵驕將悍，不易跟散兵游勇的雜牌部隊結為伙伴，可是中央社不然，我這名充員戰士，在國內，在國外，跟不少「中央社人」併肩作過戰，自五星上將以至士兵，不僅合得來，且有時發現，滿臉驕悍之氣的，反倒是我這名充員，真使我汗顏不已。我奇怪，蕭大帥推愛及人、謙恭禮豎的仁德風儀，怎能對中央社人潛移默化到如此地步？

## 盛年卸担壯志未酬

站在新聞事業的立場，中央社本身今天還不能算是十全十美，然則，中央社若非經過蕭同茲先生數十年親身及精神上的指揮領導，能否得有今天這般的成就，便很值得懷疑。我曾聽蕭先生麾下的不少五星上將談起，蕭先生一直有心要中央社在各方面都迎頭趕上世界上第一流的合眾社、路透社以及一切的國際通訊社。他有此雄心，也確有完成此一事功的能力，讓我不解的是，何以他在五十六歲的壯年，就把這付担子辭卸了，這責在是中國新聞事業史上的一大憾事。

## 念茲在茲期待傳記

蕭大帥七十五歲壽誕時，中央社同仁曾集資並集體執筆出版了一本「念茲集」，這是非賣品，我人在國外，所以在他過世那天前，竟不知有此小冊子，如今方自任玲遜先生處借來漏夜拜讀，感動不已。聽說中央社同人原還有在蕭先生八十大壽時，擴大出版「念茲集」之計劃，不幸哲人已萎，未悉中央社同人的計畫有否改變？我這名充員戰士以為，蕭先生已去，中央社似不宜再以「家務事」的方式來紀念這位新聞界前輩，要「念」大家「念」。此外，聽說沈宗琳先生已有為蕭先生作傳的計畫，他同時還寫有「中央社史」的構想（也許早已着手），我不知道「蕭同茲傳」是怎麼樣寫法，沈先生一人執筆否？或是有人為沈先生分勞？中央社在蕭先生領導時期的不少前輩記者，如今是散在海外的不少，像目前在舊金山會亞洲協會主編「亞洲學生」的徐兆鏞先生，在華盛頓的任玲遜先生，在美國教授國畫的王商一先生（編者按：王商一先生前年已在美國病故），仍在廣播界的張明先生，在紐約的湯德臣先生，在倫敦的王家松先生，中央社第一任電務部主任高仲芹先生，甚至路透社社長陳士樂先生（Chancellor）等，似乎都該盡他們所知，協助沈先生早日完成蕭先生的傳，把「非賣品」三字拿掉，早日問世。

# 一位高風亮節的知己

冷欣

蕭同茲先生與我的交誼近半個世紀，今天來追憶往事，不勝懷念與景仰。記得當年報載，軍閥槍殺勞工領袖黃愛、龐人銓等，全國民意沸騰。有蕭異（同茲先生原名）、王光輝二人參加京漢鐵路工人運動，宣揚本黨主義，因而大受軍閥壓迫，掀起「二七工潮」。當時自己遠在廣州，讀報心儀其人，對於他們熱心愛國的奮鬥精神十分傾慕！

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底定東南，我在上海市黨部工作，得與蕭先生往還。他曾領導工運，轟轟烈烈，想像這位英雄人物必定粗邁、豪放，交往後才發現他文質彬彬，迥異所想。十七年蕭先生與吳鐵城先生有東北之行，奉派宣達政府意旨，勸說張學良歸順中央，終於不辱使命。此際我也改調軍事工作，很少見面機會。

直到民國廿二、三年左右，我們又在京滬兩地重新交往，有時杯酒聯歡。這位老友瀟灑洒洒，文采風流，大家都以「三爺」相稱。因彼此相契，經常會晤，朋友們笑稱陳博生為「大爺」，張明為「二爺」，許孝炎為「五爺」，我被稱為「四爺」。所謂大爺、三爺者，

並非序齒，而是按照各人在各自家裏的排行。

我秉性剛直，待人接物，嫉惡如仇，常不免開罪於人。三爺總是婉言規勸，諄諄告以世道崎嶇，君子少而小人多，凡事宜加容忍，令人深為感佩，衷心以兄長事之，何況我的年紀比他足足小五歲。

三爺出長中央社後，我進入陸軍大學時，同在南京，每相晤暢談天下事，快慰平生。他豪氣凌雲，令人折服。二十六年對日抗戰軍興，我們過從更密，議論事局常至深夜，我曾笑談願作一名中央社義務編輯，因為新聞報導中對軍語名詞時有小誤，願為修正。身為中央社社長的蕭三爺，頗以為然，且認為軍事新聞寫作應研求改進。猶憶當年時相聚談的還有潘邵昂（哈瓦斯）、趙敏恆（路透社）幾位新聞圈子裏的朋友。後來三爺去重慶指揮中央社的新聞鬥士拿筆桿作戰，我則馳驅於長江流域及東戰場。雖然天各一方，但是依舊常通函電，有所請益。

三十四年抗戰勝利，九月九日中午我以陸軍總部前進指揮所主任身份，啣何總司令之命，攜岡村寧次代表日皇所簽降書，由南京飛重慶，九月十一日在國民政府紀念週上呈獻給今 總統蔣公。會後，三爺藉此機會和我談到中央社如何復原南京事，我因即欲飛返南京，他送我到白市驛機場，藉此一較長時間的汽車途中，他慨談共匪陰謀詭詐，危害黨國，隱憂甚多。我們待做的事千頭萬緒，大家不要以為勝利了忽視這個問題。別人正高興時，而三爺却憂心忡忡。事實證明他

的話不幸而言中。

來台灣後，他另是一番心境，飲酒之外，更常練保齡球，風度翩翩，不改其樂。蕭太太有一次臥病住院，勸三爺趁便也檢查一下，發現有輕微心臟病，於是他稍稍節飲，這完全是聽醫生的勸告。

算起來我跟三爺相知五十年了。他並非學新聞的，却在新聞界有這樣偉大的成就，實在是由於他過人的智慧，深湛的涵養和領導的才能。我們兩人不但是知己，更是革命同志，平素無話不談。鑒於我是剛性，三爺容忍，語重心長，真是益友良師。

有件事我要特別一提：即當時風傳中央社遷台之際，蕭先生曾將經費移作遣散人員之用。他不予辯正，等到移交時證明了他絲毫不苟，這位「老社長」已替中央社節餘了二十多萬美鈔和六百多兩黃金，妥交後任。這是何等的高風亮節！這位新聞界前輩的嘉言懿行，無法盡述，只此一端，足徵非常人所及。執筆至此，無限懷念而肅然起敬。

# 東北易幟與同茲先生

吳幼林

同茲先生一手創立了中國最大的通訊社——中央通訊社，成爲名列世界五大通訊社之林。中國人稱同茲先生爲蕭三爺，外國朋友却有人稱他爲中央社先生。

同茲先生領導中央社前後達三十年，是他一生心血的結晶，也是他名垂不朽的偉大功業，這是大家知道而敬仰的。同茲先生是我的世丈輩，除了他對我國新聞事業輝煌貢獻外，他對民國十七年東北易幟統一中國那一歷史階段，也有過他的貢獻，發揮了他的才智，襄助先德鐵城公相偕出關，完成東北軍易幟，全國於焉統一的任務。

先德曾先後兩次赴東北，第一次在十七年，啣命出關赴瀋陽聯絡張漢卿先生；第二次是十九年赴東北慰勞，并推動建立中國國民黨黨務在東北的開展。

第一次赴東北時，同茲丈是隨陪先德一起前赴的。可以想見，他顯然是一位參與密勿的「拍手伙計」，可惜在先德所撰的回憶錄中，還沒有着筆寫這個時期的史蹟便因病擱筆，僅留存那一章節的小目，當時的真相便無從詳知。但在和張漢卿先生週旋應付之間，杯酒言笑

之頃，這位倜儻朗爽、風情俊逸的蕭三爺，必然也發揮他縱橫的才氣，有助先德達成游說東北歸順中央的艱巨任務。

先德和三爺，感情一向很親密，來台以後，彼此較閒，過從甚密，從仁愛路到安東街蕭公館路不很遠，先德常會到三爺那裏閒聊。我們見到三爺時是一個藹然仁者，儒雅的談吐，謙和慈祥的風範，使我如沐春風，至今常縈腦海。執筆書此，仍不禁悲從中來。

# 「活得好，死得快！」

呂光

三爺的肉體已不生存在這世界上了！

我們再也聽不到他那沒有「公式化」，沒有「客套」，而富有誠厚情感的談吐了！

但是，三爺沒有死，他的精神，也就是人類真諦的光輝，永遠照耀著我們，永遠不會熄滅。

三爺晚年的歲月，始終沒有老態，總是富有年輕人的活力！值得痛飲時，也能豪情奔放，一瀉千里！

他的名言：「活要活得好，死要死得快」的意思是，活時要活得健康快樂，可以多做對社會，對國家，對人類有益之事。死要死得快，就是，如人遇到不治之症時，不要拖，病人自己可免痛苦，也不牽累親友。他活時，在公，不負黨國之所託，明責任，重實踐。在私，誠信真摯對同仁，對朋友，好人緣，受愛戴，活得好！在半小時內，他心臟舊病復發，沒有痛苦，沒有遺憾，走向人生肉體的終站，死得快！也死得平安。



大家說三爺偉大，我也說三爺偉大，但是，如要我在教室裏對學生講述爲什麼他是偉大，我想我無法能用恰當的字句說得出來。他的偉大是「有形」的，也是「無形」的。一般人雖能看得到的，但不一定也能領悟得到的。

三爺，您真是「山高水長」！

# 能人賢者

李大超

同茲兄赤膽忠貞愛黨愛國，是一位能人賢者！

同茲兄是我們友儕中，最有肝胆，最有幹勁，最能知人與相處，也是最懂得待人接物的一位賢者。我永遠記得，當鐵老和三爺一塊兒談話或討論問題時，他常是最誠懇，最坦白，最耿直的表露他的意見的。如今想不到鐵老逝世二十年之後，同茲兄竟於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逝世於台北市信義路水晶大廈十一樓寓中。我們失去了最知心、最有人情味的老友，真真是我們儕輩中失了一位長者，也是黨國失了一位幹練忠貞的同志，怎能不叫人痛悼悲傷呢！

我們是在民國十六年冬北伐勝利時，到上海、南京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友好，爲了反共鬥爭，也爲了上海的勞工運動彼此來往，而結合起一股堅強的革命力量的。同茲兄身歷民國十年長沙黃龍勞工運動事件後，獨自來到上海、結識許多有志之士及在勞工陣營中拉到了關係的。記得我們住在法租界陶爾斐斯路的時候，樓下還安放了 總理的銅棺，是外國人奉送的。正是英美煙草廠工人大罷工的時候，這是同茲兄和一般同志出力很多，且影響國際最大的一個運動。那時我們共

同幹，且和許多同志一起幹，從此上海的反共勞工運動就慢慢轉到我們這一方面，這是值得懷念的。

我們於民國十六、七年住在南京高樓門的時候，常在同茲兄的住家沈舉人巷聚會，是爲了黨的工作，也爲了反共的鬥爭。那時更密切的團結起廣大的革命力量，來擔負起各種工作。大家都以黨的共同利害爲利害，人人都沒有計較個人的得失去苦幹實幹的。因爲很多的革命工作，不願意多暴露，那是爲革命而革命的。同茲兄給予我們的影響力是很大的。

民國十七、八、九年間，國民革命統一全國的最後努力，東北方面關係最爲重要。吳鐵老其時奉命到北方及東北去開展黨務，找到同茲兄同去。他們在瀋陽格凌飯店的一段時間，爲了東北易幟，爲和平統一的實現，也爲了東北黨務方面引進許多青年有志之士，參加黨的工作及對北平擴大會議反叛中央的企圖之消除，鐵老是盡了最大最善的力量奔走於關內外使其實現的。他大聲疾呼著：『不到東北，不知中國的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的危機。』當時有多少人能體會得到他的言外之意。其時同茲兄除分擔聯繫工作外，也常常因爲經費少，支應多，和某銀行的經理李振五兄去調度。關於人事上交往，函電的來去，更都有他從中協助週旋。



這是民國五十年三月四日的一次聚會，從右至左：李大超、蕭同茲、張壽賢、吳幼林

民國廿一年以後，同茲兄全力以赴於中央通訊社事業的發展，也經常和吳鐵老及友好們晤敘，對於文化事業，在宣傳報導有關的工作，他是有決心、有計劃去做的。所以在九一八瀋陽事變，一二八淞

滬對日戰爭以及西安事變，直至七七盧溝橋抗日戰爭全面展開了持久抗戰，每一事變中，中央社的工作貢獻特別重要。各地的同志和友好，時時和同茲兄聯絡或聚會，他給予人們的親切友愛，關係很重要，影響力也特別大。整整十五年當中，同茲兄爲了這種工作，貢獻出最大最善的心力，也完成了最寶貴，無以倫比的貢獻。

抗戰勝利凱旋南京之後，我們常在頤和路後面的古林寺慧園吳鐵老家聚談，他對中央社有整個發展的計劃，認爲時代在進步，必須走在前面。接著就有中央社大樓的建築。在暫時租用的馥記大樓裏，那時陳博生兄、曹蔭釋兄和梁乃賢兄都是幹勁十足，幫助了同茲兄去發展中國的偉大新聞事業。這種事業成就，雖然在進展中遭受了障礙，相信同茲兄的事業和精神，總會發揚光大而底於成功的。

在最近這二十多年來，同茲兄淡泊寧靜的生活和個人德業的修養，更爲儕輩所敬佩。其中雖然有些不如意的事，他都能够容忍下去。尤其愛黨的忠貞，決不後人，平日對黨事，時刻表露著熱愛的心，寧願自己受折磨吃虧，絕不讓黨有絲毫損失，這是同茲兄生前一再向我道及的。又憶起他逝世前幾個月，我們在水晶大廈晤談了很不稱心的事，言下自然有點煩惱。我知道了一切，也就從中作了週旋，替他解除不應該有的煩惱。同茲兄待人接物的容忍精神，確實是難能可貴的，這是在深沉悼念老友逝世，寫這篇紀念文字時必須一提的。

袁守謙一

寵辱久去胸懷，縱往事重論，盃酒猶能銷壘塊；  
湖湘晚敦氣誼，驚清徽遽遠，黃壚自此邈河山。

# 平生難忘兩件事

李志方

在我此生最難忘事件中，有關三爺者二事。

## 中央社何以能成一個大家庭？

我是三爺部屬的部屬，不論年齡、職位、和居處（我住基隆市）都距離很遠。按照一般人看法：我對三爺既攀不上；而三爺對我也顧不下。可是，事實上我雖不去上攀；而三爺却偏偏下顧。因此，我悟出了中央社爲什麼能成一個大家庭而使這個大家庭每一份子對這位家長也都由衷地敬愛他而爲他「賣」命的道理。我相信這個道理，中央社每一份子都會悟得出來。不然「念茲集」、「在茲集」也不會出版。不過，悟「道」的經過，各有不同。現在容我說出我的一段。

爲了敘述方便，先把我加入中央社情形簡述一遍：民國三十五年初春，我應協大校友中央社台北分社主任葉明勳先生之邀，辭去福州一家報社編輯職務，來台加入台北分社工作的。起先在台北分社擔任編輯；一年後奉派爲基隆特派員。迄今整整有二十八個年頭了。

回憶二十四年前，即民國三十九年間，我已來到基隆市二年了。那時總社剛剛開始播遷來台。有一天，我陪三爺去基隆港碼頭迎接他的夫人。那天風雨交加，我拿一把傘為三爺遮雨。由於海風太大，我把身體擋住雨水。三爺見我滿身淋漓，問我為何不穿雨衣？我說沒有雨衣。過了幾天，三爺特別委託中宣部副部長兼香港時報社長許孝炎先生來基乘船赴港之便，轉贈我一襲雨衣。同時，許先生對我說：

『三爺交我這件雨衣時，曾特別叮嚀兩點：第一點，三爺請我對你說：這件雨衣，他本來要親自送來，因有要事，特托我帶送；第二點，他托我代送，已屬第二手，希望我再不要交與第三手甚至第四手送來！』我接過雨衣，心理感覺雙重的溫暖：一重屬於人情的感受；另一重屬於物質的需要。（那時正是冷天，又值基隆雨季。而我待遇微薄，實無法添置一件雨衣或大衣。）





在葉公館（從左至右）：葉明勳、葉夫人、蕭三爺、張任飛、李志方、站立者為王勳

又過幾天，我到台北西寧南路總社，在二樓走廊遇見三爺，順便向他道謝一聲。而他却很鄭重地說：『這件小小禮物，怎抵得起你在基隆港碼頭，一連幾個月，不眠不休，照料大批電訊器材的起卸以及

千餘員工（包括眷屬）的接待的辛勞！而且你曾為這辛勞的工作，幾乎斷送了生命！』（那時我確有一次曾在碼頭倉庫三樓平台上，督導電報機器起卸時，由於大雨傾盆，又因兩夜不睡，以致精神不支，偶一滑足，即跌了下來。僥倖跌在一堆軟綿綿的被服之上，毫無損傷。否則非粉身碎骨不可！因為倉庫三樓平台上，比普通六樓還要高。）我問三爺說：『你怎曉得？』他說：『我對你很清楚，不止這事，早在二年前，你初派到基隆的時候，我已認識你，……』他話還沒講完，這時正遇總編輯陳博生先生從我們身邊走過。三爺立即拉住他並拍拍我的肩膀說：『哪，這就是你在南京時曾對他的長篇特稿深表讚美的李志方！』陳博老哈哈大笑說：『我們早已認識，前幾天（在三爺贈送雨衣之前）我曾請他吃過一次飯。』

說實在的，那時我對總社遷台立即強迫裁遣台北分社大批員工，深表不滿；再加分社待遇不好，我早已不想幹了。所以我曾上五次辭呈，但都被陳博老攔住。上述他請我吃飯，就是要慰留我，並代表三爺說明總社不得不裁遣的苦衷。但我還是堅持我的辭意，因為我已找到較高待遇的工作。可是，我這樣堅決的辭意竟被三爺僅值舊台幣幾十元的雨衣所打消而服務到現在。可嘆現在三爺已離開人世，而我也已兩鬢頰白，即將退休！走筆至此，夜已深沉。窗外風雨交加，寒意襲人。當年我拿一把傘為三爺遮雨的情景，依稀如在眼前。回首前塵，不禁涔涔淚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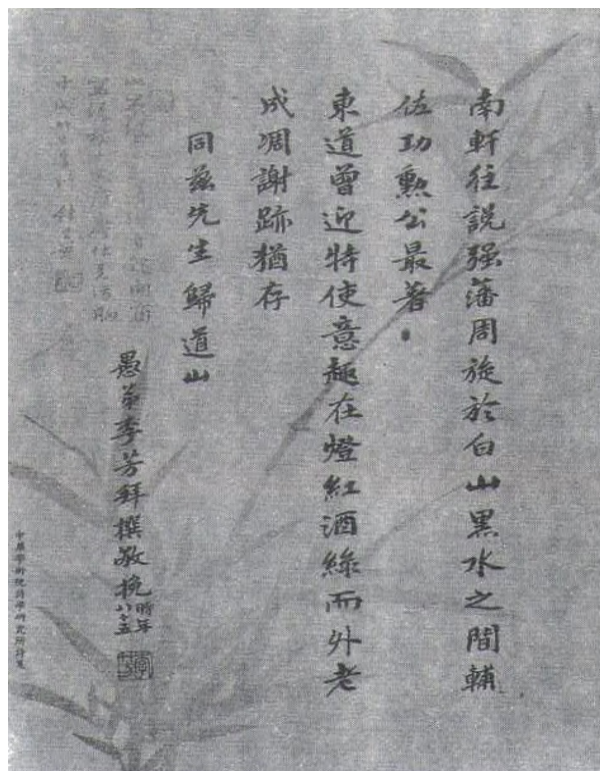
### 三爺有成人之美的偉大襟懷！

好多年以前，曹聖芬先生初長中央日報後不久，有一次中央日報總經理易家駟先生在某一宴席上遇見三爺，兩人在閒談中提及中央日報發行的問題。易先生曾告三爺說：曹社長對基隆市中央日報發行業務不振的情形，特別重視，決定列為下年度第一項整頓的中心工作。易先生說話時雖沒有請教三爺有何補救之道，而三爺却自動介紹我給易先生，說我是基隆市的「杜月笙」，對基隆市中央日報發行方面，一定有所幫助。第二天一清早，即有中央日報發行課長（忘其尊姓大名）來找我，拿出三爺「口頭支票」，請我幫忙「兌現」。我雖一口答應，但請他把「杜月笙」三字尊號收回；同時聲明如有做不到之處，也請他原諒。這位課長去後，接著三爺也來長途電話，要我無論如何也應盡全力協助。

於是，我費了一天一夜的苦思，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要基隆市政府編列一筆預算，為全市鄰里長，長期訂閱中央日報各一份，總數為二千八百多份（比原有訂戶還要多），支付報費方面，以一年為單位，先於年頭一次付清；而中央日報闢出大概半版地位，作為基隆市地方版，專刊基隆市新聞及免費登載基隆市政府對各區、里、鄰的公告。這辦法經過一番奔走，很快的獲得基隆市政府及議會（預算必須送請議會審核通過）一致的贊同。這辦法大約實行一、二年後，曾引起各報的不平，都向基隆市政府提出抗議。市府無可奈何，只好把總

數拿出均分。後來此事又引起台灣省政府重視，認為這辦法是宣導政令以及提高民智最有效方法，而對新聞事業也大有助益。於是決定這辦法，歸由省府統籌擴大辦理，把每一縣市村、里、隣報份分配給每一報社；報費由每一縣市編列每年預算之內。基隆市里隣報預算，仍歸由中央日報獨家所有。這辦法至今還在繼續辦理中。

這事太小，原不值一提。但三爺成人之美的偉大胸襟，可由此看出。



南軒往說強藩周旋於白山黑水之間輔  
佐功勳公最著。

東道曾迎特使意趣在燈紅酒綠而外老  
成凋謝跡猶存

同茲先生歸道山

愚弟李芳拜撰敬挽

李東原先生遺墨

# 做人做事做記者

李強光

我去國卅載，其間祇兩度返總社述職：第一次在民國五十年初正，從巴黎到台灣；第二次六十年夏從華盛頓回去，兩次都以先謁老社長同茲先生為快。回國看到許多老朋友、舊同事、知己之交、金蘭之契，久別重逢是人生樂事，和三爺在一起，又是另一種味道。記得我從巴黎抱著一瓶法國柯尼克白蘭地飛到香港，又從香港抱著飛回台北，孝敬三爺，酒雖非極上品，心却是熱烘烘的。三爺看到我很高興，問長問短，後來他在他府上設宴替我洗塵，並乘此機會邀約若干中央社舊人聯歡。席間，三爺拿出那瓶柯尼克供大家共賞，舊同事們因為闊別十七年，分外興奮，紛紛要和我乾杯。我本來酒量不佳，但在這種場合，盛情難却，正在不知如何是好；幸得三爺解圍，他說：『強光不會喝酒，讓他隨量吧！』

民國六十年那次回去，三爺在年齡上加了十載，但看到他精神旺盛，紅光滿面，使我很高興。有幾次應酬，他和我同被邀請，飯局過後他總是拉着我，再約上兩三位友好到藍天去坐坐，談談，品啜他喜歡的白蘭地。上次回來時他仍愛威士忌，這次他已轉喝白蘭地，可是喝的已不如過去那樣豪邁了。這次他說話也不如以前多，但是，即使

他不說話的時候，他的心總是在的。和三爺相處有獨特之處，就像你的心和他的心緊貼在一塊兒，無論你說話或他說話，你都得到他的共鳴。因此，和三爺在一起是一種無上的享受；同時你感到這也是他的一種無上的享受。

我留戀三爺的一切，這位溫文儒雅的老前輩對我的影響極大，我今天這樣的一個人，他是重要的塑造者之一。



民國五十年在蕭公館（從左至右）：前排胡傳厚、曹蔭禪、三爺、李強光、汪煥鼎、後排周培敬、彭清、沈宗琳、葉明勳、張任飛、楊孔鑫

想當年從重慶出國，啓程之前，有許多手續要辦，我那時年紀尚青，不通世故，事無大小總是跑上四樓找社長解決，他不以為忤。經過幾次之後，他把我拉着坐下，說：『強光，社長不能什麼事都管，



你有要事要辦，可以先向英文部徐主任說說，可能他就很快替你辦妥，就不必上來找我了。』講完之後，他好像有點不好意思，接著說：『強光，我這個社長算不了甚麼，你年紀輕，前程無量，你將來的成就一定比我的大，將來你會曉得做事有分層負責的方法，慢慢你就領會了。』三爺說這話時臉上很慈祥，非常誠懇，充滿同情心，使我永遠不會忘記。經過這次薰陶，我對年青人總抱仁恕態度，因為我年青的時候，三爺容忍我，愛護我。

我出國前不久，還在社裏工作。有一天社長從四樓辦公室下來，到英文及編譯兩部的大通艙。他一看見我，就要給我當時在巴縣中學外籍記者招待所的美聯社特派員慕沙打電話，通知他，我們社長約他翌日幾時在何地見面。我把電話打出之後，等着那邊去找慕沙，不巧他不知哪裏去了，足足找了四十分鐘，才把他找回來。其實，三爺自己不必等，我自然會把話轉達慕沙；但是三爺始終沒走開，我拿著電話筒在等，他也站著等，一直等慕沙找到，交待清楚之後，三爺才離開。從此，我無論做什麼事情，總竭力效法三爺，做完才走。

三爺沒有讀過大學新聞學系，但是他有新聞記者的鼻子，他的新聞感覺極其靈敏。記得民國卅二年十月下旬的某一天夜間，日本同盟社發了一節短訊，我們那時抄收回盟的英文廣播稿，那天夜間負責英譯中的是一位姓胡的同事，他大概是一時不經意，把這節短訊認為不重要，一劃就把它刷了，沒有譯出來。第二天清早，三爺也許是從別處獲悉，跑來追問，原來這節新聞是報導日本民間神祕組織黑龍會領

袖中野正剛切腹自殺的消息。三爺認為日本侵華戰事方酣之際，忽傳這樣的一位人物切腹，背後一定大有文章。他當時向我們說：中央社沒有把這節新聞譯出來，是大大的失責；他自己表示非常痛心。這件事，可以看出三爺對新聞的敏感，也看出他對新聞工作如何有責任心。

**馬超俊一**

**健筆走風雷，令譽永垂千載下；**

**中興凋碩彥，愴懷未見九州同。**

# 前輩風範

## 李葉

民國三十一年，亡友徐鎮埏先生任國家總動員會議軍法執行監，平日嗜好平劇，其左右如賈毓泉兄等均係票友，時常奏唱自娛。某日，因名票莫敬一先生（余叔岩之友）自桂林遷往重慶，鎮埏先生在家中邀宴，坐中有蕭同茲及黃少谷先生，因而得以初次拜識三爺。其後即開始隨莫先生學習平劇，不久又改移開源銀行，成立票房，定期練習。我當時任軍事運輸監察工作，終日繁忙，而且不時出差，對於學習平劇，則一曝十寒，隨即中輟，因而也不能和三爺時常會晤。自重慶回南京遷台北，雖不時在各種場合見面，也不過匆匆問問安而已。

民國五十二年，我服務正聲廣播公司，濫竽新聞界，同業時相聚會，因而和三爺接近機會日多，十多年來，每週至少一二次，多則三四次，時常親聆警歎。時日既久，漸漸體念到三爺對於處世為人，以及其生活言行，數十年來，多采多姿，其清逸神秀之風采，從容不迫之舉止，真是卓然高致，動靜均衡。偶爾論人論事，則堅持原則，明辯是非，具高尚之道德情操；雖在衰邁之年，對國家對革命具有強烈的熱誠和責任感，實在難能可貴。

十年以前，有所謂「文星事件」，扯上了三爺，演變到後來，竟然有人說他的思想也有了問題。當時我曾約了兩三個朋友，向三爺建議，請三爺不要爲此事再置身事外的沉默下去，必須立即向中央表明態度，并且要作適當的處理，三爺當時認爲確有此必要。另外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和有關誤會此事的朋友閒談，勸他不要對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多所誤會，那位朋友也釋然而笑。

三爺是我接觸老一輩的先進之一，也許他們當年的時代背景和所受教育的關係，但以今視昔，無論是道德情操，革命熱忱，政治責任，以及做人處世之誠信篤行，相形之下，總覺得我們這一輩，好像缺少了「那麼一點點」！丁此世風混亂，倫理道德式微之時，願我輩朋友，感念三爺之行誼，共同黽勉，希望能有所匡正世俗，以慰三爺在天之靈！

### 張九如一

噩耗驚傳午夜間，從此幽明畛域，回思開闔華夷通  
訊權，風雨如晦，危疑定於一心，何故麤氈鶴翅，荷鍾  
攜壺擬劉伶，漠然生死；

兩家相去未千步，又爲兒女姻親，惟以綢繆天下興  
亡事，狂狷殊途，咫尺遂同萬里。直待聽召玉樓，素車  
白馬送元伯，邈若河山。

# 永恒的懷念

李廉

三爺過世將近三個月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仍深印在同儕心中，未曾因時間的遠逝而有絲毫磨損。每當三爺生前時常聚會的朋友們小聚在一起時，總好像有所等待，等待那碩長、挺拔的身影，安祥而緩慢地踱了進來。那就是三爺。多年來，公私場合不知有多少次和三爺在一起，他那令人心折的風貌與神韻——特別是那進得門來的一霎，仁慈而謙和的笑貌，安祥而從容的步履，終始如一，從無改變。如今他雖然已經去了，和我們人天永隔，但僅就他的形貌而言，就仍然是那麼清晰，那麼逼真，依稀還和我們生活在一起。

我與三爺過從二十年，深知他雖則不拘小節，但却是自律很嚴的人物。姑不論對黨對國一片忠誠，雖遭人誤解乃至於不期之謗，也從不自辯。就是平日一衣一履、一飲一饌，務必求其端正整潔，不稍馬虎。民國六十年我訪美歸來，深知聯合國席位已難於保持，而毛偽進入聯合國後，我在外交上所將遭逢的橫逆，自亦在意料之中。又當時留美學界基於愛國意識所發動的保釣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之中，其間難免有毛偽分子從中操縱，用為統戰分化的毒計。曾與三爺謀及此事，他一時熱血沸騰，謂吾輩今日無一人而非孤臣孽子，必須準備

爲更艱苦的奮鬥，更勇敢的犧牲，聯合國的席位可以不要，而忠奸不可不辨，是非不可不明。對於華夏衣冠而夷狄心肺的共黨匪徒，尤必須大張撻伐。其言猶縈迴耳際，足見三爺雖年登耄耋，其慷慨激昂的胸懷却無遜少年。

三爺之方正，亦常見於三五友好閒談之中。許多場合，朋儕酒酣耳熱，未免放言高論，而三爺多半一旁靜聽，不輕於置評。但若對某種主張或某種態度（儘管那是出於玩笑）認爲不當時，却往往予以呵斥，語驚四座。此當然出自極強烈的正義感，但也蘊含有望之殷而責之切的無限愛心。

三爺是懂得生活藝術的人。晚年，他爲自己安排一有規律但又不枯燥的生活，長保樂觀愉快的心情，更重要的是年雖長而始終能保持純真的童心，此所以他獲享遐齡，而健康的情形不減中年。三爺曾患心臟病入院治療，但他與一般心臟病患者顯然不同，他早已勘破生死關頭，更何況名利二字！我曾認真地在體驗三爺的生活態度，他的行爲表現是適性而不任性，隨欲而不縱欲。他愛酒而不逾量，在歡樂場中歡樂，寂寞時也從不憂愁。他晚年自喪偶以後頗有一二紅粉知己，但也止於促膝清談，存其情趣而已。我知曾有人勸三爺納某女士於室中，三爺的答覆是：我既不欲害人，亦不願自苦。此其所謂能發能收，適可而止，真性情中人物！

人至於老，最怕的是寂寞。三爺却對此善於排遣。如每日上午以

保齡球爲健身運動，下午看書報、聽音樂，晚間在其所喜愛的地方品茗小坐。我相信，三爺所以能年登八十而康彊不衰，而生死之間一如其所願，活得安逸，死得痛快，全得力於靈性的修養與生活的藝術。三爺過世後，朋輩仍常至嘉新頂樓藍天小坐，香茗生烟，一似三爺還在座中。

我年二十開始寫文章，中年以後更以文章報國爲職志，亦即以筆耕爲活。初時，少年氣盛，往往以筆鋒犀利爲能。來台後評論時政，亦多慷慨激昂之作，舊時習氣毫不能改。及至拜識三爺，頗承器重，對文章一道尤獨加青眼。三爺知人亦識其文，報端言論，多半讀後即知其作者爲誰。然而對於後進，雖獎飾多於責備，但却從不輕於讚美。我每爲一文，自認用力頗勤，必蒙三爺賞識，殊不知與三爺晤見時，僅「此文爲爾所寫乎」一語而已，毫無一語之褒。但若偶有詳析事理，發爲有價值的建議之作，三爺必對之讚不絕口，往往以電話表示祝賀。久之，乃能悟見此中道理，即文章不必期其傳世，只求能有裨乎時艱，使一般讀者獲得思想與認識上的啓發；而對當前實際事務有所批評與建議時，亦理當出之於謙抑的心懷，溫和的態度，令當道者樂於接受，即此已足。此所以文章載道，道而必期其施行。否則徒尚纖巧刻薄，大非君子。今者，不但我自己寫文章，且已職司立意選題，日日看他人之文章，而自問能無大隕越，勉盡其文章報國之職責者，實得自三爺無言之教誨。世稱一字之師，三爺對我，從無一字的指點，但我所獲自三爺者，終身受用不盡。台灣新聞同業甚多出自三

爺門下，我亦以私淑弟子自居。三爺之所以受到眾多同業的愛戴而終始崇敬不衰，主要的就基於這種給人們以尊重而又能以獎勉代替責備的循循善誘的美德。

三爺去了，我們之間寂寞了許多。可是三爺留給我們的却十分豐富，只是要我們從回憶中不斷地去體認發掘。記得在為三爺治喪的一次會議中，黃少老說了幾句話：『蕭先生是平凡的，是偉大的。正因為是平凡的，所以才見其真正的偉大。』以這幾句話讚三爺，再恰當也不過了。如今，對此平凡而偉大的三爺，除了永恆的懷念以外，我們還能做什麼呢？

陳立夫—

革命著勳勞，盡瘁新聞，碩畫宏籌留聖績；  
老成捐館舍，緬懷舊誼，博文清操悼良朋。



# 最初與最後

李嘉

我生於風光明媚的江南，是書香人家的三代長孫，可是，在十七歲那年單身去日本留學以後，其間經過抗戰、國破、家亡諸種禍亂，數十年來無親無師，走遍天下，今天依然落拓異邦，一事無成。可是，回顧我這野馬落花似的半生，若有些微聊以自慰之處，那是我始終沒有背離我的職業，我的崗位，同時力求以誠對人、對事。假如這亦可以算是一種成就，那麼飲水思源，這一點成就還不得不歸功於三爺當年的啓示與開導。因為我少年乏教，視三爺為師，海外無親，奉三爺為長。

我不願套用陳腐的俗語，說什麼「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三爺」，可是，數十年來我心中却真有此感。「士為知己者用」之類的思想，在我這一代多少讀過幾本線裝書的中國人腦中，還是適用的。

二十七年前，我應三爺之召進中央社，被派來佔領軍管制下的日本做一名記者；二十七年後的今天，三爺已經作古，而我也兩鬢斑白，還留在已無國交的日本，作一名中央社的記者。在這長長的二十七年，佔我生涯一半的二十七年間，我能在屈辱與貧乏之中，在誘惑

與誹謗之下，苦守住我的崗位，一半自是我感三爺知己之恩，不忘「栖燕不以人去辭巢，貞松不以歲寒改性」的古訓；一半實由於他老人家多年來在社內社外給我的不斷鼓勵與啓示，使我對自己，對工作，對人生，經常有新的發現，新的勇氣，並且覺得不孤獨。當然朋友們都知道三爺不多說話，是導而不教，其難能可貴也就在此。

## 受命參加東京分社

我第一次見到三爺是在三十六年初夏。地點是在南京中央通訊社總社的社長室。安排那一次會見的，是當時英文部主任馮國禎兄，與戰後第一任東京分社主任宋德和兄。我與馮國禎兄戰時同在印度新德里，他是中央社駐印特派員，我於英印軍參謀本部任少校參謀，在總督府辦公；至於宋德和兄則在他從東京返南京述職時，過上海來找過我兩次，談加入東京中央社工作的事（二位現在已都作古。馮約二十年前與胡文虎長子胡好乘私人小飛機失事歿於新嘉坡；宋於數年前患癌症病故香港）。

我當時從印度回到一別十載的故鄉尚不到一年。那時，雖說是凱旋歸來，殊不知家道中落，面目全非。父親於戰時被敵人捕去，死於獄中酷刑之下，屍骨都無着落；幼妹夭折；二弟病癆，在醫院中長期療養（已故）；三弟遠在重慶，尚未復員。所謂親屬者僅存老母一人，所謂家園者，僅是陋巷孤室而已。這慘苦的景象，對十年遊學、

從軍、出征還鄉的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也使我對戰爭與勝利第一次感覺到幻滅。

幸而重慶文化界的好多老朋友，已集中在上海活躍。他們歡迎我回國回鄉，並且拉我回到文壇工作。我去南京晉見三爺時，已在上海新民晚報主編「夜光杯」和「夜花園」兩個副刊，並且同時主編國民午報副刊和「人世間」月刊，也出版了好幾本譯作。我當時年未滿三十，有強烈的自由主義與浪漫主義的思想背景，回國雖不到一年，所見所聞，每每使我嘆息悲憤；因之對當時政治的批判，對社會現狀的不滿，不免經常流露於文墨之間。報紙的銷路雖然增加，但亦同時給報館老板添加不少政治上來的麻煩與干擾，使我不得不私下考慮進退的問題。

就在這苦悶的情況中，宋德和兄從日本來，通過馮國楨兄邀我進中央社東京分社工作，說他那兒很需要一位兼通英、日文的記者。說實話，我當時以為中央社是「報喜不報憂」的官方宣傳機構，頗有「敬而遠之」之意，但去日本工作對我個人而言是一大誘惑：第一，我早年留學日本，以後參加八年抗戰，對戰敗後的日本自有極大的關心；第二，出國去日本，可以藉此脫離是非之地，暫時逃避現實。因此我的答覆是可以考慮，沒想到我還沒有認真考慮以前，中央社的上海分社送來了一對從南京拍來的蕭社長同茲約見的電報，第二天晚上我便坐夜車去了南京。



八年對日抗戰勝利，從重慶回到南京時的蕭社長

## 一席暢談決定追隨

在一個天氣晴朗，初夏的下午，我按預先約定的時間到南京中央

社總社去見蕭社長。首先我得指出：勝利後在南京的中央社，和今天在台北的中央社相比，規模至少在十倍以上。單就國內而言，全國各地即有六十多個分支機構，社內編輯、記者、員工亦有二千四、五百名。爲一社之長的三爺在那時的聲望、地位及權威，遠在一般政府首長之上。而我雖略有文名，亦不過是一介書生而已。但是，我當時並無所求，對進中央社去東京的事，有興趣，却不大；並且野馬成性，過慣自由生活的我，一提到進入「官方機構」似的通訊社，要辦銓敘人事等等，就不免遲疑不前。何況我亦有自知之明，預料社方也未必能採用我這樣一個倔強自負、毫無忌諱的年青文士。因之，我第一次見三爺時的心情是淡泊恬靜，略帶些好奇。

那時三爺所計劃的足以誇示全球的中央社大廈尚未完成，我被帶到總社舊址的社長室去見三爺。社長室比我想像的可小得多，因爲小，也就沒什麼擺設裝置，一張辦公桌就佔去很大面積。三爺就坐在辦公桌前，正拉出他面前的抽屜，低頭在找什麼似地，見我進房，抬頭示意我在書桌對面坐下。

三爺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瀟灑文雅的中年紳士，穿一套淡灰色、雙排扣的春呢西服，我想三爺那時大概才剛過五十，可能比現在執筆寫這篇文章時的我，還要年輕三、四歲。

三爺說話用字不多，但簡潔扼要。兩目炯炯有神，誠摯正直之情，流溢於容姿言詞之外。與三爺談話，終其席沒有一點點虛禮虛

詞。這是三爺給我的第一印象。這印象我一直保留到二十七年後在台北的最後一面時，始終沒有褪色。

那次談話，除了開篇時三爺問了我幾句話，我簡短地回答以後，差不多全是三爺說，我聽。（近年來我每年必回台北數次，每次回台必見三爺數次，每次見面差不多全是我說，三爺聽，與第一次談話成對比。）首先使我驚訝的是，三爺似乎對我的以往調查得頗為詳盡。他說，他讀過不少我的作品，對我甚為嘉獎，希望我「屈就」中央社東京分社特派員之職，並且毋須在國內總社見習觀摩，祇要我同意，可以立刻發給旅費啓程赴日到差。

三爺然後提到我文章中常有的自由、浪漫的氣質與批判精神。他說，他都能理解，並且希望我能保持這氣質與精神，但他強調批判不應有偏見，不應動感情；必須先把事實弄清楚，再判定真理的方向，然後才能評述。三爺再從事實與真理這一點中引到新聞這一行職業的本質，以及作為一個新聞記者的職責與使命；從這一點，三爺又推論到今天中國的變亂和問題之所在，指出在這個大時代，大變局中，一個新聞記者能不斷地追求事實與真理，他是最勇敢、最愛國的中國人；也許他得不到報酬，甚至可能受到迫害和歧視，但他決不會是孤獨的。最後，三爺談到他本人寄託於中央社的理想，以及如何實現這理想的計劃，希望我能作為中央社的一員，共同推進這理想，這計劃。

當我正聽得入迷的時候，三爺突然看了看手錶，站起來，向我伸出手來說：『你不妨回去考慮一下』。我宛如大夢初覺，紅着臉站起來，握住三爺的手說：『我決定進中央社，您在一天，我一天不離開。』

第二天我乘車回上海，辭去本兼各職，收拾行李，留下母、妻和當未週歲的孩子，單身搭船渡海來日本，一轉眼便過了二十七年的時光。

## 人生至寶誠信與忠

孔子說，人生「三十而立」，三爺當年在南京的那一席話，可以說是奠定了我三十以後的人生路程。當然那一席話的詳細內容，我已模糊；三爺自己在生前也許已忘記，即使今日能夠追憶成章，亦不見得有什麼新鮮出奇之處。但是，我覺得問題不是內容，而是說話人的情意與聽話人的心境，所謂其人，其時，其地，三者假如全都湊合，那麼話才能以心傳心，發生深遠的作用。三爺那席話的內容我可以忘記，但是三爺通過那席話想傳給我的寶，却不能忘，未曾忘，亦不敢忘。聽三爺那一席話，我突然悟到人生的至寶祇有三個大字，亦即是「信、誠、忠」而已。三爺非佛，但一席話的指點，竟使我這塊頑石亦頓悟點頭了。

我如何進中央社的這一段，對我個人是殊有重要意義的插曲，我

在三爺生前從未向外人道過，甚至和三爺本人亦不再提及。祇有一次，三爺在七十歲的那年，偕明勳、偉甫來日本避壽，我陪同三位去京都觀光，在龍安寺的石庭前欣賞了半天那以矮墀、白砂、綠岩所組成的天下名庭，走出廟門時，三爺談起禪和哲理，突然着重語氣提到「頓悟」兩個字，特意回頭向我一笑，拉我一手。這一笑好像是示意我體會到南京當年那一段插曲，但我未便問。

去年十月，我回台北小住數日，臨走的前一天，孟能兄到統一飯店來看我，談到他新近收買到的幾幅字畫，其中有一幅唐伯虎手書的詩卷。我生於吳縣，可以高攀為唐寅的同鄉，從小嚮往其人，酷愛其詩畫，因此便與孟能兄同道到水晶大廈他家中去看那幅詩卷。

## 借詞告別竟成永訣

那是一幅相當長的詩卷，其中錄有近三十首的唐寅自作，由他手抄送給他老師周臣的。我愛唐寅的詩，因此一面欣賞他的書法，一面細讀他的詩，一首首讀來，却亦頗費時間。三爺正好不在家，爲了清靜，孟能兄把那幅詩卷帶進三爺住的套房，在那套房中的大飯桌鋪開來欣賞，首首讀來，全是好詩。我還清晰記得，我正唸到唐寅的五十自壽詩，詩云：『自家只道是童兒，誰料光陰驀地移。總算一萬八千日，轉成四十九年非。從前悲喜皆成夢，向後榮枯未可知。去日已多來日少，急忙歡笑也嫌遲。』這詩的意境觸動我自己當時的心情，不



免傷感，亦不禁拍案稱絕。正好這時候，門鈴一響，三爺回來了。

那天台北的天氣好像很悶熱，三爺一進門便脫去上衣，面孔微紅，是剛打完保齡球，還是午飯喝了點酒，我不記得，也沒有問。三爺脫上衣後，擦去頭上的汗，便在我旁邊坐下來，問我在幹什麼。我祇得照實回答，但是，我肚中明白三爺一生不嗜好古玩字畫，可能是怕玩物喪志；對於唐伯虎的感傷主義和香艷詩格調的詩體，更不會喜歡的。因此，我心中作鬼，有些坐立不安，又知道三爺照例要睡午覺，便借詞告別，連詩卷都沒敢看完。

那是我見到三爺的最後一面，因為第二天清早我便飛回日本。一個多月後三爺突然過世，我是事後第三天才在東京接到那悲痛的消息，待我趕到台北，已是大殮前一天晚上！

(六十三年三月七日於東京三番町)

陳子和—

巴蜀訂交，台員話舊，託身仁宇，上接高隣，載酒賞花  
常共醉，肝膽平生，志節行芳有賢子；  
文章報國，業績昭垂，風雨危舟，堅貞大節，懷忠抱義  
最堪師，清明坐化，神凝氣定是完人。

# 兩件紀念品的故事

李緘三

蕭先生去世了，我滿懷悲愴，無限傷感。像蕭先生這樣一位超凡入化的人，似乎應該是永生的，而他竟離我們而長逝了，怎不令人感到人生的虛幻。我驚聞噩耗之日，頹然獨自坐在辦事處，陷入沉思之中，沒有流淚，只覺得內心抑鬱、痛苦，久久不能自釋。其後，連續在台北報紙上讀到有關蕭先生出殯、火葬、安靈的消息，我雖遠隔重洋，仿如身臨其境，與在場千百執紼的人同致哀悼。

不久，中央社總社同仁函告決定為蕭先生鑄造銅像，並出刊「在茲集」，以留永恆紀念。我自然衷誠贊同。但屢次想為「在茲集」撰文，提起筆來，又廢然擱置。回憶幾年前，總社同仁為慶賀蕭先生七五華誕，籌刊「念茲集」的時候，我一接徵稿函，便欣然寫就，迅速寄出。這次心情完全不同。然想不到「念茲集」是祝壽篇，而「在茲集」竟成弔喪篇。我內心似乎覺得：蕭先生已經不在，縱有千言萬語，還有什麼好說的？

但「念茲集」和「在茲集」無疑地將為蕭先生提供大量最真實、最珍貴的資料，增進後世對這一位曾為黨國元勳、中國新聞界先驅的

「蕭同茲」、畢生受人敬愛的「蕭三爺」的認識和景慕。曾經沐浴教化如我者，似乎應有提供一些資料的責任。基於這一觀點，我現在願以我所珍藏的兩件紀念品獻給「在茲集」，並約略說明它們的背景故事。

第一件紀念品是與蕭先生的一張最後合照，攝於民國五十九年四月台北蕭府。

那年，我應中華航空公司邀請，偕內子祝新回國觀光，並藉此向總社述職。那是我自從民國三十七年來美工作後，廿二年中第一次回國。在台北三個星期中，我們夫婦與蕭先生晤聚四次。第一次是我們抵達台北的翌日，即趕赴蕭府晉謁一別廿二年的蕭先生，其後兩次是在友好歡宴席上，最後一次是蕭先生在他府上招待我們的晚宴中。



本文作者夫婦從舊金山回台北時，蕭先生召宴

與蕭先生久別重逢，彼此有無限欣慰之情。蕭先生雖然兩鬢斑白，步履不如往昔健捷，惟精神矍鑠，仍然談笑風生，瀟灑曠逸，不減當年。那年他已屆七六高齡，我所感到的顯著差別，是歲月使他老

人家變得更爲寬厚慈祥。

在言談中，有幾點使我記憶猶新。初次見面，他看到我們夫婦身體都很健康，頗爲高興，隨開玩笑地對已經做了祖母的祝新說：『你還是這麼年輕漂亮呢！』

有一次，談到我在國外的的工作，蕭先生表示嘉許。我說：只是由於當年在昆明與他一面之緣，竟使我爲中央社工作了一輩子。他毫未遲疑地說：『你是獻身於一個事業，是值得驕傲的。』

又有一次，我表示希望蕭先生能到美國一遊，我們大家必將熱烈歡迎。蕭先生含笑回答說：『假如我來，一定在你們家住上一個月。』

大約是四月十四日晚（日期已不確記），我們如約到蕭府赴宴。那晚在座，除蕭先生及孟能兄嫂外，有沈宗琳兄嫂，周培敬兄嫂，馮志翔兄嫂，胡傳厚兄和葉明勳兄。老同事，老朋友，歡聚一堂，在蕭先生的春風化雨、和顏悅色之中，了無拘泥，盡情談笑。放懷暢飲之餘，喝了不少的酒。對我說來，那是二十餘年第一次重溫舊夢，重嘗中央社大家庭的溫暖。

可恨美景不長，盛筵難再。由於我們翌晨要早起遠行，席散不久，不得不向主人告辭。孟能兄陪著蕭先生緩步送我們到大門外，依依握別。詎料這便是永訣的一刻，此後，我已無緣再與蕭先生見面

了。幸而飯後攝影留念，留下這一張珍貴的照片。

另一件紀念品是我已珍藏了二十八年之久的一封蕭先生親筆函。這封信是蕭先生於民國卅五年元月六日寫於重慶，而寄到加爾各答的。蕭先生在主持中央社社務期間，給我公私函件甚多，例由祕書執筆，這是他給我的惟一親筆信。

我彼時擔任中央社駐加爾各答特派員。對日抗戰勝利，淪陷經年的我的故鄉常寧得以重光。不久，接奉先嚴家書，獲悉劫後窘況。我隨即寫信給蕭先生，向總社借支當時法幣二十萬元，請代匯舍間應急。同時鑒於戰後加爾各答已失新聞重要性，建議結束加城辦事處，並表示我希望由印度逕赴美國求學之意。蕭先生在代匯款項後，乃即親筆作覆。

我在重慶加入中央社工作後，才發現蕭先生不僅是我的湖南大同鄉，而且是常寧小同鄉。不過蕭先生少壯之年離鄉，其後一直沒有回去過。我也是從小離鄉別井，所以兩人對家鄉情況都很生疏。就我記憶所及，我們從未談過家鄉。但蕭先生在這封信內說：『民族浩劫，波及家園，言之痛恨。』仍然充分流露他對鄉土的熱愛。信中提到蕭宏宇兄，當時是中央社駐衡陽特派員；又提到英倚泉兄，當時是中央社駐莫斯科特派員。

這封信顯然是隨意漫筆寫成，但可看出蕭先生書法的秀勁。蕭先生雖不以書法名世，而實在是一個有工力的書法。這點容或是許多人

所不知道的。

說來奇怪，當我於民國三十七年奉派來美工作，離開南京總社之際，將所有多年日記、書札和可資紀念的文件全部儲置一個箱子內，交給先父母帶回家鄉，旋遭變亂，蕩然無存。惟獨蕭先生這一封親筆函連同幾張舊時照片，不知當時如何放置在行囊裏，隨身帶到美國，得以保全。近將這封信檢出審視，墨瀋猶新，而回首前塵，亦歷歷如在目前。只是，蕭先生已經與我們幽明永隔了！

緘三仁弟大鑒 上月廿六、廿七日兩函同於  
昨日讀悉 民族浩劫波及家園言之痛  
恨 尊府及舍間人口均告無恙亦大幸矣  
所囑滙款貳拾萬元接濟

尊翁已於昨日電滙長沙託宏宇帶交適  
宏宇<sup>齊</sup>齊父喪定九日旋里彼亦需款甚急係  
同時滙出諒不有誤

仁弟出國遠遊歐美之計劃原則上見思來

蕭社長寫給李緘三的親筆信



贊曰惟大戮之家破親老而弟又係獨出  
是時間上又須再加考慮矣兄意係社中  
傳真器材查有下落即可結束加城辦事  
處先行回國省親彼時再作決定諒荷  
弟台同意也倚泉兄正在辦理出國手續恐  
途由香港渡海不再經印度矣出  
注并及草、順賀

新禧

愚兄 同敬上廿五年元月六日

# 千載永懷。萬人低首

李爾康

蕭先生走了。生命、人生與這個世界，心上雜亂地泛起了茫然的哀思。

蕭先生的風範，對黨國的貢獻，與對新聞界的貢獻，爲人共知，爲人共仰，而且敘述的人很多，總統府也有明令褒揚，永垂史冊，我不想多說。這裏想說的，只是最近幾年，我對蕭先生的接觸，講一點個人的感受。

近幾年，蕭先生的許多應酬文字，有些是我辦的，從這方面仍可窺見蕭先生的待人寬厚，與處事嚴謹。寬厚，是儒家忠恕精神的表現，也是我國的固有道德。蕭先生主持中央社時，留下的佳話逸事，到今爲人追慕，樂而道之。但離開中央社後，蕭先生愛護青年，提攜後進，一如當年愛護他的部屬，同樣是出於至誠之心的。那種所顯示的恢宏器度，真如汪洋千頃，廣不可測，這種意境，我惟有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兩語比喻之。

想當年，中央社鼎盛之世，蕭先生爲國宣勞，可述之事，真是太多太多了。但是，他從來不自大其事，自尚其功。看看現世多少人在

自吹自擂，不恥其言，想想蕭先生的高風亮節，哲人已遠，天地悠悠，只有令人愴然而涕下了。

至於處事嚴謹，可從兩方面來說：一是蕭先生遇事的堅持立場，從小到大，都是如此，蓋即古人所謂「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的凜然志節。一是認真不苟，從他的書桌上抽屜裏的文件有條不紊，到給人寫信一字都不含糊，便可窺知蕭先生處事的嚴謹程度了。這種修養，可以以小喻大，是許多人所不能企及，也是有些人所不能領會的。

晉書上有一段記載，大意說，諸葛亮死後，後人對他仰慕不已，聽說蜀國有個老兵，當年曾侍從過諸葛亮，於是便去找他，問個明白。老兵却說，諸葛亮與普通人一樣的平凡。這個故事，給我們留下了啓示。一個真正偉大的人，他所給我們的印象，也許越是平凡。但是，我們必須從平凡中去認識他的偉大。蕭先生對人的印象，正復如此。

這裏，附錄輓聯一副，藉表一己哀悼之意：

以寬仁體僚屬，以正義伐奸邪，五十年典範猶存，亂世仰謙光，  
千載永懷黃叔度。

爲革命建勛猷，爲輿論開風氣，廿五載山河未復，報壇傷往事，  
萬人低首蕭三爺。

**顧祝同一**

創社溯當年，卓識深心，綽有聲聞周四海；  
歸神嗟作古，清徽碩望，永懷雅故渺千秋。

# 永難彌補的歉疚

汪煥鼎

在嘉新大樓底層的頤和園飯莊參加恭祝三爺八十大慶的歡聚以後，心裏一直縈迴著當時愉快而熱鬧的情景，不意沒有幾天竟聞噩耗，這種突然的打擊，真是難以承受。

三爺對中央社的擘劃建樹，瀝盡心血，也奠下了今天的基礎，許多情形大家都有詳盡的記述了。

我只想就親身經歷的兩件小事，來說明三爺對後進的關懷和厚道。

第一，三爺愛飲，但每次與大家同席，總是諄諄關照：『要盡興，却不必勉強。』充分流露了長者對後進的愛護。

第二，去年小兒在美結婚，我家恭治喜筵招待在台親友，原以為三爺不會來的，不意他老人家竟趕來了，雖未坐首席，仍然非常愉快。而我却感到非常不安，這種歉疚是永無彌補之日了！

于 斌一

數十載交誼久慕高風，海闊胸襟傳盛業；  
千百代清史長傳令聞，德明典範在人間。

# 忘年之交

阮毅成

蕭同茲兄長我十歲，我們可以說是忘年之交。

一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上海發生一二八的抗日戰爭。我其時在南京中央大學及中央政治學校擔任教授。中大貼出佈告說：教職員可以每人借大洋二十元，先行回籍。下學期開學日期另行通知；中政校也一時不能開學。我於是偕眷經蘇州回到杭州。四月，淞滬停戰協訂簽字，我循京杭國道再回南京。才知道原來我住的中央大學對面的協昌里房屋，已為房東胡逸民收回，必須另覓住屋。適有友人為介紹在洪武路土街口新建的一排樓房，那是上海弄堂式的一樓一底，共十戶，名為壽康里。因為地點適在中大撫中致校之間，覺得很為適當。乃立即趕去看屋，才知道自第一號至第五號，均已為中央通訊社租用，我乃租下了第六號，月租大洋五十元。其時，中央社已由同茲兄任社長，我們乃成為近隣，因而偶有來往。後來，第十號為外交評論社租用，由徐道隣兄署名的「敵乎友乎」一文，就是首先在外交評論發表

的。我在壽康里住家的時候，復任我們自己創辦的時代公論主編，每於晚間在樓上寫稿。與中央社的隔牆燈火，往往到午夜還互相照耀。

我與同茲兄更爲熟悉的時期，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我們同在漢口。我任中央宣傳部祕書，不但常在一起開會、吃飯；而且每天晚飯之後，必定同在法租界的萬國旅館晤面。所以選定在法租界，是爲了避免敵機的空襲。每晚必到的，尚有陳博生、劉百閔、彭革陳諸兄，其他常來的新聞界朋友甚多。許多次的中央宣傳通報，皆是在萬國旅館起草的。同茲兄的意見最受到重視，若干重要的觀點，皆得之於他的一言。而後大多由我執筆，他常贊許我下筆之迅捷，與用語之得當。待到散會，多已在午夜了！

是年七月底，我忽然奉到回浙江任事之命，事先我毫末知情，於是要離開了漢口，也要離開了中宣部。同茲兄對我之見危受命，頗表同情。而對我此後不能再參加晚間的會談，也至表惋惜。他對於東南前線的中央社採訪工作，要我協助，并予以方便。這在八年的抗戰之中，我真是盡了全力。





有些社務是在午餐時決定的，右為中央社秘書曹蔭穉

二

民國三十八年二月，我全家到了台灣，住在永康街。原在中央社

任職的曹蔭穉兄也住在附近，並且我們被編在同一個黨小組。曹兄也是在漢口時常見面的朋友，經他談起，我才知道同茲兄的近況與處境，遂去他的安東街家中晤談。他的休休有容，絲毫未變。

民國四十三年三月，我又忽奉到中央日報工作之命，也是完全出於意外，真感到十分惶恐。我打電話給他，要向他去請教。他却堅持要先來看我，遂在我的永康街家中談了很久。他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也真是聞所未聞，茅塞頓開。我并請他代為轉約蔭穉兄來報社任主筆，事實上是做我的祕書，替我看家。同茲兄問我，我與蔭穉兄的交誼如何，為何會想到他？我說：『論交誼，不能算是很深。但他既能久在中央社，為兄的左右手，其能力與忠誠，必定極為可信。』同茲兄說：『兄誠有知人之明，必為勸駕。』此後我在報社工作期中，同茲兄所給我的指導與鼓勵甚多、難以盡述。

### 三

這一年，我五十歲，同茲兄六十歲，我寫一詩賀之。他生於滿清光緒甲午，亦即中日第一次戰爭之年。次年馬關條約成，台澎割讓於日本。詩為：

六十年來一瞬中，台澎又已九州同。

儘多滄海桑田感，不減輕裘緩帶風。

對飲自慚非阮籍，結隣早喜識元龍。

偷閒買醉長安道，猶是蕭郎未喚翁。

他對於最後兩句，最爲欣賞。我說：『所謂長安道，係指台北市長安西路一帶。』他乃大笑。他說：『我不會寫詩，兄五十歲，無以爲報。如果請他人捉刀，反而顯得不够真誠，只有失禮了！』

同茲兄的生日，是農曆九月十八日。我每年必去祝壽，并且送他一瓶酒。所以他常說：我的酒是專爲送他而備的。近年以來，我們也常有一起歡宴的機會。我既不能飲，又不懂京劇，并不能助他的興，實在不能算是他的知音。但是他并不忘記我，有人約他吃飯，問他要何人作陪，他却常常提到我。他又常於上午，到台北市南京西路榮星保齡球館去打球，我有時順路經過，便下車去看看他，他一定請我到球館樓上小坐。他因爲我不喜歡喝咖啡，便常請我吃牛肉茶。於是我們對坐下來，他抽煙，我飲茶，并不多談話，就已經近了午刻。他又常在晚上，到中山北路藍天餐廳去小坐，他有酒存在藍天，到了就與二三好友取出來小酌。我也有時在順道之便，上樓去看他。藍天在晚飯之後，不單獨賣牛肉茶，我只得喝可可。此夕只可談風月，說到會心之處，相顧一笑。

我們也常一起開會，那是因為我們同是世界新聞學校的創辦人，他任董事長，我任常務董事，成舍我兄任校長。世新辦得很有成績，成校長功不可沒。每次開董事會，皆由同茲兄任主席，他所提有關校

務的意見，皆得其要點。

我們又同是台北市新聞評議委員會的委員，他并且曾被公推為主任委員。在開會的時候，他并不多講話，但如遇有各人意見不同的時候，爭持難決，他却常常要言不繁，幾句話就成為公認的最佳結論。但是在去年五月，本屆評議委員會改選成立，我們皆被連選連任，他以健康不佳，辭未就職。我其時亦在病中，也想辭謝，他却力勸我不必以他為例，勉為新聞界再服務一次。



這個時期的蕭先生是私立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董事長兼國華廣告公司董事長。圖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董監事（自右至左）：前排成舍我、王雲五、于右任、蕭先生、林柏壽；中排閻奉璋、游彌堅、李中襄、辜振甫、端木愷、程滄波、黃少谷；後排郭驥、陳訓念、張明煒、阮毅成、葉明勳、辜偉甫、謝然之

#### 四

同茲兄平時待人接物，均謙和有禮。七十以後，更顯出他是一位

慈祥的長者。但是在幾年之前，有一次他和我談到我們共同的一位友人，爲忌者所陷的事，他要我問清楚內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乃將我所知道的實在情形，告訴了他。我并且說：那一位忌人者，未免太小氣了些。他竟立即改容，正色地說：『此人不是小氣，乃是小人。』我很少看見他說話這樣的認真，於是，他乃爲我說，某也賢，某也不肖。可見他的是非之辨是并不含糊的。

自成舍我兄創辦小世界週刊，便約我爲寫隨筆。我當即答應爲他寫五百篇，期以十年寫完。以六十歲之後的人，要作十年寫作的打算，未免不自量力。而同茲兄却很欣賞我所寫的隨筆，他每期都看，看完了還常常打電話給我，或是當面對我說，某篇的意義如何，寫得好的地方何在。其實，我有時急於交卷，並沒有想到那麼多。經他一提，反而增加了我的自信。他常說，他不會寫文章。但是能寫的人應該寫，要寫給年青的下一代看，使他們知道我們曾經遭遇過些什麼，又曾爲國家做了些什麼。

自去年下半年起，我眼見到他的健康日漸不如從前。但以其平時的修養得法，生活的情趣未減，總以爲他還可以延年益壽。不料遽以心疾，瞬棄人寰。同茲兄是典型的中國文人，也是典型的新聞從業人員。出生在多難的國家，歷經了艱危的時代。他去了！却留下了友朋們的無限哀思，與青年們的最好典範。設奠之日，敬輓以聯：

長我十年，益友良師，文字商量頻見許。

別君旬日，酒闌燈地，人才月旦又誰同。

民國六十三年二月五日於臺北

梁寒操一

噩耗傳來，寒暄互問纔三日；

稠情永念，風雨同舟過卅年。

# 同老典範長留人間

周大中

湖南常寧西鄉之藍江，山水鐘靈，地勢開朗，清末民初間有賢哲出焉，同茲世伯即其著者。余十二歲時，既離鄉負笈於衡陽船山中學，藍江爲余進城遠行必由之途，家人即遙指此處爲我縣新聞界巨擘傑出之士誕生地，其道德文章，馳名海內外，故在少年青年時即仰止已久。

同茲先生少懷大志，熱愛黨國，在中學時代即參與工運工作，卓有表現。嗣隨吳鐵城先生說服張學良，使東北得以早日易幟，歸服中央，統一大業得以早日完成。

來台後得識先生，二十餘年間，除短期負笈海外進修外，時相過從，親承教誨，獲益良多。

先生富有企業家之精神，故其在中央通訊社卅三年間，由三、五人而發展成爲全球性之通訊社，宏揚國策，傳播消息，介紹新知，實有功焉。

先生生性豁達，處事以公，對人以誠，順乎自然，無矯情做作，



藹然長者風範，與人以親切感。從無聲色俱厲，嚴詞責人，故其在中央通訊社內，在社會外，一團和氣，贏得僚屬敬重，時人亦樂與之交遊。當其安息陽明山之巔時，盛況一若生前，若非他老人家平日之和藹與「人情味」，曷克贏得此由衷的送別。

先生融中西儒者傳統，胸懷磊落，風度極其瀟灑，故終其一生活得很有意思死也自然安祥。為貽後者典範，好友編印「在茲集」，謹為數言，以微表對同伯之懷念，并願同老清風霽日之襟度與平凡中之偉大長留人間，念茲在茲。

# 常寧先後兩人豪

## 周子方

余邑常寧，爲偏處湘南之一彈丸小縣，因地方交通多梗，工商落後，居民守株家園，樂於耕讀爲業，而出外打天下者爲數極鮮。若論鯤化鵬搏，青雲直上者，在民國以前，當推唐九爺義渠先生，逮民國以後，則以蕭三爺同茲先生爲首屈一指。

九爺出身舉人，能文善詩，當清代洪楊之亂，應曾國藩先生之徵召，遂以書生而投筆從戎，在軍中平時投戈講武，息馬論道，輕裘緩帶，大有羊叔子之儒將風趣。戰時率部殺敵，衝鋒陷陣，身先士卒，出生入死者不知凡幾，而挽清室之狂瀾於既倒，九爺實爲其中功臣之一。嗣後國家論功行賞，經擢署安徽巡撫，所謂封疆大吏，仕途顯赫，斯爲甚矣。詎同鄉人中竟有存「一人得道，雞犬皆仙」之幻想，故間關千里，前去求一官半職者大有人在。倘未如願以償，乃谷風興怨，散佈九爺不認同鄉，不用同鄉等流言。

三爺盡瘁中央數十年，於黨於國，貢獻殊多，功不可沒。尤其主持中央通訊社，成績輝煌，無非由其眼光遠大，魄力卓越，計劃周密，領導正確的種種優異因素之結晶。至於對待部屬，如何態度慈

藹，如何照顧周到，如何公私分明，如何度量寬宏，如何與人爲善，如何以身示範，均由其舊同仁分別在「念茲集」內，敘述淋漓盡致，無庸筆者贅及。所可惜者，三爺不利於少數同鄉人之口，與以前散佈唐九爺之流言，如出一轍。

竊思蕭、唐二公，當時所以未能盡量借重同鄉，致有惡言相加者，不外有下列原因之苦衷：第一格於國家機關用人之固定制度。第二堅守用人唯才、公爾忘私之原則。第三鄉間親友，無論素質若何，初出茅廬，非經相當之學習時間，誠難勝任公家任何職務，坐是心餘力絀，愛莫能助。彼輩苟能運用客觀條件，試爲二公之艱難處境設想，則此種無謂之誤會，自不至於形成。

復觀從來稱贊善於用人者，必曰「知人善用」，此語重在知字，如不知之有素，當然不用，若夫不知亦用，則是濫用，而非善用矣。三爺離開桑梓數十寒暑，對於故鄉子弟既素昧平生，自無從知其底蘊。回憶民國十七八年間，曾供職中央黨部之同鄉，如吳漱子、蕭客生諸兄，均係由三爺所推介，又同鄉在三爺所主持之中央通訊社及各分社服務者，雖寥寥無幾，僅有担任譯電或事務工作幾位小職員，究係限於通訊單位，非具有新聞長才，無法重用故也。推論至此，則少數同鄉以前所加於三爺不認同鄉、不用同鄉等蜚語，當可澈底澄清矣。

再筆者閱「念茲集」至周紹高先生所寫之「追隨十八年，難忘三

印象」一文中，有「蕭先生（指三爺）對於名器向極重視，同仁升遷，無不考慮周詳，從不輕易給予」等語。足見三爺深得古人「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之含意，更藉此證明三爺慎重名器之一貫作風，豈僅對同鄉而然哉。

### 陶希聖一

治事以五規，立身在四持，居安無自逸，履險乃如夷，爲國心血盡，對友肝膽披，名高志不有，位重氣益卑，逝其去矣，吁嗟同茲。

# 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

## 周仲衡

先生余之同邑老友也，住分東西鄉，相距約五六十里，不遠而遠，少小素不謀面。民國初年，余肄業湖南省立第三師範，先生肄業衡郡聯合中學，兩校均位於衡陽江東岸，比隣峙立，望衡對宇。余兩人忽相遇於校旁小飯店，鄉音不殊，互展邦族，見其風度翩翩，溫文魚雅，令人有明月入懷，春風拂面之感，不勝敬愛之至。嗣先生轉入湖南省立甲種工業，余師範畢業後考入嶽麓山湖南省立工專；即今湖大前身也。同住省垣，往來如昔。一日突聞龐、黃工潮慘案，先生有被牽連之說，急往其寓所探詢，則安然無恙。蓋先生機警過人，適應有方，且儀表溫如處子，不似好勇鬥狠之流，瞞過軍閥時代偵緝人耳目，幸免於難。先生經此刺激，遠走滬上，正式參加革命，余以是知先生內文明而外柔順，蓋有大志存焉者。越明年，譚組庵先生率討賊軍入湘，師次衡陽，凡有志革命者均羅致幕府。先生任總司令部行營委員，余任政務委員，舊雨重逢，互道衷曲甚歡。先是先生與總部文書委員易培基寅村先生有舊，易原任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校長，辭職來衡追隨譚公，但交卸後尚有虧空，省方追繳甚急。先生廉得其情，轉商於余，余盡力為籌款匯省了案。先生佳

余能急人之急，從此交誼益篤。不幸前方戰事失利，譚公率軍向粵方背進，余與 先生僱民舟溯湘江而上返梓，舟次誦譚公離衡時感懷詩，中有「桑麻徧野穀豐登，征將無功吏不能」之句，彼此愴然欲涕。余與 先生在縣境北坊登岸，驪歌一曲，各自東西，黯然神傷。

北伐成功後全國統一， 先生入中央黨部，迭膺要職，繼主持中央通訊社，身任社長二十餘年，爲國究勞，譽滿海內外。余從事本省地方行政亦近二十年，各至一方，無緣聚首，惟不時神馳左右而已。民國三十四年四月間，余自湖南第一行政區行政署察專員公署解綬歸養，征衣甫卸，忽奉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公伯陵電令，以常寧徧地皆匪，飭本救鄉卽救國之義，權主縣政努力剿匪。緣本縣於三十三年秋淪陷於日寇，前任縣長謝某係一幫會首領，在縣府開堂放標，全縣靡然從風，山堂林立，假抗敵之名行殺人越貨之實，且劃地稱尊，過境徵稅，行人裹足，不敢越雷池一步。本縣父老兄弟諸姑姊妹，既苦日寇之姦淫擄掠，又遭會匪之殘暴橫行，雙重災禍并臨，而莫可如何。薛公聞之，赫然震怒，逮捕謝令法辦，命余繼任，此種艱難困苦之環境，實有不勝負荷之感，然亦不能見死不救，乃毅然就職，不顧一切犧牲盡心盡力而爲。惟余以本縣之人，行治亂世用重典之政，開罪親友不少，馴至謠譏繁興，飛短流長，當此蠅飛營營，止樊止榛之會，設非相知有素，鮮不爲市虎杯弓謠言所惑。 先生聞之，甚不謂然，立電湘中有關機關主張正義，中有「周某從事地方行政多年，所至有聲，此次不惜任何犧牲拯救同鄉，不應以怨報

德」之語，結果真相大白，謠誣以息。信哉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此余衷心藏之，何日忘之者也。

大陸淪陷後，余隻身逃粵赴港轉台，一身之外無長物，首與先生商及工作事。先生告余曰，刻下政府機關人事凍結無可設法，宜從自由職業著手，余得此啓示，乃憶及余在大陸曾領有律師證書，比託人向司法行政部查明號碼聲請補發，正式執行律師業務，此先生不輕然諾忠於謀人之賜也。開業後余以三事自律：一不妄取非義之財，二不放棄應盡之責。三不走旁門左道。念年來社會幸無非議之加，藐躬亦無不可告人之事，所以忠實爲民眾服務者在此，所以告慰老友者亦在此。

昔太史公疑張子房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蘇子瞻則謂「此其所以爲子房也歟」。余亦謂先生內剛外柔，平日喜怒不形於色，但臨危難而不驚，從容應付若無其事者然，遇有不平事明辨是非，仗義執言，無少瞻顧，對朋友，以不輕然諾爲信義之本，此其所以與子房後先輝映者歟。今先生已歸道山，中央社僚屬摯友，擬籌建銅像，創立文化基金會，攝製電影片，并徵文編「在茲集」，宏揚勳德於無既。余不敏，謹就個人與先生之交往略述一二，同申大禹謨「念茲在茲」之義。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亦卽「念茲在茲」下文所謂「釋茲在茲」者是。爰爲之歌曰；泰山其頽，人將安仰；哲人其萎，人將安放；釋茲在茲，永恆不忘；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葉公超一

危言讜論應銘勛，國步多艱，傷心忍話神州劫；  
載酒看花曾共醉，交期今盡，淚眼猶欣嗣哲賢。



# 一生一死乃見交情

周君亮

蕭同茲先生於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逝世，我先在前幾天聽他患感冒，數日後心臟病猝發，終於不救。噩耗傳來，使我驚悚，事後追思，在我相識之中，還沒有找到與三爺同樣風格的人。我以久患眼疾，憚於寫作，但對於蕭三爺，我却不得不發抒一點感想。

回憶民國十八年，我在漢口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工作，蕭三爺曾以中央黨部祕書的身分，到漢口視察黨務，我在市黨部禮堂集會中與他相見，并未交談。對日抗戰時在重慶，戰後在南京，我與他同在一地，但彼此職業崗位不同，我只知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的大名，但無機會與他結識。一直到大陸淪陷，一同播遷到台灣，才得與他締交。我曾經到安東街二三一號他的住所與他長談，並曾應他的邀約，參加餐宴，也常在公共場所相遇，大家稱他為「三爺」，我也稱他「三爺」。過從既頻，我感到他有一種異乎恆人的風度，使人如對秋月，如坐春風。

三爺少年參加國民革命從事工運，在湖南與軍閥為敵，在上海與共黨為敵，隨時都有生命的危險。但他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到中央

黨部工作後，他便以全部的精力，慘淡經營，將一個附設於中央黨部內發布新聞的中央通訊社，培植擴展，成爲員工數千人，分支機構遍布國內外的國際大通訊機構，與世界各大通訊社如路透、美聯、法新等通訊社相抗衡，中國的新聞傳播事業，自此才不受歐美日本大通訊社的壟斷。他何以有此成就？仔細想來，除了憑藉他的幹才勇氣與毅力之外，尤其重要的是，他對國對黨對人的熱情。他以這種熱情的力量，使許多才俊之士爲之奔走，樂於効力。中央社從成立以至於播遷，大都在戰亂時期，中央社的人員待遇都很微薄，但只因受三爺的熱力所感召，忍危受苦，不忍離去。三十多年來，三爺主持下的中央通訊社正如一個大家庭，以三爺爲大哥，兄弟們跟著他工作，忘却了自身的苦難，這顯然不是單憑一套行政管理制所能辦到的。

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即公祭的前夕，前往市立殯儀館參加守靈的人擠滿了景行廳，大多澈夜守到次日清晨，其中除蕭家眷屬與至戚外，有朋友，有同事，以中央社的人員爲多。公祭的當日，景行廳又告人滿。本年元月二十日是三爺安葬之期，事前並無通報，而那天到陽明山第一公墓去送葬的，又擠滿了山上的祭堂，並擺成長龍，一直送到墓地。這些人都是向著三爺而至，而三爺已不存在。史記引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親歷了這種場合，然後領悟到中國人的社會究竟還是溫暖可愛的。

三爺常說：『人要活得舒服，死得痛快。』在他的晚年，特別是卸却中央社主管職務以後，他的時間便都消耗在醇酒、咖啡、保齡球

之中，經常到深夜才回到住所。他逝世的當日，從感冒引起心臟病猝發，十餘分鐘即告不起。表面看來，他的生死兩願似皆得酬。但事實上「死得痛快」一願固已達到，至於晚年醇酒、咖啡、保齡球的生活，却絕非真樂。三爺真正愉快的時候應是在湖南與軍閥鬥爭，在上海與共黨鬥爭，抗日戰時在重慶冒著日本飛機的大空襲，滿身塵土瓦礫，繼續發播通訊電稿之時。譬如勇將，樂在戰爭；譬如良驥，樂在奔馳。使勇將解甲，良驥伏櫪，便甚麼都不對勁了。三爺是一個有血有淚的人，年事雖增，雄心未已，晚年袖手時艱，驚心世變，只好以醇酒、咖啡、保齡球與寂寞相對抗，貌為歡笑，以掩護其悲天憫人之深哀，這正似信陵君的暮年心理，有何可樂？三爺在天靈爽，當能印可吾言。

# 記「最後的晚餐」

周培敬

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三日，中央通訊社一部分老同事在頤和園飯莊聚餐，補祝老社長蕭同茲先生七秩晉九華誕。事先，蕭先生堅拒我們有所舉動，經我們再三要求，說明這是希望藉此機會，讓難得一見的老同事聚會一下，他才答應下來。

那晚上，到場的四十多人，卅多位是已經離社的社友，十多位現仍在職的同仁。席間，參加過編輯部的、採訪部的、英文部的、電務部的、擔任各地分社主任的、戰地特派員的，一批批向蕭先生敬酒。大家知道他老人家近來血壓高，敬酒時都請他隨意，并且不要站起來。可是，蕭先生總是保持他一向的禮貌，還是站著和大家共飲。上壽桃的時候，全體高唱祝壽歌，歡欣的情緒洋溢在每個人的心頭，都為蕭先生的高壽而欣喜與安慰。



蕭先生總是愉快的。左為本文作者

沈宗琳兄站到椅子上，說了幾句祝賀的話，並且提議在明年蕭先生八十大慶時，再編「念茲集」。四年前我們編過一冊「念茲集」慶祝蕭先生七五華誕，由於時間匆促，許多人來不及執筆。他的這建議

立刻贏得一致贊成。

蕭先生當時很愉快，緩步走到會場中央，向大家說：

『我很喜歡藍天餐廳（就在頤和園樓上），常在那裏坐坐，因為那裏的人個個面帶笑容；今晚在這裏，看到各位老朋友都是嘻嘻哈哈，我感到非常高興。這個聚會是我有生以來過生日最愉快的一次，明年今天，如果我還在的話，希望仍然和大家再有這樣的聚會。』

『我的年紀雖比你們都大，但是希望你們活得比我都長。』

這餐飯，這席話，原本給我們一次歡樂的回憶，不料，事隔八天，十一日晚上十時十五分，蕭先生，我們的老社長，以心臟病突發逝世！噩耗驚傳，那餐飯，竟成了我們和蕭先生在一起「最後的晚餐」；那席話，也成了他老人家生前的讖語。於公，蕭先生對新聞事業的重大貢獻；於私，四十年的追隨，這一噩耗，給我以深重的哀慟。

追憶民國二十一年的中央通訊社改組成立的時候，僅僅供應極少的新聞給各報。當時，我國新聞事業也還在萌芽階段，消息傳達多賴郵遞，很少利用電訊。自從蕭先生在那年五月一日接長中央社，獨立門戶，着手他整套的發展計劃，到抗戰爆發這短短五年之間，中央社便在大陸各省建立了普遍的通訊網和廣播網，一切消息傳遞都利用自設電台拍發，以C A P呼號廣播，全天播出一萬餘字的新聞電訊，供

給全國各地報社抄收採用，使得中央政令、重大新聞、全球動態，都能在當天傳遞到全國每一角落。

由於消息靈通，不但使國內新聞事業本身突飛猛晉，政治、經濟、教育、社會各方面也都有普遍的發展；加以整軍經武，充實國力，乃能在蘆溝變起，有力量抵禦日寇，長期抗戰。



中央社的四位社長和兩位服務四十年的同人（從左至右）：周培敬（編輯部主任）、蕭同茲、曾虛白、馬星野、魏景蒙、周紹高（電務部主任）

戰爭八年，蕭先生領導的中央社，迭遭敵機的不斷轟炸，却仍繼續發展，新聞廣播工作未嘗一日中輟。這是由於計畫周詳，準備充分，雖在空襲警報中，著名的C A P廣播還是在防空洞裏播發，使後



方和淪陷區不斷收到新聞報導。

抗戰勝利，中央社更奠立了堅實的基礎。國內分支機構的普遍，全球通訊網的建立，國際新聞廣播的開闢，使中央社躋身於國際性大通訊社之林。蕭先生率領全社海內外三千多位員工，積極推動社務。由於中央社消息的正確、迅速，更獲得各方的信任與推崇。國內新聞界無人不知蕭三爺其人；國際新聞界也都稱道T. T. HSIAO是一位卓越的新聞事業家。

實際上，蕭先生領導中央社這一事業，其精心擘劃，指揮若定，對黨國和新聞事業貢獻之大，推崇為開國以來新聞界最成功的人物之一，他是當之無愧的。

近二十年，蕭先生雖不再實際負責中央社的業務，却仍以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和改組後中央通訊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身份，指導社務的發展；并且主持新聞評議會，推動新聞界的自律；發起新聞獎學金，培植後起的人才，直到逝世，畢生為新聞事業盡其心力。

蕭先生為了健身，近年每天上午必到榮星球館打一兩小時保齡球，這對他的身心幫助很大。他老人家去年曾告訴我：『老外交家刁作謙先生八十歲那年到過台北，參加高爾夫球比賽。我希望八十歲時候也參加比賽一次保齡球。』可惜他的這一願望已無法達成。

蕭先生患有心臟病，十五年間曾兩度發作，都得平安度過。這幾

天因爲感冒，血壓升高，時作嘔心，想吐，但生活如常。十一日晚飯後休息，將近十點又想吐，家人把他從盥洗室扶到床上，同時電召醫生，但祇有十分鐘，這位新聞界元老便安詳地去世，亦可謂無疾而終。他老人家子孫滿堂，享壽八旬，真是福壽全歸。

安排一位高齡老者的喪禮，我國傳統常當作一件喜事辦，禮堂高燒紅燭，親友致送紅幛。蕭先生一生盡忠黨國，臨終毫無痛楚，生者當爲他老人家欣慰。可是，和一位慈祥長者、新聞導師永訣，內心還是充滿無限哀思。唯願蕭先生在天之靈，引導我們光復大陸，重建大陸各地中央社的分支機構，讓我們在南京中山東路中央社七層大廈告祭這位中國新聞界偉大的拓荒者。

寫於蕭先生病逝之次日

郭 驥一

關邪說，遏橫流，平生不解藏人善；

携雙柑，載斗酒，一暝何如荷鍾行。

# 欽慕中央社難忘蕭先生

邵毓麟

蕭先生的爲人瀟灑豁達，治事篤實誠毅，不用我來重贅大家共有的懷想。我只想寫一點我和蕭先生，也可說我和中央社的一二合作事例以爲追念。

蕭先生在戰前南京主持中央社當時，我由川大教授轉任外交部情報司日俄科科長，即因工作關係，已相熟識。每逢蕭先生宴請俄國塔斯社或日本同盟社及其他各國記者時，我是照例叨陪末座。那時年少氣盛，總得和蕭社長拼上幾杯，而屢拼終歸是我屢居下風。

其後抗戰軍興，政府播遷重慶，我本職在侍從室，另兼外交部情報司長和外交部機關報英文自由西報職務。由於業務關係，再加蕭先生平易近人，因此交往益密。我每往自由西報館，必經兩路口，常有闖進中央社去閒談一會兒的機會。

由於我和蕭先生及中央社的公私交往，我和其後歷任社長的曾虛白、馬星野、魏景蒙各位先生，更增進了舊有的情誼。中央社總編輯故陳博生先生戰前曾任駐日特派員，適我當時任駐橫濱總領事，同過患難。除蕭社長外，我和中央社編輯部、英文部經常通電話的，有陳

總編輯、曹蔭穉祕書和湯德臣、任玲遜、王家松、沈宗琳等諸位先生。我在國內外出差時，都曾隨時和駐在各地的中央社記者取得密切聯繫。

例如戰前爲處理「成都事件」，而得與馮志翔兄密切合作；戰後受降到芷江、南京，就和律鴻起、彭河清兄在一起；光復台灣到台北，又常向葉明勳兄討教。到國外在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我常在湯德臣、林徵祁二兄的辦公室，啃著夾肉麵包，檢討國際大局。一到華府，必與李強光兄聯絡。到泰國處理游擊部隊，就須請教陳先澤兄。在歐洲，又得由洪珊兄簡報一番。東京我常去，故常和李嘉、曾恩波二兄鉅晤，我在使韓任內，適逢韓戰爆發，李、曾二兄又是代表我國的中央社戰地記者，隨軍深入北韓，出生入死，爲我國新聞界爭取了不少光榮，迄今記憶猶新。總之，中央社總社所在固不必說，凡我所到海內外各地有中央社辦公室的，就都有我的足跡。

我在任職外交部情報司的一段時期，由於當時中央社駐國外記者網尚在發展途中，我們自由西報的駐外記者，有時等於兼任中央社記者。當時我曾建立一種外交人員通訊辦法，約聘駐外使領人員，業餘兼任自由西報記者，主要是爲的請他們把駐在國公開而重要的消息，以新聞電拍發回來，既可節省政府電費外匯，增加情報，又毋需翻譯密碼而得迅速傳遞。其中除不便發表的參考消息外，有不少承中央社轉據發佈中文稿，也有不少即以中央社名義發佈中英文稿。這些都非有蕭先生的同意不可，也足以說明蕭先生的合作精神。至於我們情報

司所發消息，或我個人的以外交部發言人定期每週在中外記者招待會，或臨時必要公布的談話聲明，總是先將中英文稿專送中央社，以便中央社爭取發稿時間上的優先。

我記得曾有一事，頗使蕭先生為難，那就是戰時故外長郭泰祺先生的就職聲明。郭先生由多年駐英調任外長，回國翌日就舉行中外記者會，郭先生交下親擬聲明原稿中，有一句易於被人誤解指德國為敵人，當時中德尚有邦交，我建議刪去此句，未蒙採納，不得已乃請陳布雷先生設法勸改。布雷先生遂轉電中宣部，可惜轉輾接洽，為時已遲。及至中宣部電話中央社時，中文稿尚可刪除，英文稿頗有困難，因為記者會中有不少外籍記者參加，親耳聽到，早已發出電報。可見辦通訊事業的困難。

可是，在蕭先生的創業領導下，中央社已突破了無數困難，尤其社中同仁，長期團結奮鬥，竟使今日中央社，不僅已成為國內唯一、國際有數的大通訊社，而且中央社記者，正在國內外各地前線英勇地與匪鬥爭，這是我們在紀念蕭先生時所難能忘却的。

(民國六十三年元月)

# 待人接物處處周到

姜紹謨

遠在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後，那時我還在國立北京大學求學，就認識許多湖南同志，如郭春濤、廖維藩、黃少谷、蕭同茲、王光輝、譔小岑、李峙山諸位。我和同茲兄交遊，到現在將近五十年了。

民國十六年以後，我們見面的機會較多，常常同在黨部開會，或在朋友家中宴飲，惟個人往來極少。彼此心儀但從未有一談心之機會。我們都好飲酒，同席必定乾幾杯，亦從未過量。

民國二十一年我離開教育部，回到浙江工作。二十二年春，因事到南京，住中央飯店。當晚同茲兄知道了，就先到中央飯店來看我，得悉我行色匆匆，一二日間即回浙江。他原想約我暢飲，知道情形如此，就說吃飯作罷，明天把汽車開來給你用，一直用到後天，送你到下關上火車。我不再來看你送你了。就此互道珍重而別。

二十二年夏，我回南京工作。彼此也甚忙，亦少見面。抗戰軍興，大家都從武漢到重慶。二十八年秋，我由重慶飛香港轉上海，到敵後去工作，三十一年冬始回重慶。這一段時間，我們不特沒有見

面，連通訊機會也沒有。

三十三年我住重慶汪山放牛坪。這年九月十八日，是同茲兄五十大慶。前一日，他攜家帶眷跑到我家來避壽，朋友也就跟踪追到我家來祝壽。當晚暖壽，筵開三席，歡聚一堂。不料同一天適值我四十八歲生日，喜上加喜。我從來沒有做過生日，朋友也不知道我那天生日。從此以後，我的生日也被人知道了。年年此日，都要麻煩朋友，熱鬧一番。直到民國三十八年我皈依三寶以後，生日那天茹素一日，以報父母之恩，不再殺生害命，從此也可不請客了。

來到台灣二十多年，我們還是很少親近。每逢彼此大生日，集六十、七十大慶，互送美酒一瓶，互祝生日快樂。話雖如此，亦可說是君子之交了。

五十年來，同茲兄做人是成功的，做事也是成功的。他七十晉五時，「念茲集」，記載得很詳細。他待人接物，處處周到，就是孔子所說的忠恕之道。即此亦可見同茲兄之學問與修養了！

### 林柏壽—

論交廿餘年，肝膽襟期，早欽勳名昭宇內；  
拈花成一笑，菩提證果，留取典範教後昆。

# 逃兵的追悔

胡品清

我做好了早餐，其實只是一杯蜂蜜，一片土司，然後攤開日報。習慣性地，在細讀內容或副刊之前，我先看了所有的標題。

「黨國元老蕭同茲先生逝世」

我不願相信我的眼睛，因為上星期六中午我還收到一封邀請書，約我參加一次聚餐為蕭先生補慶華誕。我沒有參加，絕不是為了節省餐費。是邀請書來得太遲，而我當天晚上事先有一個約會，一個既不能失也不能改的約會。假如那份邀請書曾經早點來到，我原能另作安排。而「過去條件語」總是最令人無奈和追悔的。

是的，讀了那個標題，我深深地追悔，追悔那份邀請書來得太遲，追悔我如今既無法親口向蕭先生請罪，也無法書面向蕭先生道歉，既然天國是沒有郵局的。

我真是個念舊的人，親友的死亡總令我感傷震悸。蕭先生不是親，也不是友，而他曾是我的上司。我在中央社的英文部做一名助理編輯的時候，他就是社長了。由於長幼有別，由於地位懸殊，我只能



遠遠地瞻仰他的丰采。偶一面對，我也只能禮貌地點個頭，叫聲社長，像一個畏懼陌生大人的小女孩。

記得有一次下班的時候，我從中央社走向街頭。蕭先生正在門口和一位友人談天。我沒有向他打招呼，因為覺得打岔是冒昧的，但是我聽見他在背後向那位友人說：『這是英文部唯一的女編輯，也是中央社的才女。』我聽了好高興，像一個被老師誇獎了的小學生，何況他還把「助理」兩個字取消了。

此外，我還記得一則有關蕭先生的趣事，據說他打電話的時候有一個專屬於他的習慣。不論對方是誰，他總是拿起聽筒先說：『我是同茲。』有一次，對方不知道是誰，却不耐煩地說：『什麼同志！』然後就掛斷了，那是真實的故事，但是我忘了出處。

也許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永遠不知道要追求什麼，不知道哪一條是適合自己的路，有時踏上了一條，也許由於疲倦，也許由於情況，也許由於命運，就轉個彎，像一名逃兵。若此，我曾是中央社的逃兵，或者說曾是蕭先生的逃兵。

逃來逃去，我終於又回到了蕭先生所在的城市。而且上星期六，假如不是陰錯陽差，我原可能去頤和園餐廳最後一次瞻仰懿範，聆聽教益。而如今，我只能睜大著眼，瞪著報紙上由銅版製成的遺容，一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誰說我的視力有問題？那條新聞明明向我說：『一名黨國元勳和我們永別了，一名新聞先進和我們長辭

了。』像一枚發光了很久但終於隕落了的星子。

我失去了最後一個向蕭先生致敬的機會，今天尤其疚然於心，但是蕭先生的精神永遠活在我記憶深處，於是我寫了這幾句唁語，由於深深的追悔。唁語雖是短短，但它代表的却是一份無限的哀悼和尊崇。

鄧公玄一

革命憶滬濱，同志凋零君又去；

東芻誅台海，老成寥落我增悲。

# 前塵對景難排

胡健中

自蕭同茲先生撒手人寰，余爲之不歡者累月。沈宗琳兄電囑綴一短文，緬懷舊誼，所不敢辭。

中央社之有今日及數十年來對社會國家之貢獻，固有繼起諸君之勞績在，然就創始之宏規與夫其後領導之襟度言，則同茲兄之勛獻實爲最著。余識同茲於民國十七年，且始終忝爲中國新聞事業從業之一員，一切多親見之。同茲生平，人多佩其風度，余輒謂其吸引人才之功最不可沒。中央社在同茲時代，除延聘當時報壇碩彥，學驗俱豐之陳博生兄任總編輯外，所進用之青年才俊，一時稱盛；時隔四十餘年，其尚留社爲新聞事業盡瘁者，猶不失爲上選。是皆出於同茲之求才若渴及其培養薰陶與領導之功。其尤難能可貴者，在一秉大公，唯才是用，絕無門戶之見。中央社成功之鑰在此，而同茲之不朽要亦在此！

胡適之先生在日，曾與余月旦人物，一次在美國柏克萊，一次在南港，兩度皆言「貴黨之中央社，爲成功之事業，蕭同茲先生殊爲難得。」適之先生雖樂與人爲善，亦喜對人對事爲獎掖之辭，然其對吾

黨之人物事業稱許至是，洵屬罕見。適之先生之有此種評價，蓋嘗目觀中央社創始時之筆路藍縷及其後之發揚光大，在適之先生，此為公允之論；而在同茲，自亦當之無愧。

余平日讀書，所涉獵者多為中外史籍。就歷史觀之，同茲之時代乃中央社之黃金時代。然「莫為之先，雖美不彰；莫為之後，雖盛不傳」。中央社鑽石時代之創造，在繼起同人秉承同茲所遺審之優良傳統，努力不懈，以求其實現。同茲地下有知，必不以其黃金時代為滿足，而對鑽石時代之創造，與余同其企望。

# 二十四個春天

范大龍

王德真坐在蕭家大廳裏，談起了他爲蕭同茲先生開車二十四年的經過。

「老王」，王德真說，蕭先生就是這樣稱呼了他二十四年。

他於民國三十八年進中央社，翌年，他爲蕭社長開車，如今，他已五十三歲。

『過去這許多年，有太多值得懷念了！』王德真說，最令他難忘的，是蕭先生的和藹可親及樂天恤人。

他記得：當他正在開車時，後座的蕭先生常常會問：父母身體可好？孩子唸書可用功？……

每逢王家台北市大拜拜，不論起初「老王」在重慶南路的矮木屋，或以後景美的新居，蕭先生都欣然前往，有時還把葉明勳先生也一齊請去熱鬧一番。

他進中央社後結婚，第二年爲蕭先生駕車，也在那年生下長女春

卿，王春卿目前也在中央社編輯部服務。當她滿月及她弟弟週歲，蕭先生都送了相當豐厚的賀禮，使王德真長記心田。

除了開車之外，他很懷念蕭先生的日式舊居。坐在水晶大廈十一樓裏，他指着地下說，以前，這是有六百坪大的蕭公館，一百坪的房子外，全都是一早坪、假山和花樹，蕭先生公餘和應酬之外，下午都在花園中渡過，他總是幫著蕭先生整理草坪，蒔花剪枝，多少年來，已成了習慣；兩年前，造起了目前的水晶大廈。

王德真說，這兩年來，無花可栽，沒草可剪，他負責修護整棟大廈的水電，自然，還有蕭先生去世前的駕車工作。

他總共為蕭先生駕過三輛車：第一輛是一九四六年道奇，第二輛是一九五九年別克，第三輛是一九六七年別克；但這部自動排檔有冷暖氣的新車，他才坐了半年，就不再坐了。

他從二十九歲開始為蕭先生服務，二十四年的人際緣份中，他最後一次的服務，是蕭先生逝世的當天。他清晰記得，那是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午，他曾送蕭先生去陳醫生那裏看感冒，回家後，蕭先生就要為他在床邊裝一個直通緊隣長公子孟能住處的電鈴。這是怕喉嚨不適，影響叫聲，並且原先在廚房的叫人鈴稍微遠些，也不方便。

老王說，他立刻到地下室取材料，裝好叫人鈴。當這件服務工作結束後不久，他也就回家了。當時，他和蕭家所有人一樣，認為健朗

的蕭先生祇是患了感冒，並不嚴重。

誰知道，那隻鈴，蕭先生祇用了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那是十一日晚間十時，家人聽到鈴聲後趕到床邊探視，不久，蕭先生便永遠離去了！

老王說，蕭先生在世時，經常說的一句話是「活的痛快，死的痛快。」他認為蕭先生以畢生的不凡涵養，終於如了心願。



蕭先生在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到台灣中南部遊覽，王德真開車，中為葉明勳

老王說，蕭先生剛去世的那幾天，家中的許多雜務都落在他的身上。當時，他在進出與繁忙中，除了哀戚，對蕭先生的懷念並不十分強烈；可是，時間越久，反而越感到濃烈了。



如今，又是春暖花開的春天了，老王不再趕早送蕭先生去打保齡球，不再送主人去應酬或開會，彷彿多年的担子卸去。可是沒有再為蕭先生服務的辛勞，他反而不習慣。過去從沒有失過眠的他，現在常在午夜夢醒，深深想起過去二十多年像長輩又是長官的蕭先生，和為他服務的二十四個春天。映著晚霞，他凝視了一幅才由蕭家請人畫好的蕭先生半身油畫像說：『我喜歡另一幅。那幅畫了很久，掛在蕭先生自己寓所的客廳中。那幅畫，他笑的好開朗，就像他本人一模一樣。』蕭先生離開了塵世，老王經常還拿著抹布，像往常一樣，到蕭先生的客房中打掃，抹灰。他還要多端詳那幅笑著的油畫像，望著畫，像回想起蕭先生的生前起居，他心情會舒坦些，彷彿又等著吩咐，叫他開車出去尋找和散佈歡笑！

### 郭紫峻—

**深辨順逆，明敏果決，新聞取捨，堅守獨立；**

**高瞻遠矚，沉默寡言，功業流傳，與世長存。**

# 蕭三爺與楊綿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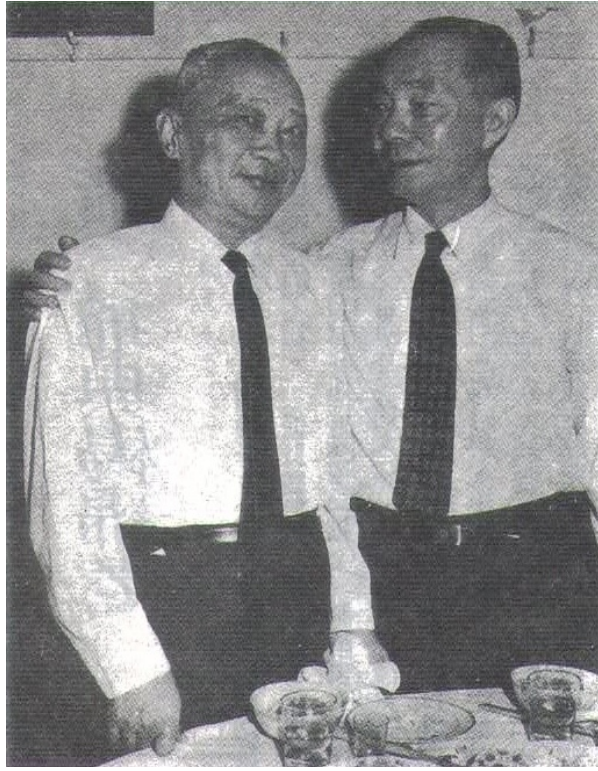
唐季涵

提起蕭三爺與楊綿老，大家都覺得顯然是兩個性格不同的人物。三爺於黨於國都擔任過很重要的職務，但對人對事却是謙虛誠懇，一派讀書人的作風，使人一見即有親切之感。綿老具有湘潭人特有的豪放才情，和倔強不服輸的脾氣，他一生以廉潔自持，而又有一套理財的本領，歷任地方及中樞財政部門主管，各方人士對他都有好評。我把他們兩位寫在一起，因為這兩位完全不同性格的湖南人却是四十年以上的至交。三爺雖然名滿天下，可是在大陸我一直無緣和他見面，到了台灣之後，大家都住在台北，人的距離雖然縮短了許多，但認識三爺，却由於綿老與三爺為至交的一段因緣。

一

這段因緣要從民國十年說起。那時民國建國不久，各省為軍閥所割據，一般老百姓還是過著渾渾噩噩的日子，任由軍閥壓迫，不敢說話，可是一班知識青年却不顧危險，羣起反抗，造成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三爺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在湖南搞工人運動，當時社會上對工

人運動是怎麼一回事，不甚了解，但認為鼓動這種事的都是些不安分的人，同情的人並不太多，他們却仍鏗而不捨的為勞工的幸福而奮鬥。長沙是湖南的省會，因為工潮洶湧，當局採取了高壓手段，最後演變成爲黃龐事件。所謂黃龐事件是指長沙甲種工專的畢業學生黃愛及龐人銓兩人發動了銅元局工人罷工，被當局逮捕槍決，其事凡湘人年事稍長者，大都知之甚詳。蕭三爺與黃龐是同班同學，不但是參加者，而且與黃龐在一起，是此役的主持人，黃龐殉難後，三爺隻身逃離，幸免於難。



蕭先生和徐鎮埏先生是老朋友

三爺脫離了虎口安全抵達漢口，最緊要的一件事，就是向輿論界控訴湘省當局的暴行。正好此時楊綿老與徐鎮埏及唐伯端幾位同志，在漢口創辦「江聲日報」，首先揭露了這件消息。說到「江聲日報」

創辦的經過，也是值得一提的事情。那時湘潭有位歐陽惠周先生，爲當地望族，其住宅「舟園」饒有庭園之色，常開放供邑人遊賞，湘潭人沒有不知其名的。他眼見軍閥橫行，極爲憤慨，毅然糾合當時有志之士如綿老等人，傾資辦了這個報紙來鼓吹革命。有些人認爲他有福不享，却把錢用在惹麻煩的事業上，目之爲怪人。又有人以爲辦報紙是爲個人前途鋪路。但他一生既不搞政治，也不願做官，只爲看不過當時政治的腐敗，借此傳播革命思想，作爲推翻軍閥的力量，如果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他當年的作法，確是一位有深謀遠慮的革命先進者。可惜他在抗戰勝利接近時已離開人世，他的長女公子歐陽榮現在台北，就是馮志翔兄的夫人，志翔總算繼承了他的遺志，一直從事新聞創作。

「江聲日報」雖然是一張小型報，但因立場堅定，詞鋒犀利，軍閥們視之爲眼中釘，但漢口是個華洋雜處的地方，軍閥們要動手，却有顧慮，一時倒也奈何他們不得。三爺與綿老等晤面後，大有相見恨晚之勢，於是就在江聲報發表了一篇宣言，說明了事變經過，總算把真相公之於社會，這是他們兩位訂交之始。「江聲日報」以後得到了 總理 的資助，繼續在漢口鼓吹革命，直到民國十三年間，綿老一班人先後入粵，投入譚延闓先生的第二軍，參加革命行動，「江聲日報」始告結束。三爺也於同年正式加盟中國國民黨，繼續在天津、上海從事勞工運動。他們兩位日後所走的路線雖有不同，一個辦中央社，一個辦財政，但意氣相投，交誼日深，對於革命的貢獻可以說是

殊途同歸。

## 二

話到此處，還得說回。因爲三爺與綿老有前面這段因緣，而我與綿老又是至戚，他們在台北見面後，老友亂後重逢，自然十分高興，常常在一起喝酒。這些酒友中也有我的朋友，因此有幸認識了三爺。我是從來滴酒不沾，三爺絕不強人喝酒，他喝酒的風度，可以說是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他能飲而不醉，醉而不亂，酒量之宏，酒德之佳，素爲朋儕所稱道，只要有他在座，必是大家盡歡而散。綿老也頗喜杯中物，論量却不及三爺，醉了又常常使酒罵座，三爺從不計較這些，總是勸他不要生氣。記得有一次在三爺家中小飲，那時他的夫人尚在，綿老不知爲著一件什麼事情，與同座某公意見不合，竟爭吵起來，各不相讓。三爺仍舊是那樣從容不迫的請兩人不要爭吵，並且很風趣的說：今天有太太們在座，大家客氣點，你們如果一定要吵，也該喝完酒再說，於是兩人一笑而罷。回家時我和綿老同車，他脫口說了一句，蕭三爺的修養真不可及。他這句話是由衷的讚嘆。三爺爲人確具有一種特殊器識，這是我認識他後對他的印象，也是我特別敬佩他的原因。

在台北，三爺有兩位長沙甲種工專的老同學，一位是鄧伯粹先生，一位是陳歧曾先生。歧曾先生在抗戰勝利後，我和他在南京一度

共事，後來也變成很好的朋友，去年不幸病逝美國。他的家人在善導寺開會追悼，很多舊友都到了，當谷正綱先生報告其生平事蹟及得病經過時，幾度泣不成聲，我坐在三爺後面，看他也頻揮老淚。另外三爺還有兩位同庚好友，一位是楊綿老，一位是徐鎮老，他們三位都是屬羊的，朋友常說他們是「三陽開泰」。綿老於民國五十年以窮病逝於台北，前年鎮老也離開了人間。去年六月間鎮老的女兒女婿從美國回來，在華嚴蓮社誦經追薦，我也去了，三爺於中午十二時左右趕來拈香並同席素餐，他的神情，一反往昔，終席未多講話，顯然感到疲倦，當時覺得這一年來三爺老了許多，我的這種感覺，私下還和志翔提過。不料十一月十二日報載他以心臟病猝發去世，震驚之餘，即趕到水晶大廈他的寓所，這時他的遺體已運往殯儀館，臥室及起居室都仍然整潔如昔，而三爺從此不能復見了。他的長公子孟能兄含淚約略告訴我他病發的情形，也說到他這一年來精神大不如前的狀況。國家多難，這些過去對國家有過貢獻的人相繼去世，真使人有離羣索莫之感！

### 三

三爺走了，他留給每個人不同的懷念，無盡的哀思，他一生為國家所作的努力，將來史家自有記述，此處不談。中央社舊友為紀念三爺，擬編印「在茲集」，擴大範圍，來函徵稿。我看過「念茲集」，那是中央社同仁在三爺七十五歲時，就各人對三爺的觀感，以及三爺

對中央社所作的貢獻，每個人寫一兩個故事或回憶。這些憑感情寫出來的文章，較之壽聯壽序更有意義，使人耳目一新。

三爺一生輝煌的成就，我僅知一個大概，「在茲集」出版，應該是紀念他的專集，雖擴大徵文，但中央社高手如雲，何敢班門弄斧。惟念三爺交遊遍天下，交情深淺，都可以各抒所感，艸此短文，以紀念此一代偉人，文章好壞，就不去計較了。

### 黃君璧—

五福備箕疇，風節堪欽，花底題襟時作伴；  
十日同尊酒，音容頓杳，德門後起有佳兒。



# 蕭先生創辦了英文通訊事業

徐兆鏞

去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盧祺新忽來電話，說他剛從遠東旅行回來，路經台北機場的時候，聽說蕭同茲先生在十一月十一日去世了！他說他原在台北逗留了些日子，十一月三日上午曾到蕭先生家裏拜候，和他談得很高興；看見蕭先生除了腳有點不靈活之外，精神很好，身體沒有異狀，沒想到這是最後的一面。他從台北飛去韓國觀光，後來又路經台北飛返美國，飛機祇在台北機場停留些時，王小亭在機場等候他，告訴他這個壞消息。他一回到舊金山就轉告我，我聽了愕然。後來我打電話問李緘三，他說他和台北社裏通長途電話的時候，已經聽見這個消息了。後來我看見台北中央日報航空版，更證實了這個消息。

那幾天我常常回想蕭先生的聲音容貌，待人處事，尤其主持中央社的情形，覺得蕭先生近八十高齡，可稱上壽，子孫滿堂，對國家對人民有很大的貢獻，可以沒有遺憾了。他最大的貢獻自然是他接辦中央社之後，有眼光、有毅力地把中央社發展成爲全世界大通訊社之一，在全國各大城市都有分社，通訊網伸展到全球各地，播發的消息全國報紙都採用，而海外廣播各僑報都採用。這樣大規模的通訊事

業，全由蕭先生一手擘劃辦起來的；所以蕭先生是新聞界的先驅，通訊事業的偉人，自然值得紀念，景仰。

我在中央社英文編輯部服務十四年零七個月，知道這部份的情形較詳，所以願意就記憶所及，談談這部份。

中央社不是蕭先生創辦的，而是由他接辦後發展成爲第一流通訊社；但是英文編輯部却是蕭先生所首創。蕭先生自從二十一年五月接辦中央社之後，就感覺英文報導，對外宣傳，是通訊事業的一部份，不可或缺的；在北伐成功、全國統一之後，這種感覺更是深刻。那個時候，蕭先生的好友張明 接辦英文北平時事日報，成爲中國人在北方自辦的唯一英文報紙。蕭先生和張先生商量怎樣創辦英文通訊事業，認爲要辦總要中國人自己辦，不能借重外人，因爲他們不懂中國國情；所以必須聘用中國人，瞭解我國國情文化，中英文兼長，而且有新聞學識，纔能勝任愉快。蕭先生根據這個原則，搜羅人才，後來幾乎我國所有英文新聞工作人才，都在中央社英文編輯部服務，例如任玲遜、湯德臣、沈劍虹、宋德和（已故）、王家松、盧祺新、鮑靜安、余捷元、郝志翔（已故）、曾恩波、伍乾滋、張慶彬、馮國楨（已故）、徐卓羣等，他們都是國內外大學新聞學系畢業。英文編輯部始終未聘用過外國人，即使做顧問，改改文章的也沒有，英文寫作全由中國人自理。

當時英文北平時事日報裏，有一位助理編輯任玲遜，他北平燕京

大學畢業後，到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專攻新聞學，畢業後回國加入北平英文時事日報工作。張先生舉薦他給蕭先生，開辦英文通訊工作，發英文新聞稿。那時英文報紙大多數在上海，有字林西報、上海泰晤士報、大陸報、大美晚報等。通訊社有英國路透社、美國合衆社和美聯社、法國哈瓦斯社、日本同盟社，還有一家國民通訊社，是中國人李才所辦，專譯中文新聞，供給外國報紙和外國駐滬記者採用。蕭先生經考慮之後，決定暫時不在競爭激烈的上海開辦英文新聞稿，而在天津開辦，這是慎重的措施。天津有英文京津泰晤士報和華北明星報。京津泰晤士報是英國人辦的，但是英國人向來保守，而且有紳士架子，新的東西，尤其是東方人辦的，抱了不屑採理的態度。同時北平路透社雇了一個中國人孫瑞芹，每天早晨把中國報紙登載的重要新聞譯成英文，發給當地的英文北平時事日報以及各外國通訊員，并趕火車送到天津的英文報紙採用，所以也有競爭。但是蕭先生認為不能顧慮太多，總要在一個地方開辦，於是在中央社天津分社發英文新聞稿，當時除任玲遜之外，祇有一個助手黃慶樞，一個打字員。美國人辦的華北明星報先採用中央社的英文新聞稿，經過一個時期，京津泰晤士報也採用了。

過了些時，蕭先生決定在首都南京總社設立英文編輯部，發稿供給各外國使館和外國記者，當時南京沒有英文報紙。任玲遜調充總社英文編輯部主任。我在二十三年八月承玲遜介紹加入的。我記得當時英文部還有王家松、余捷元、許汝祉、郭則虬、張民熙，後來黃慶樞

和余捷元對調，黃來南京，余去天津。再過些時，英文部的羽毛已豐，可以振翼高飛了，蕭先生調玲遜到上海分社開辦英文新聞稿，找了在南京做美國合衆社記者的湯德臣做總社英文部主任。德臣是燕京大學新聞學系畢業，到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做交換生，畢業後返國。後來沈劍虹在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畢業，也加入總社英文部，另外還有燕京大學畢業的李宜培、李衡宇也加入了。在上海分社助玲遜發英文新聞稿的有盧祺新、張慶彬等。在這個時期，北平分社也開始發英文新聞稿，請了鮑靜安主持。

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發生，繼而淞滬戰事爆發，蕭先生認為這個時候香港對外宣傳極為重要，派盧祺新做香港分社主任，開辦英文新聞。以分社主任責任繁重，隨即派我到香港分社負責英文新聞稿工作。我記得一天早晨在空襲警報中，到下關車站，搭火車到上海，轉輪到香港的。香港有四家英文報紙——南華早報、德臣報、孖刺報，香港電報——對於中日戰爭消息，極為重視，用我們的英文新聞稿很多。我的工作很忙，後來從上海分社調了張慶彬來協助。

政府實行長期抗戰政策，消耗敵人實力，爭取最後勝利，先遷移到漢口，總社隨往，在那裏發過英文新聞稿，隨後又遷重慶，改在那裏繼續發稿。

卅年盧祺新調充駐華盛頓特派員，他是第一個派到外國工作的。香港分社主任遺缺，派任玲遜接充。就在那年冬天太平洋戰事發生，

日軍佔領香港，我和玲遜、邵翼之、吳東四人潛赴澳門轉輪到廣州灣，分別由陸路遡赴重慶。玲遜到了重慶，即派去印度新德里做特派員，其後由新德里又派到倫敦做特派員。後來湯德臣派去紐約做特派員，我升充英文部主任。不久我派去巴黎做特派員，王家松繼我做英文部主任。抗戰勝利，政府還都總社也遷回南京。這是英文部從成立到抗戰勝利的大略情形。

在蕭先生指導之下，這段時期內，英文編輯部的特點，可分述如左：

（一）各地發英文新聞稿，供給各英文報、外國記者、使領館，廣事報導和宣傳，計先後在天津、南京、上海、北平、香港、漢口、重慶等地發稿。

（二）廣播英文新聞，供給國外各地抄收，很多華僑報紙收了直接登載，或譯成中文刊登。

（三）譯發政府重要文告。這是很繁重的工作。政府重要文告，常在夜深發出，洋洋一二千言，須立刻譯成英文，採用新聞體裁發稿。外國記者聽說有重要文告發表，打電話來詢問內容，或是到社來索稿，真是急如星火。文告的全篇大意，要譯得完整，不能疏忽遺漏裏邊有重要的句子，或是辭意隱約必須小心繙譯，以免錯誤。譬如盧溝橋事變發生，蔣委員長發表的一篇文章，是已故陳布雷先生寫的，其中有警句：『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和平未到絕望時

期，絕不放棄和平。』這是全篇的關鍵，必須正確繙譯，而且辭句也要典雅。又譬如有一次蔣主席因政局關係，宣告「引退」。這「引退」二字的繙譯可真傷腦筋，并非明言辭職，也沒有說明是暫時或永久的。嚴復說：『一名之立，旬月踟躕』。哪來旬月的時間？一個多鐘頭左右，就須全篇譯竣。

(四) 自行採訪。英文編輯部人員，人人都要參加採訪，重要的新聞，尤其有關外交事件，常常採訪部派一人，英文部派一人，會同採訪。我記得抗戰前南京總社社址在壽康里，我和沈劍虹的桌子是面對面擺着，他負責採訪外交界的消息，工作非常認真，一手捫着稀薄的頭髮，一手執着電話說話，忽然拿起雨衣帽子就出去採訪，回來立刻用打字機寫稿。抗戰期間，在重慶國際宣傳處每週舉行的外國記者招待會，必定有英文部的人參加。常常還有到別處去的特別採訪，譬如我曾參加京滇公路周覽團（這條公路抗戰前建築完成，由南京起經安徽、江西、湖南、貴州直達昆明，行政院組織周覽團，有各機關代表和各報記者二百多人，社裏派我和採訪部鴻起兄參加。團員分乘約十輛長途汽車，駛往昆明。我和鴻起沿途採訪寫報告。）英國議會訪華團（抗戰期間，英國議會派了三人代表來華訪問，參觀抗戰情形。駐英大使顧維鈞趕回來招待，外交部派了沈昌煥、陳衡力陪同招待，中央社派我隨團採訪。我們搭飛機到西安、潼關、成都、昆明等地參觀。）湘西鄂北大捷後戰地採訪（我和編輯部劉問渠到了湘西鄂北，深入內地村鎮，有些地方可以坐轎，有些地方要步行，調查戰後瘡

痍，民間疾苦）。

（五）派遣隨軍記者。派隨盟軍記者多數是由英文部派去的。宋德和、曾恩波、關宗軾、馮國楨都曾做過隨軍記者，德和、恩波還曾隨盟軍飛機轟炸敵軍，表現勇敢的精神。

（六）派駐國外特派員。駐國外特派員多數是由英文部派去的，有盧祺新駐華盛頓；任玲遜先後駐印度新德里、倫敦、舊金山、華盛頓；湯德臣駐紐約；余捷元駐西德；王家松駐阿根廷、倫敦；郝志翔駐莫斯科；張慶彬駐阿根廷；我駐巴黎、澳門。駐外特派員在報導迅速和寫作技巧上，常和外國記者競爭，因為中央社訂了合衆社、美聯社、哈瓦斯社的電訊，假如慢了或寫得差了就丟臉了。

（七）聯絡外國記者和外國使領館人員。英文部人員要和外國記者及外國使領館人員密切聯絡。宋德和、曾恩波、湯德臣、沈劍虹、關宗軾、伍乾滋、馮國楨等，在這方面都做得很出色。

（八）宣揚中國文化及其他。英文部除每日發普通新聞稿外，並常有特寫，報導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及其他發展。

蕭先生創辦了我國英文新聞通訊事業，端正了國際視聽，對國家貢獻極多。我寫下這些經過，讓我們大家對這位新聞事業先驅者共致最深的敬意。

# 永遠抹不去的影子

徐詠平

民國廿六年春，自浙江到南京。因大學同期畢業在中央社英文部任職的許君是友情最好的同窗之一，常去中央社。那裏的氣氛有另一種感受，充滿了和諧、寧靜、自由、輕鬆無惱，使人覺得像一個無爭的大家庭，却又是十分忙碌的工廠。當班的工作完了愉快的走了；接班的開始忙他的。彼此以「小名」互稱，很有洋派。對我這個客人，認識後照樣打招呼，一點也無拘束的自己去倒茶來喝，坐在藤椅上抽煙看報。這種工作環境再理想沒有。某日，見到一位和氣瀟灑英俊的中年書生，許君給我介紹是他們的社長蕭先生——久聞其名的「三爺」蕭同茲。一點架子也沒有，不像「社長」，因為工作室的空氣不因他來而稍變。我很替許君高興，他得到這樣優良的工作環境。

抗戰起後，到漢口參加筆陣抗敵。那時，中央社也撤遷漢口。新聞文化界有「三一聯歡會」，每月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在不固定的飯店會餐，因此認識了不少新聞文化界的名人，也交了不少年輕的新聞文化界朋友。自由交談，沒有訓話或指示，聽了報告後，大家心裏有數，回去在新聞、言論與寫作上反映出來，論點相同，而無八股。這一定期餐會，三爺每次必到，風度翩翩，頗有雅量，發言徐



徐，誠摯輕快。仰慕之情，由衷而起。

許君很希望我進中央社，我也覺得能作中央社的一分子，個性最合，願終老於此，不必仰人鼻息，也無須看白日驕人者的臉色。許君給我一個機會見了蕭先生。時在深冬之夜，圍爐而坐，他掏出烟盒，給我一支好香烟——大約是茄力克，噴烟對談。他說陷區日增，中央社人員緊縮，人事調度煞費苦心，此時難有好機會。娓娓而言，不使人有說假話，或應付你的感覺。其時我有工作，姑抱一試的心情，有則固佳，不得，並不失望。「三爺」給我的印象是何等教人深感其從容豁達，自然大方，是最好的領班，也是無往不利的成功人物，罕見的爐火純青的長者。

武漢撤守前我到重慶，在教育部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工作。中央社在鐵板街，編委會在兩路口山頂。每次入城必去鐵板街中央社歇腳，看看老許，也看了和認識了不少中央社朋友，來去自由。偶遇蕭先生，他還認得我，知道我已入教育部，很替我高興的說：『編教科書很費心思，也很重要。』聽去是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却給我非常溫暖的感覺。中央社被炸，遷設老兩路口大廈。我在「益世報」編第三版，社址在曾家岩，與老許同租一亭子間，在中央社對面小山坡上。中午起床，洗刷後就到中央社喝茶看報，像是我的老家。戰時物價波動，生活艱困，大家過苦日子，從無怨言。中央社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佈告牌上的福利品名、新書目錄最多，很少人事命令，更不見用社長簽章的什麼獎懲令的皇皇佈告。他們似乎不分大小，大家一般高。

一位喜喝酒的校對先生，經常邊喝邊校蠟紙，見人必舉杯邀飲。有一次我看到此公見三爺到了，跟對別人一樣的端起玻璃杯子：『請蕭先生嚐一嚐。』三爺微笑。

報館凌晨齊稿，要等中央社末次稿到了才拼版。有時遇空襲。到防空洞中等稿，中央社則在防空洞裏發稿。因為與中央社的熟人多，到快齊稿前，打個電話去問末次稿有什麼重要的「貨」？誰都會答覆。我可預留版位，稿子到了，免得多發抽換。中央社朋友們的服務態度是十分可佩的。我想是三爺的作風，無形中養成全社人員的誠以待人，勤懇工作。

卅二年秋奉派去廣西前線做報。離渝前向蕭先生請教。我的目的是希望中央社能在該地設特派員，漏報可補，因為我們只能做只抄不能問的B K。他在小冊子上記了下來。向我說去前線做報頂重要的是不怕苦，不怕危險。翌年秋報社疏遷百色後到重慶述職，見到蕭先生，他說他知道我的工作努力，中宣部有好評。他的誇獎，比什麼都有熱力。

抗戰勝利後三度到南京，參加宣傳會報與黨報會議。蕭先生必定在「六華春」招待我們。好酒好菜，倒不重要，那種親切與自然流露出來的熱情，這種聚會最教人享受了口福，也喝飽了人情。凡有宴會，有三爺在座，滋味不同，不必拘謹，也不怕說錯話，他不會多心。能喝就喝，不喝不勉強，休想把他灌醉，他是來者不拒，漏底酒

壺，總是灌不滿，但沒有人想灌醉他，那喝酒的姿態，就够你欣賞了：不貪杯豪飲，也不避酒拒人，更不教人喝醉，一切恰到好處，人人盡歡。

來台灣後與蕭先生接觸不太多。在台南時，他的好朋友潘公弼先生去世，蕭先生偕張明 與葉明勳兩先生搭飛機到台南，參加公祭。我們以便餐招待，那次他不喝酒，話也少了。北返時去機場送行，握著我的手說：『一切感謝！』年老人的心情，故人日稀，寂寞之感是難免的。



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在台南（從左至右）：前排蕭先生、潘夫人、潘公弼，後排趙夫人、葉明勳、趙班斧

我可說也是中央社社友之一。從中央社外看中央社，他們對報界提供最佳的服務；從中央社內看中央社，他們建立了最佳的風氣；從公私的接觸看蕭同茲先生，他留給我們永難泯滅的最佳記憶。蕭先生

遺體開弔之日，冒風雨致祭這位可敬的新聞界先驅，心中有說不出的難過。四代同堂，莊嚴肅穆，蕭公長逝矣。

事業成功與失敗，靠人事與制度支配與運用；而領導人的胸襟與作風，大有關係。尤其是新聞文化事業，人才最重要。任何一個工作者，都有其個性與特長，有些傲氣與主見。主持人應有將將之才，知人善用。臨之以威，那就孤立，表面服從，傾耳而聽，腹誹隨之，因為他專精一門，你總不及他。示之以恩，有人認為是嗟來之食，得之不以為榮，反倒有被收買的羞辱。搞小圈子，造成核心或智囊團，那更是畫地為牢，人人重足而立，緘口而不言，眾智壅塞了。新聞事業主持人，有所謂樣樣精通，人「不敢欺」者，那是刻薄自大，有如破落大家庭，冷冰冰的毫無生氣。又有所謂「不能欺」者，自以為察察為明，耳目周到，騙不了他，那是小人行徑，自卑感濃，以人人為敵，多疑怯決，陷錯不悟，事業有形無形的損失，挽救不及，害了後人。一流的新聞文化事業主持人，要能做到人「不忍欺」，上下協和，左右親密。人自為戰，發揮所長；聯合作戰，集體創進。決不是無為而治的老好人，必定把握原則；也不是垂拱而治的太平官，必須一貫不移。遇大事而不亂，遇小錯而不餒。功則歸人，過則自負。共同創造業績，榮譽公眾分享。蕭先生就是這一典型的掌舵者，他的成功，就是中央社的輝煌貢獻。

任何機構都有傑出的人才，每喜自負；也都有突出的人物，多半是「怪人」；也不免有不滿現實的愛說風涼話的人。對人才能禮待，

必忠勤不怠；對「怪人」能寬容，必變怪為善；對愛批評的人，以去可評之事，然後風評始息。中央社人多嘴雜，待遇不高。蕭先生領導這樣龐大的機構，安定進展，成績非凡。我想他的待人治事的祕訣，就在這些地方；他的成功，就在這無形的潛化功夫。因此，有人老死於中央社，有人另有高就，仍以曾為「中央社人」為榮。被稱「三爺」，是含有敬意，喊者有自愧不及的雅號。三爺一生，平凡自然，坦誠自若。無須諛墓，人咸欽敬。做人能如此，真不容易。三爺的修養過人，風範氣質，留給我們永遠抹不了的影子，他永遠活在我們的心頭。

# 一位至情至性的讀書人

## 秦綬章

同茲先生是湖南常寧縣人，與我算是小同鄉。因為他年齡大我很多，民國初年，他就在外求學工作，所以很少有見面機會。九一八事變以後，我在北平讀書，就聽說小同鄉中有位蕭同茲先生在中央黨部工作，很有聲望，後來又聽說他擔任中央通訊社社長，對中央社的創建工作很有魄力，很得人緣，對宣傳工作有很大貢獻。再過幾年，我從大學畢業，大約是民國二十四五年間，我在長沙擔任湖南民國日報編輯，湖南晚報編輯，湖南力報主筆，總算擠在新聞同業之列。這時的中央社已經辦得有聲有色了，但我和同茲先生仍然沒有見過面。以後我脫離新聞界，轉入黨政方面工作；繼而抗戰爆發，中央社組負起全國摘奸發伏、筆伐口誅的傳播重任，我則流離轉徙於後方工作，與同茲先生見面的機會更少了，來台以後，聽說他已經改任中央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住在安東街，我曾到他府上去拜訪過一次，可惜沒有謀面；此後我因忙於教學和研究工作，沒有再去看望過他。

## 無限懷念

三個月以前，從報上忽然看到一條消息，同茲先生於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逝世，享年八十。感歲月之不居，念老成之凋謝，惘然若有所失！開弔之日，我特地趕到殯儀館祭奠，奠畢我默站一旁，看到參加弔祭的人，除新聞界人士和黨政首要外，湖南大同鄉、常寧小同鄉到的也很多，其他各機關、各職業團體、各企業單位、以及青年學生、勞工代表到的也很踴躍。大家精神肅穆，似乎對這一位新聞界的老鬥士，懷著無限哀思，也引我無限感慨！當天十二點鐘，我從北投政戰學校下課回台北，同車的有政戰學校外文系主任邢光祖先生，他滿懷悵鬱，眉宇間似有無限隱憂；原來他也是剛從殯儀館弔祭同茲先生回來。他告訴我，同茲先生是他的老上司，對他鼓勵關懷，無所不至；他在菲律賓擔任中央社特派員的時候，遭逢險惡的環境，孤軍奮鬥，同茲先生總是爲他打氣，替他支援，每次回國，總要在一起暢談歡敘一番，他視同茲先生如尊長，同茲先生視他如子弟，言下不勝感喟！光祖先生自己就是一位性情耿介、孤芳自賞的人，能夠對同茲先生這樣的感念尊崇，真出我意料之外。

回家以後，我又展視同茲先生生前七五壽辰紀念刊物「念茲集」，曾虛白先生在序文中指出：『這是同茲兄努力一生口碑的紀錄，也是估計同茲兄爲人最信實的寶貴資料。』在這本紀念集中，幾十位曾經參加中央社工作的同人，對同茲先生的做人態度、治事精神與創業經過，以及中央社對國家的偉大貢獻，從各種不同角度分別發揮，這種集合多數人自動自發的意見反映，幾十年來酸甜苦辣可歌可



泣史實的描述，充分證明同茲先生是一個偉大的舵手，是一位做人做事最典型的成功者。

古往今來，許多成大功立大業的英雄豪傑，並不是由他的權勢足以脅衆駭俗，也不是他的言行足以欺世盜名，而完全是由平凡中得來。同茲先生亦復如是。

他既沒有顯赫的學歷，也沒有炙手可熱的權勢，然而他所統率的兩千多位散佈全球的拿筆桿的鬥士，都樂爲効命，願共生死，這就是他平實的作法，平淡的襟懷，平凡的風度所感召的結果。他早年在工廠工作，領導過工人運動，從羣眾中來，了解羣眾的心理和願望。在中央社工作的同志都是當年的青年才俊，他們視同茲先生爲上司爲尊長，但同茲先生並沒有以上司或尊長自居，同玩樂，同歡笑，共甘苦，共擔當。輕利重義，寬厚待人。其用人也，惟才是尚，既用之後，就讓你放手去做，不隨便加以干涉，十分重視分層負責，逐級授權，做到才盡其用。他對業務的處理，只是釐訂方針，掌握政策，從不在細微末節上，加以苛求。但對考核聯繫的工作，則又絕不放鬆，同茲先生真是通達事理，具有統籌合作功能的通才。

同茲先生主持中央社業務三十二年，一生精力盡瘁於此。他是一個講求做大事不做大官的人，有多次遷調的機會，都因他不願意離開中央社而作罷。他有兩句名言：『有職業不一定有事業，有事業就一定有職業。』由於他具有這種偉大的敬業精神，影響所及，在中央社

的同志，工作二三十年或三四十年的很多，「中央社自孩提以至成長茁壯，可謂胥在其懷抱培育之中」，而中央社對國家民族的貢獻，這是有目共觀的。「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實是為同茲先生精誠的寫照。同茲先生是位平凡人，也惟有平凡才顯其偉大。

從「念茲集」中不難看出，同茲先生溫柔敦厚，平易謙恭，器識宏通，胸懷博大，故人多樂與之遊。其對人也，急人之急，憂人之憂，揚人之善，隱人之短，故人多樂為之用。這就是他運用「修己」的工夫，以達到「善羣」的目的，也就是在現代中國革命史上半個世紀以來中央社是一個堅強的戰鬥體，居於宣傳戰文化戰尖兵的地位，而對國民革命具有偉大貢獻的主要原因。所以同茲先生是一個至情至性的真正讀書人，也是 國父「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而不以奪取為目的」遺教的實踐者。

陳公亮一

四十年教誨親承，直諒多聞時增益；

三千界音容遽化，德言高節倍愴懷。

# 我怎樣投入中央社

翁平

人與人之間，怎樣會發生友誼？固然是有點像謎一樣的無可捉摸，而人與其担任的工作，從而影響到了他大半生的職業，那也是多由於偶然的因素所促成，如果我們是宿命論者，相信命中注定的話，那麼，冥冥中又那裏來那許多主宰？

這裏我且把我投身服役在三爺領導之下的中央社的經過，據實披露，希望能藉此說明了三爺在當年運用什麼手法，把這偌大一堆的諸式人等拉攏在一起，組成了一支也能打爛仗的雜牌軍。

一

大約是民國廿五年的春季，西南傳出了不穩的消息，中央頗以該方面的情況不明為嫌，因而想到要派幾個西南藉的工作人員南下，看看西南方的真實情況。

筆者那時候在中央供職，忝為廣州市民，於是便被徵召服役。說老實話，筆者除了早幾年曾在港穗做過一陣新聞工作之外，其他方面

可說毫無所知，但是既然工作落到了頭上，怎能够畏縮不前？

於是我向同行的梁大哥切實商量了一下行動的步驟，便準備出發，瀕行之前，更決定先向當時的中宣部秘書蕭三爺辭行。

這是我與三爺第一次的官式晤面，當然，少不了寒暄一番，跟著請示工作的方針和叩詢有什麼吩咐。

『客氣話不必說了。中央覺得多年來沒有人在那裏工作，一切情形都很隔膜。兩位是廣東籍人，而且在中央服務有年，自然知道中央的意思，如果碰到了有機會的話，請向那邊的朋友說明中央的真正態度，爲國家民族，團結努力，那就是轉禍爲福了。』

於是，我們便興辭而去。

## 二

南歸的第一站，我們選定了香港，在堅道租賃了一幢木樓，算是個住處，那些木樓至今回想，仍然是猶有餘悸。住在裏面的人，夜歸時，或有事要行走的時候，樓板吱吱有聲，不過，當時的居民，都習以爲常，不以爲危險。而時至今日，香港的木樓，差不多都成了明日黃花，絕大多數已蕩然無存，筆者多年來生活在摩天大樓的鴿子籠中，偶然回想起當時的木樓風緻，反覺得另有一番情趣。

我們的工作，幹了短短的一陣時光，所謂西南異動就在那年的五月五日午時，鳴炮五響而宣佈的開府大計後，宣告結束。

### 三

西南政局突然天朗氣清，陰霾盡掃。於是我和梁大哥又商量了一下今後的行止。結果，因為囊有餘資，大家都是多年流落在外的人，認為不如趁着這個機會，回家鄉看看也好。如此這般，便又回到廣州。

### 四

我至今還記得，我們分住在新亞酒店的樓上，閒來無事，跟著梁大哥向一班新貴隨喜之外，便向各報老朋友拜訪。又因為梁大哥跟三爺有同部（宣傳部）之誼，我便把當時的見聞，義務的拍發了若干電報給中央社。我當時祇是給「回鄉熱」的情緒鼓舞著了，而且也覺得局面既然還政中央，那就不嫌「狗拿耗子，多管閒事」了。

不料電報發出之後，三爺的覆電來了，他首先嘉許我們的工作，其次說他本人不日南來，要我們在廣州繼續發電報，一切等他到後商決。

我那時唯一的心願，是朝夕可以看見了離別多年的老母和孩子，

已經達到，可謂心願已償，其次，發電報也不過是舉手之勞，何況梁大哥着實在鼓勵著我？

果然，不久之後，三爺飛到了廣州，我們有了較多的機會見面，但我一廂情願，仍想回到南京在中央服務，因此，我除了每天客串發電報工作外，其他不聞不問。

但是，事實上不容許我再客串了。有一天三爺在旅店中約我談話。

他問起我對於今後的工作意見怎樣，我說，我是葉老（當時的中央黨部祕書長葉楚傖先生）派來的，一切要向他請示為宜。

三爺又問：『你個人的意見怎樣呢？』

我說：『新聞工作是個專才的職位，我恐怕幹不好。』

於是三爺坦率表示了他對我們這一手努力，有了很好印象，他南來的意思，是要向中央討取我們這兩個人，立即組織分社，替中央工作。他最使我感動的一句話，就是：『如果你對新聞工作有興趣的話，不如就讓我們在一起努力吧！』

這一句口頭約束，無字無據，但從那時候起，直到三十九年我乘三爺離職而離開中央社為止，歷時十有餘年！

## 五

我曾於六十二年十月十九日，飛台北向三爺及各友儕辭行，復於同月廿六日飛回香港。不料握別未及半月，三爺竟然仙逝，而我又因美國移民簽證的時間所限，不能於三爺靈柩出殯之日，飛台祭奠，中心哀痛，莫可言宣。

我在港聞悉噩耗之時，由於心情激動，幾夜不眠，傷痛中我含淚撰出了下面輓聯，寄給台灣朋友，託他替我寫出送去治喪處，以表哀思。現把輓聯錄後，作本文結尾：

用人唯賢，處事必公，致力新聞開大業。

侍隨卅載，夙承提命，恩同師父繫心喪。

景熹兄惠鑒別後三車書未一作覆地  
稱天下奇事 兄或諒我而我時常自表  
天性使然也毛病出在每次總想詳細叙  
表腸結果反到一字無有此是我的壞性  
希生能够改過來否則住在美洲的三  
個兒女說不定認爲我也死了

蕭先生寫給翁平的親筆信



去年寄给我的那双袜子质料颜色诸  
佳由地球先生带来的两件襯衫质料  
亦佳尺寸合式且四季可用真上品也近託  
成兄带来夏天襯衫两件尚未试用以夏  
季时过去舊有者且可对付也十餘年来  
凡兄赠我之物無一不称心滿意是

兄深對弟之好向也惟今日你我手頭均拮  
據此必非弟請託千萬不必為我設想耗費  
兄之有限金錢所贈聖葉女士衣料券即  
轉到伊再三稱謝

天心兄來台參加陽明山第二次會談曾暢  
叙數日為近年一大快事歸時曾托其弟上四

十元清代購冬季睡衣兩套若有餘則另

薄絨料

棉織品

買夏季睡衣兩套聞者矣兄月底將返台可

托其先輩冬衣

友輩中有人勸弟必須結一終身伴侶且有以

空葉為對相者弟點頭稱善但續告以為時尚早容

緩圖之在弟之內心就理智言年可已高交一可

不少一事就情感言有時不免感到室虛  
此或係弟與金葉相識多年之魔障因凡有提  
及其他對相出弟必立刻婉拒

兄有何高見敢借箸代籌草、即候

儼安 弟同茲敬上 五十年九月廿日

呈示 嘉兄：

我大概是三年以上沒有寫信給你。年齒多幾歲，愈素愈懶散，連兒女的信，都是有些無去，習以為常，清在自醒，也覺過意不去。好酒仍然歡喜，但不敢盡興。

最近檢查眼睛，發現已有初期白內障，何年需要開刀，則現在還不知道。

你的賀年片，已經收到了。謝謝，並祝

萬福！

弟同茲上 六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蕭先生寫給翁平的另一封親筆信

# 我們視三爺爲家長

袁睽久

六十二年十一月三日，星期六，天陰，有寒意。晚間六時半，我以病後體弱之軀，勉力撐持，僱車前往台北中山北路嘉新大樓「頤和園」餐廳，參加中央通訊社新舊同人爲老社長蕭同茲先生補祝七九華誕的餐會。十月初旬，我曾因重感冒導致高燒不止，住醫院療治一週，這是二十多年來的第一遭；出院以後，體力一直沒有恢復，虛弱不堪，除上班外，一切活動均告停擺，應酬更多謝絕。但中央社同人爲三爺祝壽的餐會可不能不去；即使晚風多厲，冒舊病復發的危險，亦所不顧。是晚參加的中央社老同事們，包括鮑靜安、丁履進、張郁廉、葉明勳、邢光祖、潘煥昆、匡文炳、律鴻起、林家琦、沈琢吾、沈宗琳、唐雄、邵翼之、袁振宇、馮志翔、彭河清、周培敬、王繼樸、齊振一、張任飛、張民熙、謝宗傳、嚴仲熊、萬存仁以及目前仍在中央社工作的胡傳厚、丁則怡、方國希、彭清、王芒、汪煥鼎、王文德、黃履中、張潤生、黃肇珩等，共約四十餘人。外客則「僅中央社之友」張明 先生，以及張郁廉女士之夫立法委員孫桂籍先生二人。三爺到得稍遲，他一進來，大家都起立鼓掌，歷久不息；三爺笑容滿面，連忙招呼大家入座。筵開四席，不分上下，三爺左右是唯有

的兩位女士——張郁廉和黃肇珩。

三爺雖以酒量甚豪著稱，但顯然因為年事已高，飲得不多；不過在座的人紛紛敬酒，我就曾以三種不同的身份：「分社同人」、「戰地特派記者」、「湖南同鄉」，先後三次雜於眾人之中表示對三爺的敬意。三爺知我平日滴酒不沾，還特別溫語有加的說：『不會喝酒，不要多喝。』其他以「總社同人」、「採訪部」、「編輯部」、「國外特派員」等名義分批敬酒的人還很多，三爺無不一一接受。隨後他又離席分別向各桌敬酒，並且殷殷垂詢，雖僅三言兩語，但親切之情，溢於言表，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有如沐春風之感。酒過三巡，微醺的沈宗琳兄站立在一張小椅上，說明這次餐會的意義，特別指出來年三爺八十整壽，中央社同人決定出版「在茲集」，每人都要寫一篇文章，誰要不寫，就派誰的不是。他又代表大家，請三爺隨便說幾句話。當即全體熱烈鼓掌，催請三爺致詞；三爺先是遜謝不遑，最後難却大家的盛意，終於講話了。

他以緩慢而誠摯的語調說：『非常難得，今天所看到的全是笑臉，大家都興高彩烈，笑得很開心，充分表示一種醇厚的情感，使我既感動，又興奮！個人的生日本來不算什麼，何況還是小生日，勞動大家，真不敢當。明年八十生日，如果我還在的話，很樂意和大家再歡聚一堂。敬祝大家健康愉快。』三爺詞畢，歡聲四起，大家都欣然為他的話乾了一杯。不過，我當時却有一絲不幸的預感襲上心頭，三爺所謂明年如果還在，也許是自覺體力日衰，出於無心；在我聽來，

却似乎是一種不祥之兆。我不知道當天在場的其他人士是否同有此感，但至少周培敬兄的想法和我一樣，他在三爺逝世後第二天所寫的「記最後的晚餐」一文，也認為這是三爺一語成讖。

當天的一頓晚餐，足足費時兩個半鐘頭，直到九點多鐘才盡歡而散。許多人意猶未盡，還陪三爺從地下室的「頤和園」，乘電梯到十四樓的「藍天餐廳」去喝咖啡。近些年來，三爺幾乎每晚和三數友好去「藍天」喝咖啡，談天說地，看台北夜景，已成慣例；今晚改在同一座大廈的「頤和園」餐廳吃飯，自然不能例外，我因為另有他事，急於回家，無法奉陪，當下向三爺告罪，握手而別。三爺和沈宗琳兄、黃肇珩女士等人先行從地下室去到門廊等電梯，我走過門廊時，恰巧三爺所乘的電梯正一面徐徐關門，一面冉冉上升，在隨行諸人簇擁下的三爺，還在電梯中向走出嘉新大廈的我們揮手致意，臉上流露習見的慈祥笑容。不料這竟然是和三爺的最後一個照面；事隔八天，十一月十一日晚間差不多同一時刻，三爺就溘然長逝，從此人天遠隔，祇有從記憶中去追索一切。人事無常，曷勝感嘆！

「最後的晚餐」盛筵難再，使那天晚間聚首「頤和園」餐廳的每一個人不能忘懷。這是一個不平凡的餐會，一次不尋常的共處，所有參加的人，自始至終都笑逐顏開，充滿了由衷的愉悅。這些人的年齡，差不多全在五十歲以上，有的更已經到了七十開外；他們都毫無例外的，以童心仍在的歡欣，以無比虔誠的祝福，來補慶一位老上司的七十九歲壽誕。他們滿心希望當老上司八十大慶的時候，再有一次



更快樂的歡聚；但不幸這位老上司在一個星期之後，就應着他自己所說的讖語，匆匆告別了人世。差可安慰的是因為有了這次「最後的晚餐」、才稍稍彌補了一點遺憾，三爺那天晚上的音容笑貌，將長留在每一個人的心底，永不磨滅。

世俗澆漓，人情涼薄。時至今日，上司和僚屬之間，如果不是貌合神離，就是視同陌路。能够保持一種相處無間的關係，就算很不容易了。至於時移勢易，人事滄桑，早已不在一起的上司僚屬，還能互不相忘，交往如故的，那簡直是少而又少。三爺領導中央社，將及四十年，屬員之多，變動之大，非其他機關可比。但中央社大家庭的所有同人，一直視三爺如家長，包括還在社中的，早經離職的，分散各方的，遠在國外的，對於三爺，都是時刻在念，尊敬有加。五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三爺七秩晉五華誕，中央社同人爲示祝嘏，特地編印了一本題名「念茲集」的小冊子，一共收入了同人紀念性的文字四十八篇。四十八人恐怕祇是中央社先後同人百分之一的數字，例如我當時就因爲於役台南，未克執筆。然而這本「念茲集」不僅足以代表中央社同人的心聲；也足以代表作爲老上司的三爺，所留給他眾多部屬不盡的追思，永恆的懷念。不談三爺一生對中國新聞事業所作的卓越貢獻；僅憑這一點，三爺也可以說是爲當前世道，做了最好的示範。三爺處人的成功，和處事的成功，同樣可垂不朽。

而今三爺辭世，典型日遠。在「最後的晚餐」席上，沈宗琳兄早經提示，另編「在茲集」。爲了悼念三爺之逝，「在茲集」的廣泛徵

文出版，自是更具意義。我於民國三十一年抗戰最艱苦階段進入中央社，到三十八年大陸淪陷之後離開，在中央社雖然祇是供職七年、半途退伍的一名小卒，但也不能不就記憶所及，寫下一麟半爪。

# 以兩件小事爲例

馬君助

新聞界元老蕭同茲先生於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因心臟病猝發溘然長逝後，其好友故舊決定像獻呈他七五華誕時作爲生日禮物的「念茲集」一樣，編印「在茲集」，以爲永久紀念。

蕭先生生前每每自謙只是平凡的實踐，但朋友們却推崇他平凡中見其偉大。他的偉大處不僅在餘把原僅一楹陋室的中央社發展爲國際性通訊社，其成功實得力於爲人行事立身處世，使得人皆爲樂之効命，這可於「念茲集」中見知的。

我和蕭先生是在來台以後相識的，他忠黨愛國，但不會掛在嘴上；他關懷世道人心，也只是默默地盡心盡力。他有常人不可及的襟度，也有擇善固執的湖南人挺勁。在我和他過從多年，有兩件事到現在還記憶深刻，願乘「在茲集」出版，提出以作續貂之狗尾，文之工拙，固所不計。

記得在我任職台灣合會儲蓄公司總經理時，有一天蕭先生過訪，我辦公室壁上懸有塑膠製作的「革新、動員、奮鬥」六個大字，原有時刻警惕之意。蕭先生在和我談過正事以後，他建議我應該把這幾個

字撤去，他認為這些都必須深植心裏，才能時刻去身體力行。他反對形式化，見之於標語，就顯見得心之不專。

另一件事，也是在我服職合會任期內的，合會籌計在重慶南路興建辦公大樓時，一次閒談中，蕭先生建議我應該在新大樓中設法解決停車問題，那時他已預見今日台北市區停車之必成爲問題，我當時立即接受他的意見，在那寸土寸金的鑽石地帶，闢建地下停車場。在台北高樓建築中，闢有地下車場者當以台灣合會儲蓄公司大樓爲其嚆矢，到今天已證明蕭先生確有其先見之明。

# 念茲在茲

馬星野

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廿一日，我在台北松江路中央社，當著蕭同茲先生面前，接下了中央通訊社社長的重任，到去（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蕭先生長逝，恰好十年，但我與蕭先生的交誼，則遠在此以前，茲以編印「在茲集」，特將四十年來對蕭先生之深刻印象作片段的記述，以為紀念。

丁家橋

我於民國十七年間，在中央黨部訓練部服務，以後蕭先生到中央宣傳部服務，我們雖同在丁家橋，但無相見的機會。當時中央社在丁家橋大廈二樓，靠著中央宣傳部的左角一室（中央社遷出後，此室改為中央第二會議廳），主持的人，主任似乎是余唯一，副主任似乎是留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的聶鯨（紺弩）。中央社最重要工作是發佈中央常會及中央政治會議的新聞，屬於中央宣傳部，部長是胡漢民先生，後為戴季陶先生，再後為葉楚傖先生。

## 壽康里

中央社新生命，是蕭同茲先生出任社長負責社務，將中央社遷出丁家橋，在壽康里一排公寓房子辦公時開始。民國廿三年，我自美國研究新聞學回來，即在中央政治學校教授新聞學，某日我帶領同學們到壽康里參觀，同學中有許紹昌（今駐越南大使）、許汝祉等人，我與蕭先生相識自此始。壽康里在南京洪武路，以公寓房子打通作為辦公室，燈光輝煌，一派新氣象，同學們到一室，即由該部主任或負責人說明業務情況。蕭先生給我的印象，是有現代企業家精神的一位幹練精明而很瀟灑的人物，不像一般辦黨務的人。我以為他必定是受過美國或日本的新聞訓練的，其實，他除在七十歲那年到日本一遊外，從沒有到過國外，也不識英文，而他一舉一動，都充分表露出現代新聞企業家的風度。

## 重慶兩路口

南京三年間，他在壽康里辦通訊事業，我在紅紙廊辦新聞教育，我們因業務關係，經常有密切的聯繫。中國新聞人才的培育，首先是燕京大學，以後有復旦大學，再後有中央政治學校。蕭先生汲取人才，只要有能力、學問的，他必充份任用，燕京大學的任玲遜、湯德臣、盧祺新、沈劍虹、王家松、徐兆鏞、宋德和（已故）、關宗軾（已故）、李宜培、陳先澤、曾恩波等，對初期中央社的發展，都有

很大的貢獻。自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有畢業生後，中央社更吸收新秀爲其幹部，從曹聖芬、彭河清、趙炳焄（已故）、林家琦、耿修業、黃印文（已故）、鳳申（已故）、許汝祉（已故）、潘煥昆以後，每期均有到中央社服務的。抗戰時，我在重慶南溫泉兼辦新聞事業專修班，蕭先生選出中央社比較年青的人，如王文德、周培敬等到南溫泉受訓，而我需要的教師，便從中央社高級幹部中聘請，如湯德臣、鮑靜安、陳博生各位先生，都曾在中央政校新聞學系及專修班講課或演講，蕭先生自己更常來政校，對學生們講新聞記者之應有訓練與教育，他一貫主張要培植一位好的新聞記者，必須經過六年的教育。

當時中央社在重慶兩路口，蕭先生住在嘉廬，我常到這兩個地方和他見面。他最要好的兩個朋友，中央秘書長吳鐵城先生及中央社總編輯陳博生先生，是我很敬佩的人物。抗戰後期，我蒙 總裁徵召，到中央宣傳部任新聞事業處處長，在公在私與這三位先生接觸更多。我的感覺當時中央社所以能負起戰時使命，上有吳鐵城先生以黨的全力支持，下有陳博生先生的新聞經驗與才能，做同茲先生的「諸葛孔明」；更重要的是蕭先生對陳先生的完全信任，友誼之深，實逾管、鮑。博生懂英文，諳日文，也深稔國際關係，同時有長久的辦報經驗，這些方面，都可以做同茲先生之大助。我常常看到同茲、博生兩位在重慶味腴酒店相對議事小酌的情景，對他們的友誼，令人羨慕。關於博生對中央社的貢獻，我於博生逝世時，曾有長文在中央日報發表過。

兩路口一段日子，是同茲先生表現出他「湖南騾子」精神最出色時期，天上有轟炸機，地上有通貨膨脹，艱苦萬狀，同人在防空洞中編稿收發電訊，而八年抗戰，中央社無一日不發稿，全體辛勤的同入固然是最大因素，如無同茲先生有魄力有眼光的在上領導，曷克臻此！我當時組任中央宣傳部新聞事業處長，我的幫手如錢滄碩、趙漢野也是由中央社調用，當然我了解中央社是十分深刻的。

## 南京中山東路

復員以後三年之間，蕭先生集中全力來興建南京中山東路的中央社大樓，各項建築設計是十分周到的，大樓已造到百分之九十，如果不是共匪倡亂，首都淪陷，則我們中央社的大廈，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好的通訊社大廈，只有美國的美聯社可以比擬，至於合眾國際社、路透社、法新社則都將望塵莫及。我當時是中央日報社長，中央日報也有一座大廈，但與中央社大廈的設計建築比較則相去甚遠。

勝利還都後萬事待理，陳博生到東京在美國米蘇里戰艦採訪日本投降的新聞，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復員後，京滬報業蓬勃發達，採訪競爭激烈，中央日報比中央社較為膽子大一點，突出的新聞雖然常有，然仍非仰賴中央社供應經常性新聞不可。陳布雷先生可以說是當時新聞文化工作的參謀總長，每次 總統召開總統府宣傳會報都由布雷先生任聯繫工作，我常得與蕭同茲先生及陳博生先生聆取



總統睿智指示的機會。

## 台北西寧南路

中央社由重慶遷回南京，同茲先生交由曹蔭穉先生負責，後總社南遷至廣州，再由廣州而重慶，而後播遷到台北，是由葉明勳先生在台北負責部署。我是卅七年十一月第一次來台北的，承明勳兄給予很多幫助。中央日報決定在台北設分版，並由黎總經理世芬負責，這一段時期，我們備嘗艱辛。中央日報於卅八年三月十二日在台北出版，我們撤退工作做得相當完整，中央社因為由南京到廣州，到重慶，又由重慶到台北，輾轉播遷，所以工作更為艱難。卅九年蕭先生出任中央社管理委員會的第一任主任委員，曾虛白先生為社長，在西寧南路一棟又窄又小的陳舊的木造樓房裏，中央社在兩位先生領導下苦鬥了十多年，我們管理委員會每次開會，總是在西寧南路的鐵路招待所，同茲先生對於社務，除管理委員會工作外，一切完全交與曾先生，而絲毫不加干預。他開明超脫的襟懷與作風，用行舍藏的做人態度，真可謂動如脫兔，靜如處女。

## 松江路二〇九號

我在巴拿馬做中華民國駐巴大使滿了五年，五十三年十月間，突然接到中央祕書長谷鳳翔先生一個電報，奉 總裁諭，派我出任中央

社社長，同時秦孝儀兄、曹聖芬兄、吳俊才兄都有來電，要我及早成行，並轉達經國先生的美意。我不覺吃了一驚，中央社這個重担，我那能勝任？那年同茲先生七十歲，虛白先生也是七十歲，我才是五十四歲，我們相差十六歲，在經驗上與人望上，我都不能比擬兩位先進，當時還真是有點半信半疑的。

以後，外交部沈昌煥部長來電證實了這件事，並派黃仁霖先生繼我職務，我當時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要向蕭先生請益，我去電中央社，要蕭先生約一時間於我返國後長談，蕭先生慨然應允。回國後，便在安東街蕭先生公館（即現在的水晶大廈舊址）與我促膝長談，他最主要的一點，是要中央社建立退休制度，他知道中央社同人老的老了，病的病了，現在沒有經費辦理退休，要全靠這些老將打硬仗，自必有山窮水盡的一天。

五十三年十二月廿一日，在松江路二〇九號中央社禮堂中，同茲先生把中央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印信交給曾虛白先生；曾先生把社長的印信交給我，我們三個人曾有一張合攝的照片，為這一意義深長的日子留下紀念，蕭先生當時說了下面幾句話：

『…………新聞事業是需要羣策羣力來推行的，中央社成立四十年來，我雖然有卅三年沒有離開過中央社，但我認為中央社的成就，是全體工作人員奮鬥的成果。我今天離開中央社，不但是形式上的移交，也要將中央社優良的傳統精神移交出來。馬社長是位新聞界的

「真正全能」，希望在他的領導下，使中央社更邁步前進。』

我當時衷心很激動，說了下面一段話：

『我敬佩蕭同茲先生，他一生的心血，都灑在中央社的花壇上，中央社過去最光榮一頁是他寫下的；杜甫對李白說：「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我們中央社，在自由中國報業蓬勃發展之時，我們的同人待遇最苦，可以說「同業皆繁榮，我社獨憔悴」！我將保持蕭先生、曾先生這一股精神，繼續為中央社努力。』

自此之後，一直到民國六十一年六月，曾先生把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印信交給我，我又把中央社社長的印信交與魏景蒙先生。在我任社長八年中，秉著蕭先生、曾先生的一貫理想，積極的擴充中央社業務，我們收回了美聯社及路透社在中華民國的發稿權；我們開始逐步淘汰落伍的摩爾斯電報機，而採用了頁式傳真發稿的制度；我們增加了國外通訊網，伸展入與我國無邦交及以後斷交的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尼、加拿大、秘魯、衣索匹亞和希臘等等國家，中央社漸漸地恢復到蕭先生主持時代的國外通訊網，而與全世界各大通訊社，除蘇俄的塔斯社外，都建立了友好及契約關係，我們的通訊稿為海內外報紙、電台所樂用，而我們在亞洲的地位，是數一數二的領導通訊社。



中央社的三位社長（從左至右）：蕭同茲、馬星野、曾虛白

## 自由之家

我因生活方式與蕭先生不同，所以我們不大有機會在宴會中相

遇，然而每次遇及，蕭先生必以很慈祥的態度向同席的貴賓宣佈：

『星野一向不喝酒，你們不要強勸他。』有時主人向我敬酒，蕭先生也會指定我的好友代我乾了，他從不勉強他人，也總能原諒他人。他大我十六歲，是我的前輩，所以他常常給我鼓勵，使我積極整理中央社。在重慶時候，他把我在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所寫的講義底稿，拿到中央社抄下來，給他作參考。當我卸去社長職務，而任中央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時，他盛稱我替中央社所做的事，尤其是建立退休制度，及建造郊區兩座中央社空前龐大的收訊台與發報台和為中央社同人籌劃建造了九十餘戶職員眷屬宿舍。這些事情，表示長者的風度，常使人感到溫暖。

中央社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這是蕭先生、曾先生及我幾十年來的理想，也是現任社長魏景蒙先生的理想。去（六十二）年四月二日在台北市自由之家的博愛廳裏，蕭先生以股東資格當選為董事，他欣然接受，但是對於「蕭同茲以全票當選」的宣佈，曾站起來更正，他說他沒有投自己一票，他在這些地方，是不隨便的。以後每次我以董事長身份召集董事會，蕭先生雖然身體不好，總是到會的。最近一次董事會，他因體力不佳，未能出席，便要我代表他，為他在董事會紀錄簿上簽名；誰知這是蕭先生的姓名最後一次在中央社會議簿上出現。

淒風苦雨，蕭先生的遺靈自台北市立殯儀館經過中央社到舒蘭街的火葬場，治喪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黃少谷先生已流過好幾次眼淚了，

他們的友誼是高深寶貴的，可為年輕的一代効法。像黃少谷先生對蕭先生的情誼，真不愧為管、鮑之交。中國國民黨的靈魂，也都寄託在這種道義上面。

同茲先生去世了，中央通訊社的事業自必永遠綿延發展，也只有使中央社發揚光大，才能安慰同茲先生在天之靈。

# 同茲先生致力振興國劇

馬壽華

蕭同茲先生風度瀟灑，和藹可親，望之若神仙中人，與他晤談，如坐春風，令人不勝景仰。

我與同茲先生相交甚晚，然心儀已久。常聽友人談起他受命主持中央社時，堅守三個原則：用人唯才、健全機構、自主發稿，後來逐一實行。中央社有今日的輝煌成就，實為同茲先生的努力。

我與同茲先生相識於台灣。記得是文星書店在台北創設時，同茲先生託錢大鈞兄囑我為文星書寫招牌。這塊招牌，也就成為我們友誼的橋樑。

第一次與同茲先生相晤，就甚融洽。我們都醉心國劇，從北平聽戲，談到名票名角，所見所好，極多契合。

民國五十一年，私立復興劇校董事會改組，大家推蕭同茲先生為董事長。他以年事高而堅辭，經周宏濤、王永濤兩位先生力勸，我比他長一歲，也以老當益壯、為校出力相勸，他始允出任。從此，他為董事長，我為常務董事，經常一起開會。與同茲先生接觸愈多，我也

獲益愈深。

對國劇，同茲先生與我有相同看法，都以國劇為我國傳統文化重要的一環，具有至高的藝術價值，實不亞于書法、繪畫；且其表彰的均為忠孝節義，確是值得倡導推廣的一項事業。

復興劇校由王振祖校長創設，錢大鈞兄、皮以書委員、馬慶瑞校長等，都曾致力維護。但因經費困難重重，維持不易。同茲先生任董事長後，曾各方奔走，希望政府能予經常補助，但因私立學校過多，無法開例。

復興劇校能由私立改為國立，成為今天全國唯一培養國劇專才的搖籃，實為同茲先生的功勞。事後，據友人告知，同茲先生有一次晉見總裁時，曾說明復興劇校與文化復興的關係，及過去對國家培育國劇人才的貢獻，確有存續的必要。總裁乃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中，指示教育部，將私立復興劇校改為國立，于五十七年一月正式改組成立，繼續招生。同茲先生對這件事毫不居功，從未與人提及。

近年來，同茲先生時常到學校，與學生談戲、練唱，鼓勵大家努力進修，求更高造詣。復興劇校歷年人才輩出，同茲先生潛移默化、諄諄善誘之功，是不可磨滅的。

同茲先生以三十二年時光領導中央社，為黨國、為中國新聞事業獻出全力。榮退之後，仍復不減他對文化事業的支持，對青年後進的



獎掖提攜。每憶故人，思念良深，不僅止於私誼而已。

楊管北一

椽筆掃千軍，永憶才華驚四座；

瑤尊經百劫，長懷言笑足千秋。

# 蕭先生是新聞通訊總工程師

高仲芹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同茲先生率領馮有真兄和我，在余唯一先生任內，接辦中央社業務。我並不是新聞記者，當時在中央黨部担任一項通訊工作，調到中央社幫忙。

蕭先生當時對我說，我們的任務，第一件事要使中樞和國際消息於當天到達全國各地。但是經費有限，所以要我提出辦法，逐步實施。在開始工作之前，派我到全國跑一個圈子，從南京、上海到香港、廣州，沿粵漢路到漢口、北平、天津回南京。

從那時起，蕭先生在我心目中，是新聞通訊總工程師。我不過是執行命令，貫徹蕭先生的計劃而已。蕭先生說，新聞事業現代化，以通訊為神經。中央社應該是全世界最大的通訊社，因為我們代表五億人口，國境縱橫五千英里，方言數千種，東西南北語言不通，但我們有統一的文字，來克服方言問題，所以我們一定要萬分努力，來建立一個全國性無線電通訊網。以南京為中心，每日發佈新聞，以一萬字為原則，使全國各城市同時接收，來澈底糾正現在情況。那時候南京首都的消息，經交通部電報局，大約一星期至十天到達廣西、雲南、

四川、山西等距離南京一千英里以上的各省會。新聞電是「四等電」，列在一切電報的末後。

那時候，我們無線電通訊技術，得力於國民革命軍北伐軍事通訊方面的成功，在工程上講，還是萌芽時期。蕭先生的計劃如何貫徹，在經濟上的問題，比工程問題更嚴重，因為地區廣大，新聞通訊毫無基礎。

蕭先生說，電報通訊是交通部的任務，因之派我和交通部接洽，以建立中央社新聞無線電通訊網的法律地位。當時交通部電政司業務科長尹仲容先生十分同意蕭先生的計劃，就和中央社訂立中央社專用無線電新聞通訊電台十五年期限的合約。

第二件事是把路透社在南京、上海兩地的無線電台接收過來，路透社消息由中央社發稿。路透社負責人十分合作，同時也帶給我一個十分重要的助力，就是以後擔任電務部副主任、主任前後達四十年的周紹高兄。

蕭先生任職第一年中所領導的電務人員，從五人發展到五十人，第二年增至二百人，抗戰前一年，電務人員已達到一千人左右。

民國二十三年，有名的中央社C A P廣播新聞電報開始播發，全國各地同時接收。從上海向南，自南京向北，武漢更是中部重要中心。三年之內，全國報紙改觀，國內、國際新聞不再混合一起，廣東

報紙上習用的口字邊語助詞也很少應用了。

因爲發展太快，經費不能應付，蕭先生同意自造發報機，購買器材，以發報機材料、真空管、收報機爲原則。在南京金陵大學農場附近的發報台，成立一個小型無線電發報機製造廠，現任中央社電務部主任黃履中兄，對於這項付託有重要貢獻。而蕭先生對於自己製造發報機的計劃，充滿信心，高瞻遠矚，真不愧爲總工程師。

民國二十三年到二十六年，今 總統蔣委員長統一全國軍政，經濟穩定，各項建設先後開創，中央社工作格外緊張。同時，日本軍閥在北方的行動，充分顯露侵略野心。蕭先生命令布置北方電台，以北平潘仲魯、黃守楸爲中心，向張家口、天津、瀋陽方向發展。河北、河南、山東各省會也成立電台。同時沿新建的浙贛鐵路，佈置南昌、韶關、長沙各地電台。再自漢口向西擴充，成立重慶、成都電台。對於中央社的開展情況，蕭先生隨時報告蔣委員長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備查。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我有一個機會和蕭先生詳談如何研究使中國文字通訊機械化，改革數字代表中文的電碼，用「中文電報機」來加強中央社新聞通訊。蕭先生也是工業學校出身，對於我的構想，認爲極有可能，因此決定允許我到歐洲考察英、德、法、義各國大通訊社的技術設備。又得中央廣播電台吳道一先生的同意，和中廣工程師葉桂馨、王三畏兩兄回到英國馬可尼工廠實習和研究。暑期到歐洲各

國，當時的德國海通社、法國哈瓦斯社和義大利司蒂芬尼社殷勤招待，使我對於中文電報機的設計，得到許多參考資料，發明設計，更具信心。

在我到歐洲之前，曾和蕭先生研究國際局勢，他認為一九三九年倫敦海軍條約期滿之後，日本侵略野心可能達到頂點。歐洲局面因為德國不滿意現狀，希特勒積極建軍，情勢也不容樂觀。世界軍事失去平衡，危機重重，所以中央社要及早準備。

那時候，中央社發展太快，經濟方面無論如何趕不上，而且對於國際情況的估計，不但是社會上沒有反應，就是中央社同人意見也不一致。蕭先生因之決定動用電台機器折舊存款數萬元（那時候美金一元，等於法幣三元），在發報台工場加造發報機，增購一大批三十二型收報機，佈置重慶、貴陽、沅陵準備電台，由何樹元、譚德和、蕭蔚民、梁靜、岳中權等分地負責。我在重慶工作半年，經北平回南京，再出國赴歐洲。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中日戰爭全面爆發，蔣委員長宣布抗戰到底。是年九月，日本飛機炸毀南京壽康里發報台，電務部工作依照「中央社戰時通訊系統」執行。蕭先生領導周紹高先生和電務部全體技術人員機動應付，廣播電報僅中斷六個小時，第二天，全國報紙消息並無缺少。我在倫敦接到蕭先生的電報，心裏十分着急，雖然蕭先生允許我在歐洲再留一年，但是我還是於當年十月提早回國，共赴國

難。

抗戰八年，日本飛機把中央社列入轟炸目標，各地電台每天在敵機空襲威脅之下工作。重慶大轟炸期間，鐵板街電台全部炸毀，我們的好朋友李堯卿主任與電台同歸於盡。羅家灣發報台一部份地上設備也遭炸毀，幸我們大部份機件，都裝在防空洞裏，未受影響。我的工作中心在貴陽，有一段時期貴陽成爲中央社準備總台。

在此回想到艱苦時期本社同仁的合作精神，編輯、採訪、英文、電務各部大家拚命，互相合作，在蕭先生沉着應付的領導下，沒有一個人不努力。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蕭先生參觀中文電動打字機

民國三十一年，日本軍隊向南太平洋進展，先後佔領香港、新嘉坡、菲律賓等地，美國加入戰爭。當時論調：歐洲戰場第一優先，亞洲戰場就讓我們苦戰苦拚，牽制日本武力。中央社物資不夠，支持工

作日益艱困。

三十一年九月，蕭先生和美國戰地情報方面接洽，請美國政府予中央社物資支按，經同意以美金十萬元為預算，我又被派到美國。半年之內取到真空管等材料一大批，由美國政府直接運到重慶交件，中央社通訊工作得以支持。我獲得蕭先生同意，留美繼續研究發展中文電報機。

民國三十四年，日本無條件投降，中央社面對復員的嚴重問題。我向蕭先生建議，放棄在大後方的全部器材，在美國購買剩餘無線電機器，另建新台，蕭先生也同意了。我們以二十萬美元左右的經費購大批器材，包括二十啓羅瓦特大型發報機二架，二.五啓羅瓦特中型發報機十架，三百瓦特小型發報機五架，收報機八十架，及鑿孔機、放送機、電傳打字機、柴油引擎發電機等多架，於民國三十五年運到上海。不幸共匪南侵，中央社遷來台灣，蕭先生在萬分困難之中，把在上海碼頭上的大批器材裝船搶運來台，以建立中央社在反攻復國基地的新任務。

民國六十一年，中央社運用新聞局前任局長魏景蒙先生交到的高式中文電報機，開創台北、紐約經過人造衛星的中文國際新聞業務。魏先生現在擔任中央社社長，在過去，事實上和中央社同人等於一家。中文電報機的發明，是蕭先生鼓勵的成果，由魏先生實施，我認為是畢生榮幸。



新聞事業一定要完成機械化，才能發揮新聞從業員的長才。我相信新聞界同業在紀念蕭先生是新聞事業的領導人物的時候，更不要忘記蕭先生是新聞通訊機械化的先知先覺，是新聞通訊總工程師。

# 遙祭三爺

張冰子

重慶初受教誨，南京勿談國事，此後二十多年中，台北兩度相逢，你身體精神素稱健旺，「念茲集」後正想再爲你祝壽，而你何以竟忽然長逝？

別人感受如何我不知道，我則是第三次哭了。你記得在五福樓頭宴席上，我說平生性強少哭，唯有兩次感極流淚，不能自禁：第一次是戰時我從遊擊區化裝回後方，身受敵偽凌辱，當重見自家軍民時，哭了。第二次是長期浪跡海外，一旦乍回台北聽奏國歌，百感交迫，我不能自己而又哭了。誰知第三次我會爲你而哭？那天窗外大雪，當我寫賀年片給你時，忽接噩耗，我怎能不哭？

回想重慶初見，我來自前線，親歷戰地艱苦，厭見後方昇平，只有你問長問短，懇切慰勉；我說我英文荒疏，處理國際新聞恐有困難。你却說你學英文很久，總難學好，並舉當時常用「INVASION」一字爲例，正反意義混淆，不如中文可以應用明確字彙；最後你又說戰地生活體驗應已勝過大學教育，而中央社也在工作中求進步。你娓娓而談，我靜靜領受，你面色本紅，因熱忱而更紅，再加上那令人可

意會而不可以言傳的微笑，兩小時的教誨，我是終身難忘也終身得益了，但你的這些却從此中斷了！

由東北回南京述職的那次，我心情本來頗為沉重，週遭局面日非不說，我還在故總編輯陳博生主持的小組會上大受委屈——我從實報告並詳細分析北方情勢，而陳先生却於下結論時批評我的看法「太悲觀」。臨到我見你時，我只簡報小組會經過，接著就訴苦在非常環境下，錢用得太多，譬如用在吉林市共軍圍城狀態中，裝設發電機及收發報機和南京直接通無線電話，這些錢都是向吉林省主席梁華盛將軍那裏挪借，應請總社設法歸還云云。這次你沒有笑，而且沉默很久，才緩慢而有力地說出這麼兩句話：一句是『國家多難，我們都有責任為她分憂』另一句是『梁華盛將軍也是我的朋友』你不笑我可笑了，我像是服了什麼靈藥，覺得心胸突然開朗，好似一切難題都已解決。就這樣我再度北去，雖然情勢已不幸如我所料的那麼逆轉，可是你給我的啓示，使我在以後的逆境中從未皺過眉頭。你死而有靈，總該為此而笑吧！

我兩次回台，有如「女兒歸寧」。你只知道我自比「強盜」，豪情未減，却不曉得我內心感觸。第一次我由馬來西亞回台，當我看到你安東街的破舊住宅，當某夜宴後你指給我看你從上海帶出來的「道奇」老爺車，我覺得我的生活比你神氣多了，我也覺得你其他一些舊屬的生活比你濶氣多了，你當然不在乎，但我心頭可不是滋味。久別重逢，你是要約我到小酒館去談談（「念茲集」在編纂時把我那篇

「三爺與『強盜』」原文有關的意思弄錯），只可惜華筵緊排，雖然都有他在座，却輪不到我們去小酒館。你知道嗎？我曾在深夜去螢橋欣賞豆漿油條，也曾發願能隨你去小酒館訴說「女兒」心事，但如今你撒手西去，那裏還有此機會？第二次我是在移居加拿大後回台，頤和園飯莊宴會總算由你作東，中華路歡聚也總算舊雨齊集，但此時國際氣壓益低，而我又適因肝疾戒飲，你的興致已不如前此之高了。不過無論如何，我還以為來日方長，一待定居，隨時可以「歸寧」，絕沒有想到你竟永逝不返。據明勳兄來信說，他近在咫尺，當你臨終時竟也未能一見，你生前那麼從容不迫，何以去時如此急驟？難道是你在外表對後輩強逞豪興而內心憂患使你不勝負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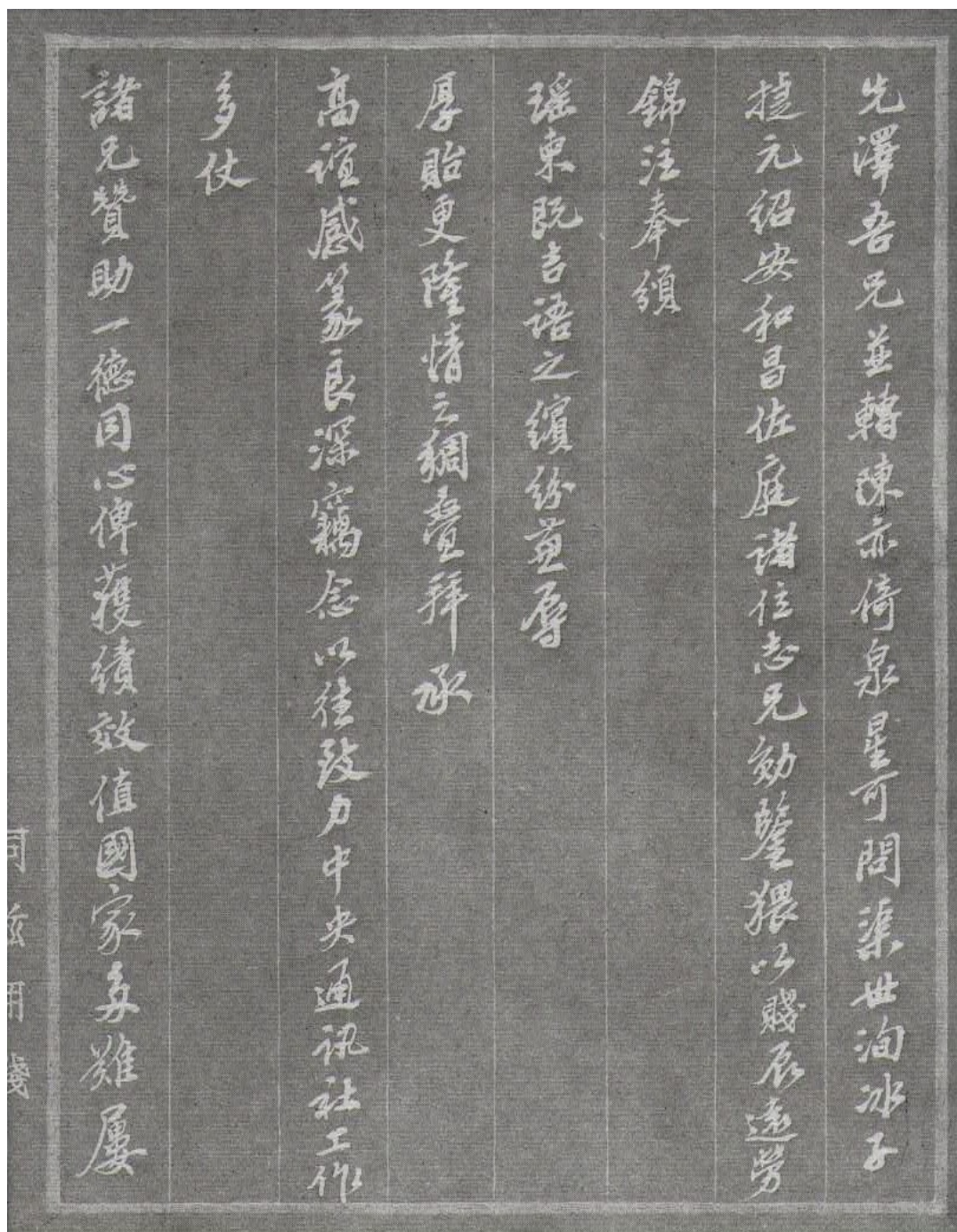
遠離父母之邦如我，趁此向你祭告：在此時代的中國遊子生涯，已經不是想望「慈母手中線」那麼單純了，去國的悲痛絕不是任何物質享受所能慰解，也不是任何精神麻痺所能消除。在重慶講英語和在海外任何地方講英語感受絕對不同，在北平吃烤鴨和在海外任何地方吃烤鴨滋味完全兩樣，而同是中國人，在海外任何名勝相逢，更不是在西湖的那種情懷所能比擬。三爺，我也在憂患中，而還有無數人都在憂患中，你何忍棄我們而去？

你在天有靈，應知我肝病已痊，酒量如前，且正物色此邦佳釀，準備「歸寧」，為你祝壽，但如今却壽酒變成祭酒了。雖然重洋遠隔，難禁我已神馳你左右，而你也該感應我精誠，願共一醉，並請聽我高歌唐詩：

大雪滿天地，胡爲仗劍遊？

欲知心中事，請上酒家樓！

.....



蕭先生寫給陳先澤、張冰子等的親筆信

歷亂離時先如流瞬屆七十自省碌之愧之獻  
替乃荷

雅意殷拳惠加督勉敢不奮此餘生期於良共  
復國有涓埃之裨以報堂國之厚過專此肅布  
區區藉誌謝忱諸維

荃察敬頌

時綏

弟蕭同茲



拜啟

十月十二日

# 記藍天之會

張佈天 閔道宏

黨國先進蕭同茲先生逝世，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組治喪會，於先生逝世後六日在台北市黨部舉行首次治喪委員會議，推葉明勳先生報告蕭先生逝世經過情形，葉先生報告時熱淚盈睫，幾至泣不成聲。其中有一段提到蕭先生近年常與三數好友晚間在藍天餐廳喝茶，似乎已成爲習慣，因爲蕭先生喜歡藍天的寬敞廳堂，覺得胸襟開闊；也喜歡藍天夜間的寧靜氣氛，洗淨一天的煩囂。蕭先生的朋友知道他有這個習慣，經常不期而聚的有不少的人，總是先後談到十一點左右各自回去。

蕭先生大殯前夕，在遺像前羅列一百朵玫瑰花，具名者十七人，就都是經常在藍天聚會的一些人。我們兩個——佈天和道宏也附驥其中，我們在靈前奠酒，心中有說不出一種感觸，深感失去了蕭先生，藍天之會恐怕從此就將風流雲散了。

蕭先生名滿天下，交遍天下，我們後生小子，過去只聽到蕭三爺這個享譽已久的大名，却無緣一識韓荊州。大概是三年以前，我們有一羣朋友也經常晚間到藍天瞎聊天，有人告訴我們，那位鶴髮童顏的



長者就是蕭三爺，雖心儀已久，但也不敢冒昧請益。忽然有天晚上，藍天主人賈毓泉兄過來對我們說，三爺很喜歡年輕朋友，希望你們也過去坐坐。我們就這樣認識三爺，在以後的日子裏，也就很自然的參加了三爺一羣朋友的聚會。說年輕，從三爺的眼光來看，我們自然是年輕人，其實我們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了。後來我們才知道三爺所指年輕的涵義具有一種鼓勵的意思。希望不要暮氣沉沉，每個人都具有蓬蓬勃勃的朝氣，永遠像青年人一樣。

我們每週聚會，少則一次，多則三五次。除三爺外，核心人物還有范鶴言、李葉超、葉明勳、張明、耿修業、賈毓泉、談公殊諸位先生，我們兩人亦敬陪末座。這些位先生大都豪於飲，祇有道宏例外，每當酒至半酣互相稱觴時，道宏僅能舉杯示敬，如有人不表同意時，三爺即挺身而出為我解圍。三爺溫婉的一句話就能將很尷尬的局面恢復了歡暢。而他老人家敬酒時總是說：『我敬你，你老弟可以不喝。』真使我有時不禁想破例回敬一次。

飯後往往原班人馬重回藍天。三爺在那裏儲備有美酒名茶供大家享用，酒醇、茶香、意更濃。我們因為第二天必須早起治事，總在晚十時左右告退，因而被稱為Mister Ten。三爺到時看看錶說：『老弟，時間到了。』我們亦遵命辭席，他老人家從無愠色。

聚會時，三爺往往在首席靜坐，聽我們這些人天南地北的瞎聊。偶爾三爺也講一兩段掌故，都是我們平常不輕易聽到的雋聞逸事。高

興時還唱上一段平劇，有時我們偶爾犯上跟他開小玩笑，三爺亦僅微微一笑，有時還拍手稱許，不以爲忤。所以和三爺在一起，每分鐘的時間都在愉快情況下度過，至今思之，一切歷歷如在目前。

三爺去世前二週，一位朋友從歐洲回來，三爺爲之設宴洗塵，由葉明公安排，賓主均歡。三爺那天晚上特別高興，總喝了大半瓶白蘭地，其中有一瓶是由趙班斧先生藏的百年拿破崙，更是喝得涓滴無存。本擬再返藍天，當時因我們臨時有事先行告退，詎料竟是我們和三爺最後的一次聚會。

三爺立言行事，一切均有法度，中規中矩，即使酒已薄醉，亦從無失言失態之事，這種修養，不是我們學得到的。我們常常聽到三爺一句名言：「事情不大」，有時又補充一句：「天下本來就沒有大事。」這種富有哲理的雋語我們可以細細咀嚼，其中含有幾重意義：一方面是講心理準備，天大的事情來了，也得從容應付，教人臨事而敬，不必相驚伯有；另一方面是達觀世情，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再就是講器度，「宰相肚裏好撐船」，有什麼事情容納不下？三爺這一生所見所遇的事大多了，何曾困擾住他，大概就是他具有這樣淵深的涵養功夫。我們和三爺相聚的時間太短，但從他老人家那裏所接受到的立身處世的影響力使我們畢生受用不盡。

# 中國的新聞事業家

張任飛

中國近代新聞界中有兩位特出人物：一是大公報總主筆張季鸞先生，是新聞言論家；一是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先生，是新聞事業家。想到這兩位先生，就不由得心中有一份敬意。

我在讀大學的時候，正是日本軍隊一步步逼近重慶，中共利用新華日報在大後方散發不利於中央政府的宣傳，戰爭和國共糾紛是人人心中的兩大問題。教授們和學生們每天早晨都在等大公報，打開報紙後是先看社論，它無論是談戰爭或談國共糾紛，看完了，心就定了，心就安了。

大公報（本文所說的大公報是指張季鸞時代的大公報）是以言論見長、見重。它處理新聞的態度也是和言論配合的。該報的四不主義中有兩項是「不私」和「不盲」。不私是所有報人都知道應該做到的，不盲却非所有報人都能夠做得到的。張先生在文章中說：『一個新聞記者無論寫什麼，應該謹慎，不可人云亦云；但有了重要意見，應該勇於發表。』

在那些抗日戰爭一再失利，共產黨深入了文化和出版界的日子

裏，社會上有一羣有目的在叫囂的人，扮演着意見領袖的角色，到處宣傳他們對當時各類問題的看法和主張。這批人的看法和主張也就成了一種社會輿論。在常「以讀者意見為意見」的報人看來，這也就是讀者意見。當許多報人覺得不敢違背讀者意見的時候，張季鸞却說：『大公報絕不盲目的投人所好。』

他用這樣的態度寫了很多文章，談論國事。它不盲從知識不夠、或有目的而在叫囂的讀者的意見，倒確是反映了明白事理而在沉默着的讀者的意見。民國三十年五月十五日，大公報得到了美國米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榮譽獎章，這是中國的報紙至今唯一的一次得到的國際榮譽。從此，大公報成為國際間知名的報紙之一，它就是中國的紐約時報或泰晤士報；在外國人看來，大公報的言論是代表中國。它也更成為中國國內的知識份子和各界領導人物（決策者）必看的報紙。張季鸞謝世的時候，蔣主席曾說他是「一代宗師」。

蕭同茲先生沒有留下什麼重要的文章，他留下的是領導和發展新聞事業的才能。他剛進中央社的時候，各省是消息閉塞，中國是百事落後。他馬上在各地遍設分社，每個單位都有電台，把每天的國內外消息傳到全國各地。國內的新聞網佈置好了，他又眼看着世界，在國外創設了許多分社，要把中央社辦成國際性的新聞機構。在他想來，中國也是一個大國，中央社當然也可以辦得像美聯社、合眾社……一樣。



重慶時代的蕭社長在處理社務

如果是別人做中央社社長，當然也會自動地或被動地做這些事的。蕭先生做來是那麼有計劃，從不讓時間溜走，一步緊跟一步。他自己有眼光、有計劃，如果沒有網羅人才的才能也是不行的。那時中

國的新聞人才太少，他到處物色，總是找來有用之人。他真會用人，例如他要設英文部，聘來了燕京大學畢業的任玲遜做主任，付給這位主任的薪水竟比社長的薪水高。國內某分社主任用多了錢，不能報銷，公文到了他那裏，他對那位主任說：『這不怪你，只怪總社撥給分社的經費太少了。』然後就批「准予報銷」。

他把中央社辦到抗戰勝利的時候，社內真是人才濟濟。他派在外國的特派員是和外國最出色的記者一樣好。從英國留學回來的大公報記者蕭乾對我說過：『中央社內的人才超過了中央社所需要的。』這話是有點偏見的，是認為當時的中央社是一個黨的宣傳機構，有些人的新聞才幹無法發揮出來。

無論社外的人怎樣看、怎麼說，中央社內是有許多人才的。這些人中有的終身替社服務，現在仍在工作；有的已離職在做別的事。蕭先生離開中央社多年了，在職和離職的人仍尊他為社長，從國外回來的人總是要去看看他，說來誰能相信呢？像有才子之稱、傲氣又那麼足的邢光祖至今在過年，或蕭先生過生日的時候總要去蕭家，看見蕭先生就磕頭！

蕭先生沒有威，也非一味的慈，是他的謙謙君子的風度使得大家願意圍繞在他的身邊，受他的領導，畢生尊敬他。

張季鸞和蕭同茲兩位先生在中國近代新聞界中是很有影響力的人。蕭先生謝世後，那麼多的人趕到殯儀館去弔他，行了禮還依依不

捨地不走，把那個大廳擠得滿滿的，真是少見的事。後來聽到有人說：『蕭某人不過是一個新聞記者，不該有那麼大的開弔場面。』

世間的每一種行業都是平等的，某一行業出了狀元，那是難能可貴的。一個成功的新聞記者在死後爲什麼不該有這種並非他討來的場面！

# 蕭先生寬厚仁慈

張民熙

五年前出版的「念茲集」上刊載了我的一篇「鼓勵、容忍和信任」，那是為慶賀蕭先生七秩晉五華誕而寫的，在極短的時間內以愉快的心情寫成。今天再寫一篇文字紀念蕭先生的逝世，不禁悲從中來，不知如何落筆。

蕭先生的逝世。是民國五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日四弟明烈在中興新村逝世以來我最悲痛的遭遇，因為四十年來蕭先生對我的提攜、教導、懲罰、鼓勵以及不只一次助我渡過難關的深厚師弟之誼，和手足之情又有何殊。

蕭先生逝世後，我亦因病住了四十九天的醫院，儘管在患病期間，我還是思潮起伏，總覺得應當要寫點東西紀念對我一生最有影響的人。蕭先生一生的大經大節，寫的人已經很多，毋庸我贅述。我還是寫蕭先生和我之間的一點小事，以為紀念。

抗戰末期，一般公務員的生活都極端困苦，我為了維持一家五口的生活，在美國新聞處兼差，每天中央社和美新處兩方的工作共十二小時，再加上往返的時間，以致非常忙碌，短時間尚可支持，但時間



久免不了身心交困，不免時常鬧情緒以及和人爭論，甚至不講理，動不動要辭職。起初大家因為都是中央社英文部創辦時期的老同事，都對我讓步，並且一再勸我不要輕易言辭。但是經不住我情緒愈來愈壞，最後徐主任兆鏞兄不得已還是把我的辭呈轉給了蕭先生。第二天上午蕭先生見到我的辭呈，同時他也聽到我時常鬧情緒，不好好工作，他那天沒有和任何人商量，拿起筆來，就在辭呈上批了「照准」二字，於是結束了我在中央社前期九年十一個月的關係。那是民國卅三年八月的事。

民國卅四年八月十日，日本宣告投降，重慶美國新聞處是個戰時機構，也隨戰爭的結束而逐步結束。我於十月間被遣散，成了無業游民，到處找事，以求得一枝棲，所得到答覆都說有機會，但是總沒有實際的結果。就在這時候，明二哥到重慶接洽公務，他有一天到我家裏來對我說：『蕭先生說：「民熙要回中央社，應當他來找我，總不能我去找他。」』二哥並且對我說：『現在無論回不回中央社，都應該去看看蕭先生，他的這番好意是難能可貴的。』

於是我第二天就到中央社晉謁蕭先生，蕭先生見到我，沒有容我開口，開頭就說：『現在戰爭已經結束，你該回中央社了。你過去犯過很多錯，我都可以原諒你，我也認為你會改過的，今天我說過之後，也不再提過去的事，希望你今後好好在社裏工作。』說到這裏他停頓了一下又說：『現在重慶總社準備還都，不再添人，我派你立即到南京去工作，南京那方面現在由曹蔭釋先生主持，我寫封信給你帶

到南京去見曹先生，他就會安排你的工作。』到這時，對這種盛情善意，我還有甚麼話可說，祇有坐在一旁等他寫信，他寫好信就通告事務部替我買飛機票。第三天我就帶着他的書信到南京報到復職。那是民國卅四年十二月初。

當初蕭先生爲了我兼差不能好好爲社裏工作，還要鬧情緒犯社規，所以批准我的辭呈。他那時一定也想到與其由我兼差，兩件工作都做不好，還不如讓我集中精力做一件工作，而且當時美新處一份工作的待遇足夠維持我的家庭生活，他也就感到心安理得。但是到後來，我被美新處遣散之後，他馬上就想到我，爲我家的生活擔憂，要我去見他，讓我復職，這一切都出於他寬厚仁慈的天性，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現在我每一想到他所說的：『民熙要回中央社，要他來找我，總不能我去找他。』就不禁熱淚盈眶。

（編者按：本文作者張民熙先生近年體弱多病，因蕭先生逝世，感恩知己，悲慟萬分，臥病四十九天，稍愈即執筆爲此文，文成而突中風，於三月七日逝世。）

# 有「至人之心」的蕭三爺

張明

蕭三爺於上年十一月十一日深夜逝世，今天（一月二十日）親友故舊到陽明山第一公墓參加他的安葬典禮。三爺離開我們已經十個星期了，在這七十天裏，隨時和朋友談話會談到三爺；靜處凝思，四十多年的往事，好像都在眼前；夢幻之中也和三爺見到三次。誠如黃少老所說：『三爺會永遠活在我們大家心裏的。』

記得四十四年前，我和三爺在北平初見面時，我才二十八歲，三爺長我八歲，都在青春年少的時候，彼此談得很投機，各人都有自己的一番抱負。三爺二十一年春接長中央通訊社後，大展雄圖，對黨國作了最大的貢獻。我愧無建樹，僅僅牢守黨報的崗位二十年，直到三十八年匪據大陸，我撤退到台灣。在這二十年裏，經過了八年對日抗戰，抗戰前三爺在南京，我在北平；抗戰時三爺在重慶，我在成都；抗戰勝利後，又各回到南京和北平，聚時少，離時多，每年祇有一兩次見面的機會，每次我們總要把握時間作志業的切磋，三爺對我的啓示甚多，我能報答三爺的就很少。

二十八年重慶五三、五四大轟炸，我適在重慶中央日報總社擔任

總經理，和三爺同在戰時首都。五三日機來炸，投擲燃燒彈，把我寄住的瞰江飯店炸毀起火，我從大火中逃了出來。五四日機更大批來襲，中央通訊社總社直接中彈，三爺是從瓦礫堆裏爬出來的，中央日報緊隣起火，也燒得很厲害。我們在被炸後，各各忙於通訊社、報社救火救人的工作，竟顧不得自己是否受了傷。

大轟炸後不久，我奉了中央宣傳部的命令，籌備創辦成都中央日報，部長葉師楚愴先生以總裁催促甚緊，要我出報愈快愈好，主任秘書許孝炎先生告訴我，部裏經費困難，籌備費祇籌得法幣八千元，要我盡量節省妥為運用。八千法幣在當時雖不是一個小數，可是要新辦一張沒有一粒鉛字沒有一個員工的報紙，究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求教三爺，得了他的指導協助，鼓起了我的勇氣，成都中央日報終於二十八年雙十節出了版和社會見面。是時總裁正駐節成都中央軍校，陳布雷先生傳諭說：『總裁看見了你的報，要你馬上去見。』我即詣行轅求見，總裁垂詢報紙籌備艱苦經過，頗予嘉勉，並頒發補助費法幣兩萬元，成都中央日報始能有日後的發展。假如不是三爺給我的指導協助，我幾乎會失去了這一為黨國効力的機會。

三爺直接負責經營中央通訊社二十年，隨後改任中央通訊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十二年，「中央社自孩提以至于成長茁壯，可謂胥在其懷抱培育之中，而此一事功影響所及，固不徒中央社本身之成就而已。」……三爺經營中央社抱了一個遠大的目標，求平凡的實踐，可是他的成就真不平凡。三爺一生的智慧精力全用在中央社這一事業

上，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



遊台南烏山頭（從左至右）：蕭先生、徐鎮埏、葉明勳、張明煒

三爺的事功，識與不識同所欽佩。至於三爺交朋友，辦事業，當黨員，做國民的態度作風，我想也應該藉此機會簡單提一提。三爺出

身農業社會家庭，天性善良，一片真誠，他對人對事都是以他自己的這種尺度來衡量的。

三爺交遊滿天下，大家敬重他，信任他。他交朋友純重道義，有時他幫了朋友的忙，朋友本人不知道，他也永遠不會提起。朋友有急難的事，他急人之急，甚至從井救人，這種古道熱腸的人，實在難得。三爺辦事業，用人以適才適所為準繩，治事以分層授權為原則，待同事如弟兄，遇過錯私下溫語點提，從來不以小疵而苛責，他以潛移默化的功夫領導中央社這樣一個龐大機構，社裏的同事也都當他是大家長，親切互助，各人盡各人的責任，忠勤職守，這絕不是偶然可以做到的。

三爺於民國十三年正式加入中國國民黨以後，因為他自己的性行高潔，又親炙黨前輩的風範，他認為黨德和黨誼是一個黨員必具的德性，他始終堅守這種德性，也隨時提醒所有同志注意這一點。三十六年春，我從北平進京述職，三爺馬上約我和他單獨談了五六小時黨德與黨誼的問題，使我深深體會一個黨員應有莊敬容忍的襟度，拳拳服膺，至今不忘。三爺對國家現況、世界大勢深思熟慮，但很少在大庭廣眾或集會的時候發表他的意見，祇是靜聽別人的高論，他對於一個國民應盡的義務都如時如限做到了。他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近十餘年來，三爺每天打打保齡，飲飲酒，喝喝茶，習以為常，

晴雨寒暑無間。三爺打保齡是作點輕微運動，舒鬆一下筋骨；三爺愛酒，但不過量，慢斟慢飲，品評酒味；藍天喝茶，逢人微笑，高高興興，視線開闊，心胸寬暢。看起來三爺「神明彌旺」，「了無頹唐之態」，閑雲野鶴，確是輕鬆之至；想不到他也會遭遇橫逆拂意的事，但他一切處之泰然，犯而不校，常常引用胡慶育先生的一句名言：

「事情不大」。因為他的修養精純，把許多戾氣都化掉了。化戾氣為祥和本是好事，對他的身心方面究不免要受多少影響。因此我有一種想法，三爺雖因心臟病遽發，十餘分鐘即不治而逝，修到了他常說的「活得好死得快」，壽終正寢；但是他的病因，也許早在十年前就種下了。

三爺一生行誼，可以說有「至人之心」。莊子南華經天地篇有云：「……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這幾句話正可為三爺寫照，我就以此來紀念永別的老友！

# 提攜關懷與鼓勵

張郁廉

認識蕭先生已經三十多年，是在戰時陪都重慶；實際上，我有機會親聆他的教益也僅僅十五、六次。但是，你有一種很真實的感覺：蕭先生永遠真誠的、默默的站在你的身旁；他提攜你，關懷你，鼓勵你。

還記得，那是民國三十一年初秋，母校北平燕京大學由當時淪陷的北平遷移到四川成都復校，我下了最大的決心辭去中央黨部國際宣傳處的工作，準備到成都完成我未讀完的最後一年大學課程。出發前，偶然的遇到蕭先生，我告訴了他我的決定。只聽他說：『你的決定很對，讀完書，到中央社來工作。』這短短的幾句話，對當時隻身「流亡」的年輕女學生，是多大的一份力量、一份鼓勵，給了我無比的勇氣、自信和安全感。就這樣，一年後我開始在中央社工作，成了中央社「大家庭」的一員。從民國三十二年到三十八年，我在中央社工作這段時間，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階段：我結婚，生子，抗戰勝利隨中央社還都，隨外子孫桂籍到東北家鄉服務——我當時請調中央社瀋陽分社及長春分社工作，一直到東北為共匪盤據，我又返回南京總社，再隨政府遷移台灣。到台灣後，在人浮於事的情況下，我和多數



同事只有依依不捨的自請遣退，離開了中央社。

我從幼年就對繪畫有興趣，辭去中央社工作後，開始從黃君璧先生學習國畫山水。記得蕭先生六秩華誕時，我把一幅未成熟的拙作送他做壽禮。以後多年，只要有機會見到蕭先生時，他總是說：『你要繼續畫畫啊。你的畫畫得很有筆力、很有氣魄，不像出之於女人之手。你送我的那張畫，我掛在家裏我經常要走過的牆壁上。』我於民國四十九年及五十五年舉行過兩次個人畫展，蕭先生給我的鼓勵和幫助最多。這件事他始終沒有對我提起過，還是事後明勳兄告訴我的。我到現在還很清楚的記得，在展覽會中，蕭先生戴着老花眼鏡逐幅仔細觀看的安祥和貫注的神態。「你不要陪我，去招呼別的客人，我要慢慢的看。」他那種認真、熱誠、不敷衍、尊重和重視他人的態度，又怎能不使人感動和感激！

去年十一月初，也就是蕭先生逝世的前一週，中央社數十位老同事舉行餐會，慶賀蕭先生八秩壽誕。那晚蕭先生來參加，大家看見他就像見到自己的父、兄一般的興奮，真情洋溢。那晚我坐在他的右側，席間蕭先生特別提到：『做人最重要的是人格品德，然後才是健康、學問及成就……』外子孫桂籍是參加那次聚會中的唯一「眷屬」，蕭先生一直以「好朋友」呼之。外子近年遵醫囑避免飲酒，當他舉杯，我正要開口阻止他，只聽見蕭先生低聲的向我說：『不要掃他興，今晚讓他高興、高興吧！』說得那麼親切、體貼和富於人情味！

現在，蕭先生已離我們而去，他的音容風範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裏。

# 不是逢人苦譽君

張壽賢

不是逢人苦譽君  
亦狂亦俠亦溫文  
照人膽似秦時月  
送我情如嶺上雲

時間已記憶不清楚，大約在十五年以前，三爺拿了一張髮箋冊頁，要我寫幾個篆字送他。他說：他不大求人「墨寶」，祇是朋友中有能書善畫的，總希望能留一些作紀念。我當時非常惶恐，我寫篆字是不入流的，從不求人知。偶爾在婚喪喜慶場合中，為表達我的誠意，自作自寫，對方喜歡不喜歡，有人欣賞不欣賞，完全非所計及。當時，三爺客座中懸掛著洪蘭友先生送他的六十壽序小屏，黃達雲將軍送他的壽詩，一文一武，珠玉當前，實在不敢下筆。

後來，還是龔定盦替我解了圍，他有這麼一首詩，我還背得出，馬上寫好，附以短跋，說明我當時的心境，忽忽送去。他徵集了多少能書善畫朋友的作品，我這「文抄公」的不入流之作，是否入了流，我不好意思問，他亦從沒有再提起。

三爺逝世以後，靈堂上所懸掛的，報章雜誌所刊載的，以及各種場合所聽到的，有一種共同的，說不盡道不出的，與蕭三爺在一起，有如坐春風，如飲醇醪，令人有回味無窮的感覺。

我在三爺靈前墓前，一直沉吟着這一首詩：

『不是逢人苦譽君

亦狂亦俠亦溫文

.....

.....』

# 憶香港的一段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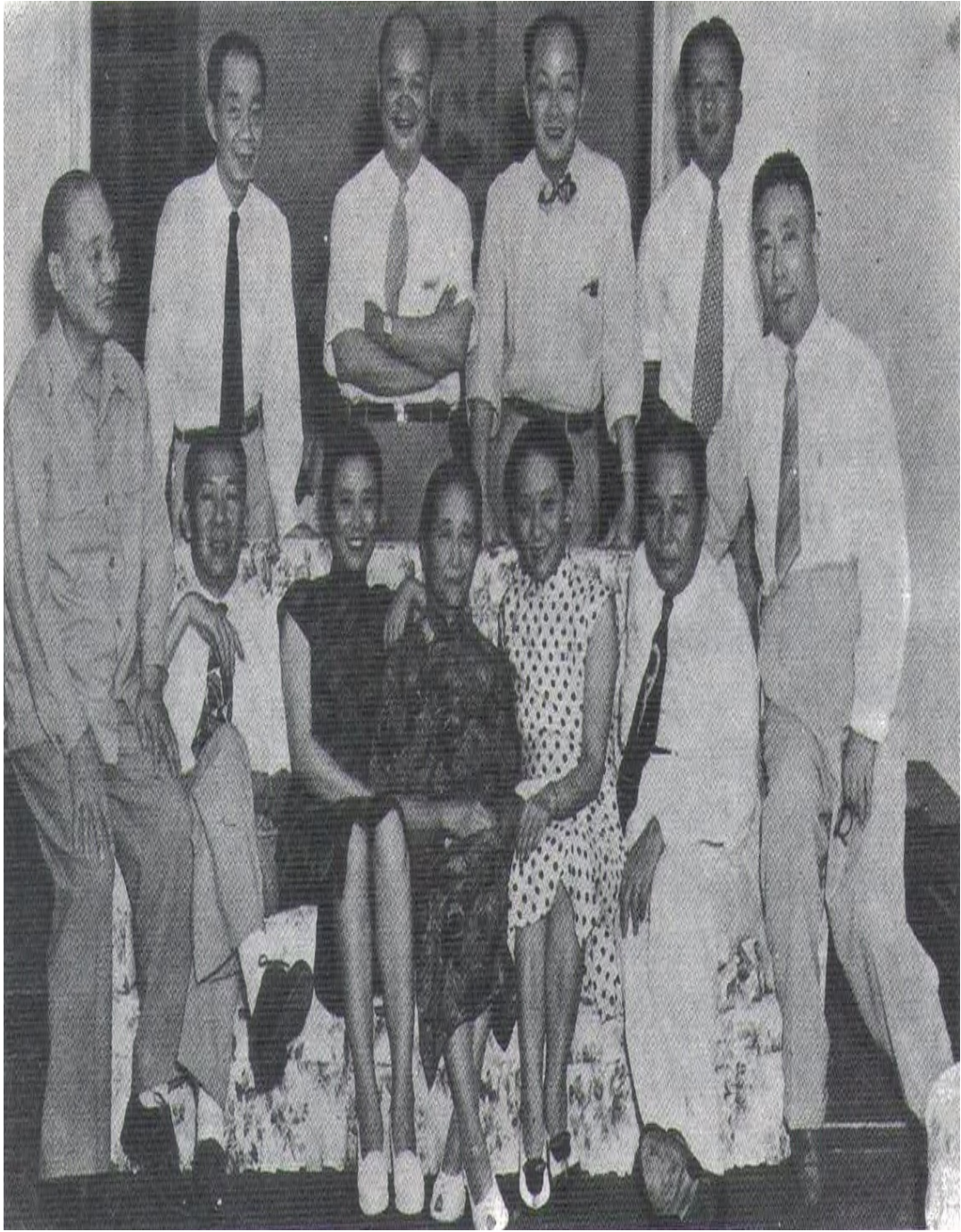
許孝炎

同茲先生逝世後，朋輩擬出「在茲集」，囑余爲文，紀其行誼。偶檢書櫥，得舊照片兩幀，觸起余之回憶，特就同茲先生在香港一段時期之生活，平實紀之。

此照片係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五日攝於廣州東山歐陽惜白先生之別墅，地臨珠江支流，屋前花圃，綠草如茵，有古樹數株點綴其間，風景佳絕。

同人聚集，係奉惜白先生之約，蓋爲慶賀張岳軍先生伉儷結婚之四十週年。岳軍先生豪於飲，余亦小有酒名，席上岳軍先生命余對飲，每舉杯必兩人與俱，盡二十八杯；復約余猜拳，余拳技甚劣，五戰五負，不覺酩酊大醉。次晨醒來，已身在旅邸，詢問侍者，始知係由同茲先生與夫人扶歸，並囑嚴扃門窗，防余醉後跳樓。

閱三日，共軍攻至穗市外圍，政府人員奉命疏散，余與鐵城、惜白及同茲三先生於十月九日自白雲機場飛往香港，廣州則於十月十一日陷入匪手。



在廣州（從左至右）：前排顧祝同、吳鐵城、蕭夫人（陳再君）、張岳軍夫人、吳鐵城夫人、張岳軍、許孝炎。後排蕭同茲、歐陽駒、吳子祥、吳幼林

同茲先生寄寓香港約半年有餘，寓所在香港英皇道一公寓中，房舍湫隘，設備亦極簡陋，且臨港島東西幹路，交通繁盛，電車、巴士絡繹不絕，市聲嘈雜，非至深夜不能入睡，此實同茲先生一生最困窘

之時期。說者謂，同茲先生耽戀逸樂，流連香島，不願回台，實爲耳食之言。

民國三十八、九年，香港社會環境對我至爲不利。大陸淪陷，一般政治及文化界人士多集中香港，觀望時局。投機取巧之徒，仰承共黨鼻息，四出游說，勸人靠攏，於是公開宣揚丟包袱者有之；聯名發表宣言，集體投靠者有之；但求見容於共黨，不知天下有羞恥事。時余正奉命創辦香港時報，同茲先生爲籌備人之一，得其匡扶督導，始能破除萬難，以抵於成。香港時報出版之次日，有過去在大陸上擔任黨政重要工作者四人來訪，詢余創辦此報之宗旨。余直接答稱，反共。彼等責余不識時務，時至今日，猶昌言反共，豈非自走絕路。余答以人各有志，各行其是。事後，余心憤激，赴同茲先生寓所，告以經過。渠慰余曰，反共乃超人之事，必須具真知灼見，且須下最大決心，始能爲之，此等人何足語此，置之不理可也。

大陸淪陷，中央通訊社之業務自不免受影響，幸同茲先生有遠見，事先佈置，海外業務得以維持不墜。當時中央政府及本黨中央已遷往重慶，但由於李宗仁之潛逃，不久即告瓦解，政治重心實際上已移至台北。惟 總統蔣公尚未復職，一切措施尚無正軌可循，反共事業陷於人自爲戰之局。就中央社之情況而言，編輯及發佈重心已遷至台北，由當時總編輯陳博生先生主持；但對海外各地分社之指導及支援，則以香港爲基地，由同茲先生自行負責。同茲先生在大陸瀕於危急時，已將社中歷年蓄積調至香港及紐約兩地，在黨政工作尚未恢復

常軌以前，賴有此款，使海外各分社之工作得以照常進行，而社中同人立場堅定，毫不動搖。同茲先生在港一段時期之努力，豈容抹煞！

同茲先生於民國三十九年回台，當年辭去中央社社長職務，改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在辦理移交時，財務清冊外，尚列有特別移交美金若干萬，黃金若干條，殊出一般人意料之外。

人謂同茲先生手面大，殊不知其精于管理公家之財物也。

羅學濂—

天上那得玉樓，何期鼓吹長才，遽凋彩筆；

地下若逢酒友，爲道澄清有日，快飲黃龍。



# 最合作的病人

陳芳武

除了新聞圈裏諸位先生之外，最近二十年，我這個與新聞界毫無關係的人，恐怕算得上是與蕭同茲先生見面最多者之一，原因是：蕭先生每週日上午必然來我診所一次，二十個年頭，總計起來大約有一千多次。

每天來我診所看病的人，可說各色俱全。我這個人個性內向，時間也不容許，因此對與各位求診者，診斷處方時固然要問要說，但絕少其他閒談。對於初來的蕭先生，我也只當一般求診者應對。但是，十多年下來，我慢慢發現，蕭先生是我國新聞界眾所尊敬的一位老前輩；印象更深刻的是：這位老前輩是我平生所遇萬千求診者中最能與醫生合作的病人。

大家知道，像蕭先生所患的血壓高、心臟病，只能防止其嚴重，不能根除，特別以年齡過了花甲的患者為尤然。談到防治，病人的遵照醫生囑咐，每天按時服藥，隨時多作休息，這一份耐心，最為重要。就這點說，蕭先生廿年如一日的此種長期耐心表現，實非常人可比。我現在還深信，如無此種長期耐心，蕭先生可能渡不過兩次劇烈

發作的難關。而去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三次發作的終於不治，我個人除深感職業性的遺憾之外，所能說的，只有一點，七九高齡而仍未摒絕煙酒，是因素之一。

承蕭先生生前的關愛後輩，民國五十年，他曾贈我橫匾一幅，四個大字是「眾生託命」。我一直懸諸診所，今後仍將永遠懸為座右之銘，以懷念這位與醫生最合作的老前輩，同時經常提醒我應守的職業道德。

# 不伎不求不慍不怒

陳建中

對蕭三爺其人，無論識與不識，都知道他是新聞界的一個老兵，淡泊寧靜，默默的為新聞事業而獻身，中央社之由創始、成長與茁壯，成為國家的宣傳事業機構，可以說是他平生心血的結晶，他那種鏗而不捨、始終如一的精神，為新聞從業人員樹立了一個楷模和典型。

我個人的認識蕭先生，是在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因在南京中央黨部服務，得有機會請教。對其風度、談吐，無不深切心儀，當時只感到中央社在艱難環境中苦撐，正負担起黨國宣傳重任。民國廿六年抗戰爆發，個人以參加戰地工作，由華北而晉、察、綏，而西北各地，目擊共匪虛偽宣傳，及其欺騙國際人士和國內青年的伎倆，深深體會到宣傳的重要性，也常與中央社派赴各地的人員接觸，更看到大公報親共的范長江、秋江等人的活動，處處感到新聞傳播事業在對付共匪謊言詭計，等於另一個重要戰場，我自己也一度主持一個新聞機構，因之對此體認得更深。

三十八年隨政府來台之後，我與同茲先生交往機會較多，特別是

個人負責中央第六組工作的期間，因爲一部份工作屬於心戰宣傳，與在海外的反統戰鬥爭，常常有了請益與交談。同茲先生對海外反共人士的聯絡與爭取方面，也曾給我們不少的幫助。例如民國五十五年秋，同茲先生爲避壽到日本，葉明勳兄同行，中央社的李嘉先生在東京接待。行前同茲先生特找我談日本的情況，因而涉及當時在日少數與政府有距離的青年，所謂「台獨」問題。同茲先生深爲注意，他認爲在國家今之艱難局面下，絕對不容許有此類分歧現象，尤其政府在台全力從事建設，一切爲國家，爲人民，所有成就，昭昭在目，共黨與日本野心家企圖破壞，從事挑撥，以致有所謂「台獨」等不倫不類的宣傳，他願以在野之身，對若干迷途青年予以勸說，使其瞭解國家的處境，走向正當的報國途徑。後來知道：同茲先生的確在這一次日本之行中，不僅默默的作了不少的國民外交，同時也接觸到好幾位當時在日本相當活躍的唱反調人士，曉以民族大義，而且對某些日人的錯誤看法，義正詞嚴的加以指正。雖然蕭三爺那一次赴日，是悄悄去，悄悄回，并未引起人們的注意，但實際上却做了許多工作，對各方的影響深遠而無形。這是一種典型的新聞工作者的本色，對國家與社會有所貢獻，常常是在無形中潛移默化。

同茲先生的長處很多，與他有交往的朋友，都完全瞭解他是一位懂得人生修身養性的人，他喝酒而從不鬧酒，他運動却不傷神，適可而止。有一度每週和他在保齡球場碰頭，見面總要談談保健養生之道，他那種忘我忘年的知足常樂精神，確實令人欽羨之至。依他平日

的達觀和常年運動的習慣，應享高壽。他的逝世，確實來得突然，朝野人士無不寄以悲悼哀痛之情，尤其是中央社的同仁及其親友，深深感到懷念與追憶。他之所以使人們念念不忘，在於：他的爲人處世，不伎不求，不慍不怒，開闊大度，保持了他一貫的書生本色。

他治事的眼光深邃，敬業樂羣，始終站在一個新聞工作者的立場而奮鬥，因之他成爲中國新聞界的一個老兵，老兵雖然凋謝，但其奮鬥的精神却永垂不朽。

他的廣交與愛才，常爲人所樂道，朋友遍朝野，當年在中央社所羅致的才俊工作者更遍及海內外。他爲中央社開拓了局面，中央社也爲國家盡了最大的宣傳責任。

一個人只要在他有生之日，盡了他一份應盡的責任，可以說就是精神的永恆。

同茲先生生前的名言是：「活得舒服，死得痛快」。他既獲得親朋的追念，也獲得了精神上的永恆，可以無憾矣。唯一遺憾的是他未能親身及見收京復土。這是他所有的同志、朋友、部屬的歷史責任。希望有一天當我們規復金陵，重見中央社大廈在南京豎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以告慰蕭先生于九泉。

# 以德服人的蕭三爺

陳惠夫

二十七年秋天，我從重慶去成都，繼續我的大學學業。在這段時間裏，我認識了中央通訊社成都分社主任馮志翔和編輯組長宋崇實兩位先生，課餘常去春熙路中央社聊天。在成都，可以說除了學校以外，中央社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在中央社時，常常聽他們提到蕭社長的種種，言談的口氣，並不像一般僚屬關係，而是一個子弟對家長，或學生對老師的神態，包括崇拜、敬畏、和真誠的愛。大家好像有一種默契，一切的作為決不能讓蕭社長失望，也不能為蕭社長增添任何麻煩。當時我很以為異，暗想這位蕭社長不知究竟是怎樣一位人物，能把他的精神真正貫徹到分社的每一位工作人員，激發起他們的自動作風，由衷的接受他的領導，很想有見到他的機會。二十九年夏，完成了金陵大學的學業階段，我又回到重慶，和中央社各位朋友仍保持相當聯繫，尤其是宋崇實，以後變成了對我幫助最大的一位事業上朋友，可惜大陸變色前，他因為家庭關係沒有能夠離開上海，從此就杳無音訊了。

回到重慶之後，我被派去貴州工作，一去近四年，直到抗戰勝利才辭職回南京，又被派去東北長春。東北局勢變化，我回南京一直到

離開京滬去廣州，又從廣州、香港來台灣，這些年裏我仍沒有拜識蕭先生的機會。也記不清年月日了，在某一次宴會中，我看到一位丰采瀟灑，態度安詳，謙而不矯，和而可親，說話不多，常掛笑容的陌生人，經主人介紹，才知道就是我仰慕已久的蕭先生，大家都稱他為蕭三爺，於是我也跟着叫他為三爺。那天，看他喝酒的神態，從容不迫，來者不拒，不強人所難，人敬他，說好多少就多少，旁人偷巧，他也一笑置之，決不斤斤較量。

從這裏，可以看出他的氣概與風度。我因為不會喝酒，他並不勉強我，儘管我以茶回他的敬酒，他只說沒有關係，可是他還是乾了他的一杯，使我有愧不能飲，不能和他同乾之憾。承他不棄叫我小老弟。我也以能以三爺為兄為榮，從此便常有晤面機會了。我有時也和他談到我在成都時常在中央社，和馮、宋兩兄以及分社同仁對他的一切，他總是笑說：『這沒有什麼，中央社，是全體工作同仁共同的事業，我不過替他們大家解決我所能解決的問題而已。至於工作應如何做，他們都知道自己的職務與責任，用不著我擔心，他們一定做得很好的。』這當然是他的謙虛話，不過值得探討的，是他領導的態度和方法，簡言之，包括了「誠」「信」與「公」，以及他本身的確能以德服人，才能起潛移默化作用，形成上下一德一心。

日常生活中，大家都曉得他做一樁事都能持之以恆，自榮星保齡球館開幕那一天起，他身為董事長，幾乎沒有一天缺席不打球的。看他鶴髮童顏，穿了運動裝打球的丰采，簡直是神仙中人。也有人告訴

我：有一次看到三爺和人打麻將的故事，說他有一次被人拖去玩牌，同席有一位太太手風不好，輸了很多。當三爺坐在她上家時，三爺有一付牌，已聽和了，上家正好打了一張三爺可和的牌，不料他下家這位太太很高興的把牌攤下和了，而且不小。三爺一見，趕快把自己的牌一推，臉上不動聲色，若無其事的付籌碼。事後，牌局結束，他才向這位朋友說：『看她和得那麼高興，又何必掃她的興呢！』這種風度，誠屬可敬。

當他公子孟能的文星書店發生事故時，我曾問三爺有沒有我可効勞之處。他朝我看了很久，只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謝謝……』從他的眼神裏，可以看出他未說的一切。他是一位替人家打算多，爲自己打算少的長者。

他曾告訴我，他的心臟有問題。我說：『既然如此，你就不能多喝酒，何以還是這樣豪飲呢？』他苦笑着說：『人總歸是要死的，趁活著的時候，多做些自己高興的事；喝酒是我的一樂，所以我還是繼續喝。你要記著，活要活得健康，活得高興，死要死得痛快。』果然，可敬的三爺已做到了他死得痛快的想法。安息吧，三爺！在不少人們的心裏將永遠留存著你的丰采，你的貢獻，和你的爲人。



# 蕭先生的風範

陳嘉驥

中央通訊社因前社長蕭同茲先生的擘劃經營而發展、而茁壯、而名聞國內外；蕭同茲先生也因為中央通訊社的繼續發展，而永遠名垂不朽。蕭先生雖然已於去歲逝世，他的精神、風範依然深深刻印在大多數新聞界腦海裏。

抗戰時期，中央社記者活躍於每一個戰區的前線，一篇通訊稿，可以在許多報紙上同時刊載，其所發生的宣傳效果的宏大，頗有筆掃千軍之氣概。因此，日本飛機曾以中央社電台為其轟炸目標，但中央社同仁在蕭先生領導下，不論在轟炸後的廢墟上，或者是防空洞內，都能繼續工作不輟，抗戰八年期間，電訊並未有一日中斷。

筆者雖已年逾五旬，然在中央社係一後輩，近三十年來僅得與蕭先生作兩次長談。第一次在民國卅七年三月十六日，筆者自瀋陽至南京，請求調在總社採訪部擔任外勤記者工作時，蒙蕭先生在其辦公室內召見。他對當時的東北局勢垂詢頗詳，最後他告以：『一個好記者不但會採訪，也必須是一個好編輯，作了編輯更能充實自己。目前總社採訪部因房間狹小擠得滿滿的，已無法再容納新人，你是否願到編

輯部工作？』筆者當年才廿幾歲，一點不知輕重的回答說：『我還是願意到採訪部。』蕭先生一點也不生氣，仍然很和藹的說：『我和總編輯商量商量再說。』其後筆者仍然進入編輯部工作。第二次是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九日，中央社瀋陽分社同仁餐聚於律鴻起先生宅，蕭先生聞訊，抱著兩瓶拿破崙酒趕至，很高興的與大家高談暢論。

蕭先生對筆者在各雜誌上，連續不斷的撰寫東北問題頗表嘉慰。他說：『這是作歷史工作，寫東北問題的人很少，並且時有錯誤；如你認為別人錯誤的應該予以糾正，你自己寫錯時，也應接受他人的指正。』

最為新聞界津津樂道的是蕭先生與中央社前故總編輯陳博生先生的友誼，不讓春秋時的管鮑之交。蕭先生自己很少參加中央社以外的活動，但却全力贊助陳博生先生參加各種政治活動。例如，支持陳先生出任重慶中央日報社長，幫助陳先生競選立法委員等，其風範確非一般人所能及。真是，無蕭先生不足以顯陳先生之才，無陳先生則難顯蕭先生之量。

當陳先生辭去中央社總編輯，蕭先生治席餞別時，舉杯猶殷殷致詞說：『中央社將虛位以待歸來！』人生本如過眼烟雲，陳先生固早已不在人世，而中央社這位老社長亦已羽化成仙！

**趙廷俊一**

**汪汪洞庭，澄之不清，淆之不濁；**

巍巍衡岳，犯而不校，撼而不搖。

# 天泉西湧，空留回憶

陸乾原

「上善若水，利萬物而不爭」——老子。

飛飛機，翻跟斗，骨折身殘，我沒有流淚。

做生意，栽跟斗，兩袖清風，沒有流淚。

心疾纏身，步履艱難，也沒有流淚。

十一月十二日清晨，站在蕭伯伯的畫像前，鼻樑間一陣刺痛，腳下一軟，眼淚奪眶而出……………

臨走時，不知道該說什麼，也不知道該安慰誰，自己內心的那一份傷感佔領了整個腦海，順口向孟能兄說一句：『我能做點什麼？』一代仁者已離我們而去，誰又能做點什麼!?

從認得蕭伯伯起，算來也快有三十年。其間，從當兵退役、經商、賦閑，也曾會見過不少位長者前輩，可是沒有一位具備他老人家那一份慈祥和藹、灑脫飄逸的神韻，和無以名之的「穩」勁。我總覺得他像山水畫中的隱士，衣帶飄飄，無身患，無寵辱之驚。在他溫暖

關切的注視裏或輕輕的交談中，使每一個見到他的人或和他交談過的人，感到對所談的事，他老人家和談話人自己產生無比的希望和信心，似乎世上沒有困難是不能解決的，沒有任何人的前途是暗淡的。

我雖然沒有向蕭伯伯要求過什麼，在我心中確信，如果有一天請他伸出援手是不會被拒絕的，他是我精神上的「透支戶」。

非常不幸，我沒有機會在他的屬下工作，接受他老人家的薰陶教導，學習治事之道。相反的，在蕭伯伯待人接物方面的接近倒是「得天獨厚」。在蕭家，只要沒有他老人家的同輩朋友在場，我一定是安排在他右手的第一個位子，一面喝着酒，一面聽我天南地北的胡吹。我是個讀書不成，學劍又不成的材料，生平失意多於得意，眼高手低，知道不多，騷牢不少的人兒。我也深知在他老人家心目中，我所聊的一些是主觀的、淺薄的、片面的，話匣子一開，無休無止。同桌已在吃水菓，我們——我敢寫我們，我知道蕭伯伯是不會介意的——還沒有添飯。雖然如此嚕噠，從未被打斷過話頭，每次聊完之後，心裏感到無限的滿足和安慰。

慢慢的，我從他的眼神態度中可以了解他所未表示出來的意見：若是「尚無不合」，他老人家就會眯着眼睛品酒；若是「似是而非」，就把着酒杯望着我，似乎在說「真的嗎？不過份嗎？」即使「荒腔走板」也一定等我說完之後再說：『Lu Lu，這臘肉味道不錯，吃一點。』他是惟一叫我綽號的長輩，正因如此更增進了親切的情

份。

十年前一個晚上，我們發現拿出來喝的是假酒，換一瓶還是假的。蕭伯伯非但不生氣，反而說：『Lu Lu，我們來研究研究這真瓶假酒是如何的被偷天換日的。』一個尷尬場面，變成了有趣的研討會。

三年前，我生意失敗，氣急生病，躺在宏恩醫院。那天病很重，親友已聚集在外間起居室裏，醫生也對內子說「盡盡人事啦！」自己也認為大概是真的「無可救藥了！」那時孟能兄陪着蕭伯伯來看我，他步履輕健，鶴髮童顏，現身說法對我道：『你看你的蕭伯伯也害過心臟病，現在還不是每天打保齡球，晚上還要喝兩杯。生這種病主要是心裏要放寬，身外得失不要看得太重。』在心寬忘我的心境裏，我又看到了陽光。後來，他老人家却被心臟病帶離了人間。

蕭伯伯待人之誠是眾人皆知的事，連對我這樣一個無足輕重的小輩和他談天說地都是全神貫注，溶化在對方的情感裏，使之感到暖溫共鳴。

這是多麼大的犧牲！

這是多麼重的禮物！

這種微妙的人生感受已成絕響！

天泉西湧，空留回憶。

# 拜墓書懷以誌永念

曾虛白

本月二十日晨，我站在同茲兄墓前送葬親友的行列中，對他的靈骨行拜墓禮時，念此生平好友從此永別，真是感慨萬千，願把當時感想到最顯著的兩事寫下來以誌永念。

我跟同茲兄訂交遠在四十多年前。那時候，日軍展開第一次一二八侵滬戰爭，我正約集一班年輕朋友鼓着愛國熱誠創辦大晚報，過我廢寢忘食的緊張生活。同茲兄以中央社社長的身份，經常到上海來，表面上是渡他優閒的週末，實際却在聯絡新聞界，以不露痕跡的酬酢，給政府做公共關係。我就在這樣場合中認識了大家親熱地呼喚的蕭三爺。

當時同茲兄做一樁份外工作，並不受任何方面的授意，祇出於他協助市長吳鐵城在上海展開抗戰前線任務的一片熱誠。上海在那時，是日本軍閥侵略的前線，砲火的刺激使這輿論重鎮成了儲藏抗戰熱情隨時可以爆炸的火藥庫。

自從二十一年第一次滬戰結束到二十六年全面抗戰開始這六個年頭中，日寇猖獗，赤禍滋蔓，政府堅守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正確原則，

與日本軍閥委屈周旋，未能得愛國人士的瞭解與同情，因此憤激輿情隨國勢砧危而日見昂揚。上海為全國輿論中心，就成了醞釀不滿政府對日妥協情緒的溫床。吳鐵城做上海市長，疏導這種隨時可能爆炸的輿情是他的責任。同茲兄是吳鐵老的知己好友，又加上他是一個宣傳機構的首長，協助鐵老溝通上海新聞界對政府的不諒，自然變成了他責無旁貸的工作了。

我今日回頭檢討深感慚愧，當時上海對政府不諒的報紙，我主持的大晚報不獨是一份，並且是相當突出的一份。我在大晚報的表現，陳布雷先生當我參加政府工作後向董顯光先生表示最可以作一個證明。顯光兄告訴我說，布雷先生第一次與我交談後向他表示說：『我再也想不到曾虛白這樣溫文的一個書生，他的儀表跟他在大晚報上所表現的完全不相稱。』顯光兄還說笑話似的說：『人家當你是紅鬍子呢！』

我那時的態度實際是上海新聞界共同的態度，祇是表露的方式顯著與否的差別而已。這就說明了同茲兄那時候自告奮勇擔負起來的這份工作實施求效的困難。





民國三十九年九月二十日，蕭先生將社長職務移交給曾虛白先生。中為羅家倫

同茲兄的機智與經驗是發展公共關係工作不可多得的能手，在這個階段中他協助鐵老跟上海新聞界打得水乳交融，超出了我想像範圍之外，姑且略過不談。我祇談影響我個人態度的轉變。

使我對政府所持先安內後攘外政策心悅誠服有透澈瞭解的轉變，跟黃膺白先生在鐵老官邸三個多小時的長談，是一個重要關鍵。在這次談話中，膺白先生表示自己應領袖之邀到華北去是跳火坑之後，復縷述政府處此內憂外患交困的夾縫中，仍在積極作最後決戰之準備。我當時深受感動，向他保證，真有一天政府發動抗日戰爭，我決心放棄手創的新聞事業，學着他跳火坑的榜樣，參加政府抗日工作。我跟膺白先生這一席談，轉變了我對國事研判的標準，同時也決定了我一生事業的方向。我當然先應該感謝膺白先生的至誠感動了我，可是，今日追思，在幕後促成膺白先生跟我這次談話的是同茲兄。因為，約我到市長官邸去跟膺白先生會面的雖是鐵老，可是在鐵老來電話之前，同茲兄已有好幾次有意無意之間在我面前表揚膺白先生超然物外立身處世的清高態度，顯然是給我這次談話先作心理準備。從這些蛛絲馬跡中，我發現同茲兄是影響我作這重大轉變的關鍵人。

這是我追思往事，應該寫下來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值得永念的事，是三十九年我從同茲兄手裏接管播遷來台的中央通訊社，那時候的中央通訊社由國內二百多單位縮成五個單位，國外三十幾個單位縮成不足十個單位，人員從二千多人裁剩了一百六十幾位。經費方面，外匯已經三年沒有領到，台幣收入不足十萬元，即使以之全部撥充員工生活費，也祇能每人分到五六百元，求溫飽尚不可得。暫作總社辦公的台北分社，因接收日本同盟社舊址已為盟軍炸毀，不得不借用西寧南路日商木材統整會社的木屋為臨時辦公

地點。同事們隨政府撤退來台，百餘位繫婦攜雛又帶有大批箱籠器材，無處安頓，不得不在辦公處內擠着渡日。

記得那一天在西寧南路這一座一遇颱風就像會倒坍的木屋裏辦理移交手續結束之後，同茲兄拉我到另一間小屋裏，說他要跟我辦一次特別移交。說著時，他面交給我黃金六百餘兩，說這是他面對這危機四伏的局勢給中央社保留著的應變準備金，鄭重叮嚀，非到萬分緊急關頭，千萬不能動用。同時他又告訴我，他還安排下另一應變措施，把歷年積存下來的外匯美金二十餘萬元，在廣州時召中央社紐約分社主任湯德臣兄返國，當面授權劃歸德臣兄戶下由其簽字支付，俾台灣發生問題後，中央社在德臣兄領導下仍能繼續活動。

我聽了同茲兄密告這一節安排，欽佩他處危若定設想周密之餘，更對他這樣忠貞黨國偉大人格的表現倍增崇敬。

記得那時候故副總統辭修陳公會把台間比做在驚濤駭浪裏打滾的救生船。同茲兄不獨奮勇跳上這條救生船，並且還做了覆舟後中央通訊社繼續奮鬥的準備。其用心之苦，動人肺腑！

這是我追思往事，應該寫下來的第二件事。

別矣，同茲！但我心頭將永遠保持這些懷念！

# 廣州之行

湯德臣

三十八年春天，總社已遷廣州，五月上旬，我忽接蕭先生電報，囑我回廣州一行，當即辦理手續，搭上飛機，直奔香港，下榻香港分社主任翁平兄寓。適台北分社主任葉明勳兄同時抵港，翌日我們三人同機赴穗，與蕭先生重晤時，已濶別快六年了，而這六年變化之大，真是做夢也未想到。

蕭先生領我上他東山寓所二樓書房，我即報告紐約業務及財務（那時總社在紐約大通銀行的戶頭是蕭先生授權我開的）。談了一陣，他很沉重的說，我們要繼續奮鬥下去，如果大陸站不住，我們要在海外幹，必要時可考慮入外國籍以便長期居留，為社工作、除此之外，別無他話。

次日蕭先生在他家裏召集一小組會議，商量針對當前形勢，改組中央社海外單位及人事調整。記得當日出席者，有陳故總編輯博生、英文部主任馮國楨兄（亦已故）、會計室主任丁則怡兄，與我五人。蕭先生及博老當場決定那些單位該保留、撤消或歸併，那些海外工作人員應留職、去職或內調，馮國楨兄偶爾參加意見，我因避嫌，未致

一詞。一切決定後，馮國楨兄以社長名義發電至各有關海外方單位，并油印了一封英文業務通訊，說明經過。

廣州是我的老家，離開已十七年，本擬多作留連，但蕭先生催我速回紐約坐鎮，故在廣州只住了五天，與親友匆匆見面，總社亦只去過一次，見到許多同事，都是新面孔。在羊城幾天中，值得回味的，是蕭先生請飲廣東「茶」，但喝白蘭地（這是我這老廣前所未聞的），博老請吃海鮮，及蕭太太請遊荔枝灣，現在他們都已作古了。

離穗回港，蕭先生與蕭太太亦同行。在港候機數日，每晨必與翁平兄到蕭先生府上致意。一日出門，忘了帶手帕，香港五月間，已悶熱異常，到蕭宅時，我就不客氣向蕭先生「借」一手帕。但劉備借荊州，一借無還，他「借」給我的精緻手帕，我現仍珍存。

在港臨行前，我向蕭先生告別。他只說聲一切珍重，其餘心照不宣。這是他一貫的作風，這也是我與他老人家最後的一面。

民國六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於紐約

張佛千一

縱橫少日，創無冕久大之業，是曰留芳，是曰不朽；

逍遙晚景，免病榻纏綿之苦，斯為懸解，斯為歸真。

# 爲三爺寫傳，我能嗎？

馮志翔

前些時，接到記者公會理事長周天翔先生一封掛號信說道：『本會本屆新聞叢書編撰委員會議決，特聘台端就「蕭同茲先生傳」一題惠撰約十萬字叢書一本，請於七月底以前將大稿賜下，以便付梓。』

接到這信，心情好沉重，個人直嘀咕：『爲三爺寫傳，我能嗎？』

以蕭先生對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貢獻，其影響不止在當時，也不止於現在，且將留之永久，一本蕭同茲先生傳不可不寫；個人追隨蕭先生四十餘年，感戴知遇，不能不寫；我是新聞界一小兵，公會給我這分榮譽的差遣，更不敢不寫。

爲同茲先生寫傳，這次我看「在茲集」的稿件時，好幾位先生都提出建議，特別是遠在美京華盛頓的續伯雄老弟說得最具體。其實，我們一羣朋友早在二十年前就聳恿蕭先生寫回憶錄。他總謙辭的說他只是一個極其平凡的人，不好寫回憶錄。後來又變更方式，誘勸蕭先生講故事，我們用錄音機給錄下來，指定幾個人輪流筆記，記下來請他老先生過目，然後定稿，保存一份歷史性的資料，並不一定要發

表。連這個也遭蕭先生婉拒了。我參加「念茲集」與「在茲集」的編輯工作，拜讀這許多篇具有紀念性的文章，很少提到蕭先生自己說他過去的事情，這是蕭先生性格方面的特點，好似過去的就讓他過去，還提他則甚！



本文作者（右）追隨蕭先生四十二年

無執着、無罣礙、無私、無我、為大眾、為朋友、坦坦蕩蕩、無怨無尤、亦俠亦儒、又似黃老、又似禪定。他這種人格的構成，大概只能從他早期決心獻身於勞工運動的動機裏去找思想根源。獻身於大



眾，隨時準備將自己的生命給賠進去，這就或多或少具有宗教意識，雖然三爺畢生只信仰科學，未曾信奉任何宗教，但在情操上却潛存宗教意識。大家都說和三爺接近，如對清風霽月，這就說個正着。清風何曾爲自己安排？霽月又何曾爲自己打算過？春夢了無痕，凡事着痕迹，在三爺看來都覺得太俗氣，他那裏還會縈懷已成雲烟的往事！

但這却苦了奉命要爲他寫傳記的小子。我曾請教張佛千兄，他說立傳最好用編年體。話是說得不錯，但三爺並未留下年譜，也未留下日記，就是往來的書翰也沒有保存幾封。更如前述，三爺就很少和人談他過去的事情，逐年編述，苦無具體資料爲佐證。另一位朋友却勸我知難而退，趁早打退堂鼓，這也是朋友好意。我立刻警告自己；千萬使不得。自己丟人現眼事小，怎能讓記者公會的議決案決而不行？

我確乎是念茲在茲，只等「在茲集」出版，捧着前後兩集，整理個大體輪廓，然後恢復我的採訪工作，就兩集中的作者分別採訪，以事爲綱，理出頭緒，再就教於方家請示端倪，始行執筆。我想用這笨拙的辦法從事工作，希望三爺生前知好隨時鞭策，讓我能竭盡棉力，爲三爺畢生行誼留下一份忠實的紀錄。

# 蕭伯伯，謝謝！

黃仰山

民國四十年仲夏的一個黃昏，我們在淡江英專的籃球場打完球，蕭伊文邀我到他家裏吃晚飯。我們從博愛路騎腳踏車到安東街蕭寓，滿身大汗。伊文帶我到客廳見他的父親蕭同茲先生，孟能兄也在座。蕭伊文說：『他就是黃海。』同茲先生打量我一下。微微一笑：『我常看你在中央日報寫的球評，我以為你已經在四十歲以上的年紀了。』我有點飄飄然，感受到一股強烈的鼓舞，深深一鞠躬，說聲：『蕭伯伯，謝謝！』

當時，我還在台灣大學地質系當助教，因為喜歡打籃球，常和台大及淡江英專的同學在一起。那時我已開始為香港時報撰寫「自由中國通訊」，並為中央日報寫些不成熟的球評。每次我到蕭家，蕭伯伯却很少和我談新聞圈的事，總是興趣盎然的和我討論地質系的問題，諸如地震的各種原因，海嘯如何發生等等。有一次他問我，台灣地下蘊藏的石油為什麼會流失？我對這個問題無法作答。他顯然感覺到我非常尷尬。他說是從一本學術雜誌看到的一篇文章，論點是根據台灣地質結構的調查資料，台灣應該蘊藏著豐富的石油，但一直未見大量探鑽出來，可能是流失了。他莞然一笑，表示他是外行人，對內行人

提出外行的問題，所以把內行全弄糊塗了。其實，我心裏明白，他提出的問題相當深入，只是我對石油地質的學識還是非常淺薄。我將蕭伯伯所提出而我不能解答的問題，請教當時台大地質學系主任馬廷英博士。馬博士說：『蕭同茲先生的確是一位現代報人，無休止的認真追求大眾所關切的事理。』

一年後，我決定改行，告別地質界，投身新聞行列，擔任香港時報駐台記者。一個星期天的中午，當時香港時報駐台特派員馮志翔先生帶我到蕭家午餐。蕭伯母、張明先生、葉明勳先生、蕭大哥和毛弟（蕭伊文）在座。蕭伯伯給我倒了一杯「威士忌」，這是在蕭家第一次喝酒，靜聽這幾位新聞界老將談天說地，酒醉飯飽，大家告辭了，蕭伯伯却留我多坐一會。他的態度顯得很嚴肅，語調還是很平和。他說：『腳踏兩隻船總不是辦法，你既已下決心作為一個職業新聞記者，就好好的幹，保持你多年來從事自然科學求真求實的素養，這也是新聞記者採訪和報導的基本守則。自然科學家是鑽牛角尖的，精而深；新聞記者却需要廣而博。你原來是發掘大自然地下寶藏的，今後，你採訪的對象是宇宙萬物了。』

他要我保持讀書的習慣，注意健康，告訴我如何向採訪對象提出問題，多聽、多看、多想、多寫。他說：『新聞記者要靜如處子，動若脫兔。』

這一天，他沒有午睡，給我上了「如何作為一個職業新聞記者」

的第一課。

他知道我被派採訪軍事新聞，交給我一本孫子兵法。我告辭時，他說：『凡是星期天，你有空的話，來這裏喝杯酒，讓我們聊聊。』我深深一鞠躬，說聲：『蕭伯伯，謝謝！』

二十多年了，我在新聞圈中打滾，酸、甜、苦、辣，百味俱嚐，每當遇到困擾的問題，總先去請教這位新聞界的先輩。二十多年了，我說過不知多少次：『蕭伯伯，謝謝！』而今蕭伯伯雖已作古，但在我心中仍然常常默唸着：『蕭伯伯，謝謝！』

# 照人顏色我難忘

黃杰

激明獨運，風氣先開，筆陣薄千軍，匡世心期天亦許。

雅敘猶溫，深杯長契，薤歌出隣巷，照人顏色我難忘。

這是我哀悼蕭三爺的輓聯。自三爺謝世的噩耗傳來之後，我對這位畢生爲宣揚文化而努力的革命鬥士，有無盡的哀痛與追慕。回憶我們論交四十年來的形跡，我對他的感念，又豈只在此區區文字之間？

記得民國廿二年長城抗日戰役之後，我率領第二師進駐北平。某日，幾位戰士在西直門乘電車跟售票員發生爭執毆打情事，我聞訊後即派員前往處理，除向對方道歉以外，並將傷者送院治療。當時北平各報對此事均有報導，且在社論中有所論列，指出過去北洋軍閥毆辱人民乃家常便飯，今日軍隊居然有認錯的勇氣，足證國民革命軍是有紀律的節制之師，而革命軍青年將校的開明作風，更使人一新耳目云云。恰巧此時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先生由南京來到北平，新聞界朋友舉行歡宴，邀我作陪，同席者有北平晨報社長陳博生先生，英文時事日報社長張明先生，華北日報社長胡天冊先生，中央社分社主任潘仲魯先生以及憲兵團長蔣孝先等人，由於我也在座，席間自然提起

電車上的問題。三爺對各報言論十分稱道，認為是正義之聲。因此我對這位遠來的蕭社長，油然而敬。談笑間，三爺對我也有揄飾之詞，把敬酒的目標轉移到我，於是觥籌交錯，逸興遄飛，我和三爺一見如故，遂訂深交。流光易逝，屈指已四十年了。

以後，我率部南調，得有更多的機會和三爺過從，更不時受到他的鼓勵和關照。而中央社也在他卓越的領導之下，不斷發展，放出異采。

民國卅三年滇西遠征軍反攻緬甸，當我統率的第十一集團軍強渡怒江成功，日寇也另闢戰場，由廣西進犯貴州。滇西前線的戰況，乃為全國上下所矚目。十一月三日晨，我軍克復龍陵，這捷報立刻由中央社廣播中外，人心為之大振。記得在我軍攻克龍陵之後，舉行升旗典禮時，中央社戰地特派員黃印文站在我的身邊，他立刻把親歷的情形打電話給駐在保山遠征軍長官部的彭河清，彭又馬上用長途電話報告重慶總社，可見中央社記者負責盡職的敬業精神。他們總是冒險犯難的去找消息，而不是等消息。我時常讚美三爺的幹部好，是由於他們的上司領導有方，三爺只是莞爾一笑。



國華廣告公司開幕，蕭先生是董事長，接待台灣省主席黃杰

三十八年夏秋之際，長沙變起，我正任國防部次長，中央為挽救湖南危局，發表我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一兵團司令官，真所謂奉命於危難之間。八月八日匆匆由廣州飛往衡陽，三爺親至白雲機場送

行，一再叮嚀，一再慰勉。所幸舊部三個軍聽從號召，不為匪逆所誘迫，相率來歸。此後第一兵團奉令南移，中央社的彭河清仍留桂林採發戰訊，直至城陷，這位戰地記者陷身匪區，在柳州賣柴度日，苦熬三月，才脫險逃抵香港。中央社記者經得起考驗，自然也是由於三爺平日的薰陶。

四十二年夏，我率留越國軍回台。有幸與三爺比隣而居，可以朝夕相見。

在台灣這二十年，他對我的關懷與愛護，可說無微不至。無論在陸軍總司令任內，警備總司令任內，或是台灣省政府主席任內，只要他發現有任何問題，絕不保留的加以批評和指點，而他那種對朋友相規為善的風誼，真使我舉生難忘。

由於他愛部屬、愛朋友所流露出來的熱誠，推而至於愛國家、愛領袖所表現的節操，已到了「忘我」的境界。難怪卜少夫先生撰文紀念三爺，說要拜他為師，學習他的風範。卜先生說三爺有：『恢恢有容的氣度，從容不迫的態度，平易近人的風度。』這三句話只有三爺當之無愧。

此外，我更感到三爺有一種服人的力量，你有任何委屈和積悶；只要盡情地向他傾訴，便會領受到無限的慰藉。在我來說，真有「三日不見，鄙吝復生」之感。



三爺謝世後， 總統明令予以褒揚。我在日記中恭錄全文：『國策顧問蕭同茲， 性行果毅， 器識宏深。早歲參加革命工作， 歷試多能。主持中央通訊社逾卅年， 規劃日新。於民智之啓發， 國策之宣揚， 竭慮殫精， 功隨年積。抗戰期間， 揭發敵偽暴行， 加強國際宣傳， 領導有方， 勛勞尤著。膺聘國策顧問以來， 廿年中不忘獻替。遽聞溘逝， 悼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 以示政府篤念忠藎之至意。』

這是何等的哀榮！三爺有知， 應可含笑九泉。

編者按：民國卅三年五月滇西遠征軍開始反攻緬甸時， 中央社僅戰地特派員彭河清一人駐保山馬王屯遠征軍長官部採發戰訊。其後節節勝利， 乃加派戰地特派員黃印文駐第十一集團軍總部， 馳赴怒江西岸工作。十一月三日克復龍陵之役， 黃印文隨黃總司令入城參加中美兩國國旗升旗禮， 並即在前線打電話給彭河清報捷。彭又遠自保山叫加急長途電話到重慶中央社總社， 由編輯周培敬接聽， 撰寫新聞， 立即廣播， 並繕發號外， 張貼通衢， 人心大爲振奮。滇西戰場上中美併肩作戰， 美國記者頗不乏人， 但無新聞電訊。路透社並未派記者在前方， 乃根據中央社消息改寫電訊， 自重慶發回英國。紐約美聯社總社等收到倫敦路透社廣播收復龍陵電訊後， 急電重慶分社查詢。雖經魏德邁總部證實此一捷訊， 可是距中央社報導已落後大半天。

# 事理洞明，人情鍊達

黃雪邨

在我們同輩的朋友中來說，我和三爺論交，應該是最晚的一個。記得陳博生先生逝世時，我輓他的輓聯曾有：「同輩論交唯我晚」一語，我與他們兩位相識是同一個時候，因而這一句話對三爺來說，也是很切合的。

我是在抗戰勝利後，民國三十六年在南京才認識三爺，也是我和中央社的許多朋友接觸的開始，如陳博生、曹蔭穉、梁乃賢、唐際清諸位都是在那同一時間認識的。我在南京的時間不長，所以見面的機會也不太多，只是偶然在中央社附近的一家叫「都城」的咖啡店聊聊天，夫子廟一家叫「大集成」的餐館喝喝酒。

## 肺肝激烈意態蕭疏

三爺第一次給我印象最深的應該是在政府播遷到廣州。有一天他特別約我到他在東山的住宅去吃中飯，沒有任何的客人，就是我和他兩個，一邊喝酒一邊聊天，談話的主題當然是有關時局的。他確有透關的見解。他雖然憂國心長，却從無慷慨激昂的情緒表現，總是保持

他那種清談娓娓的態度。好像佛家所謂悲天憫人的菩薩心腸，而意念却是非常積極的，所以在他逝世以後我的輓聯曾有「肺肝激烈，意態蕭疏」之語，也正是描述我對他第一次最深的印象。那一頓飯大概吃了兩個多鐘頭。

民國四十年，我遷居到台灣以後，我們之間的交往就比較密切得多了。那時常常聚會在一起的朋友，除了三爺夫婦之外，還有陳博生、許孝炎、孫芹池、葉明勳諸兄夫婦和潘公弼、張明 兩兄。後來徐鎮埏兄來到台灣，也參加了這次聚會。那時大家都是以排行相稱，博生、鎮埏兩兄行大，孝炎兄行五，芹池、公弼、明 三兄和我都是行二。只有明勳兄，大家都叫他葉舍，那是南京人的稱呼，大概是「相公」或「少爺」的意思。紅樓夢上面稱賈璉為賈二舍，就是一個例子。我們這些人中，除明勳夫人不會喝酒之外，其餘都是飲者，大家都喜歡鬧酒，每次必罄四五瓶酒，非到都醺醺然不止。三爺那時不過五十多歲，當然是飲中健者，不過他雖然醉了，總能維持不亂不鬧的神情，我想這應該是與平日修養有關。

這個聚會，直到博生兄生病之後，才逐漸停止。當然，我們這些朋友和三爺仍不斷有來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每逢星期日，三爺照例邀我們到他家裏去吃午飯，那時經常參加的，除了公弼、明 、明勳三兄之外。還有鄧伯粹、周君亮、王季平、劉光炎、王益滔諸位先生。據我的記憶所及，這個聚會是在三嫂過世之後便停止的。



令人回憶的又一次聚會（從左至右）：前排鄧伯粹、徐鎮埏、蕭三爺、潘公弼；後排蕭孟能、蕭孟能夫人、馮志翔、許孝炎、黃雪邨、葉明勳、曹蔭樞、張明煒

## 身體矯健興趣盎然

十年以前，辜偉甫兄開創了榮星保齡球館，三爺和我即開始學習

打保齡球。當時也還有些朋友同樣有此興趣，但過了些時，他們只是偶然來玩玩，只有三爺和我始終沒有間斷，在興趣最高的時候，白天打過之後，晚上又相約再去打幾局。因之我們除了不在台北，或者有事之外，幾乎可以說無日不見面，直到他逝世前三天，我們還同在一起打球。他告訴我感冒還沒完全好，胸前感覺得有點疼痛。想不到隔了兩天，他便因此不甚經意的病離開了這個世界。他雖然已經是八十高齡，但從他的神情體力來看，對於他的突然去世，我們朝夕見面的朋友們仍不能不感到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他逝世之後，我仍常去榮星球館打球，每次打球的時候，總好像還是和他在一起。黃少谷先生在治喪會開會的那一天說「三爺將永遠活在我們朋友的心中」，我相信，許多與三爺常見面的朋友都確實會同樣有此感覺。

保齡球對三爺晚年身體的健康，我相信是非常有幫助的。他曾和我說，每次在先一天喝多了酒，第二天起床後總會感到身體疲倦，但是打了兩局保齡球以後，疲倦的感覺便消除了。還有一次，我和他去台南，在天仁保齡球館打球，因為不是穿自己的球鞋，同時場地也不適應，他一不小心，竟仰天跌了一跤，那時他已經七十多歲的人，我當時驚駭萬狀，以為他至少會傷筋斷骨，趕去扶了他起來，誰知他竟然毫沒有一點傷痛，還繼續打了幾局球。這就是因為平日多運動的關係，才能保持那麼矯健的身體，却料不到輕微的感冒竟會使他撒手人間。

以上所述都是我和三爺交往的瑣憶，在這篇文章中，我也不打算

鋪敘三爺的事功和德行，因為那是每一個認識他的朋友都知道和瞭解的，也無庸我來多說。我想在此要說的是他平日常說的幾句話，和我記憶所及，他和我閒談時所表示的一些意見。這些話雖然看來是極尋常的，但是在這些話的含義中，如果細加體會，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觀，他的襟度，和他見理之真，見道之明。

## 豁達本性直追古人

我記得在他第一次心臟病癒不久，又開了酒戒以後，有一天我發現他似乎喝得過量一點，我在第二天見面的時候，曾表示似宜節飲的意思。他答覆我說：『朋友們對我的愛護之意，我當然非常感謝；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因喝酒喝死了，朋友們却千萬不要為我嘆息，因為我喜歡酒。』他這種想法，足以顯示他那種豁達的本性，正如從前劉伶嗜酒，攜壺荷鍾而行，人問荷鍾何意，他說：『死便埋我。』三爺之具有魏晉六朝人的風格，也可以從這些地方看得出來。一個人能將死生之際看得透，個人的得失榮辱當更可無縈於心了。

又有一次，他和我閒聊，那時三嫂還沒有去世。他說：『我從來聽到朋友中有某人某人怕太太的事，我總以為我是不怕太太。但是我仔細一想，每每因喝酒稍多，或回家太遲，不免引起太太的關切，雖然關切與吵鬧不同，然而這也就是怕太太的另一種情形。因此我又何嘗不是怕太太的人？』人家唯恐朋友們笑話為怕太太，而三爺他却從

另一種解釋來說明他也怕太太，這可以看出他之不同於世俗之見，也是見理比世俗深了一層。

## 勝固欣然敗亦可喜

兩三年以前我們幾個朋友也偶然和三爺打打小牌。他打牌的風度，正如錢慕尹先生對他的評語：「爐火純青」。他從不會因輸贏和手風好壞而表示絲毫高興或沮喪的神情。他說自己起了好牌沒有和成功，固然可惜；人家起了好牌沒有和成功也同樣可惜。因此，當我們打了一張牌而使人家的好牌和成，同樣是值得愉快的事。一副好牌之不能和成，正如一個才智卓越之士沒有發展的機會而鬱鬱以終，也如一位國色天香的美女老死於窮鄉僻壤之中，都同樣是被埋沒了。凡是能成人之美，總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為甚麼竟可因個人輸贏的觀念太重反而懊惱呢？他這種想法真是非常超脫的，又是較之世俗之見進一層的，所以他真能達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的境地。

## 事大如天醉亦可休

還有值得一提的，便是近幾年來三爺常常說的口頭禪：「事情不大」。這句話本來是故友胡慶育兄每當酒宴中朋友請他乾杯時說的。三爺大約很欣賞這句話的含義，他將它廣泛的運用到許多事物方面；同時也因為這句話和他的性情非常適合。他是一個接物處事從不急躁

緊張的人，在他的觀念中，沒有甚麼大不了之事。三爺的友好林季丞先生的寓所中，掛了一幅伊秉綬所寫的橫幅，上面寫着五個大字是「了不了之室」，在跋語中寫著：『世事無不可了，遇不了事，以不了了之，斯真了義。』三爺是真能體會到這個道理。古人又說：『事大如天醉亦休。』事如天大，醉亦可休，則世界上又有甚麼更大之事？

最後，我還要提到的，即是凡三爺的朋友們都知道的，他那句名言：「活要活得好，死要死得快」，這又是與世俗所謂「好死不如賴活」的想法進一層，最難得，他竟真能如他自己所說做到了。他逝世的那天晚上，我是在十一點鐘過後，才接到張明 兄從蕭公館打來的電話，等我趕去，他的靈體早已被家人用被單覆蓋起來。我站在他的牀前。想到兩天不見，便隔人天，自不勝其傷悼之情。但一想到他已經活到人世間所謂八十高齡，而且又是那麼毫無痛苦的撒手而去，實在是幾生修到的福氣，也就不能不為他感到安慰。

## 天賦卓越氣質完美

三爺生平事業，雖然對國家有很大的貢獻，他的學歷則不過是一個中學畢業生，也就是說他並無高深的學術修養。而他畢生從事新聞事業，又不如他的若干部下都能寫得一手好文章。但是他見事之明，見理之真；又豈是有顯赫學歷的，或者會寫文章的許多人所能跋及？



這大概是由於他卓越的天賦，完美的氣質和平日的修養所交織而成。  
古人說：「事理洞明皆學問，人情鍊達即文章。」三爺的學問文章就  
正是在這些地方。

# 灶披間的成就

黃肇珩

踏上人生第八十層階梯，蕭爺爺悄悄地走了。

## (一)

那天，六十二年十一月三日；那個祥和、歡洽、晶瑩的夜晚，他老人家被包圍在中央社三代同事的祝福中，再一次帶給這羣敬愛他的老友、子侄們兩小時心靈相通的歡聚，誰也沒有想到這是他最後一次的贈與。

嘉新大樓頤和園飯莊擺了四張大圓桌，擠得滿滿的。三爺來了，輕悄悄的，但像一道和煦的冬陽，很快地溫暖了整個屋子。大家擁了上來，又是鞠躬，又是拱手，向三爺拜壽，為他的八十大壽補慶。邢光祖先生衝上來說，他要跪下叩頭拜壽，蕭先生連忙阻止：『這個萬萬不可以。』蕭先生為這個「三代祝壽會」推辭了許多次，也延期了許多次。他怕打攪人，更怕讓這麼多人破費。

四桌人，只有兩位女性，張郁廉女士和我。於是我們這兩名代表

中央社「早期」和「近代」的女記者，被安排在「榮譽席」上——蕭先生兩邊。第一次，蕭爺爺教我處世之道，第一次我聽他談起他的成就，他說那只是小小的成就；也是最後一次，我面聆他老人家的教誨。



灶披間時代的蕭社長。他經常在這間改裝的小會客室中和訪客商談重要事情

(二)

我進中央社的時候，蕭先生已離開中央社，但是中央社仍瀰漫着

蕭三爺的精神。我最先感受到的，是蕭先生留下的「平凡的實踐」。接著是每一位老同事談話中的「三爺」，我默察到他們對這位老社長的崇敬、悅服和懷念；更驚奇大家對這位老家長沒有半句微詞，這是何等的不易！慢慢地，蕭爺爺在我心裏塑起了一個影象：有魄力，有遠見，胸襟廣闊，知人善任，肯關懷人又能體諒人。

當這個影象變成實像時，我已看不到蕭三爺當年的雄心、豪氣，也因此，他顯得更豁達、更雍和。每次見到他的時候，他總是斯斯文文、從從容容，一派長者風範。從沒有見他高聲談笑，但在輕聲慢語中，却表露了他對人的誠懇和關懷，也顯示了他對許多問題的獨特看法。似乎，有蕭爺爺的地方，就擁有一分定力、一片祥和與一團溫暖。

每次碰到他老人家，他總拍拍我的手，向朋友介紹我是中央社的孫輩。站在他旁邊，我似乎依偎在爺爺的慈愛裏，從心底，我把他老人家當為我的爺爺。我喜歡聽他的誇獎，因為他「不騙人，不說謊」。

### (三)

那個祝壽的夜晚，蕭爺爺似乎有點異樣，他改變了話題，他重重覆覆地對我說：『你年輕，記憶力好，我要告訴你一些我的為人處事的經驗，你好好記下來。』他的新話題，他重重覆覆強調的這些話，

在今天——我提筆追憶他的時刻，似乎還迴響在我的耳旁。

他說，一個成功的人必須具備四個條件：健康、知識、道德和智慧。

他特別強調健康的重要：『沒有好身體，縱使再多再好的理想和遠大的抱負，最終都將成爲空談。』他比喻：健康是一棵樹的根。

知識，猶如樹的葉。一棵長滿繁茂、青綠的樹，永遠是欣欣向榮的。

講到道德，蕭爺爺變得好嚴肅。他說，一個沒有道德的人，註定最後是失敗。一棵挺拔大樹的枝幹，必定是長短合度，曲直有序。

智慧，是花朵。

#### (四)

他的話，一再被一杯杯敬酒，和一簇簇祝福打斷。大家想出不同的題目，敬三爺酒；一會兒論輩份、一會兒攀鄉親、一會兒某單位，又是某地分社……只要能帶上一點兒邊的，都成了敬酒的題材。老壽星總是站起來，高興地接過每一份新題目、怪題材，飲個滿杯，或淡淡一品。

這頓飯，吃得真熱鬧，也真融洽，每個人的心，似乎都回到了三

爺時代的中央社。坐在蕭先生對面的沈宗琳先生很激動地說：『蕭先生，您不知道您帶給我們多大的愉快！』三爺說：『帶給大家愉快，就是我的成就。』

他講了一段南京灶披間的小小成就：

灶披間，是上海話，就是廚房的意思。

中央社從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遷出以後，在南京洪武路壽康里，租賃了兩幢二層樓的民房改做辦公廳。蕭先生是第一任社長，他希望在社長室以外，能有一間單獨與同仁們談話的房間，縱使很小很小。

在有限的空間裏，他發現一間被摒棄的灶披間，於是改爲接待室，在這個小小的灶披間，蕭先生說：『我有小小的成就。』

每逢同仁們做錯了事，或發生了什麼問題，蕭爺爺就請他們到灶披間來，關上門傾談。『我不發脾氣，也不在許多人面前指責一個人。』多少問題，在這灶披間解決；多少誤會，在這灶披間冰釋；多少情感，在這披間建立、交融。

那夜，蕭爺爺向他中央社的老朋友、子侄道別的夜晚，他老人家想起了南京壽康里二樓的小小灶披間，他說：『如果我這一生還有一丁點兒成就，灶披間就是我的小小成就。』

## (五)

蕭爺爺走了，他的灶披間精神永恆、不朽！



# 相見恨晚

黃覺

我認識蕭同茲老先生是在民廿一、二年，那時同老擔任中央黨部宣傳委員會祕書。中央黨部召開中央宣傳會議和全國新聞會議，我以山東省黨部宣傳科主任和山東民國日報總編輯奉派出席，這是我和同老見面之始。會中有人問我要山東的石搗碑帖，會後我買了泰山金石峪、張遷碑、和猛龍碑寄去，也寄贈了同老一份，曾收到同老的謝函，這是我和同老的第一次通信。其後山東鬧黨潮，我離開山東省黨部，聯繫也就斷了。

民四十二年我在中國廣播公司任職，因朋友的介紹，將節衣縮食的極少儲蓄，存放在同老哲嗣孟能先生的文星書店，才又和同老喬梓重新聯繫。我自中廣公司退休後，六十二年六月應邀至孟能先生擔任董事長的乙大公司任顧問，事實上是擔任同老的記室，代辦信札和應酬文字。十一月同老就去世了。我和同老的關係，可說是相識日長，追隨日短。雖說追隨不及一年，可是有三件事使我永遠懷念這位仁厚謙虛的長者。

我存放文星書店不過三數萬元，那時政府採取低利政策，文星月

息由三分減至二分四厘，最後再減至一分六厘。我至文星取息，從同老令媳朱婉堅女士口中，知道我的利息是文星利息中最高的。因為同老交代過：『老朋友呀，因為公教待遇菲薄，靠這幾個錢補貼家用。我們按月送點錢給老朋友也是應該的，又何必斤斤計較呢？』我存款不多，月收利息少，減息不減息的差額更微乎其微。但我感到心頭溫暖，我和文星不止銀錢來往的關係，還有深厚的友誼存在。後來文星將要結束，別的存戶紛紛提款，我反將節衣縮食的微款繼續存入，就是因為同老這幾句話的影響。

我到乙大公司擔任顧問，有一次同老由十一樓家中到四樓來找我，叫我寫篇應酬文字。我說：『同老！您又何必自己下樓來呢，有事電話叫我上樓好了。』同老說：『水晶大廈蓋好以後，我還是第一次到四樓來。因為您到十一樓看了我，我應該來回看的。再則您到這兒，是老朋友替我幫忙。否則一點點車馬費也請不到您來的。』此後每有交辦文件，都由孟能先生送來，從沒有叫我上去過一次。這樣謙恭下士，以禮待人，也是很少見的。

孫哲生院長逝世，孟能先生請我多做幾付輓聯，以備索取。陳養浩上將逝世，我也擬了一聯，另集句成了二聯：

(一) 笳吟細柳營，正憶往時嚴僕射（均杜甫句）。

猶悲墮淚碣（陳子昂），惱殺江南庾子山（黃庭堅）。

(二) 高風捲旆旌（杜甫），飛鳥不知陵谷變（劉長卿）。

月色偏秋露（李嶷），霧魂欲仗楚詞招（陸游）。

送請同老圈定。同老批示：「請覺兄決定」。我主張用集句第一首，同老也同意了。於此可見同老的謙虛。我生平擔任過多人的記室，遇見過主官自己做一半對聯，叫記室對起另一半的。也遇見過改詩出了韻，我祇得通篇改作去配合押韻的。像同老這樣謙虛，尊重執筆人意見的還是第一次遇見。

古人說：「相見恨晚」，我對同老真有「相見恨晚」之感。同老雖逝，我却永遠懷念這位仁厚謙虛的長者。

# 哭三爺

葉明勳

三爺，蕭同茲先生，中央社首任社長，新聞界元老，我所尊敬的長官過世了。這噩耗給我的震撼，真如同驚天霹靂，我追隨三爺三十多年，來台以後，二十餘年來，難得一天不見面。這時刻心亂如麻，不知從何下筆，只好略述一二以表哀思，實在不足以報導三爺高超志行於萬一。

## 中央社遷台

民國卅八年大陸情勢逆轉，中央社總社自南京遷廣州，那時候我正擔任台北分社主任，四月底首都淪陷，廣州局勢也跟着緊張，五月中旬，三爺電召我前往廣州，同時奉召返國的還有紐約分社主任湯德臣兄。三爺交代我的是積極準備總社遷台事宜，交代湯德臣兄的是對以後海外分社的經費，授權給德臣兄統籌撥付，他授權給我們去做，要求的只是中央社的工作一日不能中斷，他有嚴格的要求，也給予充分的信任。三爺所受的是工科教育，沒有留過學，抗戰勝利後，國內外分社幾十個，員工二千餘人，在那艱苦的日子，一個個願為中央社

拚命，這是什麼原因？一句話，三爺領導作風所感召。



本文作者在民國四十一年冬天陪蕭先生遊台南開元寺

## 陽明山之行

民國四十四年七月一日上午，當我將中華日報社務交給曹聖芬兄，典禮完畢返家時，發現三爺的車子已在我家門口，他老人家坐在客廳裏等我，要我同他出外走走，車子直駛陽明山，途中他沒有說什麼話，到了山頂，他叫司機停車，我們徜徉在大片草地上，觀望無窮遙偉的藍天白雲，這時刻我瞭解三爺的心意了。三爺從廿一年接長中央社，到卅九年交卸，共擔任十八年的社長，離職後無一點牢騷、半句怨言，許多親友連安慰他一句話的機會也沒有，這真是何等的氣度！

## 第一次出國

民國五十二年十月，三爺七十大壽，我陪他去東京旅行，並同李嘉、偉甫二兄到京都、奈良等地觀光，這是三爺第一次出國，三爺心中感覺很愉快，但到東京以後，發現有部份年輕人思想偏激，三爺激於愛國的熱情，苦心孤詣地和他們再三懇談，他沒有嚴詞責備，多方面從中國歷史、國內情勢反覆開導，由於三爺坦誠的感召，終使和大使館多年失去聯絡的一些人，成爲魏伯聰大使官邸席上的嘉賓，這件事，三爺從來不曾對人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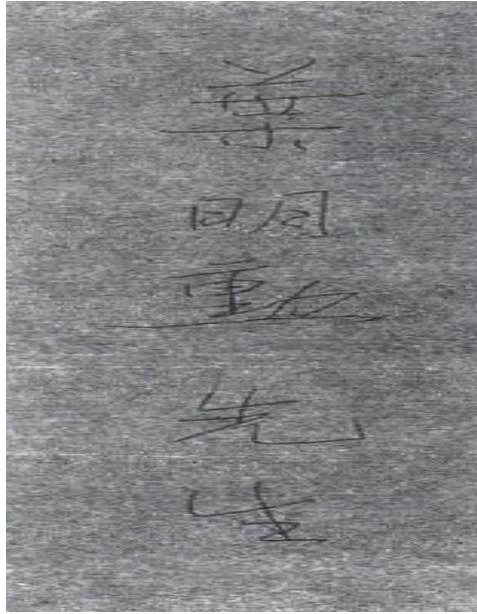
## 最後的吩咐

今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我到水晶大廈去探望他，由五時談到六

時許，他送我到電梯門口，說聲再見，四小時後就此人天永隔。第二天十一月十二日 國父誕辰紀念，也是執政黨十屆四中全會開幕，三爺是中央評議委員，在談話時我提醒他是否已經請了病假，他立刻到臥房取了一封年輕同志寫給他的信交我看，這位同志提出了若干對本黨應興應革的意見。接着，三爺就談起讀書的重要，尤其從事黨政工作的人，更要多讀書，特別是有關歷史的書。此外，他又強調誤事比敗事可怕，敗事可以看見，也可以補救，誤事常常不容易發現，稍為疏忽，貽患無窮。三爺靜悄悄地走了，沒留下一句遺言，這幾句話豈非老人家最後的吩咐？

## 生死的觀念

三爺在世的時候，常常向友好說：『活要活得好，死要死得快。』這些年來，老人家雖然能安排生活，平靜度日，但不是沒有挫折和苦悶，當心中感到重壓時，他常常引用故大使胡慶育兄的兩句話：「事情不大」、「小事、小事」，他也確能把若干不愉快的事於輕描淡寫中化掉，換一句話，不管怎樣，他都能設法使自己活得很好。三爺的心臟病是十一日晚九時四十五分發作的，十時十五分落幕，前後只有半小時，也真是完全符合他的心願了。執筆至此，天已將黑，客廳裏的電話鈴響了，我知道那不是三爺每於傍晚常打來的，他將永遠不給我打電話了。



蕭先生是在十一日晚間十時十五分謝世的。他在那天下午曾派人送一封信給本文作者，在信封上留下了最後的遺墨



# 藍天有幸

賈毓泉

在重慶時，我見過蕭先生幾次面。抗戰勝利後，我到了南京，他約我吃飯，我們喝的是四十年的陳年紹興酒。

我在台北開設藍天西餐廳，它是在第十三層樓上，可以俯瞰全市的景物；內部的陳設是簡單而高雅，是中外人士聚會的場所。三爺喜歡這種不雜亂、寧靜的地方。

大約是五年前，他開始到藍天來。人人都知道他喜歡常和朋友們聚在一起，吃點好菜，喝點好酒。所謂好菜是指中菜，他並不怎麼喜歡西菜。白天，他極少到藍天來；晚上，他也很少來吃西餐，只有在難得沒有應酬的晚上才來吃頓晚飯。

他在沒有應酬的時候，差不多總會在下午五時打電話來，對我說：『怎麼樣？你今天有約否？……那麼我到藍天來吃晚飯，我們兩人喝一點。』

他常常吃的一道大菜是塔塔牛排。有時是我一個人陪他，有時是我和內人一道陪他。

他在一年中總有三百天會來藍天。他總是在參加晚間的應酬後和三、五位朋友同來，那時已是下午九時左右。他喜歡靠裏面的一張桌子，坐在固定的面向外的座位上。服務生們都知道那是三爺的桌子，每天都將它保留下來。

他已吃了飯，喝過了酒；到了藍天後，常常是先喝一杯沒有咖啡精的咖啡，然後大家再喝一、兩杯酒，喝得很慢；然後就喝茶。他總有幾瓶酒存在櫃台，每次喝一點，再由服務生存起來。茶是上等的，也是他帶了來存在櫃台的。

他每次走進來，服務生看到他了，就拿出酒瓶和茶葉罐，跟在他的後面，走到他的桌子前，侍候他坐下。咖啡是服務生送上來的，酒總是他替朋友們和自己斟，茶也總是他自己泡。他先用開水將茶壺燙一下，然後放茶葉，再用開水泡。那是台灣最好的包種茶，味道香醇，還可以解酒。朋友都喜歡「喝三爺的茶」。他是從一個固定的茶莊買來的，幾年前是每兩台幣二十元，後來售價應該加倍了，老闆知道他是三爺，從未對他說過售價漲了的事。

這是他和朋友們閒談的時候。他說得比較緩慢，很多話都是很含蓄的，說到在他看來只是適可而止。細聽他的話，都是很深刻的，縱然是談一件小事，也可讓你思索許久。他只偶爾談自己過去的事，也從不批評任何人。他在一邊淺飲、一邊閒談的那兩個小時內，傾聽別人說話的時間最多。有時別人談到了某一像是重要的事，他會插一句

話：「那是小事情」，然後舉起杯來飲一口。

隔了一些日子沒有看到三爺的朋友，或是剛從外國回來的舊部屬，總會在這段時間內趕到藍天來「看看三爺」，或「看看社長」，中央社東京分社主任李嘉就是其中之一。李嘉會和他談談日本問題，或最近到歐美旅行回來後的一些看法。三爺謝世後，李嘉曾在蕭公館向三爺的遺像磕頭，啼哭着說：『我們常在一起吃喝，然而我們並非酒肉朋友。我們在吃喝時的一些談話是極有意義的。』

他和朋友們坐到十一時或十一時半就離開了。如果你趕到賬房小姐那裏想付賬，她會告訴你：『三爺已付過了。』他常是在去洗手間，走過賬房的時候把賬付掉。酒和茶葉都是他帶來的，只有在叫咖啡或點心時才有一點賬要付，有時由我簽字做個小東。

他每次到藍天的時候，總叫王司機先開車回去，不讓司機等得過晚。他從樓上坐電梯下來，我就開車送他回去；偶爾我不在場，他就自己或由某一朋友陪他坐計程車回去。有時朋友們提議去吃點清粥，他從不掃別人的興，常去的地方是梅子餐廳。

他謝世後，藍天西餐廳的那張桌子仍是每晚替他留看。他的朋友們常常懷念他，常常仍來坐坐，也總是仍坐那張桌子，而且讓他常坐的那個座位空着，就像他仍然在世一樣！



周至柔先生（左）邀宴三個壽星：蕭三爺、葉公超（右第二人）和葉明勳（右）

# 憶鄉賢同茲先生

詹行煦

同茲先生籍隸湖南常寧，是我的小同鄉。他的老家在常寧城西的藍江，離城十五里。

## 藍江人豪

百餘年來，該地先後誕生了兩位了不起的人物：一位是前清咸同間的唐訓方，早年以舉人擔任城南雙樽書院院長，後佐曾國藩訓練湘軍，討平太平天國，曾任安徽巡撫，人稱唐中丞公。一位便是同茲先生，他除擔任中央社社長和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評議委員外，沒有顯赫的武功，也沒有做過政府的高官，但他對於國內新聞事業的貢獻實在是空前的，我們也可以說，他的成就，他對於國家民族的功績，尤在唐訓方之上。邑人往往艷稱藍江的風水好，毓秀鍾靈，所以先後誕生了兩位人豪。我幼年曾到過藍江，看見對面幾座巍峨的大山，氣勢雄偉，高聳雲際，所謂地靈人傑，似非無稽之談。

## 識荊經過

我在學生時代，就知道同茲先生的大名，不過首次識荆是在民國二十三年。當時我已離開學校，在南京國立編譯館任職。一天一位同鄉何君來見我，說與同茲先生有一點親戚關係，要介紹我同他晤面。我欣然同意，不久便到沈舉人巷拜見同茲先生。見面以前，我心裏爲先生繪了一個輪廓，認爲他大概是一個嚴肅的人，會以同鄉先進的身份來訓勉我。誰知見面後，先生儀表瀟灑，風神俊逸，宛若神仙中人，談話時態度是那麼從容和藹，措詞是那麼清晰中肯，除詢問我的情況外，還談及國際局勢和對中央社未來的理想。整個一小時的晤面，使我如坐春風。告退時，先生送我經過一段很長的甬道，直到外面圍牆的大門。從此加深了我對於先生的敬慕，認清他是一位了不起的領導人才。

## 戰時往事

抗戰時期，中央各機關遷到重慶。中央通訊社賴同茲先生擘劃經營，在極艱難的環境中，仍繼續推廣業務。其時先生的寓所在重慶七星崗嘉廬，我曾一再去拜訪過。自民國三十年起，我在中央訓練團先後擔任編纂組科長和副組長等職。至三十三年暑天，中訓團忽縮小編制，預備由復興崗下廣闊的團址遷至復興崗上，我決計另謀出路。一天在兩路口中央社辦公室去見同茲先生，談及我將離開中訓團的事。先生說：你目前如果沒有較好的機會，可到本社來，可暫以編輯名義協助總編輯陳博生先生，三個月後，我將爲你調整工作。我略加考

慮，即表同意，旋與陳博生先生晤談。陳先生是新聞界老前輩，我久聞其名，不料此次晤談頗不愉快。因為陳先生說他擔任總編輯職務，日夜核閱稿件忙不過來，要我同他輪班工作，他在日間閱稿，我則在晚間負責。我當時住在重慶郊外的榨坊溝，地方偏僻，內子即將分娩，在困難環境下不易雇用女工，晚間必須親自照顧，不能遠離，無法接受陳先生的指示。陳先生又堅持己見，不能變更，於是彼此不歡而散，進中央社的事遂告擱淺。我旋至國民參政會任職。數月以後，我又訪候同茲先生，先生欣然接見，彼此暢談，一如往日，完全沒有提到有關陳先生的事。

過了一年多，大約是三十五年春天（時間已記不清），我突然接到中央黨部祕書處的通知，是當時祕書長吳鐵城先生約見。我與吳先生無一面之緣，過去又從未在黨務機關服務，忽承寵召，頗感意外。屆時我如約晉見，晤談約一刻鐘，始悉此次召見出自同茲先生推介。大概是先生希望我會晤這位黨內重要領袖，以便將來能有機會對黨國有較大貢獻。此後，我沒有再見過吳先生，也從未對吳先生有所請求，不過同茲先生的厚意，使我永遠感激。

## 來台以後

勝利還都以後，我曾多次與同茲先生晤談，尤其一次在一位同鄉粟君結婚的茶會上，先生談笑風生的情形猶深印腦海。不過自神州變

色政府遷台以後，我與同茲先生見面的機會便稀少了。主要原因是我自民國四十年起，患了嚴重的胃腸病，遷延多年，迄難根治，醫囑必須多事休養，因此除勉力處理公務外，便杜門不出，幾乎和外界斷絕往來，也就沒有機會向同茲先生領教。同事袁應環兄是先生的表侄，每赴先生處，便蒙垂詢病況，關懷備至。有一次要應環兄告我多服「表飛鳴」。誠然「表飛鳴」是助消化的良藥，但對於厲害的胃腸病効力是很小的。當我長期遭受病魔打擊，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忽然否極泰來，最近兩三年間，身體好轉，現已完全康復，一般人都認為是一種奇蹟。我自幸又可常赴蕭府，暢聆同茲先生的教言。不意事與願違，先生竟於去歲十一月十一日突然仙逝。從此常寧失去了一個偉大的先進，中樞也失去了一位重要的耆宿，新聞界更失去了一個奇才大略的領袖人才。我得訊之餘，甚為驚悼，多日悵惘，不能自己。所幸先生幾位哲嗣都非常卓越，二三兩公子久在美國，未曾謀面，長公子孟能以前經營文星書店，曾有多次接洽，我深知他是一位精明幹練的事業家，成就不可限量，足慰先生在天之靈。



# 三爺對我的影響

鄒傑夫

我認識蕭三爺是民國廿六年，在漢口掃蕩報採訪部工作的時候，由中央社武漢分社主任李堯卿兄介紹的，而我和他過從較密則是到重慶以後的事。

在我和三爺交往的歲月中，他對我的影響可以說是多方面的。他的做人處事給了我不少好榜樣，我的火暴脾氣甚至都因他的誘導而有所改變。在我需要幫助時，他曾自動伸出慷慨的援手。到緊要關頭，我對自己的前途不知如何作抉擇時，他也曾指出可以遵循的途徑，讓我挑選。他的熱心助人和提拔後進不遺餘力的作風，在我腦海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下面敘述的幾件事是我直到現在都不能忘懷的。

民國廿九年，我任恩施武漢日報及貴陽中央日報駐渝特派員的時候，有感當時文化精神食糧的缺乏，在三爺的贊助下，創辦了文風書局，並且刊行了純學術性的「文風雜誌」和藝術性的「戲劇月刊」。三爺擔任書局的董事長，經營頗上軌道，西南各省都設有分局，兩本雜誌也很得各方的好評。戲劇月刊有一期刊登了一篇文章，涉及立法委員王崑崙，他大為不滿，揚言要訴之於法。三爺知道了這件事，也

看過那篇文章，認為文章內容對王某並無不敬之處，只是對方在意氣用事而已。於是三爺便親自寫了一封信給王某伉儷，說明他是文風書局的董事長，一切由他負責，希望能予見諒。這封信的措辭非常委婉，末尾還用了「敬叩雙安」幾個字。王崑崙看到三爺這封信自然見風收舵了。當時我心中還有些不服，暗想三爺年紀比他長，為什麼要對他這樣必恭必敬，就問三爺何以要如此寫法？他微笑著說：『對人總是客氣一點的好。』

抗戰勝利那一年，我有機會進國民參政會工作，但又有些躊躇，不願放棄在新聞界的崗位，於是去請教三爺。三爺說：『你可以在從事新聞事業、經商，和做民意代表三者之間選擇。不過，做新聞記者或經商比較不受拘束。』我聽了他老人家的指示，決定不去參政會。二十幾年來，我能在新聞界和文化事業的圈子裏自由自在的生活，可以說全是拜三爺之賜。

大陸變色，我從香港到廣州。那時局勢混亂，我不知何去何從，只得再向三爺去請示。三爺說：『要做生意到香港，要做記者隨政府到重慶。』我考慮之後，決定暫時經商，乃啓程赴港。不料抵港當天，便有一位朋友奉三爺之命送了一筆款項給我。我得到這筆資金，心中的感激，無心言宣。以後我能在經商方面小有成就，也是靠三爺及時給我的援助。不久我雖然歸還了那筆款子，但是三爺的隆情却是我永遠也還不完的。

記得是民國卅六年底，三爺的好友某公因接受政府職位，急需一筆款項去擺脫他所擔任的商業機構的名義。三爺一肩承擔，來到上海，立即召我到他旅邸國際飯店一〇一三號房，問我可否代籌資金。我一口答應，馬上出去張羅。後來三爺洽商其他朋友，籌到所需的款項，我結果沒有幫上忙。不過由這件事可以看出他在朋友急難的時候，盡心盡力設法援助的古道熱腸，是多麼難能可貴。

三爺逝世轉瞬已經三個多月了。他生前曾經說過：『人要快快活活的活，痛痛快快的死。』他去得那麼突然，也許正合了他的想法。但在我說來，也許在他所有的朋友說來，他的去世都是一項無法彌補的損失。

# 卅年交遊記憶

## 雷嘯岑

蕭同茲湖南常寧縣人，原名異，字同茲，別號涵虛，在昆季中行三，友輩乃呼之爲「三爺」，生於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九月，已進入八旬之年了。

他於民國初年肄業湖南甲種工業學校，習機械科，與同學少年黃愛、龐人銓友善，好從事課外活動，具革命思想，尤喜與勞工羣眾接近。時筆者亦肄業湖南省立第一中學，曾與龐人銓創刊「九十天雜誌」，締文字交，因龐之關係得識蕭於偶然場合中，以其沉默寡言，而所學又殊途，較少往來。黃、龐二人年序較次於蕭，然賦性狷激衝動，思想急進，蕭淵穆不露稜角，對人言談，訥訥如不能出口，唯心思縝密有策略，黃、龐遇事皆以蕭爲謀主。

蕭在學校畢業後，曾服務於湖南電燈公司暨第一紡紗廠，仍與黃、龐等致力於工人運動，雖無工會組織，然暗中密切聯繫，揚言爲勞工謀福利，眾皆翕然從之。湘省府設有銅元製造局，工人不少，亦加以聯絡指導。各單位工人每爲改善待遇而向資方提出要求，勞資常舉行協調會議。蕭爲避免目標，只在幕後主持，而由黃、龐出面活

動。時毛匪澤東已畢業第一師範，亦好參預工人運動，且在萍鄉煤礦場設立「工人子弟學校」，夫妻擔任教職，毛本人常在長沙與蕭等接觸，另設「文化書店」於府正街，專售馬克斯主義的漢文翻譯小冊子，無非旨在宣傳而已。



年輕時代的蕭先生：手持「血債」小冊替在長沙被殺的黃愛和龐人銓兩人申訴

趙恆惕主持湖南省政後，第一紡紗廠改組，由趙之小同鄉向某增資接辦，規模擴充，工人亦大量增加。越民國十二年，黃、龐等鼓動紡紗廠工人要求改善待遇，實行罷工，廠主向某原係衡山簪纓世家，

而紗廠資本亦有省府官股，趙省長乃命工人推派代表到省府談判，屆時毛亦為代表之一。趙瞥見毛，即厲聲斥之云：『你並非工人，何以冒充代表？再不自愛，必予拿辦不貸。』毛從此不敢露面。勞資談判迄未能達協議，僵持了相當時日，已屆陰曆年關，而湖南銅元局工人又宣告罷工，一時工潮洶湧，人心浮動。尤其是銅元局停工，影響省府的年關支應費用，震撼著趙的政權前途，勢將無以善其後。

趙省長得知工潮的策動者係黃愛、龐人銓二人，即予逮捕槍決，迫使工人恢復操作。蕭忱於禍將及身，潛逃至武漢。適湘人譔小岑（後來曾任立法委員）在武漢策動平漢鐵路工人罷工，反對北洋軍閥，蕭亦預其役，且加入國民黨。既而吳佩孚令飭鄂督蕭耀南以武力鎮壓工潮，殘殺了工人百餘名，且派兵搜查武漢各學校員生的書籍，凡藏有馬克斯主義刊物者一律究處，甚至閱讀古籍「馬氏文通」的人亦一併遭殃，輿論騰為笑柄。軍閥橫蠻無知，視民命如草芥，蕭祇好離漢遠遁，一度投入天津機械廠工作，即以同茲為名，一般人不知道他是在湘漢一帶搞工運的革命份子。旋國民黨舉行改組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注重勞工政策，蕭乃南下從事國民革命運動。

越民國十六年春初，革命軍底定東南，國府奠都南京，實行清黨反共，蕭受知於本黨元老胡漢民，入中央黨部服務，初仍從事勞工運動。旋中央黨部設置新聞機構，每日發佈黨政軍重要消息，名為「中央通訊」，事屬新創，一切設備皆簡陋，辦公室僅三間，大小職員不過一、二十名，初時僅用油印發稿，供給京滬各報社採用，慘淡經

營，煞費苦心。迨民國廿一年五月，正式成立「中央通訊社」，以蕭爲社長，逐漸構成現代化的傳播事業，規模大備，而於國內各重要省區暨海外諸大都市，陸續設立分社，物色適當人才，綜持業務。蕭爲人和易瀟灑，沒有仕宦習氣，對人誠信無欺，休休有容，雖其學歷與文化宣傳異途，然才智之士皆樂爲効力，凡在中央通訊社服務的，莫不實心任事，恪盡職責，而不作見異思遷之想。蕭亦大公無私，用人唯賢唯才，泯除畛域。他綜持社務垂卅年，分支機構遍設於海內外不知其數，從未見有蕭的親屬戚眷或鄉里故舊子弟擔任過中央社某單位的職務，他自己亦以此項任務爲終身事業，勤勤懇懇，孜孜不倦。





蕭先生在六十大慶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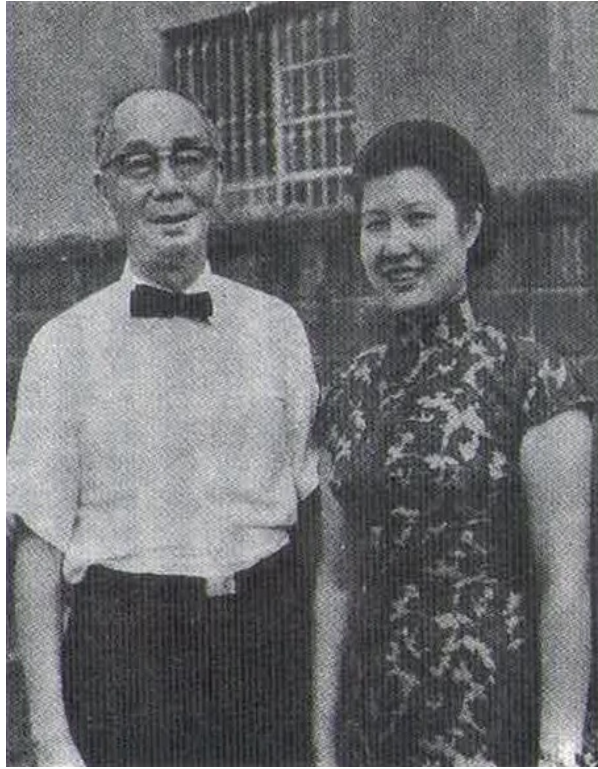
四十五年春，筆者赴日本東京出席筆會大會，晤及「日、美文化協會」會長松本重治。此人在中日戰爭之前，久任日本「同盟通訊社」駐上海特派員，與蕭甚熟識，他詢及蕭的近況時，說當年在滬常

與蕭晤談中日問題，彼此必爭辯不已。我謂：蕭賦性隨和，與人無爭。松本說：『不然不然，「蕭樣」——日語，即蕭先生之意——談到中日問題，意氣就很盛旺，決不讓步，真是個愛國主義者。』當筆者回港之日，松本猶再三託我代向蕭問候。可是，蕭三爺對本國人能忍受拂逆，犯而不校。記得對日抗戰結束還都的次年，某次在宣傳部舉行宣傳會議，蕭擔任主席，筆者代表「和平日報」參加，席間有南京某刊物負責人（現在台灣）發言攻擊中央黨部某些措施，語侵主席，盛氣凌人，且將桌上置着的大花瓶亦掀倒。當時有人甚抱不平，加以反駁，相互拍案爭論，然三爺態度安詳，無所介意。又如其子在台灣創設「文星書店」兼刊行「文星雜誌」，嗣因作家爲着文字思想爭論，構成訟事，乃有人遷怒於蕭三爺，不斷地著文指摘文星書店及其雜誌，係接受美國親共分子費正清津貼的叛國集團。我很驚詫，曾問三爺蒙此惡名何不加以分辯？他說：『天下事真得假不得，事實即係很好的答覆，安用口舌之爭爲？』

民國卅九年，三爺主持中央通訊社已近二十年，社長一職，由中央黨部派員接替。於正式移交之日，三爺將他於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前夕，曾向政府領取的一筆應變費，帶到台灣後，換成黃金六百餘兩，美金十萬元，儲存台灣銀行，一併移交新任保管等情。此事中央社所有職員，皆無所悉，社中帳冊上亦無記錄可查，而當年國庫在兵荒馬亂之中，撥交此款，已無檔案可稽。三爺若將此項應變費化公爲私，誰也不會發覺的，若以應變名義，隨便報銷若干開支，更沒人加以非

議。然他絲毫不苟，公私分明，實屬難能可貴，播為美談。當道嘉其廉介的志節，得未曾有，特聘任為中央評議委員以示旌勸，蕭認為義所應爾，對人絕口不談此事。

三爺日常生活除善飲酒外，即與二三友好乘暇玩玩麻將牌，亦喜聽皮黃歌曲。民國三十六年冬某日，我到蕭宅訪問，適三爺正與友人作方城娛樂，我站立他背後觀戰，曾見他取得一副清一色聽和的牌，被上家截和了！他祇是回首望著我笑笑，悶聲不響，夷然把牌推入桌中重來而已。我讚佩其品概，給他起了一個「牌聖」的稱號，到處逢人說項，稱許蕭三爺的玩牌風度為不可及呢！



蕭先生和羅金玉（金葉）小姐

三爺到了台灣後，極少玩牌了，而代之以保齡球，唯嗜酒如故，常與友好赴市上「東雲閣」酒家暢敘，該酒家有女侍芳名金葉，年近四旬原係孀婦，能唱平劇而善伺人意，對三爺尤特別侍候周到，久

之，彼此情感頗深切。三爺的夫人已逝世，鰥居有年了，友輩皆勸他不妨與金葉正式結合，俾娛晚景，三爺笑却之。朋儕認爲或許蕭少爺孟能有異議，然孟能表示兒輩何敢干預老父的私事。旋由筆者面詢三爺有何意見而不接納友好的勸進？他說：『沒有別的意思，只念及七旬老翁，來日苦少，不必再誤女方前程，但得純潔締交，足矣！』宅心仁厚，可見一斑。泊後蕭每日晨起進餐後，必赴該女住所品茗閒談若干時刻，風雨無阻，習以爲常。三爺固好客，凡有友好自遠方來台北，必招邀宴會，偶以臨時別有應酬，必囑金葉先來照顧。筆者某次旅游台北時，一夕，三爺約往欣賞嚴蘭靜演平劇「紅梅閣」，他因事須遲到半小時，即由金葉陪伴着我，防我感覺寂寞。三爺平日待人接物，情誼周摯的風格，多類是，宜其爲世人樂於親近，而久要不忘也。

今歲十月蕭已屆八十高齡，而精神矍鑠未衰，友輩相約於三爺誕辰大舉爲之慶壽。詎至舊曆十一月十一日晚，在家忽感嘔吐，家人急扶至臥榻靜息，頃刻即溘逝了！醫者斷爲心臟病突發，實導源於平生飲酒而然云。人莫不有一死，蕭以杖國之年，悠然無疾而終，可謂得天獨厚，堪以含笑九泉也。

蕭在台逝世以後，香港有卜少夫，東京有李嘉，均於其大殮之日，專誠飛台祭奠。舉喪前夕，並由黃杰及卜、李等在蕭之靈柩前，以酒奠棺，口呼三爺，舉杯相敬，藉誌哀思。

筆者與三爺交游亘三十年，從未覩其對人有疾言厲色的表情，總是藹然仁者，不激不隨，然與鄉愿或巧宦之輩，迥異其趣，立身行己，一是皆以誠信忠恕爲本。高風亮節，允足以箴世而勵俗，斯人不作，蓋不勝其吾誰與歸之歎也矣！

# 「我乾杯，你隨意！」

趙効沂

我在民國六十一年出版的「報壇浮沉四十五年」中，有兩處提到蕭三爺同茲先生。第一頁序言，說到：『……………十多年前，新聞界耆宿，也是我的畏友蕭同茲先生，就曾勸我於公餘寫些回憶錄之類的東西，徒以做夥計者終日忙碌，無暇及此。……………』這反映出同茲先生有報人的骨格與秉賦，對於保存現代史的資料極端重視；竹頭木屑無不珍惜。和胡適之先生晚年鼓勵國人多寫傳記文字如出一轍。

在第十三頁「吳鐵老與蕭同茲」文內，寫到：『蕭同茲先生後來主持中央通訊社，由京而渝，再復員到南京，就一間小辦公室逐漸擴大規模，躋入世界通訊事業之林。他的從容風度，領導才能，使我欽服無已。他能「統兵」，更善「御將」，所以能得天下英豪而用之。四十年來，他始終是我在新聞事業中的偶像，遇有難決之事，難免要找他請教，成爲我的畏友。我也因爲同茲先生和陳博生先生的關係，從重慶、南京到台北，幾乎認識所有中央社在國內或國外的重要幹部。我沒有在同茲先生旗下工作，却有「中央社之友」的稱號，正因爲我對同茲先生與中央通訊社事業有很多的了解，所以愈欽服同茲先生的爲人。當然，我最欽服者在於他的從容風度，而處事持平，目光

遠大，尤其餘事。這一篇以鐵老與同茲先生并列，一則因與二人同時相識，二則二人丰采尤多相似。現在同茲先生已逾七十之年，而神采奕奕，步履彌健，這是從他持躬坦蕩、胸無宿物的修養得來。』

這一段，敘述我對同茲先生的認識和交往經過，以及衷心欽敬的感念。想不到距拙作出版不及兩年，這位「神采奕奕，步履彌健」的同茲先生，却以輕快的步伐離開塵世！雖然達到了他「活要活得好，死要死得快」的願望，但給親友們的傷感却太大太多了！

在他辭世的那一晚上，老友馮志翔兄正在我家作客，尚談到同茲先生偶沾風寒的情況，孰意即在談話的同時，同茲先生已經作古。這也許是所謂友輩間的「心靈感應」吧！人總要一死，而死後的精神仍能長留在親友的心田裏，已可謂不死。所以我至今仍覺得同茲先生依然活在人世！

前文我曾經說過同茲先生的「從容風度」，「御將才能」，僅僅這八個字，以視今世的主管人物真是做到的能有幾人！我和同茲先生相識逾四十年，許多難決之事向他請教，經他剖釋以後，似乎無事不可化解。這就是他的「持躬坦蕩」之處。我從沒有看見他真正的發怒過。先哲說：「不遷怒，不貳過」，喻處世之難能，但其中畢竟還有一個「怒」字，但同茲先生心境中却只有善意，沒有「怒」的影子。

舉一個小例：若干次陪伴同茲先生飲宴，同座中無不善飲，惟我是懂得酒却又不會飲酒的一人。當我向他敬酒時，他舉起杯子，必定



說：『我乾杯，你隨意！』言畢一飲而盡，不似他人之斤斤計較。這「我乾杯，你隨意」的一句話，蘊蓄着深深的同情、體諒、與愛護的溫暖。以小窺大，可以看出同茲先生的待人處世之道。

早年我追隨陳博生先生（已故世多年）任職北平晨報，後來晨報被宋哲元派人接收，同仁均隨博生先生離社，博生先生即毅然應同茲先生之聘，任中央社駐日特派員（中日戰事起後，陳回國任中央社總編輯）。我們當時極為驚訝，以博生先生的才學聲望，如何能「屈就」中央社的職務？後來才慢慢領會到，這便是同茲先生的精誠懇切，使得博生先生不能不起而拔刀相助！這也是同茲先生「御將」才能的一個具體表現。

如今瞬屆同茲先生告窆之期，友好籌印「在茲集」，偶憶所及，匆匆執筆，自覺雜亂無章，不過略表我對同茲先生的景仰欽遲之忱。行文至此，不覺悽然欲涕！



民國四十二年，中央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時期（從右至左）：陳博生、蕭先生、張明燁、梁乃賢、黃履中

# 襟懷若薰風朗月

趙班斧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這是先賢子貢頌揚孔子的一句話。這句話，也可為蕭三爺同茲一生處世得人的寫照。

三爺的事業以及對國家的貢獻，是眾所週知。用不着我來贅辭。我所欲談的是他的德行與聲音笑貌。就記憶所及，拉雜為文，以表追思之忱。

時在民國二十四年夏天，我奉命出國出席國際勞工會議。因晉京請訓，夤緣而與三爺相識。傾蓋之始，祇覺得他英挺飄逸的風采，在當時南京炎熱的氣候中，使人頓然有清涼之感。三爺對我也很投緣，當晚請我在一家湖南館子吃飯，他穿了一件湖色的綢長衫，修短合度，說不出有多麼瀟灑。同席八九人，他和每個人都對了杯，大家又都和他對了杯，而且是一再的乾杯。我發現他的酒量奇大，舉杯穩，入口深，喝了那末多酒，仍舊還是神色怡然，毫無醉意。最可愛的是自己不管喝多少，絕不勉強別人喝，但對來者却都欣然不拒，酒量既大，酒德更好。

屈指四十年來，我和三爺經常都有接觸。抗戰時在重慶，接觸日

漸加多。那時我姊丈潘公弼與許孝炎、陳博生三家人一起住在南區公園附近的金城別墅內，三爺經常去吃飯，我也常去。三爺與許、潘二公均善飲，博生稍次，我則酒量最差，常常喝醉。在那時空襲頻仍工作緊張的環境中，三爺的神色總是那麼安祥，那麼悠閒，尤其是日機濫炸中央社的那一幕，他那臨危不亂以及舉重若輕的鎮定功夫，不僅是從修養而是與生以俱來的。

三爺的對人尤其值得懷念。人有困難，他會毫不吝嗇地傾力相助，人有苦悶，他會細心地聽你傾訴，然後給你最大的安慰與鼓勵。人有一技之長，他會到處譽揚，不惜屈己以求。一切都是那末真純，那末親切。風度謙和，惟恐有先於人。而對忠奸是非之分，絕不苟且。知人之明，知事之明，在我所認識的朋友中，確是無出其右的。我不是中央社的人，也不知中央社的事，但我看到中央社的朋友，無論是在職的，離職的，無論在什麼場合，祇要一見到三爺，那種由衷的敬愛，都表露無遺，實在使我深深感動。人當不在其位的時候，而能得人如斯，他的德行之感人是可以想見的。

中央社的成就是三爺一手創造的。由小屋三間發展成爲世界五大新聞通訊社之一。誠如他的「生平事略」中所說：『中央社自孩提以至於成長茁壯，可謂胥在其懷抱培育之中。』三十九年九月，中央社改組，三爺那時還是正當有爲之年——五十六歲，由實際負責人——社長，改任爲不負實際責任的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而三爺却是處之澹然，若無其事。

在台灣這些年，三爺與我的接觸更多。經常一起喝喝酒，有時哼兩句平劇。我又發現他對藝術的智慧極高。對於真、善、美的欣賞，意境高超。均能心領究竟，抓在癢處。他的悟性是天生的。

近兩年來，我們常於酒酣之餘，晚上在藍天喝咖啡談天。他的聲音笑貌，老而更美，眼神之秀麗如昔而益增慈祥。朋友中間除對葉明勳偶而會說一兩句玩笑以外（別人無此殊榮），對任何人還是那麼謙和，還是那麼惟恐有先於人。一直到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逝世為止。

開弔的那一天，弔者一千五百餘人。個個人都神情肅穆，由衷地哀悼，絕無一般交際場合的氣氛。是一個真正的追悼會。在野之身而有此身後哀榮，多年來確甚少見。三爺是活在每個人的心裏的。我以虔誠的心情，寫了一副輓聯送給他。字文兩劣，不足以登大雅，略表我無限的哀思而已。文曰：

受命於險阻艱難。俯仰之間，公無遺憾。

襟懷若薰風朗月。沉浮若夢，國喪老成。

民國六十三年二月

# 風雨憶故人

劉光炎

我與同茲兄訂交，時間已逾四十載，那時他剛出任中央社社長，地點在壽康里的社長辦公室。這四十多年，我心目中的同茲兄，是一位十全十美的人物，我的心儀，非筆墨所能形容。

同茲兄辦中央社，甚為成功，有口皆碑，不待我再來辭費。我所要揭櫫的，是他辦中央社所顯示出的領導者的才能。老實說，他並不是一位新聞學家，他沒有受過新聞教育，他對於辦通訊社，在開始時並不內行。但是他知人善任，他謙退若不能。他讓部下有充分發展的機會，他善於誘導，使大家樂於表現，因而在中央社呈現出千峯競秀、萬壑爭流的奇境。這正是領導者才能的最高表現，而同茲兄則完全具備。中央社所以在他手中，由一個極小的新聞發佈機構，擴展到全國性通訊社的規模，並不是偶然的。

同茲兄身體並不十分棒，但我始終相信他會享大年。我信念的依據是：「仁者壽」。無論是誰，凡是與同茲兄有一面之緣的人，都會同意我這意見。同茲兄是一位藹然仁者，他有赤子之心。他善於體諒人，也樂於助人。他從來不在背後道人短處，甚至於受了人家的欺

負，也無怨無尤。

對於這樣一位新聞老兵的凋謝，我心中的感念是無窮的。同茲兄的形體雖逝，他的精神却永存。我在此謹致其無上的悼念。

# 要找比自己高明的人

劉真

我與同茲先生，因工作環境不同，平日見面的機會並不很多。偶而和他在朋友處同席餐敘時，他那種「不推」「不催」的喝酒態度，與梅月涵（貽琦）先生頗為相似，同樣達到了可以稱為「酒聖」的境界。如果說從飲酒中能夠觀察一個人的性格，則梅先生所代表的乃是一位純粹的恂恂儒者；而蕭先生舉杯的從容與豪爽，應該算是亦儒亦俠，充分表現出一個具有豐富革命熱情的知識份子的本色。

同茲先生的為人以及他對新聞事業的貢獻，自以曾在中央社服務過的朋友瞭解得最為清楚。記得民國四十二年二月間我初抵美國華府時，一日久雪初霽，中央社特派員任玲遜先生駕車約我往遊華盛頓故居，途中玲遜和我談的多為服務中央社的往事。他說民國二十二年他由北平英文時事日報轉到成立未久的中央社工作，以前雖和蕭先生毫不認識，但一開始便獲得他的充分信任。二十年來一直工作得非常愉快。他認為蕭先生容易接受新觀念，富於創造力，胸襟開闊，態度誠懇，實在是最理想的主持機關的首長。以後我在國內外任何地方，只要遇到中央社的朋友，沒有不對蕭先生推崇備至的。



民國五十一年台中教師會館落成未久，同茲先生適有台中之行，他的老友張明 先生和幾位新聞界人士在教師會館設宴歡迎。我本擬參加，剛巧因須至台北開會，致未能略盡地主之誼。事後偶在台北相遇，他還談及對台中教師會館宮殿式的建築甚為欣賞；並謂他在南京上乘庵修建的中央社七層樓辦公大廈，因抗戰與戡亂的軍事相繼發生，始終沒有竣工，成為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可見在同茲先生心裏，是沒有一刻忘記中央社的。

同茲先生晚年以打保齡球為其健身的主要運動，幾乎每日必去保齡球館一次。五十二年寒假期間，小兒捷生自台中返家過年，一日上午，小兒要我與內人帶他到保齡球館打球，我們遂一同前往南京西路的榮星保齡球館，到時適遇同茲先生正在那裏。他一看見便問我是否也歡喜玩保齡球，我說我什麼運動都不行，那次是陪兒子去的。於是他便叫小兒和內人去打球，他則拉我在一旁茶座上喝咖啡聊天。他說：『我們雖不常見面，但我對你很瞭解。你辦師範大學和我辦中央社一樣，總是盡量找比自己高明的人來幫忙。』他這幾句話，我至今還記得非常清楚；而那一次不期而遇的短短聚會，也留給我一種最深刻的印象。

古人嘗說：「得人者昌」。歷史上成大功立大業者，大都具有知人之明與容人之量。漢高祖劉邦力雖不敵項羽，但終能將項羽擊敗，統一天下。史家稱其「豁達大度，知人善任」。這八個字可能便是劉邦成功的主要因素。其他任何事業，也和政治一樣，「人才」乃是成

敗的關鍵。中央社從一個祇有幾位工作人員的小小新聞室，逐漸發展成爲擁有兩三千員工的大機構，抗戰勝利後，並竟居於「世界五大通訊社」之一的地位。這一文化事業的偉大成就，可以說是充分發揮「團隊精神」的最佳範例。而組成和領導這個團隊三十多年的，便是同茲先生。他所說「找比自己高明的人來幫忙」這句話，固然是自謙之詞；不過正因爲他有這樣一片「禮賢下士」「求才若渴」的誠意，才能網羅許多第一流的人才來中央社共事。而所有已到中央社工作的人，更都能「心甘情願爲社効力」（引用丁履進先生文句）。

同茲先生之不朽，當卽在此。

# 我是三爺一天的部下

樂恕人

一九四五年（中華民國三十四年），我是「新聞天地」派駐歐洲戰區的戰地記者；隸屬於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將軍的麾下。當時中國駐歐洲戰區的同業，有中央社余捷元兄，中央日報毛樹清、陸鏗兩兄和我四個人。大公報的蕭乾，則是以駐英特派員而臨時申請為盟軍駐歐戰區的戰地記者的，及至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國內又來了幾位男女同業，包括女作家陸晶清、徐鍾佩等。

十一月二十日，世界最大的新聞舞台開幕了！美、英、俄、法四大同盟國在德國南部重鎮紐倫堡組織「軍事法庭」，會審納粹德國戰爭特級戰犯。

我當時在倫敦，十七日一大早搭美軍用機先飛巴黎，再轉飛慕尼黑，由慕尼黑乘火車大約二三小時即到紐倫堡。離英之晨，大霧迷茫。世界上有兩大有名的霧都，一為倫敦，一為中國戰時陪都重慶。倫敦的霧，屬於海洋性，帶潮溼，其色綠而灰。重慶的霧，屬於大陸性，略較爽適，其色乳白。

美軍運輸機是C四六型，雙螺旋槳引擎，內設相對兩排帆布坐

位，簡陋之至。但C四六型性能極佳，為第二次大戰中作戰的「功臣」之一。從倫敦飛越英法海峽，到巴黎約七十分鐘。到後因有半日閑暇換機，我即驅車入城，往中國大使館拜訪大使錢泰及館內友好。

那知一去之後，錢大使立即以一意外要事相告。原來中央社社長蕭同茲先生有一急電交他轉我。我大出意外，展開一看，是蕭社長個人用中文所拍，大意說：余捷元兄正在北非開羅採訪一項極為重要的盟軍祕密軍事會議，要廿二日才能趕去德國。他說紐倫堡會密納粹德國特級戰犯，為空前的，也是舉世矚目的最大新聞，相信我必去為新聞天地採訪，要我千萬代中央社拍發開審的新聞。

我在重慶雖從未參加中央社工作過，但在中央政治學校受訓時，同茲先生為我們班上特約講師，講授通訊社業務，因而我和他有此師生之誼；畢業後去重慶工作，不時前往拜謁聆教。

同茲先生對我青眼相加，一度約我參加中央社工作，只是因我再度入緬隨軍反攻，遂致失掉了進入中央社的機會。二十來歲的青年記者如我，自然引為莫大的榮幸與安慰，自然也有無限遺憾。

孰料數年之後，在歐洲有此機緣，我當時真有無比的興奮，同茲先生竟以此要事命我，我豈敢辭。雖蹈湯赴火，我亦不顧，何況德國已無條件投降，戰鬥已過，這樣輕快工作，豈能有違長者之命。

當晚搭美軍飛機飛往慕尼黑，再換火車於深夜抵達一片斷壁頹垣

的紐倫堡。該處是德國納粹黨的發祥地，處於美軍佔領區（其他東北部爲俄軍佔領區，西北爲英軍，西南爲法軍。），所以盟軍故意安排在那裏會審納粹要犯。

全市警戒森嚴，軍事法庭更是嚴重；各處皆由美、英、俄、法憲兵警衛，法庭中則全是美憲兵負責，記者席只能坐二百人，故由各國申請名額分配。美、英最多，各得三十幾席，俄、法次之，其他國家再次之。我們中國記者僅有六人申請，分得二席。

事前我們有協議，一席當然由中央社經常利用，另一席由我們五人抽籤決定（指第一日開審），再輪流使用。

十九日晚，會審當局盛大酒會歡迎自世界各地趕去的六百多名記者。誰知我縱目一觀，然後繞場一週，我的「同胞」記者，一個未見。招待轉來電報，原來毛樹清、陸鏗二兄正在東歐鐵幕中旅行採訪，趕不來參加，中央社余捷元兄在北非開羅，我當時真有無限寂寞之感。

酒會中因國別人數太多，負責人以三種入場券紮在一起，叫每一國家之名，由代表上台領取，再下去分發。依A B C順序叫到CHINA時，全場突然爆發一片熱烈的歡呼和鼓掌聲，歷時一兩分鐘之久。我上得台去，向全世界同業頻頻揮手，點頭致謝。下台後，立即爲幾位同業團團包圍，集中問我一個問題：

『中國雖然抗日勝利，而「國共內戰」業已展開，將來的展開會怎樣演變？』

『那不是「內戰」，而是「共黨國際」侵略中國的戰爭。史達林卵翼下的毛澤東因有蘇俄大力援助，很可能席捲東北、華北、黃河南北。戰爭會拖下去，長江（揚子江）就是將來對峙的一條線！我的國家可能分裂為南北兩個，非常可悲！非常不幸！』

第二天開審，我一人佔據最前排的中國記者席，燈火輝煌中，親眼得見納粹副黨魁赫赫納，外長里賓特羅甫、空軍總司令戈林、陸軍總司令季特等……二十幾個甲級戰犯。

審判官和檢察官入席，全體肅立；首席審判官是英國的勞萊士爵士，其餘全是文人，只有蘇俄的審判官是一位中將，全副戎裝，胸前帶滿勳章。

勞萊士爵士在全場靜肅中，嚴謹地慢慢地作開審詞道：

『我們代表全世界人民，對挑動戰爭、破壞和平、殺戮無辜的納粹戰犯，進行審判，絕不畏懼，絕無恩惠！……』

當晚，我把當局所發文件，及開審情形，擬好一道英文長電，不記得花了多少美金，以緊急新聞電拍回重慶中央社。

還都問題在國內引起爭執，有的主張還都南京，有的主張遷都北

平。所以考慮之後，還是以拍到重慶中央社爲宜，因爲我知道國內一片亂哄哄，很多朋友還自重慶來信，我想同茲先生不一定已離開了重慶。

第三天晚上，余捷元從北非趕來，我的越俎代庖工作即告結束。

去年二月底回國，四月一日回東京。三爺（我亦改稱「三爺」）在我回東京前數日，請我和「藍天」主人賈毓泉先生去一酒家消遣，因爲三爺知我回國月餘，尚未去酒家一次；同時，他想哼幾段京戲，更要我唱一段。三爺唱了一段「打魚殺家」，我只好打起精神，唱了一段「賣馬」，賈老闆也唱了一段「珠簾寨」。

吃到深夜一時許，三爺怕我吃不消，就一同外出，各自回家。我獨身如故，雖「無家可歸」，但「自由之家」亦有「家」字，權且歸「家」了。

臨別，三爺依依不捨，緊握我的手道：

『老弟，你不要六年才回來一次，六年一次，我也只能請你一二次客了。』我深深鞠躬致謝，說是秋天一定回來，向他請安。

賈老闆送三爺回去，我回到自由之家，久久不能成寐。

天！就此一別，乃成永訣！因爲我去年秋天因事未回，而我們的三爺，竟然意外地與世長辭了！

今春渡海歸來，某晚與名作家張佛千大兄、名教授毛樹清兄在一場老友的歡迎宴會後同去「藍天」，坐在三爺生前以茶以酒會友的那一張桌子，喝着 he 遺留下來的極品龍井茶，心中感慨萬千，回「家」——仍然是「自由之家」後，又久久不能成寐。

連月睡眠不足，又兼傷風初癒，酬應頻繁；截稿前夕，抽空抖擻精神，寫此一段三生有幸緣。縱然草草成文，但以三爺的胸懷浩闊，他在天之靈，相信對我絕不見責！



# 發揚蕭同茲精神

潘煥昆

同茲先生離開我們，忽忽已過了三個多月。在這三個多月中，除了在市立殯儀館以及在陽明山第一公墓兩度拜祭之外，平時也常常想起他老人家。

自從同茲先生辭世之後，中央社的社友們似乎已失去了一個中心。在過去，他有如我們生活中的一座燈塔，我們大家會時時依傍過去，在那裏找得光明，並享受他那慈藹的清暉。我是一個以勤補拙的人，雖然所負責任有限，也沒有做出多少業績，都是整天忙得不可開交，除了吃飯睡覺之外，難得有空閒的時間。可是每逢同茲先生有所召喚，無論如何也會抽出時間，甚至犧牲休息，去陪他老人家喝幾杯酒，從國家大事談到家常，並學到許多立身處世、做人做事的道理。同茲先生不是一位雄辯滔滔的健談者，但常有幾句話點在骨節眼上，令人茅塞頓開。他就是不說話，自然表露一種前輩的風範與感召力，使人有如沐春風的感覺。

現在同茲先生已逝，失去了這個中心，以後他的老朋友、老部屬的聚會大概不會那麼多。我希望至少每年在農曆九月十八日同茲先生

的誕辰，大家仍然應該聚會一次，對他表示永遠的懷念和敬意。

去年十二月六日，同茲先生的十多位老朋友、老部屬曾在他生前的寓所，商談爲了紀念同茲先生應做的事，當時決定：(一)鑄建蕭先生銅像，置於中央社總社，供人瞻仰；(二)編印「在茲集」；(三)設立「同茲文化基金會」；(四)拍攝「蕭同茲先生的生平」電影片。這些都是極有意義的事，不過我覺得除此之外，要紀念同茲先生，我們這些後死者必須努力發揚「蕭同茲精神」，擴大其風行草偃的效果。

「蕭同茲精神」是什麼？民國五十八年爲紀念同茲先生七五壽誕出版的「念茲集」中，大家已經說了很多、綜合起來，可說包括下列各項：

(一)氣度恢闊，稟大氣魄。

(二)重視名器，堅持原則。

(三)寬厚待人，不拘小節。

(四)知人善任，兼容並蓄。

(五)得志不驕，失意不餒。

(六)不降低標準，不與惡勢力妥協。

當然，一個人的稟賦是生就的，不易有所改變。不過如果我們在

做人做事時，時刻想到上述各點，作為尺度，必可使「蕭同茲精神」得到適當的發揚。

我在「念茲集」中已經說過：『中國人的一般缺點是勤勞有餘，眼光與氣魄不足；擅長做小生意，却鮮能經營大事業。甚至許多在國外喝過洋水，研究過先進國家方法的人，仍無法擺脫這一先天心理上的限制。同茲先生却是一個顯着的例外。』他早年獻身於黨國，未為一己圖謀。如果他在盛年時趕上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潮流，一定可以成為中國的福特、卡乃基或洛克斐勒。

最後我願以輓同茲先生的一聯作結：

襟懷蕩蕩，百川廣納，所接多士皆俊彥，我幸追隨十載。

正氣堂堂，嶽立不移，恥與獨夫同鄉里，眾仰德業千秋。

# 首次晉見同茲先生

潘霖

對於同老，我是欽仰已久。那是民國三十一年，燕京大學在成都復校，重慶新聞界代表團由渝赴蓉參加燕大開學典禮，同老是代表團團長。當時我之注意新聞界人士的活動，是因為我已對新聞事業發生興趣。那年我就曾考取燕大新聞系，但當我前往註冊時，在校門口的牆壁上，看見重慶中央日報所刊重慶大學榜示，我亦被取。因亟欲與家居重慶的一位同學相聚，就去了重大。

在重大電機系就學一年後，終因興趣關係，又考入政大新聞系，從此對同老之名，更是時有所聞，但是始終無緣請益。直至民國四十四年三月，那時我服務中央日報，於國父逝世紀念日，訪問當時尚健在的許靜老（世英），談他當年膺北洋政府之命南下廣州，迎 國父北上的經過。那篇短文，敘述許靜老南下，至 國父病逝北平。

刊出後，當時主持香港時報台灣地區業務的馮志翔先生給我一個電話。他說：同老對那篇文章很欣賞，但是同老也有一些意見。志翔兄在電話裏很客氣，他用意見二字代替批評一詞，當然也沒有直接說出那篇文章的缺失所在。

人生最難得是良師，是益友。文字刊佈後，能夠獲得坦誠的批評，在現社會形態中，確是很難得的事。何況，這又是我心儀已久的一位長者、一位新聞界的前輩。因此，未經介紹，我就冒昧的去安東街蕭府求見。

記得同老初見我時，頗感愕然。經我說明來意，他才拉着我的手坐下來。

這次晉見雖然很短暫，但他給我的印象很深刻。他顯得和藹親切，那種指導獎掖後進的長者之風，我至今不忘。

那以後，仍然很少機會向同老請益，雖然偶爾在公眾場合相見，也只是趨前候安而已。因為惟恐同老也像許多政治人物一樣，儘管我認識他，他未必認識我。

直到近幾年，不時附葉明勳先生和耿修業先生驥尾，參加同老的聚會，才又有請益的機會。

同老善飲，我偏偏是量淺到口酒臉紅，所以很難承趣。同老在宴席間，對於侍飲者從不勉強，但他總是以鼓勵的態度讓人盡興。每次他對我總是那句話：『我喝多少你不管，你只盡你的量，勉強不得。』有時我也乾杯為敬，同老必定說：『潘霖的酒量又進步了。』他這種態度使我領悟很多。

某年春節，同老邀宴各報總編輯，喝F O V，我和三爺乾了三

杯，即席就睡著了。席終，同老叫醒我溫煦的說：『你進步很大。喝酒就要這樣，興趣來時就喝。這和對人處世一樣，不虛偽不做作，誠誠實實做人，規規矩矩做事。』他這種和藹的態度，獎勉的言詞，使我絲毫不覺得失禮的難為情。

應「在茲集」籌印諸先生之命，寫此短文，只是敘述我向同老請益的片斷，實不足以記同老的風範於萬一，不知同老在天之靈，尚能以教我否。

(六十三年春節於大華晚報)

# 少年時代同茲與我

鄧伯粹

後面的短文，是在同茲還曆紀念的時候寫的，有位朋友看了，認為中間有些地方不合時宜，要我斟酌，正躊躇，而他壽辰已過，便沒有交卷，把它擱下來了。

這一擱便是十年，當同茲古稀大慶時，「新聞天地」卜少夫兄來信，要我也寫幾句話為同茲壽。我寫些什麼呢，可寫的實多，却不知從何處着筆，只好把那短文找出來，刪去一些，用以報命。

又十年，同茲忽然走了。我想，在今日的自由中國，論交誼，恐怕要算我和他最久；論友情，也可說不等尋常，所以他這一走，給我的衝擊最大，而哀思也最深。現在大家相約，要為他寫點東西，以資紀念。他的為人，他的處世，他一生的事功，已有許多朋友，說得非常詳盡，用不着我再費辭。



學生時代的蕭先生（前排右第二人），前排右第一人是本文作者

惟有一點，似乎還不曾有人提到，我想說一說。同茲在少年時代，就不大愛說話，但必要的時候，他也會侃侃而談的，只是在緊要關頭，他有時會突然住口，像紀曉嵐和太監開玩笑一樣，下面沒有



了。你說真是沒有了麼，不，有的，據我的體會，只有在某幾種情況之下，他才會那樣。比方，說透了，會教人下不去，或別有原因，要待你自己去琢磨，否則他也不會無緣無故只說半截的。不料他少年時代的這一習性，却成了他日後待人處事的一種微妙的藝術。我想，他的朋舊中，總有不少人曾接過他這一招，在那一瞬間或不免有些茫然，而事後則又會恍然大悟，覺得回味無窮的。茲特舉出，連同下述短文，一併湊數。

『民國二年，余與同茲共學於湖南省立第一甲種工業學校，時共和肇造未幾，而吾儕均十八九歲少年，心雄萬里，頗以工業救國爲己任，其淳樸天真之氣，與近年高唱工業化之衰衰諸公固相若也。

『少年時代的同茲，美風儀，愛整潔，好朋友，且沉靜寡言，能舍己助人。在他先天的性格中，有此等立身處世的優點，故能忠於國，忠於黨，忠於所信，忠於所事，其有今日的成就，非倖致也。

『六年畢業後，同茲任職於湖南電燈公司，余執教於省立乙種工業學校。適督軍團造反，解散國會，是年秋，同邑湖南陸軍第二旅旅長林修梅浴凡先生，奉 國父命，聯合零陵鎮守使劉建藩昆濤先生，在衡陽興師護法，進軍鄂境，是爲中國國民黨革命武力北伐之嚆矢。



民國六十年元旦的一次聚會（從左至右）：後排鄧伯粹、蕭先生、陳歧曾，前排羅金玉小姐、鄧夫人、陳夫人

『七年春，北洋軍閥以吳佩孚、張敬堯等爲先鋒，傾巢南犯，長沙不守，余隨軍走湘南，同茲旋亦遠去津沽，爲各自前途謀新的發展。未幾歐戰告終，世界局勢更趨複雜，不僅公理正義未見伸張，而

弱肉強食之象反變本加厲；至於國內情形則更與日俱非。在此內憂外患交迫之中，青年對於時代的認識，及其在責任上的自覺，自亦發生激變，吾儕後日之所以改途易轍，不復致力於工學與工業者，實時代使然。蓋中國問題，即至今日仍以政治風氣之改造與經濟制度之建立為當務之急，必如此，而後始可言工業之發展，否則工業化云云，實長夜漫漫，不知何時之可旦也。

『吾等同期同學，在預科為四班，合計二百四十餘人，及入本科，已不及二百人，然習機械者猶五十餘人。在中國勞工運動史上，首為勞苦大眾犧牲其生命之黃愛（學名正品）、龐人銓二君，均為同期同學，而黃愛則更為吾等機械科同班。同茲亦當時領導勞工運動首要之一，其倖免於難，實間不容髮。自後在湘在滬，冒險犯難，組織勞工，爭取羣眾，與中國共產黨及帝國主義者苦鬥，對中國國民革命之貢獻實多，其青年時代之奮鬥精神，於此可見。

『今避秦海外，欣逢同茲學長七秩大慶，除追隨諸君子之後，敬致誠摯之賀意外，謹陳數語為老友壽，幸彼此珍重，願明年此時，能在大陸為兄稱觴也。』

# 敬業樂群的楷模

鄭彥棻

同茲先生和我相識頗早，遠在民國十八年，我代表駐法總支部回國參加本黨三全大會的時候；但彼此工作不同，過從的機會並不甚多。不過我們有許多共同的朋友，因此相互間也有相當的認識。彼來我奉命在中央黨部服務，追隨吳鐵城先生工作，曾從鐵老的談話中，獲知他對同茲先生甚為推崇。鐵老是我素所敬佩的前輩，交遊滿天下，慧眼識英雄，同茲先生能獲鐵老的賞識，自必有他拔萃超羣的才量。迨後同茲先生把當年尚未為人所重的中央通訊社辦得有聲有色，不但成為國內唯一最大通訊社，而且躋身世界各大通訊社之列，更使我對他由衷欽佩。我平素最敬重實幹與苦幹的朋友。同茲先生辦理中央通訊社，使之從小而大，自微而著，可說都是由一點一滴的努力成果積累而成，這種腳踏實地、辛勤耕耘的精神，充分符合實幹與苦幹的要求，確實值得敬佩。

本黨北伐勝利之後，曾在國內外先後創辦不少的黨報和通訊社，以加強本黨的宣傳工作。可是其中每因經營不善而不能長久支持，能夠奠定堅實事業基礎，繼續予以發揚光大的，直如鳳毛麟角。在極少數碩果僅存仍能為本黨宣傳工作努力不懈的文化機構中，能夠蜚聲國

際爲人所重視的，恐怕仍要以經由同茲先生長期辛勤培育茁長壯大的中央通訊社，爲個中翹楚。

同茲先生去年以八十高齡逝世，我親往靈前弔祭，愴懷本黨老成凋謝，內心有說不出的悲傷。但是見到他身後的哀榮，聽到許多朋友對他深切的追思，覺得同茲先生遺愛長留人間，心中又略感寬慰。在我所接觸的許多新聞界人士中，他們不但敬佩同茲先生是一位新聞界的堅強鬥士，更稱頌他是他們個人的好長官、好導師與好朋友。足見同茲先生不但所致力的事業有輝煌的成就，其處世與爲人尤有更大的過人修養。一個人能够在進德與修業兩方面同時有不平凡的造詣，確是不容易的。

據我個人粗淺的看法，同茲先生所建樹的中央通訊社之能規模宏遠，發揚光大，應歸功於他孜孜不倦、數十年如一日的敬業精神；他所領導的中央通訊社工作同仁之能迄今鏗而不捨，仍然分別在不同的崗位上爲中國新聞事業而奮鬥，並且對他的敬愛始終不衰，恐怕已不完全由於他在事業領導上的才能，而應歸功於他平日與同仁相處時坦誠真摯的友愛與樂羣的表現。能敬業，其所致力的事業乃能大；能樂羣，其對人所建立的友誼始可久。我認爲：同茲先生敬業樂羣的精神，應爲其能够於生前成就事功，於身後長留遺愛的關鍵。

敬業需要對工作的長期熱愛與毅力，樂羣需要對朋友有無限的真誠和寬容，這些都是說來容易而必須具有過人的修養功夫才能做得到

的。同茲先生生平事略的作者，推崇他任事高瞻遠矚，氣魄沉雄，爲人性行高潔，襟度冲夷：用人以適才適所爲準繩，不以異己而置疑，治事以分層授權爲原則，不以小疵而苛責；與人無競，而是非義利之辨極嚴，沉默寡言，然待人接物一本誠信，視同事如昆季，能急人之急，雖從井救人亦無反顧。在當今之世，這些都是絕爲難得的美德，但是我相信對於同茲先生來說，這些都是極爲平實的稱頌。

同茲先生的逝世，對於中國新聞界乃是絕大的損失，但是前輩風範，典型猶在，相信今後繼起獻身中國新聞事業的青年必能步武前賢，作更多更大的貢獻。

# 蕭同茲精神與我同在

盧祺新

我雖於三十九年就已離開中央社，但和蕭同茲先生仍然保持聯繫，經過台灣前往香港都曾拜望過蕭先生。五十九年秋，我和內子一回到台灣，全島的天氣既下雨又寒冷，因此祇好把訪問限於台北和近郊。我們住在老朋友王小亭兄家裏，他是位已退休的攝影記者，住在陽明山，那裏來往於台北的交通不太方便。氣候的酷寒與時間的衝突使我不能約定一個適當時間去拜望蕭先生。不過，我們曾藉電話長談，談到我們在美國的共同朋友和他的兒女，他的兒女除了長公子孟能在台，其餘全都定居美國。他在電話裏所說的，有一句話我永遠記得。他說：『祺新，我們有多年的友誼，不是泛泛之交，也不像每天都碰面的人那種交情，用不著拘泥於禮節，祇爲了客氣而來做短暫的拜會。』他并要我不必特別去看他。這是我五次到台灣唯一沒有去看蕭先生的一次，但他不以爲忤，也未影響到我們的友誼和相互間的尊敬。這種友誼和相互間的尊敬，一直到他與世長辭都沒有改變。

## 過境時驚聞噩耗

內人和我一向認為中國是我們的祖國，我們喜歡台灣和遠東，在那裏有很多朋友和親戚。三年以後，即六十二年，我們決定再往遠東作一次旅行，所訪問的四個國家天氣都極好。承中央社魏景蒙社長的安排，使我得以到水晶大廈拜望蕭先生。日期是六十二年十一月三日，時間是上午九時。我做夢也不可能想到，八天以後，當我們兩夫婦在曼谷時，蕭先生便故世了。十一月十四日我在台北機場過境小停，王小亭兄和我會面，告訴了我這個不幸的消息。我拜訪蕭先生時，他在寓所門口迎接我，我們單獨坐下來喝茶，喝的是他最好的茶，那是我所一向喜歡的。我望着遙遠的山峯，四十年來為我所迷戀的許多回憶一齊湧上心頭。我們談了一個鐘頭，談到我們的家庭和我們共同的朋友，以及他所居住的這棟高聳入雲的大廈。當我最初在門口見到他時，他已穿好上裝，結好領帶，並在整理若干文件。他顯得比我上次見到時少許蒼老了一點，而且步履也遲緩了些，但是身體健康，精神矍鑠。我說我聽到他不久將慶祝八十華誕，並且希望屆時仍在台北得以參與盛會。他笑了笑說，還有一年時間，因為他僅七十九歲，要到明年才是八十整壽。我說我希望能再回來特別參與盛會。

我曾告訴蕭先生，特別感激他在我的記者生涯中所給予的慈愛和協助，以及他所給予我的機會。我補充說，如果不是他的關懷與鼓勵，我不會從事新聞工作如此長久。蕭先生堅持說，不論我有甚麼成就，那都是由於我自己的努力，由於我對中央社的獻身與効忠，以及勤勞的工作。我在中央社工作的那許多年，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在上



海分社任職時張學良劫持 蔣委員長事件。我正在辦公室，因而有幸得以向駐在上海的許多外籍記者證實 委員長脫險的消息。

我首次會見蕭先生是在民國二十一年，由此產生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友誼。當時我修完密蘇里大學研究院課程，正回到北平在燕京大學任教。從上海出發，在南京小停，有一位朋友建議我去會見蕭先生，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他。雖然我在燕京大學求學的最後一年曾自由投稿寫過一點東西，蕭先生對我的背景雖無所知，他却邀我參加中央社，協助發展他當時剛剛籌備的海外英文發稿業務。我告訴他，我不能接受他的好意邀請，因為我已應燕大之聘。直到民國二十六年，我們沒有再會面。在燕大任教一年半，我便離開北平去上海大陸報營業部，在董顯光先生那裏工作。又一年，我加入了上海路透社。我對中央社的海外業務發展計劃發生興趣，於是想，如果我提出申請，不知蕭先生是否仍要我。雖然我知道董顯光博士是蕭先生的好友，但我沒有要求他幫忙替我從蕭先生那裏謀取一個職位。我從上海直接寫信到南京給蕭先生求職，沒有經過約談或者考試，他便立即要我到上海分社，和任玲遜先生在一起工作。任先生是我在燕京的同學。不到六個月，蕭先生便調我到香港去接掌香港分社，使我深感意外。他知道對日戰爭已不可避免，需要一位分社主任能應付外國記者和中英文報紙，也能與香港政府維持良好關係。

## 君子之交淡如水

回顧我在台灣和蕭先生的幾次見面，民國五十年那次是令人傷感和難忘的一次。在前幾次旅程中，我和蕭先生見面，並和他以及中央社老同事餐敘一向都是很愉快的。但這次他堅持要到旅館來看我。我當時想那是頗不尋常的。當他來到時告訴我，他的夫人已於前些時過世，但感到快慰的是她在去世之前已成爲一位基督教徒，加入教會。在那種情況之下是沒有多話可說的。他的眼睛濕潤了。我察覺到他很是懷念她。我們分手時，兩人都很沮喪。

我們相識已經數十寒暑，我加入中央社之後，時常爲了公務和私事互相見面。可是，五十九年在台灣通電話時他所說的話，現在變得更有意義了。他辭世以來，我已瞭解他關於我們特殊和不尋常的友誼所說的話實具有深奧的真理。他遵循中國人的古老哲學：君子之交淡如水。

二十六年我奉派前往香港時，中日戰爭已迫在眉睫。成千上萬的人從北方逃到香港。對我來說，從二十六年到三十年是多事之秋。中央社香港分社變成一個情報交換所，隨著二次大戰的逼近，問題叢生。香港政府不喜歡中央社而關閉了我們自己的電台。英國電台負責抄收我們外來的電訊，並替我們發送外播的電訊。我們變成許多人的情報交換所。幾十位美國和歐洲記者在前往重慶採訪戰爭消息途中都在香港小停。我們必須幫忙預定機票和旅館房間，那在當時是極端困難而且受到限制的。有好幾家中文報紙從華北遷移到香港出版，其中有大公報，發行人胡政之是我在天津時便認識的。成舍我的世界日報

以「成報」的名義發行了一份報紙，其他許多小報也跟着出現，隨即與香港四家老的主要中文報紙發生摩擦。這些老報對新來者的競爭感到威脅，發動香港的報販對新報紙實行抵制。我不得不做和事佬，使問題和平解決。我和英國政府的香港華人事務廳以及美國總領事館的人員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 蕭先生香港之行

三十四年到三十六年，我曾兩次前往重慶考察。有一次我曾到過成都、昆明，然後經由河內與海防乘船回香港。在香港最爲奇特的一次經驗是發生在大批外國記者湧至香港期間。在許多外國記者之中，我和一位代表法蘭克福人報名叫索琪的德國記者成了好朋友。他後來證明是二次大戰期間在遠東替蘇俄工作的一名最特出的國際間諜，而於對日戰爭勝利前在日本被處決。索琪原是德國人，祕密歸化爲蘇俄公民，並加入共黨情報部門工作。他奉派對日本人進行間諜活動，經常從他的駐地香港前往日本。他酷嗜飲酒和女色。時常在早茶時間打電話給我，要我和他一起飲酒。他的行動詭祕，而他死也死得像他活着一樣詭祕。他是「三面人」一書中的主角。畢竟我沒有甚麼祕密給他，因此我們僅談論中日戰爭，而他對中國顯得並不感到興趣。許多年後我發現他是二次大戰期間最特出的間諜時，曾有多夜睡不著覺。

在難民從上海湧至期間，我接到蕭先生的電報，通知我，他的家

屬正從長沙來到香港，要我照顧他們。因為香港人口擁擠，他們就住在我家幾個星期，後來我們才替他們找到一棟房子，我們兩家十分親近，而他的長公子孟能對內人更是非常好。蕭先生的女公子到美國求學，嫁的是一位前中國空軍軍官，現在他已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工業家，有兩千名美國職工在他下面工作。次公子申建是一位建築師，在美國工作。最年幼的伊文是內人最喜歡的，他繼承了他父親的衣鉢，在密蘇里新聞學院畢業後，一直在紐約市附近一家美國報館工作。

蕭先生從未像許多其他官員一樣從重慶到香港來渡過一次假。他總是在重慶和他的工作人員在一起，以備應付緊急情況。可是，在二十七年底，他突然飛到香港來了。他是負有特別使命的，但我們不知道。我僅僅以為那祇不過是由於在重慶長時間的緊張而到香港來輕鬆一下罷了。他僅有一次和我一同外出，那是在和一個集團約定的一次午餐時間。那個集團每週集會一次，以交換有關中日戰爭的情報。我記得該集團的人員包括杜月笙、俞鴻鈞、孔令萊（孔祥熙的公子）、吳鐵城將軍的弟弟吳子祥、大公報的胡政之以及另外幾個人。由於蕭先生的聲望以及他與華北許多人士結識，這些人對我和對中央社都很友善和肯幫忙。有一天，蕭先生失蹤了，據解釋，他拜訪「朋友」去了。結果證明他是去看從上海逃出脫離日本扶植下的汪精衛傀儡偽政權的投誠來歸人士去了。這兩個人是陶希聖和高宗武。他們於兩天前從上海抵達香港。據杜月笙先生告訴我，他們這次帶了一些重要文件，也就是「日汪密約」的全文。他們抵達的消息沒有公開宣佈，但

我在他們抵達時曾會見他們。蕭先生得到那些文件之後，便立即飛回重慶，沒有告訴分社中的任何一個人。

陶先生決定重新參加政府，當他遷居台灣後，繼續為政府工作，現仍在台。高先生則決定和他太太前往美國。據認識他的人說，他在美國改名換姓，在股票市場上賺了不少錢，很少出來和他在大陸上認識的朋友見面。這是在香港最令人興奮的經歷之一。杜先生和吳將軍兩人都担保這兩位投誠來歸人士的安全，並安排他們來到香港。直到今天，香港沒有一家報紙知道這件事。

中央社上海分社停止工作後，大多數編輯人員都被調到香港分社。那是一次愉快的重聚，使我得以和許多老朋友與同事再度工作在一起，其中包括任玲遜、徐兆鏞、張慶彬、英倚泉、宋德和（已故），使得我們的工作陣容大為加強。自從那時以來，這幾位朋友均已退休，或改任他職。

## 維持崇高的標準

二次大戰的戰雲密佈於太平洋上，我在香港工作不到四年，蕭先生從重慶電召我去和他以及當時的宣傳部長王世杰會商，當即訓令我立即前往華盛頓成立辦事處，而成為中央社第一位駐美特派員。我回到香港收拾行李，裝了兩大箱，搭機飛往美國。我在華盛頓除宋子文博士外不認識一人，後來會見了胡適大使和大使館公使劉鏞。但是政

府明瞭，如果日本進攻香港，則該殖民地將被日軍佔領，因而在我起程赴美前，派我和英國戰時情報處處長一同前往新嘉坡。他是一個極肯幫忙而友善的英國人。不幸新嘉坡辦事處延至日本戰敗後才成立。幸運似乎一直伴隨着我，在日軍來到之前我已離開北平，在入侵者攻取上海前，我已離開。三十年一月，我和我的家屬於珍珠港事變前十一個月離開香港，又是非常幸運。雖然日機曾炸珍珠港，但他們從未抵達美國大陸。我在戰時那幾年，全都是採訪有關聯合國及其他國際機構成立的消息，爲此我將永遠感激蕭先生。

在我和蕭先生共事期間，發現他是一位富於同情心和肯幫忙的上司。他知道他每一位工作人員的缺點，從不批評或處罰他們。他對窮困的人慷慨，對陷於困難的人肯給予幫助，一向信任他的同僚。當他用一個人時，便給予他全權，從不干涉他。我記得有幾位遷到香港來的北方新聞記者曾向蕭先生批評我沒有給予他們特別幫忙。蕭先生告訴批評我的那些人說，他既已要我負起主持香港分社的責任，因此便給予我全權照我所認爲對的方式去做。廣東省主席也曾向蕭先生抱怨，香港分社的英文組沒有把中文電訊全部翻譯成英文。那些電訊對於日本飛機在廣州附近的損失情形過份誇大而不正確。我和蕭先生一樣相信事實和真象乃是新聞報導的基石，而中央社的聲譽便因其報導之正確而增加。

雖然蕭先生已不和我們在一起，他那幾十年來經過許多艱苦歲月貫注在我們社裏的那種精神，以及他所堅持的一些原則，仍將繼續和

我們同在。許多往日的同僚已經故世或退休，但那些留下來的以及後起的年輕一代當會知道，蕭先生曾如何努力工作才使中央社得有今日，以及那些前曾和中央社發生過關係的人對於他的成就全都感到驕傲。今後有待將來的一代中央社記者去維持蕭先生所定下的崇高標準。

# 懷念蕭兄同茲

戴愧生

知友蕭兄同茲，以全副精神，時時刻刻與在遠或在近的為中央社服務諸同事相與聯繫，使中央社有輝煌成就，決非偶然。至為人風度修養，偶受挫折或刺激，皆以泰然處之，確不是一般人容易學習的。君子疾浚世而名不稱，白香山詩「死後留名鬼不知」，中央社諸君子念茲集在蕭兄七五誕辰付刊，最具意義。謹以蕭兄之風山高水長為念。



# 從兩個分社看蕭先生

魏紹徵

從痛苦的壓迫中，榨取出靈魂的佳釀，  
在荒漠中暢飲甘泉，  
受了挫折，仍像在插翅翱翔。  
這是造物主的意志，  
我決不撲翅掙扎，但安定從容。  
還要引吭高歌，使歌聲直達蒼穹。

——摘錄「荒漠甘泉」詩句

同茲先生故世的次日，沈宗琳兄與筆者會面，這天在談話中，我們感慨新聞宣傳的艱難和中央社在同茲先生主持下的成就，也回溯若干中央社朋友辛勤的奮鬥。時光過得真快，轉眼新聞界眾所尊稱的蕭三爺已故世百日。我雖在旅美途中，仍願書我與中央社二、三事，以應「在茲集」編者之囑。

筆者與中央社過從甚早，而在濫竽新聞宣傳數十年中，與中央社往還亦最密切。當民國十九年在湖北中山日報工作時，每晚隔桌對面

編報的是當時中央社分社主任後來成了同茲先生左右手的曹蔭釋兄。蔭釋兄是以中央社工作為主，而以中山日報的要聞編輯為兼職，實際上中山日報的待遇較中央分社優厚倍之，他每晚必在中央分社發一次稿後才來報社，而午夜又趕回分社發最後一次稿才回家休息。

筆者曾問他為何要如此辛苦，他說中央社是國民黨初創的全國通訊機構，人少錢少，既已任職就要盡責，一個地方不好好做，會影響全體的。中山日報人多經費雄厚，他在工作時間上稍為少一點，無礙於大體。因此他在中央社所耗的精力心思，往往不是職責與服務條規範圍之內的事。例如南京總社有重要消息延到清晨一、二時還沒有發出，分社電台人員久等不耐要早退休息，蔭釋兄不能以權力來加以限制，因為收電訊的是技術人員，分社待遇菲薄是限制不了人的，於是蔭釋兄拉了電台人員下象棋，一盤又一盤。他所以如此之辛勤耕耘，乃是為了酬答同茲先生之知遇。因此，後來在重慶以至復員，中央社內外多少事，同茲先生都是交由蔭釋兄負全責的。

復次，筆者在民國三十八年接辦成都中央日報，在未正式接手之前，是借住在中央社內，分社的編輯部在城內，而電台在鄉下，每晚電訊的轉遞，電話的聯絡，當時的人手是不敷用的，又因中樞已轉徙廣州，經費的撥付，不能按月收到，分社在向各方面挪借度日。但是筆者所目睹的，分社員工努力盡職未嘗稍懈。及至最後匪陷成都，中央分社的人員是工作到最後的一刻，陶希聖先生在「潮流與點滴」一書中，指出這種戰鬥精神是令人感奮的。

筆者略舉兩個分社的人和事，旨在說明在同茲先生精神感召下，中央社總社以至各分社的工作同仁，都是忠勤自勵，卓立奮進的新聞鬥士，他們受到中央以至地方行政首長的尊重和重視。在今日台灣有不少在大陸曾任省市行政首長的，都會認為這是確切的事實。

# 生而無憾，死更無憾

魏景蒙

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晚間十點一刻，我國新聞界元老中央通訊社前社長蕭同茲先生悄然去世，耆賢遽逝，國喪元良，噩耗傳來，曷勝悲慟。

遠在民國十七年北伐勝利前，我就認識同茲先生，記得那時他追隨吳鐵老到北平，有一個重要任務要完成，我在北平當記者，對他們此行的任務早已有點了解，爲着迅速採得正確新聞，所以我就常常去看他們，就這樣認識了。「溫文瀟灑，倜儻不羈」，是我對他最初也是記憶最深的一個印象。

後來我到上海參加大陸報工作，同茲先生在南京任中央社社長，他偶爾也到上海來，我們見面，除了話些家常之外，也談些新聞和工作上的問題。

—

抗戰發生後，我離開上海，追隨政府到漢口參加國際宣傳處工

作，中央社也遷到漢口，同茲先生仍任社長，因業務關係，我們見面的機會更多，有時我也趁機向他請益。中樞遷到重慶之前，曾先遷湖南的南嶽，我在南嶽工作。湖南是同茲先生的故鄉，中央社且在長沙設有分社，因此他常往來南嶽與長沙間。在南嶽，我們不但見面的機會更多，彼此也更為熟稔了解，友誼也曾向前跨進了一大步。

廿八年冬，國際宣傳處遷到重慶，中央社也已遷來，宣傳處的業務與中央社關聯很多，加以我和同茲先生過去的認識，我和他過從也就更密，一星期至少要見幾次面。我元配姓蕭，與他同宗，我的小孩都親熱地把他叫做舅舅，他也非常高興地接受此種親切的稱呼。

同茲先生既好客，又爽朗，在渝友好都喜歡在他家裏輪番小聚，常到蕭家的座上客，除我之外，還有董顯光、陳博生、潘公弼、許効炎、潘劭昂、曹蔭穉、錢滄碩諸先生。那時候，同茲先生的工作非常忙，大家的生活也非常苦，可是在苦與忙中，我們總找些樂趣，聚在一起，或則天南地北的閑談，或則淡酒粗餚的小吃，每次無不賓主皆歡，興盡而散。而今這些老友中，有的已作古人，有的參商異地，往事成塵，風流雲散，滄桑人事，能不感慨系之！

## 二

抗戰勝利，我回到上海工作。董顯光先生因赴美辭去中宣部國際宣傳的職務。在日本投降之初，中央政府還未能進回南京的青黃不接

之際，王雪艇先生派我主持光復後的國際宣傳業務，辦事處設在上海。同茲先生仍在南京擔任中央社社長，有一天，他從南京到上海公幹，順便看我，在閑談中，他懇切表露希望我能到中央社幫忙。我向他說：『顯光先生走了，我也想動一動，不過，如果他回來，我仍要回到他那邊去。』同茲先生說：『好。』可是天下事就有那麼巧，顯光先生忽然要從美國回來了，離美時，特地給我一封電報，說他要出任我國第一任新聞局長，要我去工作。這樣，我到中央社的事，當然只好作罷。記得在抗戰中，同茲先生就希望我到中央社去，他常說，大家能在一起工作多好。直到勝利後，他在上海又正式邀請我，我也答應了，但終未成爲事實。

大陸局勢逆轉，政府撤退台灣，三十九年九月中央社改組，同茲先生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我奉命受任中央社副社長，總算實現了大家在一起工作的願望。直到我離開中央社到英文中國日報後，這其間，同茲先生對我愛護備至，不管大事小事，總是不憚其煩的一一指點我。「如坐春風，如沐化雨」，這就是我的感受與體會，現在回憶過去那一段時間，我實在太愉快了。後來，我又到中廣、新聞局，同茲先生也離開中央社，但仍常常見面。我和同茲先生的友誼，莫逆於心，久而彌篤。直到現在，我總覺得他的形骸雖先我而去，但他的精神却仍然活在我們的心裏，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我和同茲先生相交四十餘年，隨著歲月的增加，友誼濃了，了解也深刻了。我覺得他那種閑雲野鶴般的瀟灑氣概，光風霽月般的沖淡

襟懷，和拿得起放得下，和光而能同塵，在悠閒中帶著一股堅定毅力，是書生亦是俠士的性格，是常人所不及的。

### 三

他領導中央社，無論遇如何困苦緊急的事情，總表現得那麼從容不迫和剛毅堅定。他對部下愛護關切，有如家人，凡中央社同仁，無不對他十分敬愛。我更在同茲先生處，學習到許多待人接物、立己立人的道理，使我這一生受用無盡，獲益良多。我對他視之如前輩，親之如至友，「平生風儀兼師友」，這句詩正好是我和同茲先生關係的寫照。

同茲先生去了，蓋棺論定，大家對他的贊語很多。但以我的認識，只有「無憾」兩個字，才可以作為他一生的總結論。他對人接物，處理公務，總是表現得那麼從容不迫，爐火純青，既不執着，又無掛礙，恰到好處而無悔無憾。唯哲人方可無憾，他真是我心目中的哲人。同茲先生，你雖先我們而去，但你在生前，有那麼多朋友，敬佩你，親近你；你在死後，又有那麼多朋友，追思你，懷念你；因此，你是永遠不寂寞的，你是永遠活在我們心裏的，九泉有知，當更無憾。

# 留給我最後一包烟

羅金玉

相識、相聚、相知二十年。三爺是我的良師、摯友，也是保齡球場上的好搭擋。

我出身清寒，沒有讀過什麼書，加上容易引起人們誤會的職業，在心理上多少有點不平衡。寬容大度的三爺，很細心、耐心、不着痕跡地，幫我消除了這些不平衡。他經常帶書給我，教我讀，教我寫，培養我讀書的樂趣。他以實際行動，讓我體會、了解一個受人尊敬的人，不在於金錢的多寡，地位的高低，或職業的貴賤，而在於一個人的人格和善良的心。

我性急，講起話來聲音大，感情又容易衝動。

三爺的從容不迫，輕聲慢語，很自然地影響了我。他從來沒有扳起面孔說教，也從來沒有對我說：『別性急！』或『請說話小聲點好不好。』他是那麼不自覺、無意地改變了一個人的缺點。

他知道我的感情容易衝動，深怕我上當，常常勸我：不要一下子把全部感情都放出去；人家給你十分，你不妨保留一分。但是，他却



一點兒不保留地對我賜與了真情。

三爺對人，不是物質的，不是表面的；是精神的，充滿着赤忱。他從不輕視人，對各階層的人都一樣尊重。只有跟他在一起，你才會發現：人，原是平等的。

十一月十一日，三爺噩耗傳來，多少飯店的服務生，球場裏的小弟小妹們，爲這位慈祥的長者而哭。

十年前，三爺曾患了兩次心臟病，他遵照醫師的囑咐，戒烟、戒酒。台灣有了保齡球以後，他老人家開始以打保齡爲運動。幾年來，他的心臟和血壓都顯得很正常。

我們一起學打保齡，天天我陪他在榮星保齡球館消磨一個上午。最初，每人打三局，漸加到五局，最多時，各打六局。我們曾聯合參加「日月組」比賽，得了第四名。

最近一年多，三爺體力稍差，保齡球每次都只打三局或四局。在他去世的前兩天上午，他才玩兩局，就停了下來，說是喉部和胸部都不舒服，要回來休息。我們在球場一別，却成永訣。

他上車離開球場時，留下一包沒有抽完的「三五」香烟給我。二十年來，他從來沒有留給我一支香烟。這是他的最後一包烟，他留給了我，莫非他已有預感？

點燃一枝烟，黑暗向我湧來，我怎麼也不肯相信這位與我相識、相聚二十年的知己已經離去。三爺，你不是說，朋友是可以好一輩子的嗎？你怎麼先走了呢！



蕭先生和羅金玉小姐在榮星保齡球館參加日月組比賽得獎。中為榮星保齡球館經理陳炳煌

# 蕭三哥軼事

## 關棠

同茲三哥對黨國的功勳及對新聞事業的發展與貢獻，不特我國稍有知識的人都知之，即在國際間亦有聲譽，報章、雜誌常有刊登，不必多贅，我現在祇寫他的幾件軼事。

## 慷慨重義

慷慨重義：朋友有求助者，他必予週濟，甚至友好中有困難者雖未向他求助，他若知之，多自動給予接助，一向如此。單就我個人說，我前年在香港教學退休，去年一月底，申請入台久居，攜來少數現款，祇勉強維持水平線的生活。五月中旬忽患毒瘤，入舊中心診所施手術，他常來看我，安慰我，並自動洽商醫生及護士長為我僱用日夜班看護各一人，費用由他負擔，足以證明所說非虛。

常聞中央社同仁說，三哥對同仁，愛護如家人，凡遇有急需，請求預借薪水者，無不批准，在事務部方面，按照規定，當待下一個月，或分月扣還。有時借薪者因有特別急需，如婚喪或疾病，預支兩三個月薪水仍不够用時，他會很慈祥的詢明後，由他個人另行量力援

助。或者有人認為社中同仁故意為社長宣傳，使社會人士對他發生好感，增加中央社的聲譽，這種觀念是錯的。現讓我將所見所知說明。

民國二十九年我在重慶中央銀行服務，偶然到中央社訪他，正在社長室與他談話，適有一位職員，因重要事項，來辦公室請求他准予特別借支，並懇當面吩咐事務部在三個月後，分次扣還。三哥當即按電鈴喚主管出納者進來，囑即交兩個月薪水給某君，出納員問分幾次扣還，三哥說：待我詳細問明後，由他與你接洽。出納員走後，三哥對某君說：『聞你已經借支過不少，現在我開一張支票，是你所借支的數目，你去銀行提款後，好好地保存，不可花掉，這筆款是我個人送給你，以便你分次歸還事務部的。你現在手中等於有四個月薪水，想可以應付了，至於我特別送給你兩個月薪水，不必對別人說。』某君鞠躬道謝離去。三哥對我說：『現在的青年多好花亂用，與我們年少時不同，不過某君很能幹，肯負責，有前途，我不忍見他困難而不予解決。』三哥這樣的愛才和對同仁的愛護關懷，是我親見親知的事情。由此可知他的仁慈慷慨而樂於助人確是事實。

## 選賢任能

鼓勵青年，選賢任能，對同仁信任禮待：當三哥帶同高君仲芹等接收中央社後，即着高君到各地看看各報館以便決定建設的步驟，和技術上的需要。聞高君花了四年時間，業務才逐漸進展，無線電通訊

網才粗具規模。因編輯工作繁忙，人手又不多，惟有把中文電報機械化，代替人工譯電的方式，才能事半功倍，而且迅速，俾可與世界上第一流的通訊社，在新聞通訊方面達到同等的地位。

高君對外宣布要到外國考察學習以使中文電報機械化時，有人曾以癡人說夢譏笑之。但三哥認為有志氣，立刻表示贊成支持，高君因此達到出國的願望。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要發生，高君出國前，曾建議成立中央通訊社戰事通訊網，不過申請經費頗困難，而三哥竟允許提用折舊費購買，兼自造發報機，當時也曾有人認為高君有神經病。後來中日戰事爆發，南京電台雖被日寇轟炸，而在抗戰期間，新聞報導始終未曾停頓，并且引致高君先後發明中文打字機，蜚聲中外。此乃鼓勵青年，選賢任能，負責信任同仁的效果。

陳君博生為新聞界權威，世所共知，但才高而骨傲，不輕易為人任使。三哥優予禮待，以長輩視之，事無大小，多與商討。陳先生受他感動，竭盡忠誠，先赴日本，旋回總社，成為三哥第一名助手，中央社的成功和聲望，陳先生與有力焉。由此可見三哥的知人善任，確有領導才能。



民國二十年六月一日蕭先生隨吳鐵老訪東北，在哈爾濱水上俱樂部留影（從左至右）：前排吳鐵城、李鳳、（不知名）、蕭先生；後排張震西、簡孝純、王紹季、李芳

## 絕不負人

篤實誠信，絕不負人：民國十八年冬，中央政府特派閣錫山為陸

海空軍副總司令，派吳委員鐵城監誓，三哥奉調偕行。先到北平聽候閻決定就職日期，然後赴太原。吳鐵老與楊氏夫人住在舍下，三哥則住中央飯店，鐵老對當地黨政軍人員及銀行界領袖難免往來應酬，謙飲徵逐，三哥亦然，因攜款不多，常感不够應付，洽商我先代墊款在交通銀行開一活期往來存款戶，以便需用時可以開支票或透支，從未失信。在北平時，他自己已感不够應用，若遇友好有急需時，他仍願透支相助，他的仁慈俠義，令人敬佩，故順道及。

當時閻錫山一面暗與汪精衛、馮玉祥籌備組織擴大會議，在北平成立偽政府對抗中央政府，但尚未宣佈發動，一面派交際處長潘蓮如到北平表示歡迎鐵老。迨北平行營主任何公雪竹往太原晤趙戴文後，得悉閻等反叛消息，密告我轉達鐵老要注意（因雪公自己亦忙於應變事，無暇分身晤鐵老）。鐵老得悉閻反叛消息，知閻已不願就副總司令職，乃急謀對策，三哥亦多所贊助，在我家商討後即着張震西兄與三哥共同草擬報告中央電稿，核閱後即交何雪公代為發出。鐵老與三哥便離北平先赴天津，翌日我護送楊氏夫人乘火車抵津即返北平。鐵老旋奉中央政府命令赴瀋陽與東北保安總司令張漢卿聯絡。我知東北軍政人員，多好應酬兼玩牌，三哥初到瀋陽時，亦由我親函介紹三哥與鐵老與奉天分行襄理李振五相識，並託李君轉洽陳漱六經理，如三哥需用款時望照付，轉北平分行帳，由我負責，三哥亦絕不失信，而且依期歸還。

## 重情念舊

對人固重情感，對住居地方亦然：我自民國十八年與他相交後，他三次偕鐵老到北平都住中央飯店。我記得有一次，他抵平後，該飯店客滿，無空房（時我家已招待鐵老與楊氏夫人居住，飯廳，甚至女客廳，日夜多用以分別與賓客交談接洽，無法招待三哥，深以為憾），他祇得暫住別的旅館，一俟中央飯店有空房即遷住，仍住對他慣居的地方。

抗戰前他在南京住沈舉人巷，巷口甚窄，汽車出入頗不方便，他因為住了很久，不願他遷。勝利後，他原想仍回該宅居住，祇因該宅在抗戰時已被破壞，且是租用的，不便代業主重新建蓋，仍有依依不捨的意思，遂住珞珈路馮君有真的住宅。所以我說他不特對人有情感，即對住居地方亦然，由此可以證明。

## 寬恕容忍

對人能寬恕容忍：「念茲集」張君民熙所寫一段，有云：『在抗戰期間撤退到重慶，有一天有一個工友做錯了事，我年少氣盛，毫無修養，拍桌跳腳，破口大罵，鬧得聲震屋瓦。蕭先生在同樓的一間辦公室辦公，當然大受我高聲叫罵的影響，可是他當時沒有來制止，也沒有叫人來制止，祇在過幾天遇到我的時候，對我說：「你那天那樣



的鬧法是不對的，我相信你會改過的。」』由此觀之，在一般機關的首長，能這樣容忍寬恕下屬，誠屬罕見，所以社中同仁對他的尊敬和盡職，固非偶然。

再就應酬消遣方面言，在北平當時社會上交際，或在家宴客，多好玩幾圈麻雀牌。一次鐵老在我家請客，我因代鐵老招呼不打牌的客人未入局，在週旋客人間，得見三哥手是筒子清一色的滿貫牌，同桌者早已知之，他對面的客人是混一色，有紅中三只，發財一對，另有一二筒三只三筒及四五六筒，也是滿貫的牌。當時三哥已聽和，等三六九筒。桌上已出過一只九筒，六筒未出過，三哥上家是六九筒和牌。對方知自己有三只三筒，發財尚未見過，可能別人亦有一對，或者排在很後，和牌的機會較少，又猜度下家是筒子和牌，因為他打七筒時，下家似有收牌的意思，於是拆六筒打出，下家果然是聽六九筒和牌。對方放「衝」（與銃字諧音）的人笑嘻嘻很自得的對三哥說：『真抱歉，下家截了您的滿貫了。』正要舉手翻看三哥的牌底。三哥也很輕鬆的笑著對他說：『老兄未免有些緊張，其實我還未聽和呢。』順手把底牌抹散。此雖然是小事，但觀人先觀其微，三哥堪作模範。

## 虛懷若谷

三哥虛懷若谷，從不恃才驕傲氣燄凌人，表示高人一等，正所謂

「君子不欲多上人」。不過他的容忍是有限度的，有時雖極小的事，他認為使他難堪的也會發火。

例如他能飲而從來不強人飲。有一次我在家邀請能飲的男女友好及他們喜歡吃我家廚子所做的那幾樣菜兼暢飲，三哥當然是座中要角，張明兄及蕭七妹、八妹也在被邀之列（七妹八妹是江西望族，其族長蕭新之老伯，是先父會榜同年，蕭龍友是先父鄉榜同年，蕭三姐是先室在天津的同學，七妹八妹是由三姐介紹與我夫婦相識的）。飲至相當時間，各人已有醉意，加上飯廳火爐升熱，三哥把上衣脫下，剛由先室接過掛在衣架上，八妹拿著一杯酒站起來對三哥說：『我要敬三爺酒。』三哥也舉杯站起來，八妹繼續說：『您已經喝了不少，我恐您會醉，現在您乾一杯，我乾三杯。』三哥一言不發，立刻離座，奪門跑出，先室急往追他，大聲呼喊，三哥以先室穿著高跟鞋，恐她跌倒，即回首站著，把她扶住，仍然一言不發。先室對他說：『八妹年少好勝，望三哥原諒她。』並拉他回舍下，八妹亦向他道歉，一場「風波」遂止，大家繼續暢飲直至午夜，才各自回家。此乃我與三哥結交後，第一次見他發火。第二次是他在抗戰勝利後，還都前在重慶向吳鐵老發火，時我因事赴重慶住在吳公館。此是鐵老對友好開玩笑的軼事，留待寫鐵老逝世廿週年紀念冊時再說，現在暫且不提。

## 厭惡勢利

性情和藹仁慈，厭惡諂媚勢利的人：東北軍入關，擁護中央，消滅擴大會議組織後，吳鐵老回北平時，因我家地方較小，難容接見或招待中央與東北軍政人員及新聞記者，故改住××鐵路局某局長公館。某乃一勢利的人，除對鐵老逢迎外，對鐵老隨員如三哥及張震西兄多不理會，此種態度當然與三哥性情相反，且鐵老已完成重大使命，無需日日要三哥共同商討及策劃，祇留震西兄代為辦理書牘事宜，不過有時仍在舍下會晤約定的中央黨政軍首長及親友，三哥間亦在旁以備諮詢。

鐵老從瀋陽南返，先到天津，稍事逗留，再留北平甚久。他到天津前一日，我得訊，先到天津準備歡迎，在中國大戲院預定一大包廂，並洽商尚小雲當晚演他著名的平劇梁紅玉。我記得鐵老抵站與我握手時，第一句話說：『你受驚，委屈了。』因擴大會議組織在北平成立時，北平當局謂我通中央，和代鐵老做祕密破壞向銀行借款工作，曾派二十一名警探監視我十四日。第二句話便說：『同茲在瀋陽很苦悶，你要好好地安慰他。』這足以表示鐵老對三哥的交通和關切，同時也是我應做的事，因為鐵老是愛護我的老世叔，而三哥又是我極尊敬的摯友。

## 對酒高歌

三哥回到北平，寒舍頓增熱鬧，三哥驟以無事一身輕，故除有對

外不得不參加的，及其他友好約會外，常到我家，或暢飲，或清唱平劇。他喜歡唱蕭恩打漁殺家，我曾經介紹他與馬連良研究該劇的詞句和板眼。我童年便隨先父到舊京，由於很多翰林而不必常進宮廷的老世伯很清閒，日中多聽戲消遣，常帶我同去，因此我從小就成了戲迷。北大畢業後，服務銀行並兼職鐵路有了收入，晚間常偕先室到各戲院聽戲。三哥到北平時，我已升任北平交通銀行副理兼平漢鐵路會計處副處長，手頭較鬆，幾乎每晚都去聽戲，並與男女名伶時相讌飲，更有機會遵照鐵老面囑好好地安慰三哥，故晚餐時，男四大名旦梅蘭芳、尚小雲、荀慧生、程艷秋，女四大名旦雪艷琴、華慧麟、章遏雲、新艷秋、及小翠花、馬連良、楊寶忠、寶森常為座上客，或與三哥碰杯，或與三哥說戲，使他高興到幾乎飲過量，乃他生平少見的事。

## 北平四寶

值得回憶的事，並引起無限傷感：程艷秋能飲，酒量甚大，但很少出來應酬，我因為要安慰三哥，預先五日懇請他來暢飲，並說明三哥很想見他，他以情不可却，依時前來，席間曾與三哥往來互敬五杯，亦即每人各飲了十杯（每杯二兩）。席終，三哥對我說：『你請我吃這一頓飯，我認為最高興的就是程老板（北平尊稱名伶語）與我對飲十杯及馬老板與我拍板共唱打漁殺家。』

又有一次三哥及明、芹池兩兄及先室羅秀英共玩麻雀牌，連續三晝兩夜才停止，親密如一家人。賢妻已於六年前在香港逝世，而「北平四寶」（當時我們四人時相出入，在交際場中頗活躍，友好中多叫我們為「四寶」）之一的同茲三哥已達到自己常說「活要活得好，死要死得快」的願望，壽終正寢，生榮死哀，兒孫亦能克紹箕裘，毫無遺憾。而芹池、明兩兄夫婦都健全，兒女亦多建樹，祇我一人在此鰥獨無依，回憶往事，不禁無限感慨。

## 憾與慰

我的四遺憾及一安慰：我與三哥交非泛泛，去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六時三刻我尚與他通過電話，聞葉君明勳亦與他閒談至六時三十分，他還送到電梯，詎料十時便以心臟病復發逝世。孟能世兄即電告知三哥各親友，並擬電告我知。明兄體諒我，認為我第二次施手術，割治處尚未大痊，當晚不宜通知我，因為我尚在病中，得訊定必很悲傷，如來時無人陪伴，恐會滑倒。直到翌晨孟能世兄才電告我知。

當我聞耗，悲痛到淚如雨下，迨抵達蕭公館時，三哥遺體已移送殯儀館冰房，致使我未能於最後一次看到他甫離塵世的容貌，這是一遺憾。廿四晚，我承前安徽地方銀行舊同事丁君雲翔扶持我到殯儀館親視小殮、大殮、拜祭，原擬守夜，因明兄及其家屬力阻，而我亦

覺得很悲傷，難以支持，遂先返寓所，這是二遺憾。廿五日公祭，我本想俟公祭完畢，煩丁君扶持我到火葬場拜祭，亦為幾位老友勸阻未去，這是三遺憾。他安葬之日前一晚，我本決定懇求明 兄來寓所接我同去，作永別的一拜。據明 兄云，一則他無自用汽車，是搭別人的車去，二則墳地崎嶇，我不宜走動，以免發生危險，力勸不必去。並謂「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你既有此心，我當代你轉知三哥家屬，他們必定原諒你的。這是四遺憾。

至於所謂一安慰者，是甚麼呢？緣三哥逝世第二晚，其家屬及幾位親友在他寓所與殯儀館經理商討殮葬事時，我亦扶病參加。偶然在茶几上看見有一個盒子，裏面放有黑與藍兩種顏色的綢料，我便問這是做甚麼用的？坐在茶几旁邊的某君說：『這是預備三爺殮葬時所用的大禮服——黑馬褂藍長袍的樣式。』我拿起來一看，綢料是有團花的，我認為不合，當即對孟能世兄的女婿周其新說：（時他正與殯儀館經理洽商殮葬應用各物）『政府規定大禮服的袍褂並無團花，是純黑色的馬褂，純深藍色的長袍，用中國綢或緞均可，夏天亦可用紗。我敢保證我所說是正確的。因為純黑色的馬褂及純深藍色的長袍，政府定為大禮服，是由民國十八年 國父奉安時，中央特派的三位迎襯專員林森、吳鐵城、鄭洪年，及 國父同學，共同發起革命，推翻滿清的陳少白先生在北平宣武門外頭髮胡同九號我家裏商討結果，建議中央黨部，經政府核准有案。』因此孟能世兄及殯儀館經理遂依照我說改用純黑色的馬褂及純深藍色的長袍，正式大禮服殮葬。定都南京

後上自總統、黨政軍大員下至全國官吏人民，都遵照規定顏色衣料作大禮服，迄今尚未變更。否則三哥以革命元勳，黨政顯貴，而殮葬未穿正式大禮服，我想他在天堂亦永感遺憾。我所謂一安慰，就是此事，頗值得寫在「在茲集」中。

子高二嫂賜鑒內子之喪辱承

遠道馳函存唁

老友托手愛之情弥深感慰弟德涼福薄晚  
歲重罹此鏡破釵分之痛情所難堪益以夏起倉  
卒悲懷尤難自抑幸在台諸友好多方譬慰少  
減愁苦三週後或可徇友人之邀出作小遊聊  
以自遣賤軀尚可支持知荷

謹注謹以存聞專誠覆謝敬候

雙安 弟蕭同茲百拜 四十九年十月十九日

三爺寫給本文作者的親筆信



# 及早爲同茲先生立傳

續伯雄

蕭同茲先生過世後，海內外追念他的文字中，最爲人樂道的，是他曾以高過他社長本人薪津的待遇，延聘一位處理英文稿件的專才，爲中央社創組了其後名聞中外的英文部，這位專才不是別人，正是今天爲駐美大使沈劍虹撰講演稿的任玲遜。

任玲遜是蕭先生接長中央社後第一個禮聘的英語專才，他以後不僅爲中央社逐步創設了規模遍及全國的英文部，而且直接間接爲中央社引進了不少第一流的人才。

## 偶然相逢一拍即合

在蕭先生七五壽誕時出版的「念慈集」中，任玲遜曾寫了一篇他初次會晤蕭先生及如何草創英文部的大略。據他自己說，他與蕭先生的遇合，是偶遇，却也是「一拍即合」。

他於民國二十年自美學成回國，拿着學校教務長爲他寫的三封介紹信，準備在上海或北平的三家英文報中謀一個記者職位，其後因北

平離他天津的家近，乃選擇了「北平英文時事日報」，這家報紙到他進去後才發現原與外交部有關，社長是由老外交家刁作謙博士兼任，總經理是張明。他的工作倒也自在，幾個月後，他即由記者升任主編。除社論由刁博士自撰送社外，其餘稿件幾由他全權撰寫處理，這樣做了大約一年。

一天，張明告訴他南京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要到北平，希望他也同去拜訪。他初回國門，根本未聽過「中央社」其名，自也不知蕭同茲其人，所以也未多問。到第二天見了面，蕭先生道明來意，並跟他大談今後發展中央社的抱負與計劃。那年他方廿六歲，心雄志大，既已為蕭先生一席話所折，加以張明當面答應蕭先生借用三個月，所以就滿口允承下來，為中央社創組英文部。蕭先生只問他一個問題：『你是不是黨員？』，他說：『不是。』蕭先生立即接口：『那也沒有問題。』遂提示了幾項原則，一切便由他去着手了。

## 下屬俸入多過上司

任玲遜說，那時只想到如何創事業，跟蕭先生並不會談待遇問題，他先在天津把英文部的基礎奠定，六個月後才回到南京為總社成立英文部。那時是民國二十三年，他記得一個月的薪俸是四百五十元大洋，比起他在北平英文時事日報時並不好多少，可是，大約在他入中央社後一年的樣子，蕭先生無意間談起經費問題，說未能給同人太

好的待遇，心頗不安；不過，却以開玩笑的口吻對他說：『你知道吧！你在中央社的待遇已是第一等，比我這個社長還多一百元呢！』以後，此事成爲所有認識他的中外朋友津津樂道的美談。

中央社有史以來，恐怕自有中國新聞史以來，任玲遜是第一也是唯一在待遇上凌駕老闆以上的記者了。

同時，任玲遜也是中央社引進的第一個非國民黨籍的記者，自後，蕭先生即據此請准中央黨部，中央社聘用的人員，不一定必須黨員同志。

任玲遜回憶他協助蕭先生創組英文部的經過時說，蕭同茲用人不疑的恢宏氣度，使他對蕭先生交辦的大小任務，除了殫精竭智全力以赴而外，就唯恐自己能力不及，辜負了蕭先生的付託。他說，蕭先生對部屬，只商定原則，絕不過問細節，蕭先生能從中央黨部爭得多少權限，幾乎就將同等的權限轉手交付執行業務的人，各部門主管都有自行處理業務及用人之權。他當時不贊成蕭先生在南京成立英文部，認爲那時唯上海、北平、天津、漢口有英文報紙，必須選擇以上各地之一先行幹起。蕭先生遂同意自天津開始打天下，這個原則一定，餘下的事就是他的了，蕭先生本人反爲處在協助的地位，有了問題才找蕭先生，凡能自行解決的，根本用不著請示。在天津六個月後，他將棒子交給黃慶樞負責，只關照蕭先生一聲就行了。以後他在南京總社找了王家松、徐兆鏞、余捷元、郭則虬等人爲班底，蕭先生都絕對信

任所有他推介的人。任玲遜說，蕭先生從不以人事問題困擾下面的單位主管。

## 身教言教推心置腹

蕭先生對於部屬只有受過的份，即有相責，也十分尊重當事人的人格尊嚴，總以和悅的語氣找適當的時地曉諭幾句。同樣地，蕭先生也極少當眾讚揚任何同仁，這種「不挫傷銳氣，不培養驕氣」的統馭原則，正是使中央社上上下下始終安位盡份、心平氣和的最大因素。

任玲遜說，在蕭先生手下做事，權責分明，很少有可能把一件事做得太離譜的。蕭先生身教言教，對上下同仁推心置腹，同樣的錯誤只要不是一犯再犯，蕭先生都認為是優秀的好同志。一次上海分社將財政部長孔祥熙的重要政策聲明，漏發了一行，以致使原文的精神有了顯著的出入，次日全國報紙刊出，在金融市場引起很大波動，各方責難甚烈。可是，蕭先生只在事後趕赴上海之便，曉諭該同志切記不可再犯類此的同樣錯誤，這個大亂子早已由蕭先生承擔了下來。以後，該同事卒成為中央社最努力與以穩重練達著稱的老編之一。

很多人見到蕭同茲，都被其豁達的言談、瀟灑的丰儀所傾懾，多以為蕭先生拓展中央社的事業做得一帆風順，一杯在手，一曲高歌，便少有人注意到蕭先生在貫徹其理想時所遭遇的數不清的困苦與艱辛。任玲遜在回憶他追隨蕭先生工作初期的一些往事時說，當年中央

黨部雖應允了蕭先生三個條件：其一、中央社自中央黨部內遷出成一獨立單位；其二、中央社有權發佈一切認為適可的新聞；其三、中央社有獨立的人事權。可是，基於中央黨部與中央社長時期的歷史淵源，在戰前戰時，中央黨部直接間接過問中央社人事的情形，仍時有發生。譬如有一次黨部把蕭先生找去，指責西南某分社主任不夠盡責，不能與當地軍政單位融洽相處，必須更換。蕭先生在那一時刻的處境自是可以想像的。

其次，中央黨部對新聞的發佈，也常有與中央社不同的意見，例如英文部向國內外發稿時，概稱「日機」如何如何，但黨部找蕭先生去，要中央社改稱「敵機」，雖然經過蕭先生解釋，英文部的稿件主要對象是外國報紙，「敵機」二字當不能為他國報紙所接受，直指「日本飛機」，意明而不涉主觀，似較合宜，而卒為中央黨部所諒解。然而，由此可知蕭先生在經營中央社時之困擾與難題，有許多是不足為外人道的。

## 豐功偉績應傳後世

蕭先生領導中央社歷三十二年之久，但絕少親筆為中央社寫新聞或專論。蕭同茲知道外國的通訊社或報紙負責人，都經常自己執筆、採訪新聞，所以也常有牛刀小試的衝動。惟據任玲遜回憶，蕭先生總是太過謙沖，自認對新聞是外行，很少「班門弄斧」；不過，對於採

訪新聞則興趣很濃。在重慶時，因蕭先生是國民黨的中委之一，消息自然靈通，因此曾供應了中央社不少獨家新聞。任玲遜記得在他擔任香港分社主任的時候，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初的一天，蕭先生突自重慶悄然飛到香港分社，而後拖着他去碼頭接人，原來蕭先生已獲知高宗武、陶希聖將脫離汪精衛組織，從上海搭輪到香港。去後，果然見到了人，這則震驚中外的新聞，乃由中央社香港分社發出。

中央社初遷重慶時，經濟狀況不怎麼好，可是對任何有益國家宣傳的新計劃，蕭先生一定全力支持。民國二十七年，任玲遜曾建議除英文部的經常性新聞稿件外，應另辦一份英文雜誌，對中華民國單獨抗日的處境，向國外作有系統的報導。蕭先生當即同意，遂創辦了「英文中國半月刊」，由任玲遜主編。其後因二十八年間日機對重慶濫施轟炸，中央社也直接被敵彈命中，設備乃至對外交通都成問題，蕭先生遂決定將該半月刊改在香港發刊，並調任玲遜為香港分社主任，兼任主編。這份半月刊，一直發行到香港被日本佔領後為止。

任玲遜說，蕭先生以一名紡織廠技術人員而獻身革命，又以黨務工作人員的身份主辦中央社，口口聲聲自稱外行，可是，一生做下了無數使內行汗顏的劃時代事蹟。蕭先生是領導中國新聞界粉碎外國通訊社獨佔中國新聞發稿權的先驅，是第一個正式派遣國外通訊員的新聞界領袖，是第一個指揮遍及全世界二千七百新聞從業員的中國新聞界巨子。任玲遜認為：其一生對中國新聞界的豐功偉業，應有人早日為之撰著專傳，以彰後學。



# 附錄



# 完成現代化通訊社我們需要更大努力

蕭同茲

中央通訊社於民國十三年四月一日在廣州成立，開始發稿，今年恰屆二十週年紀念，檢討過去，展望將來，不無足爲本社同人共勉之資。本社之得有今日小小的成就，皆由於領袖的啓示與培植，當局的指導與鞭策，同業的同情與合作，社會的認識與協助。同人於銘感之餘，又切望今後能獲得更多的指導與援助，不勝企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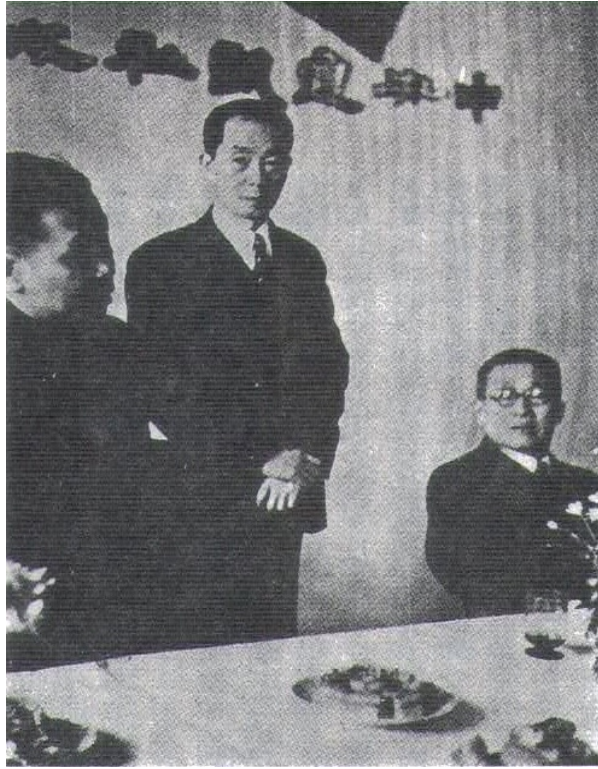
當民國十年前後，我國新聞事業尚稱幼稚，而通訊社尤爲缺乏，全國報紙不獨國際消息須依賴外國通訊社傳達，即國內消息亦多由外國通訊社供給，致發生許多不合理之現象。中央有見及此，以爲欲謀革命的成功，必須先謀報導的正確，與宣傳的普及，創立通訊社極爲必要，乃由宣傳部籌備組織，本社始應運而生。當成立之始，中央曾特發通告，說明本社任務：

『凡關於中央及地方黨務消息，暨社會、經濟、政治、外交、教育、軍事、以及東西各國最新之要聞，足供我國建設之參考者，靡不爲精確之調查，系統之紀述，以介紹於國人。』可見本社雖爲宣傳部所創辦，而其任務則在供給國內外消息於國人，確定本社爲服務全國

民眾的報導機構。二十年來本社的經營方針，與同人小心翼翼奉爲信條的，始終一貫以此爲其出發點。

本社成立未滿三年，我國革命軍在今 總裁蔣公統率之下，誓師北伐，當時本社尚屬草創，人力亦極有限，然不能不負起時代的新任務，一面派遣記者分路隨軍報導戰事消息，一面選拔幹才深入北洋軍閥腹地，宣揚我軍的主義與目的。當日報導所使用的工具與方法，既嫌簡陋，又多遲緩，現在看來，誠不勝今昔之感。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後，隨政治的發展，本社所負責任，亦日趨繁重。我於民國二十一年承乏本社，默察環境的需要，民眾的蘄求，黨國的政策，認爲促成統一乃鞏固國基的先決問題，而使全國民眾皆能明瞭中央政策與國內外實在情況，又爲促成統一的主要前提。爲求達此目的，則報導的敏捷與正確，乃必不可缺的條件。但當時電信機能至爲遲滯，不能適應迅速的需求，故於是年樹立「全國七大都市電訊網計劃」，自設電台，以免阻礙。同時再擬定「十年擴展計劃」，務期於十年內完成全國電訊網。現在大體雖已實現，惟單位尚覺不密，進展亦嫌不快，這由於環境影響者半，由於器材與經費缺乏者亦半。可是，我相信於戰爭結束後最短期間內，自可完全實現。



蕭社長主持中央社二十周年紀念會，坐者為吳鐵城先生

自本社自設電台，建立電訊網以來，傳遞消息非常迅速，每日將所得中央及地方消息廣播全國，無論國內任何角落所發生之事件，瞬息間即可傳佈全國。因此，不獨中央於推行政令上，得到不少裨益，

而地方亦可立刻明瞭中央及其他地方的情況。本社工作的現代化，這是基點。本社於民國十七八年即有北平、武漢兩分社及上海電訊處，併於民國二十一年加以充實，復改組上海電訊處為上海分社，以後隨環境的需要，逐年增設分社或辦事處及特約通訊員，現時全國各重要都市、交通重衝、宣傳據點，無不有本社報導的機構和人員。抗戰軍興，淪陷地區雖屬不少，而本社的報導單位仍有增無減。尤其隨軍記者的分布各戰場，每一隨軍組皆攜帶輕便電台，冒險在前線工作，使戰事消息可以迅速傳布於國內外，達成報導的使命，不能不說是抗戰以來本社工作的一宗特點。

國際新聞的報導，亦為本社重要任務之一，惟本社在創立初期，因經費關係，一時不能自派記者分駐各國拍發專電，故一面與各國通訊社磋商，使用其在我國所發布的中文電訊，以充實本社的國際新聞，一面仍設法逐步派遣國外特派員，以完成國外通訊網的計劃。依此方針，本社於民國二十年十月首先與英國路透社訂立合同，取得在我國內發布其中文電訊之權，繼於民國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間，先後與哈瓦斯通訊社，德國海通通訊社，美國合眾、國際兩通訊社分別訂立合同，或交換備忘錄，取得其在我國內之中文電訊，或中英文電訊之發布權，這是本社與外國通訊社合作的經過。

本社早於民國二十一年，在日內瓦設置特約通訊員，復於民國二十七年在法國設置特約通訊員，但特派專人駐在國外，經常拍發專電，報導消息，則以民國二十五年設置東京特派員為嚆矢。七七事變

以後，國際政治的演變，與我國息息相關，更有廣置國外特派員之必要，惟因種種關係，於民國二十九年始先設置華盛頓特派員，四年之間，新德里、加爾各答、倫敦、紐約各地分社或辦事處亦相繼成立，現莫斯科特派員已在赴任途中，即可開始工作。倘為環境所許，亦擬於最近的將來，一一派員前往其他各國，世界通訊網的完成，當不在遠。至世界各戰場的隨軍記者，亦極重要。本社於交通極端困難之中，仍不時選派記者巡迴採訪，如義大利戰場、西南太平洋戰場、中太平洋戰場，本社皆視戰事情況，隨時電令前往訪問，曾獲得若干珍貴材料，介紹於國內，當為讀者所共見。至緬甸戰場，與我國關係更為密切，在史迪威將軍總部。在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總部，本社均有常駐隨軍記者。昨年美機轟炸南昌、廣州、海防各地時，本社記者隨機出動，目擊空戰情況，克盡報導任務，這不能不感謝盟邦軍事當局協助的盛意。現因緬戰日趨激烈，本社將在蒙巴頓將軍總部，及我駐印軍總部設置隨軍記者，以期周密。

本社隨國內外時事的發展，工作日益繁重，而機構亦日益擴展，以是報導的責任更形重大。民國二十一年五月我接辦本社時，總社內部工作同志寥寥不過二、三十人，今日總分社及國外工作同志已超過七百人，每日收發電訊稿件，不下千數。在陪都所發社稿，平常約在二三萬字左右，而廣播全國者亦常在一萬二三千字之間。廣播種類約有三種，有詳播、有簡播、有午播，這些都是適應全國報紙的需要，而加以區別的。英文稿雖只有一種，但此項工作亦極繁重。凡國內新

聞可供友邦人士參考之資者，本社無不以絕對的客觀態度，介紹事實，或發通稿，或作通訊，直接間接，逐日供給。

本社早已看透日寇大規模侵華的陰謀，故於「七七」之前，即已擬定「戰時工作準備大綱」，着手籌備，而一切準備工作之中，以電台為最繁困，因器材有限，頗有顧此失彼之苦。倘電台失去作用，則宣傳即無有效工具。事前策劃，煞費心血。因為早有準備工作，故總社雖一再遷移，而工作并無片刻的停滯。民國二十六年敵機濫炸首都時，本社社址被燬，二十八年狂炸陪都，社址復一再被燬，二十九、三十兩年總台亦被炸，受害甚大。同志有因而殞命者。而本社工作始終毫未間斷，全國報紙仍能照常獲得本社所廣播的國內外要聞，這不能不說是我們全體同志發揮最高度的犧牲精神與服務信念的結果，而對於死難同志，尤不勝惋惜之感。

國軍退出北平、天津、上海各地後，本社各該地分社仍祕密工作，不斷報導敵偽消息，雖屢被敵人發覺搜捕，而同志前仆後繼，賡續執行其任務，毫未畏縮。被捕同志有被敵人殘斃者，有至今尚被敵人拘押者，我們於悲憤之餘，更加深懷念。其他在淪陷區域的分社，皆於國軍轉進之時，始行撤退，其危險與困苦，可以想像。太平洋戰事爆發，香港、新嘉坡兩分社亦於敵軍進佔各該地時始停止工作。致工作同志在當時幾瀕危殆，且至今尚有未能脫險者。

二十年光陰本不甚短，在個人是成年期，惟本社之具有現代的報

導機能，實為近十年之事，故仍在成長途中。現代通訊社最重要的條件，莫過於組織與人才。有堅強的組織與豐富的人才，纔能負起大時代所賦予的新使命。報導固為通訊社的任務，而今後時勢所趨，調查與研究工作，至少與報導有同等的重要性。報導機構的學術化，將為戰後世界一個迫切的願望。唯有報導機構的學術化，才能保障恆久的和平，增進人類的福利。調查與研究的工作，是學術化的基礎。

我們不但要使本社成為世界第一流通訊社，而且要為世界報導機構開闢一個新的園地。我們不但要為全國民眾服務，而且要為全世界民眾服務。任務這樣重大，工作這樣艱鉅，對於強化組織，培養人才，更不可不格外注意。我們深知今後所經歷的艱苦，勢必十倍百倍於過去，必須秉承 國父大無畏的精神，勇往邁進，才能突破橫在前面的重重難關，這是我們全社同志應有的信心。我們需要更大的努力，才能完成我們現代化通訊社的艱鉅工作。

(中央社「業務通訊」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 中央社廿週年紀念會講詞

蕭同茲

今天是本社成立第二十週年紀念日。在南京的時候，我們便考究過這一個紀念日是那一天，但苦於沒有發現任何文件。直到一個月以前接到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許師慎同志來信告訴我們，民國十三年三月廿八日中央執行委員會曾發過一個通告，才確實知道二十年前的今天，是本社的誕生紀念。

我們知道了這個紀念的日子，恰恰在二十週年，意義頗覺深遠，便考慮紀念的辦法，但因為社址太窄狹，尤其在戰時，如果舉行擴大紀念會，覺得在時地兩方面都不適宜。可是本社在社會和同業的合作指導之下，業務一天天發展，又不能不藉此紀念日向社會人士作一個簡單報告，所以才有這一紀念會，略備茶點，招待同業。

這一個本社誕生的歷史文件，今天已經錄示各位同人，現在我再恭讀一遍：

中央執行委員會通告第二十九號

「為通告事，本委員會為求新聞確實宣傳普及起見，特由宣傳部



組織中央通訊社。凡關於中央及各地黨務消息，與社會、經濟、政治、外交、教育、軍事、以及東西各國最新之要聞，足供我國建設之參考者，靡不為精確之調查，系統之紀述，以介紹於國人。茲經籌備妥當，定於四月一日開始發稿。惟組織伊始，未臻完善，本會規定各地黨部及黨員，均有供給新聞資料之義務。特此通告貴部，轉知所屬黨員，一體知照，共同負責，按照上開各項，如有消息可作新聞資料者，請於每日十二時以前，投稿逕寄越秀南路五十三號該社，代為發表，不勝翹企之至。」

這一個通告，我個人已經細讀過兩三次，認為通告雖是二十年前的事情，而指示我們的業務範圍，却極為正確。二十年來，本社的工作恰巧也是本着這個方針而行。通告裏面指示「東西各國最新之要聞，足供我國建設參考者，靡不為精確之調查，系統之紀述，以介紹於國人」。這表示本社不僅僅是黨的宣傳機關，而同時要把國外的要聞，介紹國內。通告中又規定「各地黨部及黨員均有供給新聞資料之義務」。因為當時黨的經費困難，把採訪的義務歸之於黨員，規定各機關不是發佈新聞而是供給資料，直到今天大體還是這樣的。所以我們認為這一通告，對我們的工作範圍，指示得十分明確。

從民國十三年到廿一年的時期，其他的材料太缺乏，我們知道本社並不是一直從廣東移到南京的，是民國十六年中央黨部遷到南京，胡漢民先生任宣傳部長，指定幾位同志，在南京重新組織，我們知道的，其中一位是李景芳同志，一位是楊幼炯同志，一位是尹述賢同

志。

在南京工作的時候，胡漢民、蔡子民諸先生都曾直接向本社投稿，可算是本社最有名的記者。足見他們對於中央的通告如何重視。

民國二十一年，本社從中央黨部遷出，四月底中常會決定本機構獨立，改爲社長制，對本社業務決定新的方針。本人奉命承乏本社，還有一個月便是十二年。這其間承 總裁不斷的指示，各位長官的指導，社會同業的協助，本社同人的努力，比之十二年前已逐漸進步。同時十二年來，也曾經過若干艱難困苦。我們知道要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必須作最大的努力；同樣要建立一個現代化的通訊社，也應當有最大的努力。今後的困難將更增加，即使抗戰結束以後，也不一定解除。可是在千辛萬苦之中，我今天值得報告的，是我們總分社同人極少異動，這可證明本社同志並不因爲艱難困苦而變更志向。

十幾年來，在發稿方面有幾件事，在當時看來，似乎沒有多大關係，而事後證明對於國家有重大影響。

第一件事是民國二十四年推行法幣政策。事極機密，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十點鐘，才通知本社，要我們全文廣播全國和世界各友邦。本社已達成這一個任務，第二天全國都知道了政府這一政策。後來回想一下，假如沒有本社這一機構，也許法幣政策的推行沒有現在的順利。

第二件事是西安事變。在我們知道這個消息以後，馬上派記者攜帶電台西上，不斷把那方面的新聞報導全國，一方面是爲了總裁的安全，一方面也是本社業務所在，而因爲此種新聞的報導，鎮壓了反叛。

由這兩事可以證明本社對國家政令的推行有不少幫助。

一二十年來，許多人看我們祇是政府的喉舌，其實試一檢閱，一二十年來，本社的社稿有過許許多多次是爲人民說話，又有若干消息不便公開發表的，也特別送給當局參考，因而促起當局注意，加以改善，這也是本社對於社會和人民盡力的地方。

當前局勢確實困難，但是我們爲了國家民族的前途，一定要迎接這個困難。今日在本社二十週年紀念的日子，特別提出幾點意見，和同人互勉：

(一)振奮精神 這並不是說過去我們不振奮，而是說未來將有更大的困難，恐怕不能忍受，所以特別提高我們的警覺性，俾能應付來日的局面。

(二)緊守崗位 本社每一個細胞都應當自立負責，這在過去已經有具體的表現。我希望本社同志，要把工作看做是一種事業，而不能看做是一種職業。固然以往同人看工作爲職業者極少，更希望今後能絕對沒有。因爲本社同人的工作經驗，對於工作效果有非常重大的關

係。

(三)要學術化 同人於公餘之暇，要不斷研究學問，而且不祇限於社會科學，即是自然科學也應當研究注意。歐美的物質文明進步，尤其是電訊設備進步，異常迅速。我國今日的環境如此，要求業務的開展，應力求克服若干困難。這個責任，並不一定在於專家，我們自己應當研究改進的。

(四)互勵品行 新聞記者的一言一動，對於社會有極大影響，所以學問雖好而品行不好是不夠的。我以為新聞記者是教授，是教育家，報紙便是教材。我們至少應自認為小學教師，所發的社稿是社會教材。則在今日社會道德下落的時候，我們更應以身作則。

以上四點，我特別提出來和我同人共勉。至於對社會和同業的要求，希望繼續得到合作和協助，可是這種合作和協助不能等待，要爭取，要以我們的服務，爭取同情和相互合作。本社的事業是社會國家一個大的事業，在業務開展途中，困難必多，我們熱誠希望社會和同業精誠合作。我再重複說一遍，這種合作是要我們爭取的。

今天承兩位長官出席，最後我藉此提出幾點懇求。本人於二十一年四月廿七日蒙 總裁召見，命令整理本社，當時恐力有為逮，再三懇辭，未獲邀准。在授命之後，曾提三項要求，今天我特重新提出：

第一、要使本社成爲一個社會事業，必須機構獨立，對外不用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的帽子。總裁也認為是正確的，我們現在對於這一點，已經做到。

總裁去年還命令我們研究如何使本社事業化，我們也正在研究之中。

第二、當時本社的電訊僅賴交通部的有線電報，消息的傳遞太不靈活，所以要求自設無線電台，建立大都市通訊網。十二年來，本社電訊網的佈置已逐漸加強，但是戰後本社一定不能靠這少數的電台，所以要求中央積極協助加速使它現代化。

第三、在不違背國法和黨紀的原則下，能有處理新聞的自由。過去我們已經獲得這樣自由，到抗戰開始，若干消息的發佈受有限制，這是戰時的現象，我們自然無話可說。今天我們僅要求戰後能恢復像過去的自由，因為約束太多便難有進步，希望當局不斷指導，並對本社工作能予信任。二十年來，本社幸未發生大的錯誤，現在有了二十年的經驗，相信將來或許不致和國策距離太遠。

今天乘這紀念成立二十週年的機會，特順便提出以上幾點要求。

(周培敬記錄)

# 運用自由，善盡責任

蕭同茲

前些時，我在自由談月刊讀到一篇文章，是王洪鈞先生節譯雷諾氏所寫「艾帥的大學校長生活」，給予我很深刻的印象，同時也予我以新的啓示。

我們知道哥倫比亞大學具有近二百年的歷史，擁有美國最出色的科學家，它一向以它最高的學術成就的傳統向世人驕傲，所以當艾森豪元帥接任校長之初，好些人認為以他這樣一位叱咤戰場的二次大戰英雄，一旦卸去征袍，穿上儒服，出長這樣一個權威學府，是否能領袖羣倫，勝任愉快，頗為令人擔心；但兩年多來，事實證明，這位艾森豪校長對於哥大的貢獻，非但沒有貶低它固有的輝煌地位，並且給哥大，也是給整個教有界，建樹了許多永恆的典型。

雷諾氏舉出了事實說明大學校長艾帥的成功。其中一個具有最重大意義的是，艾帥認為大學的主要任務，是替國家製造公民，理由是無論怎樣一個出色的科學家，假如他不是一個出色的美國公民，那對國家依然全無用處，也就是大學教育的根本失敗。據說：艾帥這種觀念的形成，乃緣於他在戰爭期間的親身體驗，他發覺那一時期的美國

青年，對於自己國家的命運毫無警覺，發現很多士兵竟不明白他們究竟是為何而戰，很多人因此喪失了戰鬥精神，所謂人民潛力，並不如想像的那樣強大。恰巧在他來到哥大之後，該校師範學院的教務主任羅素也對他說：『我一生致力教育事業，我深信全美國懂得什麼叫自由的人實在太少了。……只有極少數的美國人懂得什麼是公民權利。』羅素接着建議：『假如自中小學起，即利用社會作為實驗室，定可培養很好的公民道德。』這建議與艾帥的意見正心心相印，不謀而合。因此他便在哥大創立了兩個計劃，一個是公民教育計劃，一個是人類潛力的研究計劃，這兩大計劃不啻武裝了美國人民的精神防線，使得一般老教育家莫不為之折服。

雷諾氏對大學校長艾帥成功的要訣，最後提出了總結，認為是由於他能「合理地分析」與「開明地判斷」這兩個原則。

我不憚煩地引述這篇文章，因為覺得這位哥大校長艾帥的成功故事，足以直接作我們新聞從業人員的借鑑。

我們知道：民主國家有推行民主政治的兩個重要工具，一是學校，另一個就是報紙，而且這兩者看似不同，實則乃是整個教育的兩面。艾帥指出大學教育的目的是替國家製造出色的公民，則負有社會教育責任的新聞記者，無疑是替國家培養出色的公民。學校教育是主動的，而且施教對象是少年到青年，不啻是在白紙上着色，可以隨心所欲。新聞教育是輔導性質，其對象普遍，年齡無限制，其無形的責

任，較之有時間限制的學校，實在還要深重萬倍。尤其是我們中國，教育的設施既不普及，新聞事業的歷史尤其短淺，而國家民族的遭遇，却又空前的阨隘，我們這一代從事新聞事業的人，由於客觀環境所要求的迫切，更加重了我們應負的責任。因此百劫餘生的我們，今天在臺灣來慶祝記者節，集天南地北全國各地優秀忠貞的報人於一堂，固然值得欣幸，但回首大陸，誰能不感慨萬千。而萬千感慨中有一點尤應記取的，即是在這次空前慘痛的整個失敗中，我們新聞記者也不能辭卸應負的責任。

固然，中華民國憲法明白規定保障言論出版的自由，爲了國家尊嚴，政府和社會對於新聞記者，要善盡其保障與維護的責任，不應隨意去干涉或侵害新聞記者應有的自由。但就新聞記者本身立場說，我個人始終認爲自由的觀念和責任的觀念是分不開的，要自由就要負責任，要對國家民族的利益和社會大眾的福利負責任。打一個譬喻說，新聞自由好比一件武器，國家很鄭重的把這武器交給了我們，用之得當便能善盡我們教育社會的責任，用之不得當便只能製造罪惡，貽害國家和社會。

今天我們回首大陸，大陸上的新聞界現實情形，便是我們應該警覺的最大啓示。因爲以自由中國一角的臺北市而論，我們今天還有公營民營報紙十三家，通訊社十三家，廣播電臺六家，此外私人發行具有新聞性的定期刊物，更是琳琅滿目，數以百計。但試問今天整個大陸，除了匪黨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報紙之外，舊日民營報紙存在的還有



幾家？除了匪方自辦的新華社和新華廣播電臺之外，民營通訊社和民營電臺有一家允許存在的嗎？再說淪陷在大陸上的新聞記者，除了百分之九十的失業者外，其餘百分之十受「訓」就「業」之後，那一個能在編發千篇一律的新華社「欽定」稿件，和撰寫一些謳歌匪黨的文字之餘，享受到我們今天在臺灣所享受到的新聞自由的千分之一？

然而上面這些人，其中不乏當年在我們新聞界高唱爭取新聞自由的「鬥士」，而也就由於這些「鬥士」們的濫用自由武器，以及我們今天在臺同業們當時的不够努力，在新聞這一條戰線上，我們整個被共匪所擊敗，而這一重要精神武裝之被解除，再加上經濟、政治等其他因素，才導致了最後的軍事失敗。

不過今天我們痛定思痛，來檢討此種往事，我們也承認除非甘心附匪的一些人之外，深信每一個善良的新聞記者，決不願運用他所持的新聞自由這件武器，有意去製造罪惡的。同時我們站在對社會教育的責任上想，也不忍心去製造罪惡。因此，要分析過去種種失敗的形成，其最大原因，一方面是由於 蔣總統所昭示的對於自由這一名詞的觀念模糊，懈怠了每個人的主觀努力，一方面是由於若干無心的疏忽，鑄下了無可彌補的過失。說到這一層，便是我本人所以要特別推薦艾帥「合理地分析」與「開明地判斷」的成功要訣之理由了。

因為作為一個今天自由中國的新聞記者，從大的目標方面說：我們相信比西方民主國家的所有同業要幸運得多；西方民主國家緣於它

是植基於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在今日之需要修正，又為識者所公認，因此他們上上下下，差不多每個人都得在暗中摸索，而我們的三民主義，非但是最進步的社會主義，且也早已深入全國人心，所以無須再有任何煩惱；關於這一點，記得李惟果先生有一次曾對我談及，他於抗戰期間參加訪英團訪問英國時，和當時在野黨的工黨理論權威拉斯基教授作過一度深談，拉斯基表示對中國非常羨慕，因為孫中山先生早就替中國畫就了一幅建國的藍圖，而他們英國還在工黨的設計中。

再就當前的新聞工作任務說，我們同業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為適應世界潮流，為去除建國障礙，我們的任務是反共抗俄，敵人講的是仇恨，我們講的是仁愛；敵人專尚欺騙，我們開誠立信；敵人絕滅人性，我們崇尚理性；敵人出賣民族，出賣祖國，我們要堅決維護國家民族的利益。

因此，問題乃歸結到一點上，這一點就是在邁向三民主義的建國大目標和完成反共抗俄大業的艱巨過程中，我們應該如何做法，才能在消極方面避免無法造成的過失，積極方面加強主觀的努力；說到這裏，我願重提本文首節所引艾帥的卓見：教育的目的是替國家製造出色的公民，而達成這個目的的要訣，是「合理地分析」與「開明地判斷」。

我們必須牢記著，當我們編撰一條新聞或寫下一篇評論時，我們

要對千千萬萬的讀者負責；因此，我們必須對於每一新聞的事實，每一評論的見解，運用「合理地分析」與「開明地判斷」，是否合乎新聞自由的確切準繩，然後通過我們報紙的影響，才能使萬千讀者都能成爲出色的中國公民。

欣逢九一佳節，願以區區此意和同業共勉。

（「報學」第一卷第一期，民國四十年八月）

# 遠大的目標，平凡的實踐

蕭同茲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一日，本社在重慶慶祝二十週年，個人曾撰短文，略述史事之餘，進而強調現代化之通訊社，報導固為主要任務，而學術化之調查與研究工作，少焉者亦與報導有同等之重要性。乃懸此鵠的以冀中央社不僅成爲世界第一流通訊社，抑且爲世界報導機構闢一新園地。

歲月荏苒，溯自抗戰勝利，國步又入坎坷之途，共匪倡亂，神州陸沉，本社追隨政府一再播遷，當年願望，徒託空言。值茲本社三十週年紀念，感時撫事，能不感慨系之。

猶憶二十一年五月，個人奉命接長本社後，兢兢業業以從事者，厥爲如何使本社發揮爲民耳目之使命。蓋新聞事業爲社會教育之一大重要環節，已成不可爭之事實。報紙如爲人民喉舌，則供給新聞資料之通訊社，即應爲人民之耳目，而後乃能分工合作，相得益彰。其如何使人民耳益聰、目益明，了解息息相關的世界大勢，熟識個人身處之社會實情，並以持續不輟之服務，從而發生無形之教育作用，無疑爲通訊社之主要任務。三十年來，本社之所以要求特准設置無線電台

收發電訊者以此；本社之所以先後必欲與各國通訊社訂立合同，取得在華發稿權者以此；本社之所以在長期財力拮据下，傾全力於國內外通訊網之建立者以此。蓋惟有自設電台，利用無線電以傳播新聞，方能縮短時空距離，迅速傳遞內地邊疆每一角落所發生之新聞，迅速普遍廣播至內地邊疆每一角落。惟有取得各國通訊社之在華發稿權，方能擴大本社之報導領域，採其長而去其短，使讀者耳益聰、目益明。抑又惟有建立廣泛之本社內外通訊網，方能以中國人之角度，報導新聞於中國讀者，俾在國際風雲詭譎幻變之際，而知有以自處。



陳誠副總統賀蕭社長主持中央社三十年

然爲民耳目之任務，達成殊非易事。新聞報導工作，就空間言，其廣袤無際；就時間言，則分秒必爭；對於發生突然、來源繁夥之新聞，加以慎思明辨之過濾，千迴百轉之傳遞，設非政府社會與本社間

以及本社內外同人間之雙重充分合作，則迅速與正確，勢難同時達成。兩者失一，固非得謂成功之新聞報導。三十年來，限於種種條件，社外之合作未能盡臻理想，而社內之合作則賴同人等同心戮力以赴，未嘗一日或廢。例如本社最盛時期，工作人員多逾二千，分支單位無慮百數，然工作職位不論高下，工作地區無分內外，皆能以「中央社」三字一以貫之，即離社他去者亦無不喜引服務本社一段歷史為光榮，甚或對本社之戀念每隨歲月俱增。此無他，三十年如一日的和諧合作精神有以致之。

猶憶本社新聞廣播創辦之初，多數內地邊疆報紙，過去僅憑剪刀漿糊，以轉載平津京滬報紙所刊消息為其新聞來源者，於焉對本社此種嶄新服務，無不交口稱譽，視為恩物。其在大都市之少數報紙，對本社之迅速拓展，或有投以嫉視之眼光者，然時間無異一最佳證人，本社服務精神終為彼等少數同業所了解；而本社同人之駐在各地工作者，亦終於獲得當地同業之和諧合作。三十年來本社之發育長成，全國同業此種鼓勵與合作無疑乃一大助力。

故友張季鸞先生曾以「平凡的實踐」一語贊譽本社之工作。其意蓋謂中國報紙所刊新聞，主要由中央社所供應，各報自有之報導雖不乏文情並茂之作，然一般報導之責任，則無不仰賴中央社同人篤實而踐履之。各報記者每易因特有報導而得名，而中央社同人則致力於平凡化、普遍化之供應，不求名籍。個人亦認為：過去三十年本社如稍有貢獻，則此種「平凡的實踐」之精神，實足以當之而無愧。蓋本社

同人不求名籍，願做「無名英雄」，其所爭譽者乃在本社不在本人，乃在大我不在小我，故能始終持此集體合作之精神，為本社所樹立之遠大目標而努力。古諺有「不作良相、便作良醫」之語，今日新聞記者，論其所負使命，論其服務精神，正應具備「良相良醫」之胸襟，學習「良相良醫」之智慧，完成其濟人濟世之任務。過去一世紀來，國際新聞界奉獨立、客觀兩大信條為新聞報導之圭臬，惟晚近以降，鑒於宣傳技術之日新月異，新聞記者稍一不察，即易於不知不覺中為野心宣傳家所利用，客觀的報導之說，已為識者所懷疑；是以解釋性的、分析性的新聞報導，已成為國際新聞事業的新趨勢，新聞記者在新聞報導中解釋社會之病症，分析局勢之得失，其工作精神，與「良相良醫」之挽狂瀾於既倒，起病者於沉痾之濟世濟人任務，應無二致。

今日本社誕生三十週年，當前遭遇雖有不如二十週年紀念之時者，惟我人苟能仍本「平凡的實踐」之精神，鏗而不舍，推而廣之，進而把握新聞事業進展之新趨勢，則又何憂不能突破難關，達成吾人昕夕以求現代化通訊社之遠大目標。願本此義，以勉本社同人，並就正於海內外同業。

(中央社「業務通訊」三十週年特刊)



# 中央社卅周年紀念會講詞

蕭同茲

今天是本社卅週年紀念日，承各位長官，各位來賓及同業先進，於百忙中蒞臨指導，本社在臺灣的先後同仁共同參加，致有今日這一盛會，使本社增加無限光榮與鼓勵，謹在此深致感謝。

到今天爲止，中央社還只有卅年的歷史，比起世界先進各國的大通訊社，真是一個小弟弟。就是在中國新聞事業史；中央社的歷史也還是太短淺，真算不得什麼。可是，由於中央社的創立，以及它的成長和發展是和中華民國國民革命的歷史相配合而不能分開，所以，中央社站在本身的崗位上也曾勉力的去肩負這一時代的時代任務。中央社成立於民國十三年本黨改組的時候，隨著國民革命軍北伐，奠基礎於南京，爾後抗戰戡亂，以迄隨政府播遷到臺灣來，本社沒有敢一天放棄過我們的責任，也沒有一天間斷過我們的工作。這卅年，國家民族遭受危難，社會發生劇烈變遷和影響，正和國家與社會的命運完全相同。此中經過，絕不是簡短言詞可以概括報告的。我們印行了一本紀念冊，在那裏面，簡單報告了本社卅年來的歷史，我不敢在這裏再浪費時間，報告過去瑣碎的事情。

但是，卅年過去了，還有無數個卅年在前面等待我們，我們應藉這個機會，仔細的檢討過去，策勵將來，使本社在未來能有更多的進步，才不致辜負在座各位先生和社會各方面對我們的鼓勵。

個人願提出幾點感想，就教於各位先生：

第一、我首先應該提到，並且應該特別感謝的是本黨——中國國民黨。任何人都知道中央社是由中國國民黨創立的，當籌創之初，黨交給中央社的任務是報導社會、經濟、政治、外交、教育以及東西各國最新的要聞。黨把這樣重大的責任交給中央社，也正是說明了本黨是具有如何的一種抱負，從一開始就沒有把這個通訊機構看為一黨之私，交給它的使命是替社會、替國家服務，而不是單純替黨服務，更不是叫它專為黨作宣傳。還有中央社初成立時，黨曾經命令每一個同志都要替中央社作通訊員，各就所服務的範圍報告新聞，雖然因為種種困難，這件事後來沒有切實做到，但在這裏却可以看出本黨扶植中央社是具有如何的氣度和魄力，黨所期望於中央社的又是如何的殷切！

在以後的若干年來，據我所了解，黨對於中央社一直是希望它成爲一個健全的新聞機構，並盡一切力量扶植它能在國際上成爲一個代表中國的通訊社。一個健全的新聞機構需要很多的條件，尤其想在國際上樹立信譽，需要更多的條件。我們想起由最初的基礎發展到後來的規模，雖然我們並未達到理想境地，但已經不是一件太簡單太容易

的事，我們不能不感謝黨所給予的正確指導和盡力扶持。

其次，我們要感謝政府對於本社的協助和給予我們的合作。這些年來，可以說我們是無時無刻不與各級政府及政府各部門相接觸，我們新聞報導與政府有密切關係，我們的業務發展需要政府給予方便，我們遭遇到困難，要政府替我們設法解決，所有這些事情，三十年來，進行都相當順利。我們非常欽佩並感謝政府當局眼光的遠大，和對於這樣一個通訊事業認識的深刻。

政府對於中央社，無論在精神方面或是在實質方面，都有很大的幫助，一時無從詳加列舉。我們隨便舉一個例子來說吧，本社當初實行全國電訊網計劃的時候，政府特別授權中央社自設無線電台，因此，我們才能於瞬息之間傳遞新聞，正因為透過這一科學利器，我們才能對新聞傳遞迅速這一方面有所貢獻。這對於本社業務的發展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單憑這一點，所幫助的價值就已無法估計了。



蕭先生在中央社三十周年紀念會中頒獎給資深同仁

在政府負責的先生們對於中央社業務都有深刻的認識，社會各方面領導責任的先生們，對中央社業務也有深刻的了解，這是我們最值得興奮的。

第三、我們在這裏對新聞界同業致深切的謝意。這些年來，如果不是新聞界同業給予我們充分熱忱的合作，我們決沒有方法發揮服務的力量。我們的同業，不論遠近，都能重視我們這個事業，他們給予我們鼓勵，并給我們帶來希望，凡是中央社同仁到達的地方，當地的同業無不給予親切的照顧，工作有困難，設法幫忙解決，工作有缺點，總是用同情心原諒我們。中央社與各地同業所處感情的深厚，真是水乳交融，使我們增加勇氣，也使我們得到安慰。不僅國內的同業如此，就是國際的同業和我們的合作也有難忘的交誼。比如說中央社遍設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機構，就隨時得到各當地同業的合作與幫助。比如說，本社先後和世界若干大通訊社交換新聞，其中如法國哈瓦斯社及德國海通社就曾毫無條件的讓本社轉發他們的電訊。又比如說，各國派駐在中國的同業，他們採訪新聞時，以中央社為重要新聞來源，或者到中央社來證實某些新聞的可靠程度，他們能如此信賴我們，也是值得欣慰和鼓舞的。

本社在三十年發展的過程中，工作同仁有幾個顯著的特點：

第一點，大家發揮了精誠合作的精神，中央社逐漸發展，部門相當複雜，而且都有專門性，非學有專長者不能勝任，各人的學養和技能各不相同，但都為這一件事而工作，求發揮綜合的集體的力量，而我們的同仁就能合作得非常圓滿，使工作發生效率，我們靠「人和」彌補了很多工作的缺憾。

第二點，本社同仁有冒險犯難的精神。中央社在發展過程中，大部份都是做開闢新天地的的工作，凡是最邊遠最偏僻的地方，最先到達的，多半是中央社同仁的足跡，他們獻身於新聞事業，願為新聞事業開闢處女地，筚路藍縷，他們願作開路先鋒，這種精神應該值得讚許。抗戰期間，活躍於各戰場的戰地記者，中央社的人數最多，出入戰場，奔走於槍林彈雨之中，甚至深入敵後，採訪新聞，置個人生死於度外。我們同仁之中，就有人死難在日軍監獄裏面。這種精神，我認為是中央社一筆很大的資本。

第三點，本社同仁有確守崗位忍受痛苦的精神。中央社的待遇向來清苦，可是工作同仁都願意守住崗位，十年二十年的幹下去。以今天在社的工作同仁為例，將近三分之一已經在社工作滿十年以上，這就是很好的證明。外間紛紛想到中央社物色人才，譬如在英文部或編譯部工作的，外面有優給五倍乃至十倍於中央社的待遇，請去幫忙，但是他們還是情願忍受清苦而不願離開中央社，這種傻幹精神，又是我們一筆很大的資本。

講到這裏，使我特別想起我們同仁中，恐怕有兩千人以上現在還是淪陷在大陸，他們現在的處境，使我們時刻懷念。他們都是於大陸各省市相繼淪陷時，在各地工作到最後一分鐘，才和我們告別，他們所發出的最後一份電報都是充滿悲壯的情緒，令人讀之心酸，但是我們沒有方法搶救他們出來，以致陷入魔手。他們因為在中央社工作過，絕不能見容於共匪，目前消息隔絕，無法知道確實情形，但我們

有理由相信，他們當中必有很多人遭受了共匪的屠殺，即使還留著一條性命的，他們精神上和生活上所遭受的痛苦，我們也可以想像得到。今天我們在這裏歡歡喜喜慶祝三十週年紀念，想起淪陷在大陸的工作同仁，我們的心情便覺得格外的沉重了。我們懷念他們，我們並願向他們致意，希望在最近的將來，能夠和他們在南京，在上海，在北平或是在國內其他的地方會面，我相信這個日子是決不會太長久的。

# 新聞事業、新聞記者與新聞教育

蕭同茲

謝謝新聞學系系主任王洪鈞教授給我一個光榮的任務，讓我和諸位學新聞的同學來談話。我只想如同談家常一樣，將我個人對於新聞事業、新聞記者和新聞教育一些看法與想法用漫談的方式和諸位談談。

首先值得我們大家高興的是：自由中國的新聞事業有了長足的進步。這進步表現於多方面，以前我們沒有電視，現在有了，廣播事業由於電視的出現，都紛紛作節目的改進。報紙這一環，表現尤為突出，不僅各報的銷數增加，表示我們讀報的人數一天天擴大；不僅各報建高樓，更新設備，表示報業經營已步入企業化的途徑；尤其各報都願意投資於報紙內容的改進，大量吸收人才，注重專欄報導，拋棄以罪惡新聞的誇張、描繪為競爭手段，代以人情味故事的發掘來表現特色。遇有海難，不惜以重金包賃飛機飛臨現場實地採訪，遇有發生在國外的事情，利用越洋電話與當事人直接訪問，這些都表現出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從事自由企業所作的有價值、有意義的自由競爭。

新聞事業普遍的進步固然由於新聞界自身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不



能忽略有利的客觀因素，一則是國民教育水準普遍的提高，一則是經濟的繁榮發展，經濟成長率一年超過一年，不斷創造高峯，國民所得逐漸提高，迫使新聞事業，不論是通訊事業、電視廣播和報紙都非走向企業化經營的途徑不可，否則便不能與走向現代化、工業化的社會相適應。

## 報紙經營企業化

談到企業化，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第一，一個事業須是有機體的組合，組織制度化，管理科學化。第二，須是一文錢發揮一文錢的效用，每個人發揮每個人的能力，不當的使用一文，就是浪費，不當的任用一個人，就足以構成對制度的破壞。第三，時刻不停、不斷的求進步，也就是一般所說的「研究發展」。推陳出新，精益求精，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報社經營企業化，報紙商品化，不過這商品負有促進文化及分擔社會教育的任務，故稱為文化商品，其性質不同於一般商品。但經營的原則並無二致，必須以最佳品質的商品供應市場，爭取讀者的信賴。報紙品質優劣的鑑別不是那張為油墨塗滿的紙張，而是印在紙上的文字與圖片的內容。必須每一行文字、每一張圖片經過嚴密的生產過程而自信已盡到最大的努力，做到滿意的程度為止。「所有的新聞都適宜於刊載」，是紐約時報一句標語，要做到這樣，才知道報社對

於品質管制採取了如何謹慎的態度。

士大夫恥言利，我國的讀書人都厭聽利之一字，辦報只不過遂文章報國之願而已，何必孳孳圖利。殊不知報社企業化，增強報紙獨立經營的地位，擺脫外來的干預和影響。非但絲毫不貶損文章報國的心願，獨立自由，放手辦報，只有更增加文章報國道德的勇氣。相反的，如果不善經營，不按企業化經營，自由競爭立不住足，報社倒閉了，縱有文章報國的萬丈雄心，也就失去倚託。

提到文章報國，我們可以提出兩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四年），梁啓超（任公）與黃公度、汪康年在上海創刊時務報，辦報的動機，梁任公說：『自審舍言論外未由致力，辦報之心益切。』時務報由任公擔任總撰述，「每日報中論述四千餘言歸其撰述，東西各報二萬餘言歸其潤色，一切奏牘告白等項歸其編排，全本報章歸其覆校。十日一冊，每冊三萬字，經啓超自撰及刪改者幾萬字，其餘亦字字經目經心。」梁先生實際上是將時務報的主筆、總主筆、編輯、總編輯、校對長的各項職務一肩承擔，運用他筆底下帶感情的文字，深入淺出，痛論時政，甚得各方好評，第一年銷數達八千份左右，第二年增至一萬二千份。對當時社會發生很大影響，梁任公的文名亦因是傳遍遠近。可是經營不甚得法，經費的來源來自捐助，報份的銷數靠各省督撫整批分派給所屬傳閱，其中尤以湖廣總督張之洞贊助最多。後來因梁的一篇文章議論激烈，為張之洞

所不滿，對梁頗有責難，梁不甘於此種「殆如僱傭者與資本家之關係」，於丁酉冬（光緒二十三年）拂袖而離開時務報。他一手創辦的一份報，而且辦得非常成功的一份報，終不能不忍痛離去，前後僅為時一年半，他的文章報國的心願，其結果不過如此。

距離時務報創刊三十二年之後，民國十五年九月一日，另有三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是張季鸞先生、胡政之先生和吳達銓先生，聯合接辦天津大公報，又是以文人論政為宗旨。創刊之日，特揭示四不主義：『一曰不黨，純以公民的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有利於國者，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二曰不賣，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的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三曰不私，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他圖。即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四曰不盲，不隨聲附和，不以一知半解，不為感情所動，不昧於事實以立言。』這四不主義，使大公報贏得「獨立的大公報」的令譽歷久不衰。同為是文章報國，但實際的經驗提醒張、胡、吳三位先生，必須是純粹商業，不假政治之力，不仰人資助，獨立經營，維持報紙的生存與發展，才能達到這個目的。所以他們主張：資本獨立，人才集中。胡政之先生固然是寫文章的老手，但辦大公報，却將全部精力放在報紙的經營上面，貫徹商業化、企業化、制度化的目的。這種經營方針，不僅使報紙業務蒸蒸日上，也實現了文人論政、文章報國的最大抱負。可惜大陸局勢變化，大公報為匪竊據，要不然，大公報如日

中天，前途豈可限量。他們三位先生都是我最敬佩的，平日晤對請益，所知較多，我認爲大公報之爲大公報，到今天依然可作爲我們的典範。

## 人才是事業的骨幹

人才是支撐事業的骨幹，離開人才，不能辦事業，離開人才，尤其不能辦新聞事業。人才並不指天才，天才屬於天生的稟賦，未可強求，但從事新聞事業，不能沒有高度的智慧，智慧可於修爲中得之。智是知識，慧是了解，通達事理，明辨是非，就是智慧。孟子說：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好學深熟，即可增進智慧，孜孜不倦，終必豁然貫通，佛家講棒喝，一旦開了智慧的竅，就可進入領悟的新境界。智力有高下，可用科學方法作測驗，智商超過一百就是常人以上的聰明，另外又可作性向測驗，不適宜習醫的勉強學醫，性不近於文學的勉強學文學，都不可能有所成就。至於做新聞記者，至少要有旺盛的求知慾，有豐富的同情心，有不畏艱難適應環境的能力，有激濁揚清、辨黑知白的性格。天性中缺乏這些氣質，最好還是不要做記者。

白鵬飛先生在「我對於新聞記者之希望」一文中說得很好，他說：

『新聞記者雖爲一種職業，然其神聖微妙之任務，則實超越於任何職業之上。以言啓迪愚蒙，開發民智，則有如教師；以言發奸摘

伏，掙擊國賊，則有如判官；以言發揚民意，善導思潮，則有如產婆；以言救濟時弊，防止害毒，則有如醫師；以言涵育民德，助長民權，則有如奶姆；以言代表輿論，議論國事，則有如議員；以言抵禦外侮，維持和平，則有如士兵；以言懷鉛握槧，汲汲窮年，則有如勞工。蓋兼其他職業之所不能兼，而任他人之所不能任。故為新聞記者，非才識兼優，學德並茂，則不能勝任愉快，而完成報紙之天職。』

才識兼優，學德並茂，這就是人才。今天做新聞記者比往昔所要求的條件更多、更複雜，由於傳訊工具與交通工具的發達，把這世界縮小了，往昔面對一隅，現須面對全世界，視野擴大，所要求的知識領域亦隨之擴大。近半個世紀科學與文明的進步，超邁過去兩個世紀或三個世紀，我們何幸而生於今日五彩繽紛的世界，耳所聞，目所接，全是新事物、新思潮、新觀念，波譎雲詭，瞬息萬變。做為新聞記者，是新時代的尖兵，決不能失落在時代的後面，需要有淵博的知識以適應職業的時代要求，不但要求廣度，而且需要深度，從事這一職業，做一個出色的記者真是太不簡單。

## 具備多方面知識

提到知識，包括多方面。

第一是工具知識。譬如說語言知識，拿國文來說，必須搞通，通

到能嫻熟的運用文字技巧，靈活的表達意思，文字要大眾化、通俗化，使讀者或聽眾很容易、很順當的予以接受，顯明流暢，深入淺出，生動活潑，又不流於庸俗，嶄新的事物，複雜曲折的故事，都能用簡明的筆觸鉤畫清楚，決不是亂用成語的陳腔濫調，決不是幾十個字一長句的翻譯文體，才能達到文字的功効。其次是英文，英文在今天幾乎已變成世界語文，我還想不出在新聞記者接觸的領域中有不需要英文的地方，既然天天接觸，就得把它學好，學到聽得清楚，說得明白，寫得出來。現在的大學畢業生讀英文書、看英文報沒有什麼問題，要聽、要說、要寫，大致還要經過一番歷練。最好能懂得一種第二外國語，在工作上將格外方便。

我個人甚至將語意學和理則學也列入工具知識的範圍以內，一個記者如果不懂得運用科學的思維方法，不懂得運用邏輯的辯理，條理混雜，夾纏不清，用功再勤，仍一無是處。

第二是新聞學的專業知識。關於這方面，諸位同學正在從事學術與實務的探討，知道非常清楚。我只感覺今天新聞學專業知識比起三十年前又不知進步了多少。新聞學已擴充為大眾傳播學，研究的範圍已經擴大，眼界跟心境都已放寬。有關編輯、採訪、評論、新文學史、報業管理、廣播電視、公共關係、民意測驗，無論那一學科，專精一項，就够我們鑽研的了。印刷、廣告、發行，縱不談世界的進步潮流，就以台北各報的現況作研究對象，也已今非昔此。印刷已超越原先的手工排字、打版、澆版、裝入輪轉機那一套方法，手工排字已

改爲電動鑄字，印刷亦將採用新式機件，壓版鑄版早已放棄手工操作，照相圖片遠比以前清晰。現在一家報紙的印刷設備非但需要投下大量資金，而且工廠管理，序列的一貫工業程序，非借重專門人才不可。報紙發行，研究推廣技術，針對特定地區，特定讀者對象，配合季節時令，提供各項統計數字，作有效的推銷，同樣的已經採用了現代科學方法，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的報紙也會採用電腦來管理訂戶卡片。至於廣告，進步更有一日千里之概。報社通過業務員與廣告掮客對外招攬廣告已成歷史陳迹，現在須借重廣告代理商，廣告代理商是替工商企業開展公共關係，擬訂宣傳計劃，代作市場調查，設計各種廣告形式的代表，報紙與廣播電視是促進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密切關係的媒體。這是工業社會新型態，被視爲促進工商發展的一種有力的推動力量。廣告代理商一方面爲工商企業幫助開拓市場，一方面也爲報紙與廣播電視幫助開拓廣告領域。報紙及其他廣告媒體，必須取信於廣告主，使其達到甚至超過他預期的廣告効力。我在這裏簡單的提及新聞學的專業知識，不論是學術觀點或技術觀點，都深覺有浩瀚無涯之感。

## 新聞寫作與深度報導

第三是有關寫作的專業訓練。新聞工作原不限於寫作，參加管理工作與技術工作同樣重要。但通常提及新聞記者，都偏重於寫作，一如提及航空，首先想到飛行，提及航海，首先想到駕駛一樣。推許某

人爲名記者，一定是以寫作見長，既以記者爲職業，採訪與寫作的確居於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我的交往中，結識不少享有盛名的專欄作家，對於他們敬業的精神和認真的工作態度令人由衷敬佩。一般人只羨慕專欄作家的權威地位，却不甚了解成爲專欄作家以前，兢兢業業，鍥而不舍，增進學識修養，鑽進一個專門問題付出心血的辛苦代價。既享盛名以後，窮研事理，觀察銳敏，必須有絕對把握，然後大筆如椽，一揮而就，發人之所未發，才致洛陽紙貴，爭相傳誦。專欄作家對於所專的問題保有極爲完整與珍貴的資料，聘請助手代爲蒐集資料、整理資料，更重要的是對他個人所專，具有淵博的知識，又有便利取得較新、較確實的情報，並了然突發事件的背景，再通過訪問、觀察、研判，然後才下筆。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專欄作家已然熟知天下事，但決不放棄實地採訪，獲取第一手的資料，才成功真正的專欄作家。

我自問讀報讀得相當仔細，遇到一件重要的新聞，也喜歡就各報的報導作比較，這是個人的習慣和興趣，讀到這一篇精彩的報導，再次欣賞。我所謂精彩報導，必然要文章優美，一氣呵成；必然經過策劃與設計，多角度的採訪，是一條完整的報導；必然尊重讀者而不教訓讀者，不代替讀者作判斷，不隨意用形容詞，而只敷陳事實，言之有物，句句結實。

美國的新聞學教授高普魯先生倡導「深度報導」，其主張深獲我



心。所謂深度報導，「將新聞帶進讀者關心的範圍以內，告訴重要的事實，相關的原故以及豐富的背景資料。」深度報導所要求的不僅須具備新聞眼和新聞鼻，而且更須有新聞腦。哲學家的敏銳思考，史學家的勤蒐資料與科學家的求證精神，合成深度報導所需要的研究精神。殫精竭思，不忽略任何角度。從事深度的新聞報導，專家主張：高級編輯人員經常去和學者座談，參加科學簡報和外交研究所，如有可能，最好每隔幾年進入研究院從事某項學術的進修，以免知識落伍。編輯們和當地大學的人文思想學者經常定期交換有關新觀念的意見。新聞工作者不要老是跟同行同業混在一起，而要和非新聞工作者多多接觸。負責指揮採訪報導的採訪主任，須真正具有知識感，處理一則有關人性新理論的新聞，具有與處理一則飛機失事新聞同樣的熱忱。報社經常派科學記者、醫藥專欄作家、教育編輯等出外旅行，和派遣體育記者一樣。採訪和編輯幹部經常接受在職訓練，使職業水準和讀者的教育水準，得以同時提高。必須如此，始能盡深度報導之能事。

講到這裏，我想起一個故事，說明記者不好做，名記者更不好做。前面說過梁啓超先生辦時務報很成功，聲譽鵲起，跟他同時代另一位有名的學者嚴幼陵（復）先生，翻譯天演論等名著，享譽比梁先生更早，年齡也比梁長，他非常賞識梁，唯恐他少年得志，得意忘形，寫了一封信給梁，裏面有兩段話，一段說：『苟所學自今以往繼續光明，則視今之言必多可悔。』意思是說，假如你的學問繼續有進

步，到將來看今天你所寫的文章，有不成熟的地方，必會感到後悔。另一段說：『毫釐之差，流入眾生識田，將成千里之謬。』提醒他文人着筆，一點也錯不得，必須謹而又慎，否則會發生不良後果。梁先生畢竟是智慧高而又肯虛心接受規勸的人，立即回覆嚴先生的信，在信上說：『數月以來，耳目所接，無非諛詞，貢高之氣，日漸增長，非有先生之言，則啓超墮落之期益近矣。』坦率的承認錯誤並感謝糾正，但亦有苦衷：『譽者漸多，而忘其本來，又困於賓客，每爲一文，則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脫，已付鈔胥，非直無悉心容定之時，並且無再三經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遼草塞責，亦幾不免。』原來賓客太多，時間不夠，有時給自己原諒，但亦終覺不妥。信中再這樣說：『又常自恕，以爲自不過報章信口之談，並非著述，雖復有失，靡關本原。雖然，就今日而自觀前次之文，其欲有所更端者，蓋不啻數十百事矣。』報紙所載文章，豈可視爲信口之談，報紙傳遞之速，影響之快，超過書籍，梁先生如此低估報紙，我頗有些不服氣。我在想，可惜梁先生早生五十年，如其在今天，他體會到報章中有所謂「深度報導」，以他的聰明智慧，和他「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宣戰」的勇氣，他會對於報章文字重新估價的。

## 相關的科學知識

第四是相關的科學知識。從以上所述，已知做新聞記者必須具備豐富的科學知識。密蘇里大學新聞學系的課程標準，只有百分之三十

是新聞學專業知識，百分之七十講授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等相關的科學知識。我想這是有道理的。例如歷史知識，人類的文化發展有一脈相承的軌跡，鑑往才可知今，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必須了解過去的源源本本，才能認識今日事象的全盤情況。假如不了解美國兩黨政治演變的歷史，就沒有方法採訪美國大選的新聞，不知道猶太人亡國兩千年的歷史，就沒有方法說明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衝突的真實原因。地理知識同樣重要，新聞的發生未必發生於一定地點，也許在世界這一角落，也許在那一角落，沒有足夠的地理知識，就摸不清底蘊，還談什麼採訪。

經濟知識非常重要，經濟活動操縱人類的命運，決定人類的生活方式，影響國家的強弱與世界前途。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把整個世界歷史改寫了，自由中國今天能在複雜的國際局勢中挺得住，我們經濟發展有非凡成就是個重要因素。經濟知識是專門學問，不要以為複雜深奧就不去碰它，不懂，學著去懂，不知，努力求知。

法律知識與記者的職業須與不可分離，我們是法治國家，我們鼓吹民主法治，民主與法治相輔相依，離開法治不能談民主。民選的縣市長究竟是政務官抑是事務官，這是法理問題；大法官解釋法律，如果認為與憲法的立法原意相違，是否構成大法官違憲，又是法律問題。密醫殺人，偽藥殺人，而竟不能澈底搜捕、澈底取締，就因為原來的法律有了漏洞。政治外交，教育措施，工商活動，家庭構成以及個人行為，沒有一樣不受法律的約制，如何是守法、合法，如何是違

法、犯法，都應該有清楚明白的概念，才不致盲人瞎馬，才不致南轅北轍。新聞記者而缺乏法律知識，不曉得給社會製造了多少紛擾。

此外關於社會學、心理學也須有廣泛的知識。社會學是研究羣體關係羣己關係的學問，心理學是研究人際關係及了解人的行爲、個性、人格的學問。新聞記者不懂這些，從事深度報導便無從入門。

以上所說是基本知識，但知識的範圍很廣袤，尚須隨時留心，隨時涉獵。譬如自然科學，理論的與實用的，能够吸收多少就接受多少，一個現代人不能拒絕知識。自然科學太專門，無法深入，但至少要具備常識，矢志做科學的忠僕，不作科學的叛逆。醫學常識就特別緊要。人，構成新聞的主體，人的生與死，人的疾病，民族健康，公共衛生，這些課題無一不與醫學常識有關。其他太細密的事情，屬於科學記者或科學專欄作家的職責，他們專精的程度超過普通的專家，到甘迺迪角採訪的科學記者，對於太空科學的造詣，或許超越於一般大學教授。

新聞記者的任務爲滿足讀者或聽眾的求知慾，而最先獲得滿足的是記者自己，這是記者的幸運。「新聞記者這個職業有如攻讀一所永無畢業期的大學」，這句話具有不朽的價值。

## 記者需要藝術的陶冶

第五是藝術的陶冶，人在歡樂的時際自然發出歡唱，在愁苦的時候，也以悲歌來發洩胸中抑鬱，我們隨時隨地接觸音樂。初民社會即已產生了繪畫，或民間藝術，或是宮庭藝術，到處充滿繪畫，這裏也是圖畫，那裏也是圖畫，一張廣告也是圖畫，我們隨時隨地接觸。音樂與繪畫代表民族精神，最足以表現民族的特性與風尚習慣。

新聞記者不一定每個人具有這方面的天賦與才華，但至低限度要培養欣賞的興趣。因為藝術能陶冶一個人的性情，孕育高尚的情操，進而增進生活情趣，改變一個人的氣質，養成高雅的風度，而這些正是忙碌的記者生涯所迫切需要。成舍我先生的生活非常嚴肅，但却醉心於崑曲，偶爾高歌一曲，用以調劑生活。董顯光先生年輕時做記者，有一次報社派他去採訪音樂會的新聞，他對此是門外漢，一籌莫展，惶恐的不得了。後來他想出一個主意，看到座位附近的老先生，似覺對音樂深具修養，於是專心注意老先生的表情，是點頭，是搖頭，是讚賞的意思或是不敢恭維的意思，由此了解一個大概，根據這個寫了新聞，雖說交了卷，但董先生心裏一直不踏實。他說當時因為沒有欣賞音樂的能力，使他吃足苦頭，由此得到一個深刻教訓。

藝術修養豈僅新聞記者需要，人人都有需要。近代大政治家邱吉爾，叱咤風雲的名將艾森豪，公餘之暇，以繪畫為嗜好，都有不尋常的成就。他們不是為了消遣，而是為精神生活加注潤滑劑，才能迴旋從容，擔當起世界責任。

## 新聞教育的責任

我事先聲明是漫談，拉拉雜雜談了很多，由新聞事業談到新聞記者，特別強調做一個優秀的記者實在非常艱難，但一想到我現在站的這個地方是在新聞教育的最高學府，即或再艱難些，依賴新聞教育可以將問題解決，因此心中的懸慮感到輕鬆些了。我們應該可以這樣說：中國新聞事業前途的開展，新聞業者自身的努力負一半的責任，新聞教育負起另一半的責任。

諸位同學既然選擇新聞事業為將來的職業，我願重複我已經講過並複述若干前輩先生對於新聞記者的期望。打定主意做記者，就一輩子做記者，不為外物所誘，決不中途改計，否則還不如趁早放棄，因為這條漫長的道路是艱苦的也是清苦的。

再則，新聞教育傳知、授業，不止是學理方面技術方面的授受，而尤須著意於品格的修養，養成堅貞不移的節操，受人尊重的品德。新聞記者和法官一樣，德不副學，所學適足以濟其惡。我國賢哲有些格言，對於新聞教育提供了確切不易的指導原則。「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應是我們的座右銘。「慎思之，明辨之。」凡是作學問功夫的都當具備這樣的科學態度，特別是學新聞的更須奉為治學與治事的基本準則。易卜生說：『你的最大責任是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器。』謹以此語移贈給今天在座的諸位同學。

（此為蕭先生於民國四十八年在政治大學演講詞，載於「大眾傳

播學術論文集」)

# 開弔那天

中央社

一面青天白日黨旗，輕輕地、莊嚴地，覆蓋在咖啡色的靈柩上，蕭同茲先生安息了！

兩千多位蕭先生的老朋友和年輕的朋友，於十一月廿五日從海內外各地趕到台北市立殯儀館，向這位永遠帶著慈祥笑容的長者，致最後的敬意。

上午八時，喪禮在哀樂中開始，景行廳的人羣越聚越密。九時，榮星兒童合唱團的四十多位孩子，仰著小臉，用他們全心的愛，在蕭爺爺的靈前，獻上他們誠摯的歌聲。小天使們的祝禱和讚頌，溶入每一位追悼者的心裏，齊聲共鳴。

在「聖母頌」的餘韻中，治喪會主任委員黃少谷，率領全體治喪委員，向總統府國策顧問蕭同茲先生，獻上一束鮮花，一柱香，和無盡的追懷與哀思。

人羣慢慢地、靜靜地繞過蕭先生的靈柩，瞻仰遺容。八十歲的蕭先生一臉平和，十五分鐘心臟病的突擊，似乎沒有給他留下絲毫的痛



楚，他老人家走得那麼輕悄，那麼灑脫，就像他生前所期盼的：『活要活得好，死要死得快。』



黃杰、周至柔、袁守謙和馬星野在靈柩上覆蓋國民黨旗

黃杰、周至柔、袁守謙、馬星野四位委員，輕輕地把一面中國國

民黨黨旗，覆蓋在他們老同志的靈柩上。這面青天白日旗，與懸掛在靈堂正中，蔣總裁題頒的「宣勞著績」輓額，輝顯出蕭先生畢生盡瘁黨國，永垂不朽！

副總統嚴家淦和張羣、何應欽、陳立夫以及各院部會首長，也都分別到靈前致祭。

蔣經國先生主持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公祭禮。他致送的兩籃白菊花，安放在蕭先生靈案的兩邊。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公祭，中常委兼行政院長蔣經國主祭，前排自右至左，谷正綱、蕭贊育、黃杰、黃少谷、蔣彥士、張寶樹。

這天上午，台北不停地飄着細雨，市立殯儀館前的馬路，曾一度被弔祭者的車輛堵塞，殯儀館景行廳的人羣，更是絡繹不絕；數不清的鮮花和輓幛，綴滿了靈堂，更延伸到廳外的廣場直向馬路。每一幅

輓聯，是一段追思；每一籃鮮花，是一份摯情。蕭先生散播在他的朋友們心中的，是真、是誠、是無私。

在蕭同茲先生的八十年生命歷程中，他把最「黃金」的三十二年又六個月獻給中央社。儘管他已離開這座傾他一生精力創建與養育的通訊社，但是，九年來，他的「平凡的實踐」的精神，仍是中央社同人工作的憑藉。當這位老社長的靈柩，經過中央社總社的大門口時，中央社前任社長曾虛白、馬星野和現任社長魏景蒙，以及同仁們，在雨中設奠致祭。



台北榮星兒童合唱團在靈前唱晚歌

十幾個機關、團體、學校的公祭禮，於十一時結束，接着發引。蕭先生的家人，遵從他老人家的遺囑，舉行火葬。靈灰將暫厝陽明山公墓，擇期葬在他的夫人的旁邊。

蕭同茲先生走了，就像他一生服務黨國一樣，一介不取地走了；  
留下的是無數位敬愛他的朋友們永恆的懷念。

# 六秩壽序

洪蘭友

抱朴子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染其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瓢舠所校矣。茫茫乎非跬步所尋矣。此數語者，徵諸今日，則吾友蕭同茲兄有之。蘭友識同茲兄始於民國十五年，傾蓋之始，見其神姿高朗，如瑤林瓊樹，光彩照人，蓋翩翩佳公子之風範。初尚不省其即為三湘革命激昂之士，曾參預黃龐之役，策動工運於荊楚之間，遭軍閥嫉視，欲得之而甘心者也。迨國都初奠，黨事方適，相與供職中樞，晨夕晤對，更服其通明雅正，器識弘贍，論事侃侃，則具衡嶽雄勁之氣，凜然若不可犯。及退而與人交遊，則虛懷若谷，不肯稍過於人。蘭友敬之篤，而慕之深，以為欲學不可及。而兄之於蘭友，其過相期許者，亦復如之。迄於今垂三十年，此三十年中，亦世變最亟之時，同茲兄每臨艱鉅，靡不貢其才智，竭其勞勤，或折衝於樽俎，或獻替於議壇，嘉績良謨，非可殫述。尤以主持中央通訊社達二十餘年之久，為兄生平最悠久最炳煥之事業。方其受命之始，於篳路藍縷中慘澹經營，漸次開拓，卒能遍設分社於國內外，蔚為國際間新聞樞紐之一。經抗戰至於反共抗俄，所奮効於黨國，正視聽於世界者，建樹至溥。而又不矜不伐，謙沖自守，退然若無與其事者，是

其沉潛堅毅之涵養有度，越尋常者矣。故綜其行誼，持躬則淡泊，待人則仁厚，懋事功而無宦情，重公誼而無私怨，於出處進退之際，常視之怡然，雅度淵衷，良足爲多士之範，此不獨蘭友一人之私言，凡識同茲兄者多樂道之。今同茲兄年六十矣，清健康疆，而倜儻之襟懷無殊少壯，是共德量之醇粹，有以養其天和，必更臻上壽者也。欣直周甲介祉之辰，謹貢下俚之辭，藉晉南山之壽。同茲兄其聽然爲滿引一觴乎。

愚弟洪蘭友拜撰并書——中華民國四十三年歲次甲午農曆九月穀旦



# 七秩壽序

錢大鈞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甲辰九月，摯友蕭同茲先生七秩榮慶，戚友紛謀爲先生壽。大鈞與先生締交逾三十年，習聞雅論，時親過從，深知先生立身治學，本末純一，才識卓越，廣結天下英俊之士，往往片言九鼎，爲各方所推重。早歲造福桑梓，主持勞工會成績斐然，爲羣眾所愛戴。民國二十一年承今總統蔣公之命，接長中央通訊社，時值九一八事變未久，外侮憑凌，國難方亟。先生實施新聞救國之策，宏揚正義，鼓吹中興，於時政頗多匡益。其對社務擘劃周密，規度恢宏，本公正無私精神，樹立合作互助信念。其處理新聞則慎思明辨，分秒必爭，謀慮既甚周當，傳遞必求神速，躬行實踐，自立立人，於以奠定中央通訊社之強固基礎，而贏得中外人士一致之贊揚。當抗戰初期，余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時，先生在中央通訊社，每有重要新聞或軍事情報，無不立以電話通知，供余參考，余因此得據以爲準確之情況判斷，進而作有劾之建議與措施，厥職無添，多出於先生之協助，使余永遠不能忘懷者也。先生學問淵博，修養功深，余夙甚景佩。每於友朋間論談先生之品德，皆無不以溫柔敦厚爐火純青八字譽之。余遇有不能解決之事，必

請益於 先生， 先生亦無不竭誠指教，使余頓決疑難，其對朋友之真誠有如此者。經傳謂天下有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觀乎先生之行誼，概足以當之。今 先生雖年臻古稀，而精力充沛，豪邁之氣，不減當年。國家方亟圖復興， 先生為新聞界先進，且夙為領袖所倚重，深信必更能發抒忠藎，外揚教化，內贊廟略，為中興復國而益宏獻替也。 先生弧辰，謹以所知書此以為 先生慶。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九月弟錢大鈞敬撰并書

# 生平事略

## 治喪委員會

先生諱異、號涵虛、字同茲，以字行。世居湖南常寧，爲湘南大族，耕讀傳家。尊翁越民公始懋遷川黔粵贛間，丈夫子五，先生行三，生於民國前十七年。童年就讀私塾，鼎革後，赴衡陽就學，次年負笈長沙，入中等工業學校，即湖南甲種工業學校之前身，民國六年畢業。先就長沙電燈公司職，後改入湖南第一紗廠，旋復離湘北上就業於天津機械工廠，雖所學得以致用，然非其素志也。

當時軍閥倡亂，禍國殃民，而共黨潛滋，復散播其毒素思想於青年羣眾間。先生默察變亂之因，深明順逆之辨，認爲非崇奉國父之三民主義，發爲革命行動，無以救亡圖存，乃毅然敝棄所業，返湘從事工人運動，在軍閥壓迫與共黨鬥爭中，糾合同志，艱苦奮鬥，屢蹈危機，終不曲撓。民國十年一月，長沙黃龍事件發生後，先生幸免於難，乃隻身走滬上，晉謁國父。十三年正式加盟中國國民黨。五卅大罷工之役，與共黨爭領導，制止共黨破壞工廠設備之暴行，先生盡力獨多。

十六年初，服務中央黨部，參預工運、民運、宣傳諸活動，明敏

果決，勇於任事，爲諸先輩所器重。隨後弼贊吳鐵城先生促使東北易幟，完成全國統一之局。二十一年春，奉派爲中央通訊社社長。廿四年被選爲第五屆中央委員，卅四年被選爲第六屆中央委員兼常務委員，卅九年、四十六年、五十二年及五十八年全國代表大會，均承總裁蔣公提名爲評議委員，四十三年奉 總統聘爲總統府國策顧問，均迄今茲。

當 先生受命主持中央通訊社時，社址設於中央黨部內，僅敝屋三楹，員工不過二三十人，秉承發佈者以公式宣達爲多，未能發揮新聞報導與宣傳之作用；而外國通訊社，如英國之路透，日本之電通，法國之哈瓦斯，皆於治外法權掩護之下，隱然操縱國人視聽。先生有鑒及此，認爲非健全機構，延攬人才，積極展開新聞報導之業務不足以有爲。乃於任事之先建議三事：一爲對外獨立，使成爲社會文化機構；二爲以新聞爲本位，發稿取捨不受干預；三爲用人唯才，由社遴選。中央悉准其議。

於是中央社之大本大經以立， 先生遂得放手有所作爲。厥後中央社業務逐年發展，二十二年開始，於七大都市自設電台，與總社直接互傳電訊，旋並成立強力發報台，每日以摩爾斯無線電定時對全國廣播，從此小城小縣之報紙均得抄收當日發生在國內外之重大新聞。同時，先後交涉取得四國五大通訊社之在華發稿權，爲國內外人士不復爲外電之欺瞞浸潤，建立堤防。凡此中國新聞事業新頁之展開，其餘民智之啓發，國本之維護，實有莫大之助力。

邇後中央社鼎盛時期，分支單位在國內者五十有二，在國外者二十有五，全社員工達二千六百餘人之眾，實皆肇基於此，然亦非先生之高瞻遠矚，氣魄沉雄，勇於任事者，莫克致此閎偉之事功。其用人也，以適才適所爲準繩，不以異己而置疑；其治事也，以分層授權爲原則，不以小疵而苛責。視同事如昆季，能急人之急，雖從井救人無返顧。故皆樂爲効命，一德一心，盡忠所事，遂得收不令而行、人自爲戰之効。昔日同儕在今日新聞界不乏卓然有所樹立者，悉皆出於於先生當時拔擢培育之力也。

廿六年至卅四年，對日抗戰時期，中央社追隨政府播遷，由漢口而至重慶。八年之間，先生雖奔走不遑，但指揮若定。除於大後方及各前線普遍佈置報導據點及戰地記者，採發全面戰時新聞之外，尤足稱道者：一爲淪陷區原駐記者多數轉入地下工作，在敵偽追緝迫害下，透過祕密電台與總社每日聯絡，繼續揭發敵偽暴行。二爲派遣特派員分駐盟軍各個總部，與世界各大通訊社記者比肩採訪重大戰役新聞。三爲設立貴陽、長沙兩準備電台，重慶在敵機疲勞轟炸時，總社同人移入防空洞工作，仍得透過準備電台維持電訊交流及對全國之新聞廣播。四爲加強國際宣傳，除爲駐華記者多方服務外，並對海外直接發電，宣揚國情，一面增進友邦對我國之了解，一面使各地華僑報紙獲得有關祖國之正確消息，其於激發僑胞愛國熱忱，澄清國際視聽，團結海內外民心，其功尤偉。

先生與同人同甘苦共患難。廿八年五四大轟炸，重慶鐵板街總社

社址直接中彈，員工二人殉職，先生當時於斷垣殘瓦中掙扎奔出辦公室，塵土被面，衣履污垢，立即指揮員工處理善後，恢復編採與電訊工作，沉着鎮靜，若無其事，設非修養精純如先生者，曷克臻此。

抗戰勝利後，先生復擘畫社務更進一步之發展，於首都建七層大廈，供總社及中外駐京記者辦公之用，並設置強力電台，以擴大收播電訊之績効，惜以大陸陷匪，播遷來台，致不克盡一日之用，先生固深感宏願莫償，亦中央社全體同人所共引為遺憾者。三十九年九月中央社改組，先生改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五十三年十二月離職。綜計先生主持中央社社務者垂三十有二年，在此期間，先生之心力悉盡瘁於此，中央社自孩提以至於成長茁壯，可謂胥在其懷抱培育之中，而此一事功影響所及，固又不徒中央社本身之成就而已。先生性行高潔，襟度冲夷，與人無競，而是非義利之辨極嚴，居恆欲然若不自足，沈默寡言，然待人接物一本誠信，故皆樂與交遊。來台後，雖繁勞稍減，而匡時之志不衰，每以餘力貢獻於社會、教育與經濟事業。並世賢俊有所經營，輒以獲得先生之贊助為光寵。

先生身體夙健，晚年鬢髮雖霜，神明彌旺，衣履修潔，飲啖如常，了無頹唐之態。近十年來每日作保齡球運動，無間寒暑。四十三年十一月，忽發現患心肌阻塞症。四十六年八月復發一次，經數月治療，均告康復。因血壓稍高，十餘年來，每週均就醫檢查，並服治高血壓藥物，平日除偶有輕微感冒外，從無其他疾病。本月二日，以感

冒延醫診治，四日感冒已愈，而血壓突增，八日感冒復發，經醫慎重診治，並開始服用抗生素。十一日上午，惟覺喉部不適，親赴醫生診所就治，認定一切情況皆正常，但囑靜養，詎料當晚九時五十分突感不適，欲吐，而痰湧喉部，哲嗣孟能夫婦及孫婿周其新、孫女近仁扶擁上床，不及二十分鐘，即溘然長逝，急召醫來，已回生乏術矣。據醫生診斷，仍係心肌阻塞症復發所致。

耆賢遽逝，國喪元良，永懷功烈，怛惜同深。因略述先生生平事迹，以誌敬仰哀悼之忱。先生元配吳夫人珍芝，繼配劉夫人紹賢、陳夫人再君均先後病逝。長公子孟能、仲申建、季伊文均授室；女宛君適胡；孫四，孫女二，外孫二，外曾孫二。後昆濟美，善慶方長，宜足以慰先生在天之靈矣。

# 墓表

## 袁守謙

先生姓蕭氏，諱異，字同茲，號涵虛，湖南常寧縣人。少壯時，目接身遭列強之侵逼，軍閥之禍亂，憂懼國亡之無日，毅然棄其專習之工業學，奮赴革命救國行列中，入中國國民黨為黨員，初致力工人運動，旋服務中央黨部，所歷職事，皆卓卓可紀述，上級察其能，遂有主政中央通訊社之命，時民國二十一年也。先生受命之日，以駕篳路、服藍縷之志行，開闢蒙塞未啓之山林，然獨能見其遠，持其大，凡所區劃，都為百年大計，故其作始也雖棘，其成功也則鉅。自中央社之設，我國乃有獨立自主之通訊體系，始不為列強通訊社左右我時局之新聞所淆亂。而政府之政令，國家之要聞，得以遍達全國通都僻邑，所為啓迪民智，增進國民對中央向心之無形影響力，復不可以里程計。洎及抗日大戰起，中央社記者遍布於國軍前線、盟軍總部、淪陷地區，電訊直接通於友邦，於是戰報敵情、敵人暴行、偽組織行動之報導，與中央抗戰決策之宣揚相配合，其於激勵民心、士氣，僑胞愛國熱忱者，或不下於百萬大軍之戰力。凡此，皆先生主持中央社功蹟之尤大者。三十八年共匪篡竊，中央社盡喪其大陸已有之業蹟，及其正在開拓之雄圖。然先生猶能鼓其餘勇，遷至台灣，重行佈署，力



圖恢復。三十九年中央社設管理委員會，先生改任主任委員，五十三年卸職退休，綜計主持社務垂卅二年，畢生心力，盡瘁於斯矣。方先生之肩負大任也，志氣堅定，才情橫溢，若不知天下有難致之事者，及其倏然退息，則又襟度冲夷，歆然若不自足者，此非學養德量之厚蓄積，其克至是耶。先生歷任中國國民黨第五屆、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七屆至第十屆評議委員，四十三年總統府聘爲國策顧問，均迄今茲。先生生於民國前十七年，歿於六十二年，春秋七十有九。元配吳夫人珍芝，繼配劉夫人紹賢，陳夫人再君，均早世。子孟能、申建、伊文、女宛君適胡，孫四、孫女二。以民國六十三年春與陳夫人合葬於陽明山之陽，吳夫人原葬常寧藍江祖塋，劉夫人原葬上海永安公墓，孟能今並以空襯會瘞於此，冀精魂所依，重聚泉下，亦孝思不匱之意。墓既竣，朋輩命守謙表於其上，謹撰文并系以辭曰：

歿也忽諸，存也迥然，怛化與晚境果如公自道之言，樂天順命，其晏晏於九泉。

# 編後記

這本書分做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念茲集」，出版於民國五十八年農曆九月十八日，是中央社同人為祝賀蕭同茲先生七十晉五壽誕呈獻給他的壽禮，由追隨過蕭先生的同人寫出他們對老長官的懷念和欽敬。第二部分是「在茲集」，出版於六十三年四月，蕭先生病逝後第二年，他的朋友和部屬為這位他們所敬愛的人所寫的紀念文章。從這一百三十篇文字裏，可以看出蕭先生為中央社以及為國家社會所作的偉大貢獻。當他百齡誕辰之日，我們特地把這兩部分合併在一起，編印「念茲在茲集」，作為永恆的紀念。

(編者)



民國四十二年